

邓小平年谱

第五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邓小平

ISBN 978-7-5073-4744-9



定价: 368.00元(全5卷)

邓小平年谱

第五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邓小平

5
1981
1997

邓小平年谱

第五卷

ISBN 978-7-5073-4744-9



9 787507 347449 >

定价：368.00元（全5卷）

邓小平年谱

第五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本卷

主编 冷溶 汪作玲

副主编 闫建琪 熊华源

中央文献出版社

参加本卷编写的有：

徐永军 高 屹 许保利

刘金田 姜淑萍 闫建琪

裴淑英 宋毅军 李红喜

张 曙

目 录

1981 年	(1)
1982 年	(93)
1983 年	(177)
1984 年	(251)
1985 年	(321)
1986 年	(399)
1987 年	(461)
1988 年	(520)
1989 年	(560)
1990 年	(604)
1991 年	(623)
1992 年	(632)
1993 年	(656)
1994 年	(666)
1995 年	(669)
1996 年	(671)
1997 年	(672)
后 记	(680)

1981年 七十七岁

1月4日 上午，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西奥多·史蒂文斯和美国共和党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阐明中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指出：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中的有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我们历来不回避穷和弱，可是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

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是有益的。我们高兴地听到史蒂文斯先生刚才讲的话，那就是里根先生在台湾问题上会谨慎从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1月6日 阅胡愈之〔1〕、楚图南〔2〕、孙起孟〔3〕建议由民主党派办一份报纸的来信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改进政协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建议》，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

1月10日 阅聂华桐〔4〕等十四位美籍华人科学家关于中国决定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的来信，作出批示：“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我过去是积极分子，看来需要重新考虑，请方毅同志召集一个专家会议进行论证。”来信对中国决定建造高能加速器持保留意见，希望中国领导人在科技政策的轻重取舍上有所调

〔1〕 胡愈之，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2〕 楚图南，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3〕 孙起孟，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4〕 聂华桐，当时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整，并建议国内科技界对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证。

△ 审阅耿飏《关于以军委名义下发紧缩军费开支厉行节约指示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军委常委各同志核阅。”

1月11日 审阅外交部《里根政府加强与台关系和我对策的请示》报告，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此事应在政治局会议上郑重讨论一次。”“最近最迫切的事，是台湾官方人士将参加里根就职典礼，外交部应就此提出交涉，并拟出对案。”此后，外交部在北京和柴泽民〔1〕在华盛顿就台湾官方人士出席里根就职典礼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官方人士出席里根就职典礼，就是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大使绝不出席典礼。后美国作出让步，以因病“住进了医院”为由，没有让已经抵达华盛顿的台湾官方人士出席里根就职典礼。

1月12日 上午，会见德永正利〔2〕率领的日本参议员代表团。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精神上的问题很多，所以搞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现在，大公无私、舍己为公、艰苦奋斗等道德观念都遭到了破坏。要恢复是一代人的问题。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如过去，动不动就打砸抢，年轻的娃娃甚至动刀子，不讲礼貌了，也不照顾别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但不是说所有一代人都如此，不过在相当一部分年轻娃娃中有这个问题。没有好的

〔1〕 柴泽民，当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

〔2〕 德永正利，当时任日本参议院议长。

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在谈到中国人事问题时指出：我们有个根本的改革，就是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搞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有才能的人上来。这是很费脑筋的问题，有很多障碍，但不这样做就没有希望。在谈到经济调整时说：经济调整越看越重要，是必须做的。调整表面上看是后退，实质上是前进。前两年我们头脑发热，想搞快反而不能快，现在冷静下来了，这就是进步。

△ 上午，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李钟玉。指出：中朝友好关系是经历过烽火考验的，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两国在国际事务和其他问题上是一贯相互支持的。中朝友好关系一定会继续加强和发展。晚，同李钟玉单独会谈，向他通报并请转告金日成：我们中央政治局已经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至于华国锋辞职后，党的主席人选，可以告诉金主席，我是不会当的，因为年纪大了。

1月16日 上午，会见日本众议院副议长冈田春夫和夫人一行。在谈到中国经济调整问题时指出：前一个时期，我们缺乏经验，有点急，一些见效慢的项目搞得太多太大，超过了自己的能力。我们总结经验，决定进行调整，不调整不行。去年底我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经济调整。但是，调整并没有改变原来确定的政策，比如对外开放政策、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正确的，还要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不调整当前的国民经济，财政继续出现赤字，物价势必上

涨。调整国民经济，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是一时的后退，实际上是前进。经过调整，我们就可以在经济发展上迈出更加稳定的、扎实的前进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整经济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在谈到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时指出：国际、国内都把这三十一年的成绩估计低了。总的来说，三十一年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成绩不少，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一片漆黑。总结历史要把这个体现出来。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美关系问题。

1月17日 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负责人汇报某部炮兵团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1〕的情况。指出：炮兵团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是敌我界限的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一般的错误问题，是思想、立场附和郜怀明的反动思想、立场的问题，是要另立党、另立政府、另立军队这样一个问题。炮兵团问题是北京军区的一个严重的动态，也是全军部队的一个严重动态，一定要引起严重注意，不能小看。北京军区要组织专门调查，解剖麻雀，弄清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作出具体分析、具体判断，有针对性地对部队进行教育，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并在北京军区党委关于炮兵团事件处理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常委各同志，“这是发生在军队里的一件至为严重的、明目张胆

〔1〕 1980年11月，河北省鸡泽县武装部军械库临时工郜怀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炮兵团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炮兵团负责人两次召开团营干部会议，为他的反动宣传提供条件。1981年，郜怀明被北京军区法院以策动叛乱罪判刑，事件中的其他责任人也分别受到刑事处罚或党纪、政纪处分。

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好好解剖的一个麻雀”。

1月19日 上午，会见巴基斯坦军事代表团。在介绍中国经济调整情况时说：调整不意味着改变政策。我们的各项政策，包括对外政策，要继续贯彻。调整的是步伐。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不要过分严重估计形势，不要造成人为的紧张，天天生活在恐惧状态中不行，这对我们不利。

1月中旬 听取陈慕华^{〔1〕}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汇报，对一九八〇年所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指出：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战略性任务，一定要抓好，要大造舆论，表扬好的典型。随后，陈慕华向参加十日至十四日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座谈会的全体同志传达了这一指示。

1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对外政策时指出：对外政策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看待三个世界的划分、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这三个问题，需要好好议一议。会议还讨论了宋庆龄入党和担任国家名誉主席的问题。

1月24日 同意赵紫阳、万里、姚依林、宋任穷等商议后提出的国家机关部分部委主要负责干部调整方案。

〔1〕 陈慕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1981年3月还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1月25日 将《信访摘报》刊登的《一位团政委来信反映部队少数领导干部的思想情况》，批示印发中央军委常委和正在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同志。

1月26日 下午，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安东尼·奥斯汀·斯特里特。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国外对中国领导人职务变动、审判“四人帮”等问题的种种议论，指出：世界上有好多议论都是一种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猜测。半年前，我们的总理更迭了，我和几位副总理年龄比较大不当副总理了。今后还可能有个别的变动。这是好事情，表明中国这种人事变动在向健康方向发展。这些变动更有利于中国的安定团结，更有利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更有利于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过去一些个人专断的现象可以得到更好的纠正，因此也更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更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在晚年确实有很大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讲清楚的好处是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也教育我们自己。但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是在四十年代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肯定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我们不能丢。既然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说是“非毛化”？我们要写个文件〔1〕，主要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肯定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要把过去的问题讲清楚。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通过这次

〔1〕指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审判“四人帮”和这个文件的公布，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了，不再纠缠。我们十亿人民一心一意向前看，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努力。在谈到南北问题〔1〕和南北对话〔2〕时指出：南方和北方的概念主要不是按地理来划分的，主要是按经济情况来划分的。中国应该算南方。南北对话的目的是，北方要在经济上帮助南方。提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发达国家要真正花点力量，花点钱来帮助贫穷国家的发展。这是解决世界矛盾的方法。

2月3日 上午，会见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伦纳德·伍德科克。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发现经济上搞得太急，提出调整，但当时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够，采取的措施不得力，特别是对基本建设的调整不果断，去年才下了更大的决心。现在采取的调整措施，一是压缩基本建设项目，二是减少其他行政性开支。压缩基本建设项目，可能会影响今后三四年年的发展速度，但能使我们前进的步伐和基础更加扎实。还指出：中国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主要是政策见效。所谓政策见效，就是充分尊重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自主权，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了他们的优势和特长。在回答中共党内是否会进行整风时指出：整党整风迟早要进行，但可以缓一步，先通过教育，让那些犯错误的人在实践中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和表现。

2月5日 上午，出席全国政协春节茶话会。

〔1〕 南北问题，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关系不平等问题。因发展中国家多数在发达国家的南方，故名。

〔2〕 南北对话，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为解决双方经济关系问题进行的对话和会谈。又称南北会谈。

△ 阅美籍华人吴健雄、袁家骝教授建议中国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不应停止发展高能物理研究和电子加速器建造的来信，作出批示：“此事请财经小组审定，宜早作抉择。”

△ 阅郭维城^{〔1〕}希望中央派一位领导同志在他调职前同他谈一次话的来信，作出批示：“请任穷同志约他一谈。”七日，又将郭维城建议由中央挑选一位年轻知识分子干部担任铁道部部长的来信，批送胡耀邦、宋任穷等处理。

2月6日 将胡乔木关于中央全会^{〔2〕}议程等问题的来信，批送胡耀邦、李先念、陈云、赵紫阳阅，并批示：“此事可在近日常委会上一议，请耀邦、紫阳准备，依林、万里参加。”

2月11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外政策问题。在谈到外交战略方针时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我们的口号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个格局不要变。对苏联贸易可以维持一定数额，边界问题也可以有些接触，但涉及恢复两国关系的谈判就要慎重。没有出现新的大的情况（比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两国关系的谈判就不能恢复。这是一个大的姿态，否则就会损害我们的外交格局。在国际关系中，现在比较形象的语言是打牌。打牌是个手段，用打牌来达到什么目的，我始终怀疑。我们要从政治角度考虑外交问题，不用打牌的方式。在谈到对第三世界的

〔1〕 郭维城，当时任铁道部部长，1981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

〔2〕 指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政策时指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是毛主席晚年提出来的，是重要的贡献，我们实际上是根据毛主席这个思想做的。对第三世界的工作，今后要加强。由于我们自己还很困难，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数额不可能增加，但各种层次的友好访问和民间来往要增加。

2月12日 上午，会见日本政府代表、日本前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在介绍中国经济调整情况时说：在调整中，我们从日本和其他国家引进成套设备的建设项目有一部分要停建或缓建。这种调整是必要的，是为更好地前进打下牢固的基础。当然，这会使某些外国厂商经济上受到一些损失。我们希望能共同寻找一种更好的办法，如利用政府贷款或合资经营等方式，使停建的项目继续搞下去，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一时找不出好的办法，我们也愿意承担合理的经济责任。我们历来是不管怎样困难，也要守信用。

△ 下午，会见弗朗索瓦·密特朗^{〔1〕}率领的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在谈话中分析了爆发战争的根源，并就延缓战争爆发、维护世界和平的途径发表意见。指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能够打世界大战的只有两家，美国和苏联。任何一种力量要称霸世界，必须取得欧洲，因为欧洲才具有真正强大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维护世界和平，延缓战争的爆发，单单依靠哪一家不行，必须大家联合起来。我们多年来一直希望欧洲联合和强大。

〔1〕 弗朗索瓦·密特朗，当时任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

△ 下午，会见随密特朗来访的法国记者。指出：密特朗一九六一年访问过中国，时隔二十年又来中国访问，对增进中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是有益处的。在回答中国共产党是否打算同法国共产党进行接触时指出：就我们来说，所有法国的政治力量我们都愿意接触。在回答有关西哈努克亲王最近提出的愿意同柬埔寨其他爱国力量联合的建议时说：这是一个新的姿态，带有积极的意义，我们表示欢迎。在回答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时指出：我们始终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席在晚年确有错误，但是，就他一生来说，他对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而他的错误，尽管我们要讲清楚，但毕竟是第二位的。在回答如何看待西方对江青被判刑的反应时指出：各种反应都有，有人认为判轻了，有人认为判重了。但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中国人民认为这样判是恰当的。

2月13日 上午，在住地同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谈话。

2月14日 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1〕}作序。《序言》指出：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世界历史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激烈的动荡中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了自己的很不寻常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第一篇讲话，即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发表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和造成中国社会

〔1〕 这本文集收录了邓小平1956年到1979年的部分讲话，1984年12月由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

深刻变化的巨大成就，为世界人士所瞩目。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遭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讲话都属于这一时期。我想，这本小小的文集可能为各国对中国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及我们几十年来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从某些侧面提供一些材料。这就是我同意出版这本文集的原因。《序言》又指出：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序言》还指出：近年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使得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今天再就本文集中的同样的题目讲话，我也许会讲得更加完备一些。但是，已经客观地存在着的历史，除了不断地加深对于它的认识、理解之外，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因此，我同意照讲话当时的样子全文编入文集，不做任何改动。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

2月17日 上午，会见前来主持美洲银行北京代表处开幕式的美国美洲银行行长奥尔登·温希普·克劳森。

△ 委托邓力群打电话告诉廖承志：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请各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参考。

2月20日 阅萧洪达〔1〕报送的邓小平在一九八〇年就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问题所作的几次指示，作出批示：“军委办公会议研究”。一九八二年四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将其并入铁道部。

2月21日 上午，会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顾问任之恭〔2〕和夫人。会见后，设午宴招待。

2月23日 上午，在住地同李先念、黄华〔3〕等谈柬埔寨问题。

2月23日或24日 同意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党组关于召开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的请示。二十五日至三月六日，这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 萧洪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2〕 任之恭，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当时兼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

〔3〕 黄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2月25日 将林铁〔1〕关于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班子调整的建议的来信，批送胡耀邦考虑。

2月27日 上午，会见委内瑞拉外交部部长何塞·阿尔维托·桑布拉诺·贝拉斯科博士及其一行。指出：虽然中国与委内瑞拉相距很远，但两国关系一直很好，我们的共同点很多，对一些重大国际政治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都反对霸权主义，努力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都属于第三世界。为了抵制霸权主义，中委两国需要加强团结，共同努力。又指出：现在是多事的时代，我们友好国家领导人多接触，经常交换意见，对应付当前严峻局势很有益处。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现在不存在中国和苏联合作的问题。中国是从全球战略高度考虑中苏关系的，不只是从苏联在中苏边界驻军一百万这一个因素考虑中苏关系。我们中断中苏谈判，就是因为苏联出兵阿富汗。

2月28日 上午，在住地同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谈话。

3月1日 阅新华社记者反映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人对包产到户问题“讲了许多不恰当的话，做了不少错事”的来信，作出批示：“请书记处了解一下浙江的情况。”

3月2日 上午，在住地同宋任穷谈话。

〔1〕林铁，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3月3日 上午，听取杨得志、何正文〔1〕汇报军队精简整编情况。指出：北京、沈阳两个军区，先各搞一个集团军试点，尔后根据条件逐步再增加。至于总部体制和兵种体制是否改革，再好好研究一下，可以提出两三个方案，提交到一定的会议上让大家讨论。还指出：世界大战在几年内打不起来，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如果当前老是强调战争马上打起来，使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到打仗上面，就会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当然，军队还是要随时准备打仗的。在谈到铁道兵问题时强调，铁道兵最终要走同铁道部合并这条路。打起仗来，铁路保障主要靠铁道部。

△ 阅陈云来信，赞成他提出的由中央对潘汉年〔2〕一案正式予以复查，并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的提议。

3月4日 上午，同秦基伟〔3〕、袁升平〔4〕谈话。在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某部炮兵团的政治事件时指出：这不是一个团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全军对这样一种现象

〔1〕 何正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潘汉年，1936年至1937年间，曾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1955年错误地因所谓“内奸”问题被关押审查，1963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并被判刑。1977年4月逝世。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他平反。

〔3〕 秦基伟，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

〔4〕 袁升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估计不足。这种情况过去没有过，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要好好总结，要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好好讨论，主要是教育问题，特别是对团以上干部，当然营连干部也必要。现在看来，炮兵团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起码是思想混乱。思想不对头，会犯更大的错误。在谈到“三支两军”〔1〕问题时指出：对“三支两军”，一定要说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部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对军队本身的危害很大，对军队威信的伤害也很大。只讲一句话，就不能正确地接受经验教训。对这一点，要给干部讲清楚。对派性的危害不能低估。下午，北京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和讨论邓小平谈话。

3月7日 在住地同邓力群〔2〕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说：胡耀邦的第二个方案〔3〕不考虑了。

3月8日 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关于派军事代表团访问葡萄牙、丹麦的请示》报告。

3月9日 同邓力群等谈话。指出：送给我的历史决议的

〔1〕“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和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2〕邓力群，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3〕1981年2月17日，胡耀邦在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全体人员会议上提出：决议可考虑改变一种写法，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的任务和今后的做法。根据胡耀邦意见，有关人员将决议的题目拟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分9部分。

历史部分，看过了。总的讲，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1〕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写得差不多了。应该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心是对老人的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现在稿子是两万七千字，不要压缩了，三万字也可以，争取早一点修改好，早一点召开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定下来了，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

3月10日 上午，听取杨得志、张震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方案的汇报。指出：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搞这么一次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励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多年没有搞了，还是

〔1〕指毛泽东。

要搞一次。就按第一方案^{〔1〕}搞一次，节约一点。总参具体抓。要搞好一点，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还指出：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它对部队作风培养有教育意义。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通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人民看，这样加强了军民关系，使军民关系更好些，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随后，在张震报送的关于北京军区拟组织战役演习的来信上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

3月12日 将一封反映有些反对林彪和“四人帮”的人还在服刑，建议各地主动清理一下这类案件的来信，批送胡耀邦交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提出意见”。

3月13日 上午，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一行。在谈到中日经济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时指出：这只是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中出现的暂时现象。它不会改变我们总的前进方向，也不会因此影响我们两国长期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我相信会找到好办法，把停建的大型项目继续进行下去。当前国际形势的格局，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形势的格局，都决定了中日两国必须建立紧密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总的来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情况是六十年代以来最好的。起码有两点可以证明：第一，我国的最高领导层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几年来，我们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人民的收入普遍增加了，特别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的形势很

〔1〕 第一方案，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拟制的投入10余万兵力的演习方案。

好。这就决定了整个政治形势是很好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问题都解决了，问题还成堆。比如，“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社会风气问题，长期受“左”的思想政策影响而导致的一些错误倾向等。这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但是，这无关大局，不会引起大问题。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就是要解决社会风气不良的问题。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遇到了困难，正在进行调整，要退一步，但我们不会放弃对外开放的政策。

3月18日 上午，听取邓力群、吴冷西^[1]汇报胡乔木对历史决议稿的修改意见。指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我最早提出写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在这一点上站住了，决议才能拿出去。这是中心，是关键。写好这个问题，才叫实事求是地分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是和非、对和错，包括个人的功过。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急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在谈到宪法修改

[1] 吴冷西，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时正在北京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

问题时说：还是要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职位。中国是个大国，设国家主席，对国家有利。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五部分。

△ 下午，和谷牧会见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土光敏夫一行。在谈到中国因经济调整中止引进部分日本设备问题时指出：现在要找个很好的办法加以解决。这么多、这样大的成套设备项目，统统用现汇付款，说明我们不懂，对自己的能力估计太高了，对自己的资源例如石油也估计太乐观了，结果不但给自己带来困难，给日本的企业也带来了困难。对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处理不好会在我们人民当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日本朋友提出很多好建议，说可以寻求日本的一些援助，把其中的一些引进项目继续搞起来。如果能找到好方法继续建设这些项目，使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快一点，耽误的时间少一点，对我们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很有利的。中日两国经济合作前景很好，能够合作的领域很多。现在不搞大项目，但中小项目可以搞。合作的领域也不限于化工、化纤，其他方面也可以搞。我国有关对外经济合作方面的法律不完备，一下子也制定不出来，可以通过实践完备起来。会见后，出席谷牧举行的招待宴会。

3月21日 阅曾涛^[1]、穆青^[2]来信，同意信中提出的新华社创办《经济参考》的办刊方针。《经济参考》的办刊方

[1] 曾涛，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2] 穆青，当时任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兼总编辑。

针是：把新华社搜集到的国际国内有参考价值的经济动向、预测、行情和经营管理经验等，介绍给各级领导干部、经济部门和工农企业的工作人员。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经济参考》创刊。

△ 将赵东宛汇报掺氮、锆铝、汞释放剂和锆石墨等四种消气剂的研制和应用情况的来信，批送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来信介绍这四种国产消气剂的性能和质量都赶上了国外最好公司的同类产品，拟从一九八一年开始逐步将它们打入国际市场。

3月23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听完福特转达的里根总统期待着美中两国在建交公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两国关系的口信后，指出：我们非常高兴里根总统采取明智立场。中美之间没有别的问题，就是一个台湾问题。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遇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也还是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冷静地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台湾问题不难处理。如果我们违背人民的愿望，对一些问题采取容忍态度，处理不恰当，人民有理由责备我们。因此，对像荷兰向台湾出售潜艇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不作出相应的反应^{〔1〕}。美国在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这件事上可以做很多工作。台湾人民的感情我们是了解的。如果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处理得好，经过一段时间，当然也不是短期，比如三至五年，海峡两岸可能发生接触。如果美国政府处理不恰当，实际上给台湾打气，给蒋经国

〔1〕 1980年11月29日，荷兰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决定批准荷兰公司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5月5日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降格为代办处，5月11日荷兰驻中国大使馆也降格为代办处。

打气，台湾就根本不可能同我们谈判。目前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就是这样的性质。坦率地说，美国这样做，并不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了不起的威胁，但是对我们用和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制造了障碍。

3月24日 上午，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我们现在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看起来是见效的，比如说农村政策。“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在农村政策这个问题上有很好的思想，他提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要相结合。但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个思想，采取了一些超越我们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因此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政策上，我们叫解放思想，就是每个公社、每个生产大队和每个生产队，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来考虑问题，要因地制宜，加强责任制，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实行新政策很见效。我们的这些农村政策，很自然在人民和干部中间提出了一个“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四人帮”鼓吹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谬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甚至污辱。向穷的方向发展，这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强起来。难道穷就是社会主义吗？农民收入增加是不是资本主义？靠自己的劳动成果增加了收入，这是什么资本主义？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交往，但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内。如果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不发达，没有购买力，那样，哪会有国内市场？我们看到，现在的政策正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最有效的政策。这就教育了我们那些原来

不理解新政策的干部和群众，使他们开始懂得了这些道理。当然，并不是说，这方面没有问题了，问题还是有的。但是，大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还指出：现在，不仅国际上，我们国内也有人说我们在搞“非毛化”。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所以我们说要正确评价毛主席。毛主席的一生，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在后期确实有不少错误，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也有些失误，比如说“大跃进”，但这些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因为当时我们也参加了中央领导。就我来说，我也要负责，否则不公道。“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的主导方面是正确的。毛主席确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毛主席确实错误不小，但他的好多见解也是正确的。比如，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反对霸权主义，确定中国永不称霸，确定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些思想都是很好的，将继续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我们必须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评价毛主席的各个方面，目的还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这对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很必要的。

△ 看望陈云。陈云对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两点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

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

3月26日 同邓力群谈话，就有些人对《人民日报》三月十日社论《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提出异议一事，询问了社论发表的经过。指出：中央工作会议〔1〕以后，《人民日报》的工作有显著进步。三月十日社论发挥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总的说可以，只是未提右的倾向和四项基本原则，不够周全。批评右的倾向的话一句不提，包括讲党的历史只讲“左”的危害，没有讲陈独秀右的危害，王明后期右的危害。文章似乎给人一个印象，二十年来一贯“左”倾。但总的说，问题不大，不像反映所说的毛病那么大。那些同志把问题看得太重了。因为在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受“左”的影响的问题。对不周全的地方可以采取陆续发表一些文章的形式进行补救，再写社论没有必要了。三中全会后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些要继续贯彻执行，在贯彻执行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要防止和反对来自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是“左”的，一是右的。作为领导思想，重点是防止、纠正、反对“左”的阻力和影响。至于不同地方、不同时间、不同问题，要按具体情况办。现在不要提层层清理，人人过关。整风是需要的，但现在不是时机，等历史决议通过和十二大召开以后再定。还向邓力群转告了陈云对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两点意见，说：这些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并报告胡耀邦。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

〔1〕指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二十六日谈话的内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六部分。

△ 阅穆青来信，同意新华社在《瞭望》杂志上开辟《中南海纪实》专栏。来信提出专栏将以新华社记者在中南海采访见闻的形式，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中央和国务院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人民生活日夜操劳的事实。

△ 审阅并同意《中南海纪实》之一《中南海的春天》。本月出版的《瞭望》杂志第一期，刊登了这篇报道。

3月27日 上午，听取韦国清、梁必业、华楠^{〔1〕}汇报解放军学习贯彻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着重就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当前，还是以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为中心，同时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我们当时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重点是纠“左”。对军队中受“左”的影响的情况不能忽视，特别是三四十岁的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看问题的比较多。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

〔1〕 华楠，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当然，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还指出：最近有一件事做得好，就是大讲精神文明。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怕”〔1〕的口号很好，军队就这样办，要好好宣传。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这次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

3月29日 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关于组织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问题向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五月十九日，再次审阅总参谋部关于这个问题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的请示。

3月31日 审阅解放军报社关于发表黄克诚在中共中央

〔1〕 1981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1983年1月，又根据中共十二大文件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关提法，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内容调整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

纪律检查委员会上的讲话^{〔1〕}的请示信，批示胡乔木：“这篇东西，我看是讲得好的，请你帮他看一下，争取按时发表。”四月十日，黄克诚的讲话在《解放军报》发表。十一日，《人民日报》转载。

4月3日 上午，会见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彼得·亚历山大·鲁伯特·卡林顿勋爵一行。在回答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问题时指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一九七九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现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加强中美关系的愿望。我们注意到里根总统就职后没有按照他在竞选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行事。我们高兴地看到，里根总统和其他美国领导人多次讲过会慎重处理这个问题，不会采取导致中美关系停滞或倒退的行动。

4月6日 上午，会见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最高领导人拉斐尔·卡尔德拉。在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指出：现在我们正在控制人口的增长，我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在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之内。中国人历来喜欢孩子多，几千年都是这个传统。如果每年人口增长百分之二，不仅会新增加二千万人口的就业压力，而且建设成果

〔1〕 指1980年11月下旬黄克诚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题目为《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都会因此抵消。因此，控制人口增长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密切相关的问题，也是一件比实现四个现代化更难办的事情。

4月7日 上午，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指出：关于修改历史问题决议的设想，看过了，很好。就按这个设想修改，文字不要太长，语言要精练。又指出：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的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要充分肯定，对毛泽东同志，要维持原来正确的评价。不这样，就是给党、给社会主义制度、给国家抹黑，就会使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丧失信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才大大提高，中国人才在世界上站起来了，除台湾外，其他地区才真正实现了统一。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七部分。

4月8日 上午，会见印度人民院议员马尼亚姆·斯瓦

米。指出：我们两国历史渊源久远，两国古老文化互相影响，两国过去的经历又有很多共同点，都对人类历史做出过重要贡献。如果我们能够友好合作，对人类的贡献会更大，尽到人口最多的大国的责任。两国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只要双方谅解，通过很好的讨论，问题不难解决。我也讲过采取一揽子解决问题的设想。如果条件不成熟，短时间不能解决，可以从其他方面加强关系。中印两国彼此不存在什么威胁，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没有理由不友好，没有理由不进行交往。

4月10日 上午，会见瑞典首相图尔比耶恩·费尔丁。指出：中国一贯的目标就是争取和平。中国很穷，最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因此，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的。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对付霸权主义。实现和平的手段，就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更长时间的和平。

△ 前往北京医院向沈雁冰^{〔1〕}遗体告别。次日下午，主持沈雁冰的追悼会。

4月13日 上午，听取杨得志、彭冲、杨勇、赵苍璧^{〔2〕}汇报边防工作情况。指出：边防管理的体制以军队为主，局部调整。领导要统一，管理要不断改进、加强和提高。在谈到警察队伍的建设时指出：警察队伍也要加强。要由军队选质量好

〔1〕 沈雁冰，笔名茅盾，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81年3月27日逝世，终年85岁。逝世前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2〕 赵苍璧，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

的，政治上可靠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有文化知识、讲精神文明的，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员，训练半年或一年后去当警察。警察就是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办学校加强对警察队伍训练。先搞好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这四个城市的警察队伍的建设，把治安工作搞好。要花点钱把通讯联络搞好，改善警察服装。

4月14日 上午，会见古井喜实〔1〕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中国的情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好起来了，把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确立起来了，正在坚定不移地奔向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讲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就是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九七九年我跟大平首相说到，在本世纪末，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日子可以过。经过我们的努力，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特别是前一个时期，我们的脑子有点热，对自己的估计不很切合实际，大的项目搞得太多，基本建设战线太长，结果就出现问题了。尽管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没有放弃，只是我们吸取和总结了经验教训，更加量力而行了。想快，这个意图是好的，但欲速则不达，这是中国的古话。步子稳妥一些，也许速度更快一些。中国现在的形势是安定的、团结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农村情况好，中国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只要农村

〔1〕 古井喜实，当时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

情况好，整个国家就可以基本安定；另一个方面是在经济调整中，我们向关停并转企业的职工交代政策，信任他们，没有出现什么事情。

4月15日 将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同其他一些外国专家就中国建造高能物理加速器的非正式讨论的意见，批转方毅考虑。四月二十三日，方毅回信给李政道，表示国内准备在五月上旬召开一个讨论会，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参加，进一步论证北京高能物理研究基地的建设方案。遵邓小平嘱，回信转达了邓小平对李政道的谢意。

4月16日 晚，乘专列赴沈阳，次日晨抵达沈阳。

4月17日—19日 在沈阳接待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十七日上午，前往火车站迎接金日成。下午，和赵紫阳同金日成会谈，听取介绍朝鲜国内情况，并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晚，出席欢迎宴会。十八日下午，同金日成单独会谈。在客人表示邓小平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很好时，指出：这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讲话，在全党传达了，在学生中也传达了。许多工作都是根据这个讲话精神去做的。接着，就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指出：这个问题在中共党内、在中国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全党接受了。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对毛主席和

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意见很多，经过多次反复。评价毛主席，现在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于毛泽东思想，是另一个概念。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我们党的七大肯定了毛泽东思想。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年轻人不懂得这个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正确的。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徘徊，华国锋同志有责任，当然不能都推到他头上，这样也不公道。晚，陪同金日成观看舞剧《孔雀恋歌》。十九日上午，到火车站为金日成送行。

4月19日 上午，和赵紫阳听取郭峰^{〔1〕}等汇报。在谈话中指出：我要说一个问题，就是找些年轻人慢慢带出来。这是个长远的战略问题，是关键性问题。省委的各部门、省政府的厅局可以先找些年轻同志当二把手、三把手，省委常委会也要增加四五十岁的年轻干部，不能搞论资排辈。现在选拔年轻干部的条件比较好，政治面貌比较清楚，可供选拔的人很多。年轻干部选拔上来后，开始时工作可能不太熟悉，干一两年就会熟悉。不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他们自己没有办法锻炼。我们全党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还没有统一。这个问题比较大，如果在三年内不能逐步解决，再过五年，我们的干部

〔1〕 郭峰，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队伍就要发生很大的危机。因此，对待这项工作不能光讲，要见诸行动，最好搞个规划，有意识地去做。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电话会议，宋任穷传达了邓小平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 下午，听取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委员会常委汇报。

△ 晚，乘专列离开沈阳，二十日晨回到北京。

4月20日 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委《关于亿次电子计算机研制情况的报告》，并批送叶剑英、胡耀邦、李先念、陈云、赵紫阳、徐向前、聂荣臻。

4月21日 审阅并同意《中南海纪实》之二《时刻想着八亿农民》。五月出版的《瞭望》杂志第二期，刊登了这篇报道。

4月27日 将方毅《关于进一步开发和建设攀枝花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批送赵紫阳、姚依林：“我看这些意见都很重要，问题是，每一项都应认真落实，力避拖延。”

4月28日 上午，在邓颖超处开会。

4月29日 出席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工会联合召开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座谈会，对所有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的模范行动、努力的工作，以及他们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4月30日 上午，会见塞拉利昂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1〕}。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一个国际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对战争的看法还是那三条：一、战争的危险始终严重存在；二、经过努力，主要是建立国际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战争是可以延缓的，可以争取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三、尽管我们判断可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对战争不能不有所准备。目前我们很穷，但也得加强国防建设。比如搞原子弹，确实很花钱，但不搞一点也不行。会谈结束后，设午宴招待史蒂文斯。

△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关于批判〈苦恋〉的部分情况汇报（一）》，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5月1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统、自由民主党名誉主席瓦尔特·谢尔一行。在谈到中国国内就业问题时指出：中国每年都有新的待业人员产生，一年就有七八百万人。除原来没有就业的以外，每年都有新的就业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把青年人下放到农村，这条路越走越窄。城市要开辟多种途径解决就业问题，发展一些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排就业是见效的。要扩大和改造服务业，这样每年可以安排七八百万人。在谈到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时指出：建国以来，毛主席制定的方针一直是农、轻、重，但在执行中是“以钢为纲”，实际上重工业是重点。我们搞那么多大项目也是受

〔1〕 西亚卡·史蒂文斯，当时还任塞拉利昂全国人民大会党主席兼总书记。

这个思想的影响。现在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就是要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发展轻工业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5月3日 上午，会见宇都宫德马^{〔1〕}率领的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代表团。指出：中国对外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一是反对霸权主义，二是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不担心日本对中国有什么威胁，但日本要复活军国主义，我们是要反对的。我们也理解日本应该有足够的自卫力量。现在国际形势看不出有什么缓和。所以我们说，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不过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反对霸权主义的力量联合起来，可以延缓战争爆发的时间。如果我们反对战争有力，对付霸权主义有力，延缓战争爆发甚至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讲联合反霸就是为的这个目的。在谈到朝鲜问题时指出：整个朝鲜人民包括南朝鲜人民都希望国家的统一。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状态迟早要解决。这种民族的情感没有办法用别的方式解决，十年不能解决，一百年总要解决。我看现在金日成主席提出的纲领比较好，就是采用联邦的形式来解决统一问题。这种形式不改变南北双方的社会制度，不影响各自的经济，不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影响各自的自主权。它合情合理，但也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希望它取得成功。在谈到中东问题时指出：现在世界战争的第一个爆发点是中东。战争真的爆发，受害的首先是阿拉伯人民。美国的中东政策不改变，中东问题只能更加复杂化。

〔1〕 宇都宫德马，当时任日本参议员、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会长。

5月4日上午，听取洪学智〔1〕、王平、胥光义〔2〕关于军队后勤工作问题的汇报。指出：要重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必须明确服从经济建设，不然国防建设也是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军队员额减下来。如果能减下来，就能用节省的钱多搞点装备。至于后勤的职能和工作关系等问题，可以起草个文件，以一九五二年的文件〔3〕为基础，并根据新的情况，写明职能、工作关系、各级后勤主要领导同志参加同级党委常委，以及后勤实行同级军政首长和上级后勤的双重领导，后勤与司、政机关的关系，等等，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作出新的规定后，发下去执行。部队的装备修理，关键靠搞好平时的维修保养。仓库保管员要专业化。飞机修理人员、舰船修理人员、医务人员等专业技术人员，都应该搞成辈子兵〔4〕，可以按干部待遇，可以升级。这样可以保留骨干，也可以减少人员。各种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进行培训。有的部队减人，把技术人员减了不少，这样不好。干部问题要清理一下，顾问聘任、干部离休、干部转业、家属子女就业等问题，一是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不能伤感情；二是要搞个制度。做政治思想工作也要有制度。一个是如何把军队员额减下来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干部及其家属的问题。这都是大事，要广泛讨论，理出个头绪来，搞个方案和制度，争取在三到五年内实施。

〔1〕 洪学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2〕 胥光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3〕 指1952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的全军后勤部长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全军后勤组织原则与领导关系的决定（草案）》。

〔4〕 辈子兵，指终身在部队服役的人员。

5月5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指出：里根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没有定型。中美关系现在可能处在一个考验时期，考验的题目是台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个论点，就是只要美国对苏联强硬，美国不论怎么做，中国人都会吞下去。这是不可能的。你说里根面临着右翼强硬派势力的问题，而我们的问题更大，十亿中国人民的感情谁伤害它都不行，我们也不行。这个问题，如处理不当，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停滞甚至倒退。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对黑格国务卿访华，就中国方面来说，希望他能早些成行，即使对一些问题考虑不成熟，见见面也好，彼此也可以从新的角度谈谈问题。双方领导人能见面探讨些问题是有益的。

5月9日 会见并设午宴招待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5月11日 上午，和邓颖超、彭真、王震等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开幕式，并接见参加大会的全体代表。在同大会主席团成员交谈时，询问有没有五十岁、四十岁以下的学部委员。指出：别的事情搞得差一点，发展科学技术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账，否则交不了账。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在科学研究上，也往往是青年人赶过老年人，我们的老同志应当高兴地帮助青年人赶上来。

△ 下午，出席朱蕴山〔1〕的追悼会。

〔1〕 朱蕴山，1981年4月30日逝世，终年94岁。

△ 同意廖承志根据邓小平意见重新修改后报送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一九八〇年工作总结和一九八一年工作要点》，并批送叶剑英、李先念、赵紫阳再阅，陈云、胡耀邦核阅。

5月12日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关于批判〈苦恋〉的部分情况汇报（二）》，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 阅黄火青〔1〕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整方案及四位退职的正副检察长工作安排意见的来信，并批送请彭真考虑。

5月14日 上午，会见泰国公主玛哈扎克里·诗琳通。指出：中泰两国之间的历史关系渊源很久，两国之间没有纷争，只有友谊。希望中泰两国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相互往来更加密切。

5月15日 上午，在住地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吴冷西、胡绳再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的修改问题。指出：起草时间很长了，稿子不要再变了，快搞出来。稿子可以压缩短一些、精练一些，解释不要。争论问题可不谈，但原则问题一定谈，如四项基本原则，可以反驳一些错误观点。在胡耀邦、胡乔木各自谈了对《决议》稿的十条基本经验的意见后说：十条基本经验很重要，可以给人以信心。当然，文字上可以写得扼要一些。

△ 上午，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在介绍中

〔1〕 黄火青，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国国内情况时指出：建国三十二年来，总的来说，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也走过一些弯路。对此我们并不后悔，因为成绩是我们干出来的，错误也是我们自己犯下的。成功的经验是我们的财富，错误的教训也是我们的财富。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总结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我们相信，这些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当然，由于中国面积大、人口多，问题复杂，我们的经验还需要进一步积累。因此，今后很难说不会再犯错误，但是有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力求不犯大的错误。只要不犯大的错误，步子才能加快。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都很好，是历史上少有的。这是我们对形势所作的非常客观的判断。在谈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时说：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问题弄清楚，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怎样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很有关系。不弄清楚，总会有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毛主席最大的弱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要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破坏生产力，而应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会见后，设午宴招待客人。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宋庆龄为国家名誉主席^{〔1〕}。

〔1〕 1981年5月1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八次会议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5月16日 上午，看望重病中的宋庆龄，祝贺她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希望她安心养病。

5月19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讲话中指出：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这个决议稿子是在去年十月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有些意见没有吸收。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八部分。

△ 审阅并同意新华社报送的《中南海纪实》之三《经济工作的战略转折》。六月出版的《瞭望》杂志第三期，刊登了这篇报道。

△ 审阅韦国清《关于三个军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简要情况的报告》，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军委常委各同志。

5月中旬 和彭真商议他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彭真在座谈会上就当前治安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学习问题作总结性讲话。

5月21日 阅叶剑英医护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叶剑英同志病报（85）》，批示由胡耀邦打电话请正在杭州休养的叶剑英即日回北京治疗。

5月23日 上午，会见北美主席戴维·洛克菲勒、日方委员长渡边武、欧洲主席乔治·贝图安等三十五人组成的北美、日本、欧洲三边委员会成员。指出：三边委员会和中国各界著名活动家在北京会晤是一种新的合作形式。这种形式很好，对大家都有好处。在回答关于中国提倡精神文明的问题时说：我们在充分注意满足人民需要，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要注意政治思想工作，其中心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要在人民中提倡，特别是教育青年要有理想、有纪律、有知识、有礼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讲四美”〔1〕。我们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

〔1〕“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

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就要使人们具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只要我们的精神状态好，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能够克服。在回答有关中国经济政策问题时指出：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包括同外资合作和兴办中外合资企业的政策，没有变化。在能源方面，不仅沿海石油的开发，还有水力和煤炭资源的开发，也欢迎外资合作，当然条件要对双方都合适。

5月24日 上午，会见埃米利亚诺·伊萨生·埃纳奥〔1〕、维克托·卡德纳斯·哈密略〔2〕率领的哥伦比亚参议院代表团。指出：中哥两国同属第三世界，有许多共同点，通过相互之间的交往加强彼此的了解，才能真正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中国将努力发展自己的国家，并对第三世界尽到自己的力量。

5月25日 出席杜聿明〔3〕的追悼会。追悼会前，同邓颖超、乌兰夫等一起向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及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表示亲切慰问。

5月27日 下午，会见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指出：中比两国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愿意同包括比利时在内的整个欧洲加强合作。欧洲希望中国好起来，中国也希望欧洲好起来。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我们政治上强调民主和法制。只有加强民主和法制，才能把人民的积极性调动

〔1〕 埃米利亚诺·伊萨生·埃纳奥，当时任哥伦比亚参议院第一副议长。

〔2〕 维克托·卡德纳斯·哈密略，当时任哥伦比亚参议院副议长。

〔3〕 杜聿明，原国民党高级将领。1981年5月7日逝世，终年76岁。逝世前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

起来，才能在全国形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我们才能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总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立足于自己。我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要使我们摆脱落后的状态。会见后，设晚宴招待客人。

5月29日—6月4日 参加宋庆龄治丧活动。二十九日晚，得知宋庆龄逝世，立即赶往宋庆龄住宅志哀，并向其亲属孙穗英、孙穗华等表示慰问。三十一日上午，到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遗容。六月三日下午，出席追悼会并致悼词。悼词回顾了宋庆龄光辉伟大的一生和她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对祖国统一所做的杰出贡献。指出：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很早以前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宋庆龄同志逝世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宋庆龄同志永远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永远活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四日，和李先念、彭真等到机场为宋庆龄送灵。宋庆龄骨灰，由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护送，当天由专机从北京移送上海安葬。

5月31日 上午，会见南斯拉夫外交部部长约西普·弗

尔霍韦茨。指出：中南两党自从恢复关系以来，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两党相互信任的关系，将继续不断发展下去。

5月下旬 阅陈云《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文，指出：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

6月5日 上午，会见语言学家、美籍华人赵元任教授，向他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情况。

6月6日 阅浦安修^{〔1〕}要求撤销一九五九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所作的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为彭德怀彻底平反的来信，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2〕}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6月11日 上午，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指出：不管国际上发生什么新的问题，柬埔寨和阿富汗这两个问题绝不能搁置在一边。这两个问题的共同特点是：一个国家用武力占领另一个国家。联大对这两个问题都有决议。如果容忍武装占领这两个国家的领土，就等于否定了联合国宪

〔1〕 浦安修，彭德怀夫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2〕 周小舟，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错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1966年12月逝世。1979年12月中共中央为其平反。

章。又指出：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迹象，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注意，引起重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朝鲜的统一可以采取联邦的形式来解决。所谓联邦的形式，就是南北两方还是独立的实体，作为一个国家的两个方面，但仍是一个国家。通过建立联邦这一形式，可以逐步减少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危险因素，增加国际安全与稳定的有利因素。

6月12日 上午，会见阿迪萨·阿金洛耶〔1〕率领的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现在中国有近十亿人口。娃娃们长大了要就业，一年就有七八百万。世界上都在谈就业问题，我们这里就更复杂。人口多的大国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困难也很多。我们把计划生育问题当作一个战略问题，试图在较短的时期内使人口年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五至六。我们有些地方的经验证明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其实，即使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也只是争取在本世纪末人口不超过十二亿。我们必须定这个目标，否则，经济的增长就被人口的增长抵消了。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可是我们知识不够，技术力量薄弱，管理水平比较低。现在我们有较好的国际条件，我们可以加强国际合作，同时我们自己努力学习，不仅向外国学，也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学习。毛泽东主席过去讲过，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本身当然不好，给我们带来损失，但从错误中可以得到教育，使我们变聪明了，了解得更多了。这两年我们农业情况比较好，主要是因为政策见效。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扩大生产队、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建立责任制，这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1〕 阿迪萨·阿金洛耶，当时任尼日利亚民族党主席。

了。其次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过去在一些不适合种粮食而适合种棉花的土地上硬种粮食，现在改种棉花，收入一下子就增加了两三倍。这是新的政策，是总结了过去二三十年经验制定的，很见成效。过去有些很困难的地方，依靠国家贷款，吃返销粮，现在翻了身，粮食已经能自给。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正注视着我们，看我们的对外政策变了没有，我们说没有变。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制定的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声明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称霸。我们讲的是永远不称霸。问题是中国发展起来了称不称霸？现在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担心这一点。我们说，中国即使发展起来了也还是属于第三世界，绝不称霸。

6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美关系问题。指出：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不能含糊其辞。

6月16日 上午，会见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接受黑格转交的美国副总统布什的来信，并就如何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发表意见。指出：我们希望，在里根任总统、布什任副总统和黑格任国务卿的这一届美国政府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不仅维持现状，而且进一步得到发展，这对全球和平、安全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要继续发展，关键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

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对待两国关系。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如果就这方面来说，我们又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我们贸易关系有发展，中美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协调了行动。但中美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发展。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美国仍采取敌对国的态度来处理同中国的贸易、商业、技术转让等问题。当然，摆在我们面前最敏感的问题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现在台湾海峡形势很平静，有什么必要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样的问题涉及中国最大的政策之一，就是要统一祖国、解决台湾问题。我们真心诚意地希望中美两国关系不但不要停滞在现阶段的水平上，而且要发展，这对全球战略有益。但现在这样的意愿还不是很稳定，还经常有那么一些事情或因素来干扰这种意愿。我们希望干扰的事情尽量减少，没有更好，至少应该尽量减少。我讲这个是因为中美关系确实存在阴影，干扰我们的战略意图，干扰我们的战略目标。就中国方面来说，希望发展两国的关系。但我们也不回避，不能不想到，假使这个干扰行动太厉害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导致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后退，思想上要有这种准备。我讲的这些话不是外交辞令，是把我的真正心里话都讲了。

6月17日 上午，会见罗马尼亚外交部部长斯特凡·安德烈。指出：中罗两国关系发展很好。我们两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有着广泛的一致。

6月18日 上午，会见佐佐木义武^{〔1〕}率领的日本众议员

〔1〕 佐佐木义武，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当时任日本自民党众议员。

访华团。指出：中日两国要友好要合作，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也是当前现实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不管中国谁当政，也不管日本谁当政，都不能违背这一点。尽管某些时候对某些问题中日双方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一些困难，但这对中日友好的大局来说，都是暂时的、枝节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

6月19日 上午，会见福田一〔1〕率领的日本众议院友好访华团。指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发展和变化，中日两国都应该和平相处，友好合作。这是中国的需要，也是日本的需要。我们对发展中日关系要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深、更长远一些。

6月中旬 阅刘澜涛报送的缪云台〔2〕关于台美关系等问题的谈话记录。缪云台认为，打开台湾这把锁的钥匙是美国，建议以此为基础制定对台、对美政策。

6月22日 下午，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各小组召集人碰头会。在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指出：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这个决议

〔1〕 福田一，当时任日本众议院议长。

〔2〕 缪云台，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比如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斗争，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个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为什么这次我们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决议中华国锋同志的名字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他的工作。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第九部分。

6月24日 审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稿的一部分。

6月27日—29日 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二十七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二十八日，全会进行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增选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指出：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一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二是人事问题。全会对这两个重大问题采取重大的决策，作出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所以这次全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7月1日 阅王震关于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来信，作出批示：“请由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代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八月，赴新疆石河子垦区调查研究。回到北京后，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十月，在王恩茂^{〔1〕}赴新疆上任之前同他谈话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1〕 王恩茂，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 阅聂荣臻建议继续清除干部中“左”的影响，狠抓对帮派残余势力的清理，对干部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来的来信，作出批示：“聂荣臻同志提出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建议连同宁夏的信〔1〕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一议。”

△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大会上讲话。

7月2日 上午，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指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六中全会之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同志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十分重要。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关键是老同志带头，真正要开明，真正要从大局着眼。有没有人？我看找十万、二十万都有。问题是我们下不下这个决心，大家是不是好好地去做工作，去了解，去发现。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务以后，要着手去做。做，要有个目标，要具体化。现在就是要大家来讨论怎样具体化。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

〔1〕 指寄给聂荣臻的一封未署名的宁夏群众来信。

的同志，凡是超过六十岁的同志，都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

7月3日 上午，会见阿曼德·哈默〔1〕率领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代表团，就中国同西方石油公司在石油、煤炭开发及其他领域进行合作交换意见，重申在经济调整期间，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

△ 会见哈默后，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讲话再次指出：今天我为什么急着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外经济合作的问题上如果搞官僚主义（不只是搞官僚主义），始终徘徊，对我们很不利。在国际合作领域里面，我们当然要量力而行，但是凡是能够办到的，即使有少量困难，我们能够克服的，我们为什么不快上？国际上议论中国的经济调整是在后退，说我们政策变了，担心合作的事希望不大。这些项目一搞，更加证明我们确实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这样，外资就有兴趣了。对我们自己来说，当然要警惕，外国资本家总是资本家，钱他们肯定要赚。但是，他赚，我们也赚，而我们得的益处总比他得的更多。还指出：我们调整总要有个时间，在调整当中经济建设速度不可能快。但是，如果我们经过三年的调整之后，经济建设仍然没有一定的速度，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我们的调整方针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样一种意见，即现在就必须着眼考虑到三年以后经济建设的速度。现在不考虑，三年以后就来不及了，那时着急也没有用。我们不在

〔1〕 阿曼德·哈默，当时任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

调整时期勉强增加速度，还是把比例失调的状况改变过来，中心的任务是调整结构，特别是把工业结构调整好。但是，一定要在今年、明年、后年，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到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大项目我们不要上得太多，但是一千五百万吨的煤矿是大项目，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积极地上。不搞这样的基本建设，将来速度上不去。我们这个时候，脑子里面都是考虑中小项目，考虑改造现在的企业为主体。是不是还是要两条腿走路？总之，对这方面应该考虑得远一点，步子要积极一点。

7月6日 上午，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名誉主席包兆龙、主席包玉刚一行。指出：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一下子都做，有很多障碍，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知识。会见结束后，对韩克华〔1〕、庄炎林〔2〕说：民航同旅游关系很密切，一定要密切配合好。并同意他们提出的关于将一些地方的军用机场改为军民两用，以方便民航运输，发展旅游业的建议。

7月9日 上午，同杨尚昆〔3〕、耿飏、韦国清、杨勇等谈话。指出：五年内，老同志要逐步退到第二线，找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接替。这个问题很迫切，因为事情总要有人来做。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陈云同志提出要着重选拔四十岁以下的领导干部，这就更难了。但难也要做。军队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好办些。对老干部的安置，

〔1〕 韩克华，当时任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局长。

〔2〕 庄炎林，当时任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副局长。

〔3〕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81年7月还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

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搞离休、退休制度，着重搞退休制度〔1〕。顾问要少，堆的人多了，庙腾不出来。要先解决一进二出。所谓进，就是为年轻人上来创造条件，不要搞论资排辈。对离休、退休干部的安置，下决心把条件搞优越些，多花几个钱。干部定员也要有个制度规定，人数多了总不是办法。现在各级的副职太多，大军区一级、军一级有两个副职就够了，总部的副总长、副主任也不要这么多。军委办公会议是一种过渡性的临时办法，五年作为过渡期，五年后可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2〕。军委常委制度也应该考虑。这个制度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搞起来的。现在军委常委作为一级，人数多，很不灵便，什么事也办不通。〔3〕三总部要在职责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总参就是总司令部。今后，军事命令应该由总长下，有的命令应该由总政主任、总后勤部长下。这涉及一个制度问题，要改革，归根到底要解决军队的制度问题。首先解决好军委直属系统、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问题。军种要保留，有些兵种应该撤销，太多了不好。最后，向杨尚昆交代：你到职后，要先理出个头绪来，要议几个制度，解决一进二出的问题。同时要设想五年后，把这支军队建设成什么样子，五年后又怎么办。

〔1〕 1982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决定》指出：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保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和健全发展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必须立即着手有系统地建立和健全起来，使之经常化，并且严格加以实行。

〔2〕 1982年9月新一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机构成立时，军委办公会议被取消。

〔3〕 1982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不再设常委，而由中央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中央军委常务会议，负责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7月13日 审阅《关于利用侨资提高西南煤炭外运出口能力、逐步开发西南资源的报告》，同意谷牧提出的“基本上不用国内投资”，利用香港人投资，“由小到大，用‘驴打滚’的办法”解决西南煤炭外运、逐步开发西南资源的意见。

7月14日 上午，在住地同李先念、胡耀邦、万里、宋任穷、习仲勋〔1〕、王鹤寿〔2〕谈话。

7月16日 彭真给邓小平写信，请示宪法修改草案稿完成的期限，以便安排工作。

7月17日 上午，同王任重、朱穆之〔3〕、周扬〔4〕、曾涛、胡绩伟〔5〕谈话，就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发表意见。指出：当前思想战线上，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党的三大作风有一条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这一条很难做到。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

〔2〕 王鹤寿，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3〕 朱穆之，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4〕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5〕 胡绩伟，当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谈话还列举了思想战线特别是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严肃批评了《苦恋》等作品的错误，并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当然，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坚决纠正和防止。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的问题。八月三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讨论邓小平这个谈话。十一日，中共中央印发这个谈话。九月上旬，文化部和文联联合召开首都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讨论文艺界如何加强领导、改变涣散软弱状态、增强团结、改进工作等问题。会议一致拥护邓小平这个谈

话和胡耀邦在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对于那种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倾向，要进行正确的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斗争。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7月18日 上午，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指出：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因为在党内、人民当中，接触中国的历史，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一个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主席的问题，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特别是第三世界，在毛主席的影响下进行革命，主要是进行民族革命，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要总结经验，对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分析。不这样的话，思想统一不起来，认识统一不起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写这个决议的目的。有了一个统一的结论性的东西，今后对历史问题就不再说了，一心一意搞建设。在谈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指出：“四个坚持”不搞不行，“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底子这样薄，怎样取得革命胜利，怎样把国家建设好，离开了党的领导毫无出路。中国近代历史什么时候真正统一过？一百多年来，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除台湾外，国家真正统一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世界上站起来，只能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共产党也要善于领导。要坚持领导，还要善于领导，这是我们过去没有解决好的，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在谈到经济调整时指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情况十分严重，不调整不行。如果不调整，物价控制不住，人民

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的利益就要失掉。从现在的情况看，调整进行得比较好，比我们预料的好。但短时间内不可能把比例失调的情况纠正过来。我们宁可把调整的时间放长一些，把调整期间的发展速度放慢一些，稳一些。如果这个时候的基础打好了，以后发展速度会快。基础不牢，想快也快不了，欲速不达。我们现在搞长远规划，目标放在本世纪末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美元。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那时我们是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亿美元。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我们相应地把教育经费提高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教育事业就能更快发展，人才就多了，科学事业也就能更快发展。如果再抽出适当的比例来搞国防现代化，国防发展也就快了。人民的生活也会因此逐步提高。

7月19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就中美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指出：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你做了许多工作。建交三原则是我们俩谈话〔1〕确定下来的。我们有共同的信念，即不是把中美关系当作一般的、一个时期的或策略性的关系，而是从全球战略角度来对待我们的关系。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关系，才能有基础，才能发展关系，起码是维护现有的关系。在谈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时说：“毛主席”这一称呼，在江西根据地就有。那时他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就这样一直称呼下来了。称他“毛主席”，反映了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他确实在几个重要的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在谈到中国国内形势时指出：相当长一个时期，有人怀疑中国是否稳定、安定。通过十一届六中全

〔1〕 指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谈话。

会的召开，政策的连续性有了保证。政治上我们要建立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我们要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十一届六中全会肯定了这条路线，而且从组织上保证了这条路线延续下去。在谈到中国的干部问题时指出：总的来说，我们干部队伍在老化。过去我们实际上存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这要废除，要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7月20日 深夜，乘专列离开北京，次日凌晨抵达北戴河。

8月2日 同意杨尚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宜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号的报告，并批转王震。

8月5日 傍晚，乘专列离开北戴河赴新疆视察。

8月8日 在赴新疆视察途中路经甘肃，参观了敦煌千佛洞。听取敦煌研究所介绍千佛洞维护情况，指示随同参观的王任重帮助解决千佛洞保护维修资金不足的问题。一九八一年国家有关部门向敦煌研究所下拨三百万元专项经费。

8月10日 乘专列抵达乌鲁木齐。

8月13日 上午，乘车抵达石河子市。

△ 下午，视察石河子农科所和石河子总场一分场三连的棉田。在途中，看到公路两旁林带如织，田连阡陌，渠水潺潺的美丽景色，说：我过去看过两部电影，一部是《军垦之歌》，

一部叫《绿色的田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向我讲起过你们开发准噶尔、塔里木的情景。不过还是那句老话，“百闻不如一见”。这次来不虚此行。

8月14日 上午，接见石河子垦区团以上干部、老红军及劳动模范代表，观看紫泥泉种羊场培育的细毛羊以及用这种羊毛纺织的毛布样品，视察石河子八一毛纺厂。随后，乘车离开石河子返回乌鲁木齐。

8月15日 视察乌鲁木齐县南山牧场，走进哈萨克牧民帐房了解牧民生活情况。

8月16日 上午，同谷景生〔1〕谈话。指出：要把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新疆稳定是大局，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处理谁。还说：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拔上来，甚至放到很高的领导位置上来。

8月19日 乘专列离开乌鲁木齐，抵达吐鲁番。

〔1〕 谷景生，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

在乌鲁木齐期间 接见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先进工作者代表及文艺工作者等。还前往昌吉州阜康县游览天池。对身边陪同人员说：风景不错，要保护好，要发展旅游。

8月20日 上午，视察吐鲁番市亚尔乡，察看坎儿井、防沙林带和葡萄园。

△ 下午，乘专列离开吐鲁番，前往甘肃省天水市。

8月21日 下午，乘专列抵达天水。

△ 傍晚，乘专列离开天水，当晚抵达兰州。

8月22日 上午，乘专机离开兰州回到北京。在甘肃期间，在酒泉、兰州、天水接见当地干部和兰州军区、甘肃省委、甘肃省政府的负责人和部分老同志。

8月25日 下午，会见马里总统、马里人民民主联盟总书记穆萨·特拉奥雷。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的政治形势开始了真正的转变。这次会议确定了现行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并确定了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在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和消极的东西。现在我们正在清理，逐步把党的生活、国家的生活纳入正轨，但十年的问题不是一瞬间可以解决的。总的说，现在是六十年代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最稳定的时期。只要把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贯

彻下去，我们的事业就一定有希望。

8月26日 上午，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进一步阐述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两岸实现“三通”〔1〕没有先决条件。“三通”就是说先来往，增加彼此了解，增加人民之间的了解，这是促进谈判的一种方式。所有国际朋友如果是真心要促进中国统一的，我们欢迎。归根到底，中国统一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祖国的统一富强，国家的希望，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什么谈判啊、“三通”啊，都谈不上。在介绍国内现行政策时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剥削，没有违背集体所有的原则，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允许居民买房也不产生剥削，不是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建国后一直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取消，现在又恢复了。外国有人认为这是搞资本主义，是不正确的。

△ 同意全国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十个月来

〔1〕“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

工作情况、问题和安排意见的请示报告》。

8月27日 上午，会见加拿大外交部部长马克·麦圭根。指出：中加两国关系一直很好，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传统的友谊，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有共同的想法，在国际事务中合作得很好，希望今后两国在各个领域中的合作关系不断得到加强。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说：我们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建国以来的历史总结了一下。历史问题以后可以不谈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所谓向前看，就是搞现代化建设。搞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但我们还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不善于管理，不善于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成绩不够显著。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吸引外资、合资经营包含资本主义成分，但我们并不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它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至于管理方法、科学技术，则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资本主义在管理方面好的东西，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 上午，会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由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开创的，在你任职期间内完成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三原则也是在你任职期间，我们共同确定的。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一点。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存在和出现一些分歧是正常的，就是社会制度相同，盟国之间也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是要协调好、互相尊重、互相谅解，这样才能使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发展是好的，但确实存在一种阴影，这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可以使中美关系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我们希

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这是全球战略的需要，也是中美两国的需要。认为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有求于美国，是很错误的见解。又指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的方针是立足于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但至少在三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放弃使用武力：一、台湾领导人根本不同意我们谈，使和平方式成为不可能；二、台湾当局投靠外国，台湾变成外国的基地；三、台湾用武力统一中国。为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我们明确宣布了祖国统一后的台湾地位和我们的政策。我们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提出，实现祖国统一后，台湾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生活方式不变，生活水平不降低。台湾作为地方政府，对外关系可以保留，也可以保留自己的军事力量。我们还承诺，实现祖国统一后，将对台湾各界人士在全国政治机构中作妥善安排。我想，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都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希望美国不要做妨碍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事情。美国有力量也有条件促进双方谈判，美国在促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上，可以做很多事情。随后，同卡特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设午宴招待卡特夫妇。

9月2日 上午，会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保尔·哈特林一行。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在三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一、在全国确立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二、在工业、农业、财贸和其他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正确的政策；三、在正确政策的基础上，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当前，我们正集中精力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使国家好起来，人民富裕起来。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千方百计使我们的干部年轻化。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在谈到难民问题时表示：中国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继续同联

联合国合作。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赵紫阳汇报经济情况和黄华汇报外事工作。在陈云作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时插话：责任制，肯定会见效。农村还有一件事，就是政社分开，这件事情要做，不能太迟。

9月4日 上午，会见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以及美国国际交流署代表团、美国绘画展览代表团，在介绍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前景时指出：应该说我们建国后是一个有活力的国家。在三十二年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基础。八十年代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到本世纪末，就有一个小康社会出现。但要达到美国的水平恐怕要花一个世纪。在介绍中国加强法制工作的情况时说：我们提倡民主，加强民主，同时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把法制建设提到重要地位。中国同美国相比，中国法律太少，法官、律师等司法人员太少。我们必须制定必要的法律，同时培养司法人才。这不但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利益，也是为了培养好的道德风尚和良好的社会风气，引导人们向前看。在谈到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时指出：中美两国的关系应进一步发展，两国各方面的人士应增加来往，以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

△ 山东省平阴铝厂一干部写信给王任重转中共中央和胡耀邦，建议党中央尽快编辑出版《邓小平选集》。二十日，王任重致函胡耀邦，认为这一建议“有道理”。“如你同意，望提常委研究决定。”二十六日，胡耀邦批示：“请力群同志指定人开始编辑和加工，待到有了一个眉目，再请示小平同志并中央

常委作决定。”随后，邓力群批示：“已经得到小平同志同意，初步提出选目，准备讨论。”

9月8日 上午，会见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和前大藏大臣、众议员竹下登一行。指出：由于在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经验，我们过去交的学费确实不少。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有好处，就是取得了经验，使我们以后在合作方式上更加考虑要切实照顾到我们自己的情况。一个是量力而行，一个是合作方式的多样性。同时，我们希望日本朋友在同我们合作时，能更多地考虑中国的条件。双方回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在各方面友好关系的发展情况，认为：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情，要从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待，为不断加强和发展这种关系而努力。

△ 下午，出席傅秋涛^[1]的追悼会。

9月9日 上午，会见竹入义胜^[2]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介绍中国修改宪法、农村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等情况。指出：过去我们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宪法，就是一九五四年通过的宪法。我们现在就是以它作为基础来修改。设国家主席问题是这次修改宪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内容，但都比较好处理。因为我们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已经确立下

[1] 傅秋涛，1981年8月25日逝世。逝世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

[2] 竹入义胜，当时任日本公明党委员长。

来，而且已经见效了。两年多的时间证明，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的国情，是行之有效的，当然可以反映到宪法中去。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宪法中要肯定这一点。要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个现代化，特别是高度民主、高度文明，过去没有反映到宪法里，这次要反映进去。“四人帮”搞的不是民主，实际上是提倡无政府主义，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发作。所以，什么叫民主，民主和法制的关系是什么，这些要弄清楚。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同时也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若是民主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还有什么社会秩序、社会安定和社会团结？所以，没有法制不行。我们历史上的缺点就是法太少。精神文明，就是社会风尚，人民的理想、道德，精神面貌，包括讲礼貌在内，这些都很重要。“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年轻一代人的思想混乱，其中一点就是盲目崇拜西方。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是很好的，人民有理想、有奔头，着眼于更远的目标，照顾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照顾左邻右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文明，我们在延安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大家过得非常愉快，什么困难也压不倒我们，我们把它叫做“延安精神”。六十年代初，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下放了职工两千多万，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当时，我们物资非常贫乏，商品严重短缺，但人民精神面貌很好。那次调整是非常困难的，但很顺利地完成了，而且把欠苏联的债也还清了。回想历史，感到精神文明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搞四化，情况会逐步好起来，但是好起来也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相当大的目标，要相当长的时间。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三十年到五

十年的时间，恐怕要到二十一世纪末。在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中，还不能浪费，不能把经济发展的成果通通分掉，那样再生产、再发展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要教育人民，生活只能逐步改善。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只追求物质享受，以后的发展就没有希望。这也属于精神文明范围的问题。又指出：我们现行的政策就是解放思想，从许多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在经营管理上，我们提倡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我们叫联产计酬，这样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中国农村实现这个政策以后，普遍好起来了。还指出：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我们已经感到“一大二公”的目标并不是很快能实现的，那时毛主席还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后来毛主席经过多次调查研究，提出要搞三级所有制，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以生产队为基础。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公社制度问题，这还是一个探索的问题。现在的中心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概括起来就是建立责任制，在建立责任制的基础上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农村的经验今年要推广到工厂。现在凡是那样搞的，都见效。这就关系到农村和工矿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

9月10日 上午，会见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卡迈勒·哈桑·阿里。指出：中埃两国之间经常就国际问题交换看法和意见，这很好。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中最有力量的国家。在大多数国际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或是吻合的，我们之间没有争执。我们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很好。在介绍中国情况时指出：要恢复过去好的传统，消除十年动乱的消极影响，要做许多方面的工作，但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把经济建设搞好，使国家逐步好起来，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9月13日—15日 在华北某地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和空军部队举行的合成军军事演习。

9月16日 上午，在北京会见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指出：瑞典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国王的这次访问将对进一步发展中瑞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时强调：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一贯政策。现在我们的力量有限，对世界的贡献不大。我们只有发展自己，才能摆脱落后状态。要做到这一点，恐怕要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会见后，设午宴招待客人。

△ 约万里谈话，就长江和汉江上游山区毁林开荒和森林过量采伐造成四川、陕西南部发生特大水灾一事，提出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的倡议。指出：最近发生的洪灾问题涉及林业，涉及木材的过量采伐。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以规定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棵树，比如种三棵或五棵树，要包种包活，多种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可否提出个文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或者由人大常委会通过，使它成为法律，及时施行。总之，要有进一步的办法。十月十七日，林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关于贯彻小平同志林业谈话的报告》。十八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林业部党组的报告，一致同意邓小平的倡议。十二月十三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

9月17日—19日 在华北某地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

军区和空军部队举行的合成军军事演习。十九日，检阅演习部队并发表讲话：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这对全军的建设、战备和训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演习达到了预期目的，是成功的。这充分表明，我们党缔造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军政素质是好的，是有优良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是有战斗力的。强调：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印发这个讲话。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9月22日 上午，会见阿马杜·西塞·迪亚^{〔1〕}率领的塞内加尔议会代表团。强调：发展中国家要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归根到底要发展本国的经济。

9月23日 上午，会见日本前外相、众议员小坂善太郎。在谈到中国国民经济调整时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要的标志是正视现实、敢于自我批评，这是有信心的表现。一九七八年大批引进大型设备，搞得过急了。在谈到中国国防政策时指出：我们没有同美国、苏联进行核竞赛的想法和能力，我们不可能在这方面花更多的钱。不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不照顾人民需要不行。今年搞调整，只好减少一点国防开支，但

〔1〕 阿马杜·西塞·迪亚，当时任塞内加尔国民议会议长。

这不会影响军事力量的准备。四个现代化包括国防现代化，这个目标是不会放弃的。

9月24日 主持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会议，讨论和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和空军部队在华北某地举行军事演习的经验。会前，和胡耀邦、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接见完成军事演习任务的军队领导干部，以及观看这次演习的中央和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并合影留念。

9月27日 上午，会见多哥人民联盟主席、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指出：中国的问题首先是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安置好。中国是不是真正稳定，首先要看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地区是否稳定。我们国内的情况总是好的。我们现在的方针、政策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拥护。我们的目标明确，很有希望，但不是没有困难，而是困难很多。又指出：中国现在还很穷，对第三世界朋友的帮助做得不够。今后中国发展起来了，情况会好一些。但不管中国今后多么发达，它将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凡是有利于非洲统一、发展和进步的事业，中国都将无保留地支持。会见结束后，设午宴款待埃亚德马一行。

10月1日 上午，会见哥伦比亚外交部部长卡洛斯·莱莫斯·西蒙兹。指出：近年来，拉丁美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分量越来越重。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同我们合作得很好。中哥两国建交时间虽然不长，但两国关系非常友好。中国愿意进一步发展同拉丁美洲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还指出：中国正在发展经济，实在不愿意把钱多花在别的地方，特别是用在军事方面。从国际上来说，我们希望和平，希

望长期和平。但是我们总得准备另外一手，应付战争的来到。战争来不来，不决定于我们，所以迫使我们不能不在这方面注意，以对付面临的危险。

10月2日 上午，会见意大利众议院议长妮尔德·约蒂。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统一大业的事情。叶剑英委员长最近阐述的九条〔1〕，是我们根据现实情况提出的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的合情合理的方针政策。这九条在国际上已经得到很好的反应，也一定会得到台湾人民的赞成。

10月4日 上午，和邓颖超接见从台湾驾机起义归来的

〔1〕指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的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二）海峡两岸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黄植诚〔1〕。在谈话中表彰他的正义行动，并建议黄植诚回家乡看望亲友，看看国家的建设情况和祖国的壮丽河山。在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指出：香港有报纸讲“四个坚持也是统一的障碍”，这是什么障碍呀？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两边赛一赛。我们不要求你实行社会主义，你怎么能要求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呢？叶剑英委员长最近发表的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政策，是合情合理的。台湾当局硬着头皮说“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三民主义怎么统一？何况台湾也没有真正实行过三民主义。

10月7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2〕。指出：自建交以来，中德两国在各个领域都合作得很好。今后，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合作形式。在经济上，两国可以在技术转让、合资经营方面加强合作，大中小项目都可以。这样，合作的步子可以快一些。中国的特点是底子薄、面积大、人口多，进口几套设备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得到技术，以便自己能够生产。我们各方面都有点基础。如果引进你们的技术来改造我们的企业，那我们得益更大。中国经济发展了，就可以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10月8日、10日、12日、13日 连续四天下午，出席中

〔1〕 黄植诚，原台湾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考核官。1981年8月8日，从台湾驾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航空学校副校长。

〔2〕 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当时还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由民主党主席。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日下午，在讨论企业整顿时指出：整顿要搞几条^{〔1〕}，要搞经济立法，保护企业依法开除工人的权力，使管理人员敢于按法办事。现在搞走私、贪污等非法活动，作个自我批评就完了，这不行。要保护好人，惩办坏人。十三日下午，就编制国民经济长期规划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利用外资更多的是“七五”计划时期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是“六五”计划时期的问题，比如利用外资改造中小企业的问题。现在的计划没有列。外资如果利用得好，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肯定会快些。第二，建议国家计委和管理经济的同志，立即准备一个能够在“七五”计划时期、“八五”计划时期发挥作用的骨干工程的单子，包括利用外资、筹集内资，也包括劳动力投资。骨干工程，包括动力、能源，特别是水电、交通。农业当然还是要靠政策，但是也要着手搞一些项目。所有该办的事情，不管什么时候搞，前期准备立即着手。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一有资金，就可以马上确定，争取时间。第三，要认真抓中央这一级的机构改革。部委太多了肯定误事，每个部委的人太多了也肯定误事。机构不改革，计划就不能很顺利地执行。现在不讲全国改革，首先抓中央包括军队的改革。中央书记处成立一个小组，迅速地议一下，提出一个改革方案^{〔2〕}。不要改良主义的方案，要革命的方案。改良主义的方案是零敲碎打，可能搞不成。这个决心再不下就晚了。做这件事虽然有

〔1〕 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决定》要求：从1982年起，用两三年的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点面结合地、分期分批地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的整顿工作，以促进国民经济状况根本好转。

〔2〕 1982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初步方案》。

难度，但是只要中央下了决心，还是做得通的。要建立退休制度。退休制度建立起来了，就有希望了，否则年轻有为的人难于上来。同日，会议通过国家计委《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汇报要点》。

10月9日 上午，会见亚西尔·阿拉法特^{〔1〕}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是长期的，你们终究会取得胜利。中国将始终一贯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但我们的支援是有限的，主要靠你们自己，靠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在谈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策问题时，希望阿拉法特慎重考虑对以色列的政策和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两个问题。指出：以色列国已经建立，要把它消灭是不现实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首先松动一下，推动阿拉伯国家采取政治上的主动，承认以色列。同时，以色列归还所占领土、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

△ 下午，和叶剑英、胡耀邦等以及首都各界人士一万多人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纪念大会上讲话。

10月11日 阅林铁关于河北省委班子调整问题的来信，并批送胡耀邦、宋任穷参酌。

10月13日 审阅中共国家农业委员会、中共新疆维吾尔

〔1〕 亚西尔·阿拉法特，当时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

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等文件，作出批示：“此件请中央书记处审批。所拟通知，我删去几段，请酌。”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发出通知，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 阅李维汉关于政协章程修改问题同孙起孟的谈话记录，作出批示：“此件在我处压得太久，所提意见，我基本赞成。”李维汉在谈话中就政协的性质、政协的监督权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10月15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传达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的情况简报》（之二），并批送胡耀邦、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

10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同里根会谈问题指出：我们最近发表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政策，处理了荷兰问题。我们处理荷兰问题，就是给美国的警告。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做法，实际上就是霸权主义。因此，在同里根会谈时可以说：我们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美关系的，双方都不要玩打牌游戏。打牌是不从政治角度、不从战略利益考虑的，有时甚至也不从国家利益考虑。如果是打牌，牌就可以随时换，也可以随时丢掉。从战略的角度、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有个稳定的政策。

10月18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部长、霍普金斯大学高级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罗德·布朗。指出：在我们提出九条建议之后，美国更没有理由向台湾提供武

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是给中国和平统一造成障碍，破坏中国和平统一。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好，确实存在着使中美关系停滞和倒退的危险。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反应很强烈，中国的容忍是有限度的。我们当政的人，我算一个，如果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当，人民将不支持我们。多年来，我们总是把中美关系放在全球战略上来看待。我们认为，考虑谁有求于谁多少的问题，是没有益处的。中国确实落后，也穷，但中国不会妄自菲薄。我们希望美国政府、政界、报界注意这个问题。

10月19日 上午，让秘书打电话给李梦华〔1〕，询问中国排球队伙食不好、运动员吃不饱的问题解决不了的原因。李梦华说，国家队的伙食标准还没有解决，排球队的伙食采取临时补贴办法已经解决。

10月20日 审阅并同意赵紫阳在坎昆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2〕上的发言稿。

10月22日 上午，会见丹麦首相安高·约恩森。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世界一直在讲缓和，讲裁军，但事实上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局势不是缓和，而是更加紧张；不是裁军，而是天天在扩军。将来不一定就打核战争，因为核武器你有我也有，你多我也多，也许大家都不敢

〔1〕 李梦华，当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2〕 指1981年10月22日至23日在墨西哥坎昆城举行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进行对话的最高级会议。简称坎昆会议。

用。在谈到中国是否继续发展核武器时说：还要发展一点，没有，会遭受欺负。但是，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必要花很多钱同美、苏比赛。随后，回答丹方随行记者的提问。在回答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统一台湾的问题时指出：很难说出一个确切的时间，因为这不是由我们一方决定的，还要看台湾当局怎么想。我们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是合情合理的，台湾没有不能接受的理由。和平统一需要时间，最根本的是海峡两岸先接触起来。

10月24日 阅谭启龙、鲁大东建议在制定长远规划时要考虑四川三线建设如何发挥作用和如何开发能源的来信，并批送赵紫阳、万里、姚依林参酌。

10月25日 上午，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雅克·德拉罗西埃。在谈话中赞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中国的良好合作，并指出：中国人口太多，要改变经济落后状况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但中国是有希望的。

10月28日 上午，会见茅诚司^{〔1〕}率领的日中协会第三次访华团。在谈到中日两国关系时指出：中日两国不但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而且在当前和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保持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十分重要。我相信在座的日本朋友和中国朋友都有这个信念，要以长远的观点，而不能以一事一时的观点来考虑和处理两国关系。希望中日两国在广泛的领域里开展合作，互相帮助，并在国际事务中经常协调彼此的观点和行动。在谈到台

〔1〕 茅诚司，当时任日中协会会长。

湾问题时指出：台湾当局总是讲凡是搞统一、合作，都是他们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很大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一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抗战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合作后来破裂，破裂的责任，实际上两次都在国民党方面。我们不去算老账了，要从长远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和安全来想，去看待第三次合作的需要。

10月 同汪锋谈话，商议对台工作问题。指出：对台工作是大事，需要专职的人专门做。现在专做此事的人还不够多。中央决定由你担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给你加上了“专职”两个字。

11月1日 上午，会见委内瑞拉总统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要自立、自强、自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十年，我们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站起来了，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发言权，而且在广泛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

11月2日 上午，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对福田在执政期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表示感谢，强调凡是对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做过有益的事的人，我们都是记得的。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对台湾的九条建议，现在台湾的反应是拒绝了。我们知道，它的第一个反应会是这样。我

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昼夜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时间。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是要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我们提出的是对等谈判。相信总会有变化的。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但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实际上就干预、插手了中国的内政，给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造成了障碍。美国国务卿黑格六月来访时，我同他说，我们的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中美关系可能停滞或者后退这样一个问题。导致停滞或者后退，那不是中国干的事。我们的话说得很明白。至于台湾问题，我相信美国，还有日本以及其他很多朋友都可以做好多事情，来推动谈判。就美国来说，促进这个谈判，至少是推动接触，实际上就是维护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而出卖武器、装备台湾，是出于什么意图呢？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这对全球战略格局是一种破坏，至少是一个损伤。

11月5日 审阅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党组《关于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务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并就请致开幕词一事批示：“不致开幕词，因为没有必要，无话可讲，但我可主持会议。”

11月9日 阅王恩茂关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问题会议后回新疆处理有关问题和新疆现状的来信，并批送胡耀邦、李先念等。

11月10日 上午，会见法国外贸国务部长米歇尔·若贝尔，就进一步发展中法两国贸易关系和经济合作问题交换意见。指出：中法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有很多一致点。我们历来欣赏法国的独立政策，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独立的政策，是要受欺

负的。

11月上旬 审阅全国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报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送审稿）》。

11月11日 上午，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书记多布罗斯拉夫·丘拉菲奇。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总的说是很好的。“文化大革命”和过去长期的“左”的指导思想反映在各个方面，还需要纠正。这需要很多时间。我们很高兴的是，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见效了，特别是在农村，农业情况不错。工业方面问题还多。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官僚主义。它表现为上层建筑臃肿不堪，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耽误事情。这些弊端有它的历史原因，因此要纠正可不是简单的事。现在正在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用简单的改良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不行，但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很难顺利发展。我们正准备着手采取比较有效的办法，甚至以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干部对这个问题有共同的认识，这是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我们国内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青年人的教育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问题，“左”的错误还没有完全肃清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上层建筑的改革问题。只要我们下决心把上层建筑的问题解决好，以后的步子会走得比较顺利。

11月13日 上午，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指出：我们一直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践，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我们党和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时代，从哲学到政治、经济以及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有很大的创造。但是很遗憾，他晚年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本身也违背了他过去的思想。现在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强调的是集体领导。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是有些新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当然，也不否认个人的作用，比如说我个人在里面起了我自己应该起的作用。许多具体政策、具体问题，有的是这个同志提出的，有的是那个同志提出的，并不都是我一个人提出的。可以这样说，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最后是集体决定的。我们也有一条经验，个人干预问题过多并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也与此有关。还指出：一九七四年，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我主持起草的。这是一个转折，即要把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面来。过去由于各种干扰，特别是政治运动的干扰，始终没有贯彻下去，形成了历史上的曲折。现在我们说，除了国际风云发生激烈变化，例如发生战争之外，我们始终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这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至少要三四代人来干这件事。这个转折到一九七八年底的三中全会才实现。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转折，而是整个党、国家和人民的转折。在回答中国为什么不是不结盟运动成员的提问时指出：中国一贯支持不结盟运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世时就是这样做的。中国是最不结盟的国

家，但不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我们考虑在外面支持不结盟运动比当其中的一员更有利，对不结盟运动更有好处。在谈到中南关系时指出：中南两国历史上的一些纠葛统统过去了，剩下的就是很好地发展两党和两国关系，发展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没有任何障碍。

11月17日 上午，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在谈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时指出：我们冷静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根据现在的情况，到本世纪末，可以实现一个“小康之家”的现代化。我们不能主观地求快。一九七八年我们设想可以搞快一点，但我们想错了。因为中国底子薄，人口太多。所以，我们紧接着总结了经验，提出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不能同西方比。日本大平首相一九七九年访问中国时向我提出，你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个什么样的现代化。我想了一下，说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就要超过一万二千亿美元，因为到那时我们人口至少有十二亿。现在我们经过摸索、计算和研究各种条件，包括国际合作的条件，争取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最低达到八百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在下个世纪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西方的水平。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设想。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个目标不能达到。搞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高度文明，就是人民要有理想，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守纪律，要有道德，要坚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的传统。否则我们的事业是不会有希望的。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文化大革命”前是很好的。那时，我们是延安传统、

延安精神。我们在延安时，什么都困难，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棉花，穿衣服都发生困难，连盐、火柴都没有。就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自己拿锄头开荒，种粮食，结果所有的困难都克服了，过得很好。那种精神现在中国仍然需要。在谈到中美经济关系时指出：中美成立了联合经济委员会，总应该做一点对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关系有益的事。中美关系应该有连续性。中美双边贸易发展相当快，缺陷是中国逆差太大，要改进，否则很难持久。美国前政府和现政府都对我们卡得很紧。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没有给我们一样先进的东西，连人口普查用的电子计算机都不给，而且别的国家要给我们，美国也不让。长期这样，两国关系不可能发展。今天谈这个问题，不是抱怨，而是严肃地提出我们应该消除两国经济合作发展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也可以说是障碍。

11月19日 上午，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第一副总理扬·丁卡。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头脑有点发热，没有量力而行，结果带来了更大的问题。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我们引进大项目二十二个，把石油储量也估计错了。如果二十二个项目一开工，就没有石油原料了。引进这些大项目单单考虑快，没有考虑国内配套能力，结果引进来了用不上。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急，政治上又“左”，积累率太高，基本建设战线太长，结果项目很多，建设周期拉得很长、尾巴很大，最大的问题是农、轻、重比例失调。差不多二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再这样下去，就难以为继了。一九七九年我们开始调整，逐步降低积累率。我们设想，经过几年，积累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甚至比百分之二十五低一点更好。我们砍了几百个基本建设项

目。现在看来，这样做实际上使剩下的一些更重要的项目能更快地建成投产。现在我们农村的情况最好。农业政策的见效，主要是把权力下放，使生产队有自主权。这几年并没有增加机器，也没有增加投资，但政策对头，农民收入确实成倍增加。农业生产实行因地制宜，尊重科学，同样是一块土地，收入就会增加三倍甚至四倍。过去把吃大锅饭理解为社会主义，农民的眼睛就看着国家，困难了，靠国家补助。工业方面，根据农村的经验，我们也在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加强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特别是工业管理体制不好，人也太多。现在我们考虑照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既要考虑到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适应，也要考虑到长远发展的利益，为以后打下更好的基础。

11月20日 阅吴亮平〔1〕在苏州调查研究期间看到苏州风景区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一事的来信，作出批示：“耀邦同志阅，此件转江苏省委研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

11月21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指出：这些年来国际人士总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同苏联是否总有一天会改善关系，意思就是合作起来对付西方。我就反过来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看苏联的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对外路线是否会改变？如果苏联霸权主义政策不会改变，中苏关系也不会改变。又指出：中国军队装备主要靠自己生产，靠买武器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技术，我们有生产能力，

〔1〕 吴亮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全国政协常委。

有了技术就能生产。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同朋友们合作。

11月22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指出：中美关系不只是同中美两国利益有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全球战略角度，也就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才能处理好。台湾问题只有从战略角度、政治角度来考虑，才能作出正确的答案，才能处理得比较好。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让的余地，这是十亿中国人民的感情问题。如果领导人违背人民的意志，即使不被打倒，也应该引咎辞职。

11月23日 上午，会见金永南〔1〕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指出：我们国内总的情况是好的。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教育青年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打砸抢带来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至少要做十年的工作。手段还是教育，并且从小处着手。另一个是体制改革问题。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是发展而不是减少，解决问题困难重重。问题不仅是中央一级、省市一级，企业也有这个问题。企业改革首先是企业体制改革。一个企业本来一千人就可以了，可它有两三千人。现在我们准备把企业改革一下，该多少人就多少人，多的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安排学习，工资照拿。我们开始试验一些方式。这也要花时间，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大量的思想工作。不过，现在大家不管对自己有

〔1〕 金永南，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国际事业部部长。

什么影响，赞成不赞成，对通病有共同的认识。但治这个病用什么药就复杂了，太急的药不行，太温和的药也不行。

11月28日 下午，主持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开幕式。这次会议审议了一年来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工作，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主持会议闭幕式。

12月8日 上午，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副主席李伯忠。指出：中国的调整还需要五年的时间。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必须要稳。真正做到这一点，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快。现在国内的主要问题：一是就业压力大，国家每年要安排七八百万人就业。二是知识不够。我们这样大一个国家，仅司法人员、经济警察就需要一两百万，但一时培养不出来。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指出：我们正在考虑处理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会影响香港投资者的利益。

12月9日 上午，会见苏丹第一副总统、苏丹社会主义联盟总书记阿卜杜勒·马吉德·哈密德·哈利勒。指出：多年来，中国和苏丹在各方面合作得很好，两国间存在着良好的关系，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祝愿苏丹人民在建设自己的国家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12月10日 将钱正英的来信和转送的《中国青年报》刊登的《历尽沧桑获得的一个真理——钱宁教授和同学们的一次

谈话》^{〔1〕}一文，批送胡耀邦、胡乔木：“这种现身说法的谈话，对教育青年很有用。”

12月11日 为纪念广西百色起义五十二周年题词：“纪念李明瑞^{〔2〕}、韦拔群^{〔3〕}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12月12日 上午，会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副书记、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主席维托里诺·科隆博。在回答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时指出：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如果梵蒂冈解决了这个问题，承认一个中国，我们同梵蒂冈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第二是梵蒂冈必须尊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独立自主、自传、自办教会的政策。这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必然要提出的政策。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教会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在谈到中国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要

〔1〕 载1981年12月5日《中国青年报》。钱宁根据自己的经历，从旅美8年彻底击破了我的幻想、新中国给我带来新的曙光、《苦恋》不代表我们的声音、克服自卑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等方面，讲述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走向光明，走向胜利”的道理。

〔2〕 李明瑞，曾任国民党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军事特派员。1929年12月参加领导百色起义，曾任红7军、红8军总指挥。193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0月由于肃反扩大化被害。1945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

〔3〕 韦拔群，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29年12月参加领导百色起义。曾任红7军第3纵队队长、红21师师长、第3独立师师长。1932年10月被叛徒杀害。

逐步增加人民收入，不允许产生剥削阶级，也不赞成平均主义。这涉及吸收外资问题。我们欢迎外国来中国投资、设厂，这里面有剥削，但这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西方有人认为我们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这不确实。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贫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我们犯过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错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12月14日 针对广东、福建两省一些单位和干部继续从事走私、贩私活动的情况，致函胡耀邦：“这类事为什么总处理不下去，值得深思！我建议由中纪委派一专门小组进行彻底追究，越是大人物、大机关，处理越要严、要重。”

12月15日 上午，会见亚历山大·巴科切维奇^{〔1〕}率领的南斯拉夫通讯社代表团。介绍中国国内情况，并回答客人提出的有关国际形势的一些问题。

△ 将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副总经理何炳章关于一九九七年英国对香港租借期满后的香港问题的来信，批送胡耀邦、李先念、陈云：“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必须在两三个月内制定两个以上的方案，以供选择。建议耀邦同志亲自主持此事。”

12月19日 上午，会见土耳其外交部部长伊尔泰尔·蒂尔克曼。指出：中土两国同属第三世界，都是发展中国家，都

〔1〕 亚历山大·巴科切维奇，当时任南斯拉夫通讯社社长。

需要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环境来发展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共同面临着霸权主义的挑战。同时，我们还都面临同邻国的领土纠纷问题。这类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相当复杂。我们相信，只能从良好的愿望出发，通过比较长时间的努力，用友好、和平、互谅、互让的方式来解决。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 上午，和胡耀邦、李先念、彭真等到张鼎丞〔1〕家吊唁张鼎丞逝世，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得知张鼎丞家属两次写信建议中央对张鼎丞丧事从简办理，免去遗体告别仪式、免开追悼会的意见后，称赞这些意见很好，完全符合张鼎丞生前愿望。

△ 阅聂荣臻来信，同意他关于撤销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由国务院、中央军委通过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领导、组织全国科技工作的建议。本月，该委员会撤销。

12月中旬 审阅彭真《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根据中央书记处十一月底的审议意见，对宪法修改草案稿进行修改、补充的情况。下旬，再次审阅修改后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12月22日 阅李昌〔2〕、钱三强〔3〕请求批准在北京建设

〔1〕 张鼎丞，1981年12月16日逝世，终年83岁。

〔2〕 李昌，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

〔3〕 钱三强，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报告，作出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12月25日 中午，会见并宴请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谈话中，对李政道多年来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会见李政道前，就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问题，对将陪同会见的万里、姚依林说：要坚持，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了。工程进度按五年为期限，经费要放宽一些。这个益处是很大的。

12月26日 上午，在住地同胡乔木谈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问题。在谈话中就设立国家主席、正确处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的关系、国务院各部设立和部长任免移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而不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年限等问题发表意见。其中强调：宪法序言里要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条文里不提。要尽快把宪法草案拿出来，用最短的时间修改好。

12月28日 阅杨振宁关于中国的科研方针和重点问题给方毅的信，作出批示：“由有关部门进行讨论，拟出方案。”来信指出：当前中国科技研究工作对发展性研究重视不够。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效率高的发展性物理研究中心。中国如果建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需要在国内召开小组会议，就其规模、研究重点、人才训练等问题进行仔细研究。

12月31日 上午，听取韦国清、梁必业、华楠汇报关于

一九八一年全军政治工作估价和一九八二年全军政治工作主要任务。指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每年开一次好。你们提出的一九八二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方针和四项任务，我同意。从全军来说，今后三年工作的中心是调整，把军队搞精干。政治工作能够保证把调整搞好，就不错了。不精干，矛盾解决不了，事情做不通。这个问题，涉及许多老同志，要慎重，要周到，更要坚决。精简整编，着重精简军以上的人员、干部和机构。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军队如此，地方也是这样。军队还是要搞定额。规定了定额以后，就有个一进一出的问题。大部分是出的问题，是离休、退休的问题。出的问题，要做大量的工作，要安置好。进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选什么人进班子接替的问题。人一定要选好。第一是政治上要好，第二是比较年轻。现在还要加一条，叫做不能搞派性。你们在给政治学院的指示中提出的“全军办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院校教育与部队建设相结合，教学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办校方针是对的。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提出过，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的地位。教育训练，就包括院校。战士要经过院校的学习，也包括教导队学习，才能提干。战士考学校，考教导队，文化达不到的，可以给他一些补习时间。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训练的时间比例，还是按“六、三、一”不变好，可以不改了，扎扎实实地搞。军事训练有“六”就够了；思想工作要好好抓，“二”不够；文化教育还要继续搞，军队要学习科学文化。以后军队质量要提高，知识水平要提高。所有转业的，都要经过训练。干部学文化，也是为转业创造条件。

1982年 七十八岁

1月1日 上午，会见穆罕默德·哈吉·亚拉〔1〕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指出：中国人口太多，特点是又穷又大，加上“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管理起来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目标明确，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已经见效，因此中国是有希望的。我们以往的错误常常是过急，“左”的东西多，不是量力而行，而是超过了客观条件。急着摆脱贫穷落后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经验值得总结。要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发展政策。只要政策符合实际情况，经济发展就可以快一些。这几年，我们总结了经验，发展经济不那么急了，发展速度实际上较过去还快些。发展速度不能光看增长了百分之几，而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调整经济就是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在谈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与发展问题时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也是一场战斗。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都不希望我们发展。为了发展的需要，我们还是应该同它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也都是这样做的。局势的发展提出一个新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开辟更广泛

〔1〕 穆罕默德·哈吉·亚拉，当时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及利亚财政部部长。

的合作领域。过去提出南北对话，南南合作〔1〕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很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不仅仅有南北、东西问题，还有南南合作问题。南南合作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1月5日 将一干部来信批示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来信建议，解决党风问题，首先要解决政治上与中央唱反调、经济上违法乱纪的问题。选拔年轻干部，首先要选好掌握选拔大权的领导人。

△ 阅陈云批转的《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2〕一文。并在陈云的批语中加写“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陈云的批语是：“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要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批示。同日，中共中央就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

△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指战员发出指示：“军队在植树造林中，要积极地多做工作，除搞好营区植树造林外，营区外十公里范围内，要与地方共同协商搞好植树造林。”二月三日至十一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全军绿化工作座谈会。会上

〔1〕 南南合作，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由于发展中国家多数位于发达国家的南方，因此人们习惯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称为南南合作。

〔2〕 此文刊登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编印的《信访简报》上。

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强调今年是开展全民植树造林运动的第一年，全军要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植树造林中带个好头。二月中旬，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解放军各部队认真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具体要求。

1月11日 上午，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在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们那个制度。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着想和对待这个问题的。说什么“统战手法”，我们不搞。我们讲大政方针。没有这样的气度不行。

△ 阅胡乔木来信，作出批示：“我赞成乔木同志意见，如何实行，请书记处、国务院拟定。”来信建议中央就下面两个问题作出决定并发给全党：（一）在今年内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农村普遍恢复乡政府、恢复村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仍作为经济组织保留不变），并普遍在乡级设立派出所。（二）必须坚持在农村地区实行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入小学，不许中途退学，成年农民入冬学。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邓小平等的批示和胡乔木的建议进行了讨论。

1月11日、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十三日下午，在讲话中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

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所有的老干部都要认识到，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亡党亡国。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不论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怎样正确，工作怎样有成绩，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和政府的机构这样缺少朝气、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能充分贯彻，工作不能得到最大的成绩，我们怎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我们自己又怎能安心？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但是，早了没有条件。现在，我们经过粉碎“四人帮”，又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六中全会，创造了这个条件。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强调：精简这个问题要涉及到几百万人，问题很大。正因为大，工作就要做细。但是，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这件事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只要我们下了决心，坚定不移，我不相信搞不成。还指出：这一次革命，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第一位要着眼于进，包括军队也是这个问题最重要。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选贤任能这个话就有德才资的问题。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够顶得住。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精简是革命，选贤任能也是革命。出要解决好，更重要的是解

决进。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的讲话。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这个讲话，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认真贯彻落实。随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工作开始进行。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1月12日 和胡耀邦、李先念、陈云接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

1月18日 晚，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广东休假。二十日，抵达广州。二月九日，回到北京。

2月2日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发出指示：“空军要参加支援农业、林业建设的专业飞行任务，至少要搞二十年，为加速农牧业建设、绿化祖国山河做贡献。”为贯彻落实邓小平这一指示，十三日，空军向邓小平报送《关于执行支农专业飞行的安排情况》。十六日，邓小平阅后转赵紫阳、胡耀邦、李先念、陈云。

2月17日 上午，在住地同彭真、胡乔木、邓力群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的意见。指出：从一九五四年到现在，原来宪法已有近三十年了，新的宪法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同意把“权利与义务”放在“国家机构”前面的意见。政社分开问题要说，现在的宪法草案没说，只说人民公社是经济组织。保护国家名誉、保守国家机密要单独设一条。现在许多人一到香港、国外，什么话都说，宪法里要专门有一条讲这个问题。要抓紧修改，几天内

就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然后开人大常委会。三月公布，讨论半年，再修改。

2月18日 上午，会见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介绍中国情况时指出：我们正在搞体制改革。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必须消除。干部老化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它当作一场革命，当然这是对体制的革命，而不是对人的革命。从一个月的实践看，这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可以行得通。我们能够顺利地进行体制改革工作，是因为这几年我们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 and 政策的连续性，也因为我们党内的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认识是一致的，这是很好的条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差不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算是第一个试验。在谈到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引进技术卡得很紧时说：毛主席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这始终是我们的根本原则。不靠自己努力，许多问题都解决不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吸收外国资金的方针不会变，还要贯彻下去，只是不能太天真。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真正的问题恐怕还是台湾问题。美国认为台湾是它在远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个观点在美国占统治地位，那末要搞好中美关系就很难。因为这实际上否定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没有回旋余地。实在没有办法时，中美关系只好倒退。

△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广东问题和香港问题。

2月19日 上午，会见美国依柏斯公司副总裁、美籍工

程专家吴光叔博士，同他就经济和工业建设问题谈话。

2月20日、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二十日，在会上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并就有人提出如果要设立只能由邓小平担任，这样会增加他的工作量、对健康不利的意见，表示：除了我，别人也可以担任。二十三日下午，再次就设立国家主席职位问题发表意见，说：如果国家需要就设立，不能从对某一个人的考虑来确立我们国家的体制。

2月24日 上午，会见乔森潘^{〔1〕}率领的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对乔森潘同西哈努克亲王这次在北京会晤就促进联合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赞赏，希望柬埔寨各爱国力量以民族利益为重，尽快地联合起来。

△ 将冶金部一干部反映该部处理“三种人”^{〔2〕}、机构改革所出现的问题的来信，批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这个反映值得重视。”

2月25日 上午，会见摩洛哥首相马蒂·布阿比德。在介绍中国经济建设情况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根本方针是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摆脱落后状态。这几年所做的事都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这

〔1〕 乔森潘，当时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政府总理。

〔2〕 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些政策已经见效，特别是在农村效果更显著一些。现在农村扩大农民自主权，提倡责任制，绝大多数地区收入成倍增加。在介绍中国机构改革问题时指出：机构改革首先涉及到一批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干部、老同志，他们要离开工作岗位，退休、离休，或到荣誉岗位上去。这不是涉及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问题，而是几十万、几百万人的事情。这也是得罪人的事，而且得罪的是大批的好人、有功的人。但老干部、老同志思想比较一致，都认为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非走这一步不可。我们做这件事，也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如果中国的政治局势不稳定，就根本不能干这件事。这件事开始了一个多月，比我们预想的要顺利。在谈到中国对外开放问题时指出：中国将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主要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吸收对我们有用的资金。但是，贪污、盗窃、贿赂、走私这些资本主义世界腐朽的东西决不能引进来。这些事在资本主义世界不奇怪。既然开放，接触多了总会有影响，问题是你能否消除这些影响。这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既不要大惊小怪，又要认真抵制，采取有效的手段包括法律手段，消除这些坏的东西。我们要提倡精神文明，在这方面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要教育我们的后代有理想，有道德，讲礼貌，守纪律，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在发展中美关系存在着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回旋余地。如果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且出售先进武器，就会使两国关系倒退。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形势逼人，逼到我们走那一步，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谈到中国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时说：在当前动乱的世界形势下，第三世界国家相互配合、相互合作是十分重

要的。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是我国的一贯政策。

3月1日 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委《关于一九八二年国防尖端技术科研、试验、生产计划的报告》。

3月初 同意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党组关于全国政协单独召开一次常委会议，讨论国务院机构精简问题。三月八日、九日，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十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3月5日 上午，就胡乔木不久前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彭真写信，提出修改和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建议一事，在住地同彭真、胡乔木谈话。指出：对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要给武器，现在刑法规定太轻了，要加重，对经济领域的敌人要狠狠打击，不狠狠打击不行。要在这次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修改刑法的条文，一周内搞出，彭真主持，乔木参加。三月八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指出：为了严厉惩处经济犯罪分子，有必要对《刑法》的一些有关条款作相应的补充和修改。《决定》还列举了经过补充和修改后的条文。

3月9日 将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撰写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中国问题的动向》一文，批示印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 阅邓力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作出批示：“紫阳〔1〕同

〔1〕 紫阳，即赵紫阳。

志考虑，似还可结合哈默的建议〔1〕，一并研究。”报告建议：集中力量开发和利用云南省磷矿资源，电、磷结合，外运磷肥及磷制品，自力更生地解决国内农业生产对磷肥的需要。

3月上旬 阅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的报告》，同意按照《报告》中的原则进行文稿的整理工作，并表示文稿整理好后，再予审阅。《报告》简述了《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进展情况，提出《文选》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出版，内部发行。还提出：这本《文选》收入的文稿时间近，现实针对性强，出版后将产生很大政治影响，因此对文稿中某些政治性、政策性的内容提法和文字用语，需作反复斟酌。文稿力求精选精编，使之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保持一致。

3月12日 带领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西山参加植树活动。植树后，同有关部门负责人观看附近不同品种的树木，强调：植树要选好树的品种，要选那些长得快、能成材的品种。栽下后要有人管理，保证成活。植树不要占用好地。

3月13日 上午，在住地同陈云谈话。

3月14日 阅赵紫阳关于国家经委、国家计委班子调整问题的来信，作出批示：“此事面谈过，我同意。”

〔1〕 指哈默提出的中国要把农业搞上去，应该生产过磷酸等高效液态肥料的建议。

3月18日 阅贺绿汀的来信，作出批示：“李坚〔1〕参加青年音乐家旅游团事，请文化部、对外文委再作考虑。”

3月20日 上午，会见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查济民，介绍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指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这件事已经定了。一切文章都在这个前提下做。现在，主要是研究这个文章怎么做的问题。在查济民谈到香港百多年来都是在英国人统治下，香港人没有机会参政，香港回归后培养管理香港的人才是个很大的问题，建议成立几个政治性团体，以便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时，指出：这个建议很重要。为了培养治港人才，需要建立一些政治性团体。

3月21日 审阅廖承志《关于解决香港地位问题的初步方案和近期工作的报告》，作出批示：“拟原则同意，具体方案，待与各方人士交换意见之后，再作修改。”

3月22日 审阅杨尚昆报送的《军委总部精简整编方案》，作出批示：“这个方案不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案，但可作为第一步，立即进行。这一步完成后，再研究进一步方案。”

3月24日 上午，在住地同胡乔木、王鹤寿、邓力群谈打击经济领域犯罪问题。表示赞成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打击经济领域犯罪问题，并说：四月份不干别的，专干这件事。谈话时，阅胡乔木转给胡耀邦、邓小平的《解放日报情况简

〔1〕 李坚，当时为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学生。1981年6月参加巴黎国际钢琴比赛，获得第二名。

报》登载的《受厦门市委、福建省委某些负责人的阻挠，套购走私珍珠大案无法清查》一文，并指出：与此有牵连的各级领导都要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审查清楚后没有问题的恢复工作。随后，批示：“请中纪委抓紧处理，以此为例，作一大案处理。处理要坚决，所有牵涉的人，包括省委书记在内，应即停职，听候审查（审查结果，如无责任，当然复职）。”

△ 将国家科委干部建议让方毅再兼任一个时期科委主任的来信，批转胡耀邦、赵紫阳：听说科委干部对主任人选议论很多，如拟选人员不合适，似可考虑方毅兼一段时间。此后，方毅兼任科委主任至一九八四年七月。

3月24日或25日 打电话给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三月二十四日在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的讲话^{〔1〕}作出反应。

3月25日 上午，会见巴西外交部部长拉米罗·萨赖瓦·格雷罗。在谈到加强第三世界合作时指出：尽管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进步，但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看不起我们，想欺侮我们，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有些彼此可以借鉴的东西，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较新的科学技术方面，没有发达国家的合作不行，而在其他很广泛的方面，通过发展

〔1〕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讲话同时对中国的政策作了不少攻击。

中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解决的。这对发展中国本身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一环。在介绍中国情况时指出：中国为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当前正在抓两件大事。一是搞体制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精简机构，就是“拆庙搬菩萨”。这件事搞不好，我们就会丧失民心，四个现代化也没有希望。从这两个月的情况看，我们的老干部顾大局，是经得起考验的。二是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不严肃处理，我们的开放政策就不能继续下去。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提倡精神文明，提倡人民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我们面临的问题成堆，有些问题很复杂，但是可以解决的。总之，中国的情况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是很落后，二是有希望。

3月26日 上午，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前，听取高扬文〔1〕、秦仲达〔2〕汇报合作开发山西平朔矿区安太堡露天煤矿及有关化工项目的谈判情况。指出：肥料问题很重要。我们落实了农村政策，农业形势很好，但靠政策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农业还要靠科学，要尽快解决肥料问题。

△ 上午，会见哈默博士。在谈到客人的生活阅历时说：你与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有几十年了，从二十几岁与列宁打交道算起，已经有六十年了。我们要向你学习些经验，通过与你们合作，可以学到一些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美国有个最大特点是讲求实际，现在是不是比过去差一点了。你是第一个与列

〔1〕 高扬文，当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

〔2〕 秦仲达，当时任化学工业部部长。

宁接触的美国人。那时你还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由此可以看到美国人讲求实际的精神。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制定政策、实行政策的各个方面。过去空话太多，没有益处。还对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和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所属的岛溪煤矿公司在合作开发煤炭方面签署的协议书表示祝贺，说：这是个好的开端。看来我们会很顺利地进行技术合作，希望这种合作不要因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纠缠而受到影响。就我们方面不会因此影响经济方面的合作。在哈默提出中国要把农业搞上去，就必须使用高效肥料，以及同中国在农业、畜牧业方面合作的建议时说：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事，特别是肥料。

3月28日 阅章蕴^{〔1〕}反映浙江省委领导软弱涣散情况致王鹤寿的信，作出批示：“完全赞成，省委班子应快调整。”

3月29日 审阅并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和《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

3月31日 上午，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称赞国际奥委会同中国的积极合作，并希望合作进一步发展。在客人称赞他身体很好时说：尽量减少工作，让一些年轻、身体好的人来工作，这就是养身之道，也符合奥林匹克精神。在谈到中美关系会不会影响中国参加一九八四年

〔1〕 章蕴，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的洛杉矶奥运会时指出：中美关系处在微妙的时刻，如果搞不好，出现我们不希望出现的情况，那不是一件好事，但对奥林匹克运动不会有影响，除非美国把台湾当作一个国家接待。只要不出现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参加没有问题。

3月 为四川省中江县黄继光^{〔1〕}纪念馆黄继光塑像题字：“特级英雄黄继光”。

4月3日 同胡乔木、邓力群^{〔2〕}谈话，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保证问题发表意见。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条件下，没有党的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党的领导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坚强还是软弱，就看这个领导能够不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接着，着重阐述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所需要的四条根本的政治保证：第一，要进行机构改革和全面的体制改革。机构改革、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机构改革现在还只是开始。全面的体制改革包括好多方面，像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领导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宪法有密切的联系。就国体说，要解决民主和专政的问题，只讲民主不讲专政不行，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政体说，要解决民主和集中的问题，只讲民主不讲集中不行。国家政治生活、党内

〔1〕 黄继光，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1952年10月在上甘岭战役中用身体堵住敌人暗堡的机枪口，打开了我军冲锋前进的道路，自己英勇牺牲。获特级英雄称号。

〔2〕 邓力群，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4月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政治生活，都要高度民主、高度集中。这些方面都有一个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试点。这几年实行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有成绩的。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办法、制定新制度，使整个国家的各种体制越来越完善，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第二，把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必须有两手，不能只有一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实践证明需要改进的一定要认真改进。另外一手要头脑清醒，提高警惕，长期地、坚持不懈地抓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如果没有这一手，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现代化建设也不能搞好。对待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对待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认识一定要清醒，态度一定要严肃，决不能麻木不仁，敷衍搪塞，消极怠工。同时，方法、步骤、措施要非常慎重。主要是依法惩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遵循司法程序，不搞过去隔离、围攻那一套，不能人人过关，无限上纲。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完成的，要长期反复地进行下去。当然每个时期重点抓什么，是不一样的。有一种议论，说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惩治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会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种议论是没有道理的。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的党员、干部，把我们的党员、干部改造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还怎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严重经济犯罪分子进行斗争，正是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有坚决制止他们在各种领域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的破坏，只有毫不留情地把犯罪活动打下去，我们的建设事业才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顺利进行。第三，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作为一个重大任务长期抓下去。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心是三句话，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要使全国各族人民，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要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的人。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坚持对外开放，但是终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无论干什么，都要立足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革命和建设靠自力更生，今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靠自力更生。要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间，形成这样一种风气、一种作风、一种精神状态。第四，整顿党的队伍，加强党的领导。党员干部中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一定要按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把他们清除出去，对我们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经过不断的整顿，使我们党的队伍，我们的干部队伍越来越纯洁，永远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除了组织整顿，还有思想整顿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根本性。我们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个性质不能动摇，不能改变。要在党内，特别是在党员、干部中，普遍地、经常地、深入地开展共产主义教育，使每个同志都成为合格的党员、合格的党的干部，使党员、干部的思想品德、党性修养和政治质量普遍恢复以至超过过去的最好水平，使党的战斗力恢复以至超过我党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4月5日 上午，在住地同彭真、胡乔木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修改稿）》。十二日，宪法修改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和审议了这个修改稿。

△ 阅胡乔木转呈的《美国专家艾德勒谈我国经济特区建

设等问题》〔1〕一文和他的附信，并批示请赵紫阳“约艾一谈”。胡乔木在附信中指出：艾德勒关于我国经济特区的建设方针的谈话，看法很现实，而又具有对我国利益的深谋远虑，很值得重视。

4月6日 上午，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希思问：记得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你也在座，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一九九七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一九九七年只有十五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要担心呢？邓小平回答：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香港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在谈到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问题时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

〔1〕此文是艾德勒同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宋平、甘子玉等的谈话。艾德勒，美国财政金融问题专家，长期在中国工作，曾参加《毛泽东选集》翻译工作。

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1〕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在谈到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时指出：这不只是卖武器的事，这是美对华政策的根本体现。美国要承担义务，在一定时期内要逐步减少直到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否则，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就不可能，除非使用武力。现在看来美国有一部分人的根本思想还是杜勒斯主义，就是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4月7日 上午，会见德钦巴登顶〔2〕率领的缅甸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在介绍中国情况时指出：我们现在在做四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体制改革。通过体制改革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同时在各行各业有意识地配备年轻干部，接替老同志的工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贯彻始终，一直抓住不放。第二件事是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要搞四个现代化，不实行开放政策不行。为了坚持开放政策，必须打击经济犯罪分子。因此，我们坚持两手，一手坚持开放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分子。这两手都不是搞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行的，要坚持到底。第三件事是抓精神文明建设。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注意精神文明建设，就有很大危险。精神文明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特别是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和艰苦奋斗。这也不是

〔1〕 指1842年8月、1860年10月、1898年6月英国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即《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原称《中英续增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这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的中国领土被割让给英国，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即所谓“新界”，被“租借”给英国，期限为99年，1997年6月30日到期。

〔2〕 德钦巴登顶，当时任缅甸共产党中央主席。

抓一年两年的事，要一直抓到底。第四件事是加强党的建设。我们讲四个坚持，核心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但是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要善于领导不容易。这也是要天天注意的问题。这四件大事都围绕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四个现代化的保证。

4月10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在讲话中指出：《决定》是一个重要的文件，这是讲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实际上我们要看得更深一点。对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以来出现的经济犯罪活动，要有足够的估计。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应该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现在刹这股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

文选》第二卷，题为《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4月16日 上午，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介绍中国经济情况，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指出：我们的经济要搞调整，原来准备调整三年，现在看来，整个第六个五年计划都是调整时期。我们缺口太多，欠账太多，能源短缺，交通运输紧张，城市建设滞后，这些问题不解决，想把事情办好、想发展快一些都办不到。我们正在制定“六五”计划。我们要求计划工作要做得扎扎实实，没有水分。不然，就会造成弄虚作假的坏风气。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要为九十年代做好准备，力争在九十年代有一个较快较好的发展速度。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除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他的话我们表示注意到了。我们的立场在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里都讲了。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同时，请齐奥塞斯库见到勃列日涅夫时带话：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出他的军队也可以。先一两件事做起。没有这样的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在谈到党与党的关系时指出：每个党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现在采取向前看的态度，过去的事一风吹。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合适的，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对一个小国，即使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不一定合适，更不用说对发达国家了。欧洲问题欧洲人最了解，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人家犯了错误，让人家自己去改正。在所有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是不存在的，即使意见完全一致，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也会不同。

4月17日 阅陈云建议宋任穷继续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电话记录，作出批示：“宋这次不动。”

4月20日 上午，会见几内亚比绍国家元首、革命委员会主席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指出：粉碎“四人帮”后这五年来，我们正确地总结了经验，下决心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没有三十年到五十年不行。现在正在努力实现第一阶段二十年的目标，就是在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美元。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我们前进的基础就比较好、比较扎实了。

4月21日 阅反映马璧^{〔1〕}关于对外宣传和落实政策等问题的意见的材料，作出批示：“请中央统战部考虑。对马璧的安排要恰当，要使他能有所作为，还可考虑他加入政协常委。政协、统战部领导同志应有人同他常来常往。”十二月，马璧任全国政协常委。

4月22日 阅马寅初^{〔2〕}请求帮助办理其长孙赴美国留学护照的来信，作出批示：“教育部处理。对马老的事应照顾些。”

4月23日 上午，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雅各布·汗，

〔1〕 马璧，曾任台湾辅仁大学教授、国民党军队总政治作战部特约研究员、台湾《政治评论》月刊社社长。1981年11月从台湾回北京定居。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2〕 马寅初，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名誉校长。

就中巴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指出：我们的友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不受两国人事变动的影响，这种关系是世界上少有的。两国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在国际事务中合作得很好。这种亲密的关系将会长期巩固下去。

4月25日 晚，和胡耀邦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民族解放阵线党总书记沙德利·本·杰迪德。指出：在当前更加动荡的国际环境下，不仅要把南北对话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南南合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就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合作。第三世界国家各有特点和长处，可以互相借鉴，是有能力进行合作的，合作的领域是很广阔的。

△ 晚，同胡耀邦离开北京赴朝鲜进行内部访问。

4月26日 上午，赴朝访问途经沈阳、本溪、丹东车站时，和胡耀邦分别接见中共辽宁省委、本溪市委、丹东市委负责人，在沈阳车站询问站台售货亭商品销售情况，提出要把站台商品销售搞得繁荣一点。

4月27日 上午，和胡耀邦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举行第一次会谈。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我们历来反对美国卖武器给台湾。美国卖武器给台湾，是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统一。我们要求美国承担义务，就是在一定期间内逐步减少直到最后完全不卖武器给台湾。如果美国不尊重中国主权，势必要导致中美关系的倒退。现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倒退了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世界上有一种议论，说中国不敢倒退。美国最近的舆论包括他们官

方人士的非正式讲话，说倒退对中国不利。所谓不利，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会受到影响，贸易方面会受到影响。他们讲，海上石油勘探，美国公司不干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威胁。我们对这种腔调根本不理。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中苏关系应该说总有一天要有所改善，但要恢复正常化，看来现在也不具备条件。所谓条件就是苏联在阿富汗问题、柬埔寨问题、中苏边界驻军与蒙古驻军问题上要有实际行动。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指出：我们尊重国际条约，还是到一九九七年，不准备提前解决这个问题。方案无非两个，一个是新界延长租期，一个是收回。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一九九七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整个收回。英国的“盘子”是放在能够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这点上。这不行。在中国，不管哪个人当政都不会同意新界延长租期。而且一建国我们就否定了关于香港的不平等条约，不承认这个条约。卖国的事谁也担当不起。所以，我们同英国人说，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中国全收回。在这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设想，那时香港收回后，维持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组织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挂中国国旗，也可能有个地方的旗帜，这可以商量，因为它也有些外事活动和国际交往。保留这样一个香港对我们益处比较大。不管怎样，香港必须收回。不搞这一条全国人民要反对。

△ 下午，和胡耀邦同金日成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由胡耀邦介绍中国国内情况。在胡耀邦介绍中共十二大准备选举历史上为党做过贡献，现在还可以做工作、出主意、提意见的老同志组成中央顾问委员会时，邓小平表示，如果有人不愿意

当，别人又赞成他当，他愿意当顾问委员会的主任。

△ 晚，和胡耀邦出席金日成举行的宴会。席间，在金日成谈到他很赞成中国党恢复刘少奇的名誉，并认为刘少奇搞白区工作很有成绩时表示：刘少奇实际上是我党白区工作的负责人。

4月28日 上午，和胡耀邦同金日成举行第三次会谈。听取金日成介绍朝鲜国内情况和南朝鲜问题、不结盟运动问题。在主人谈到许多国家要求举行一次发展中国家首脑会议来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希望中国考虑这个问题时，表示：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最近有很多第三世界的朋友谈这件事。我们很赞赏发展南南关系的倡议，这是很好的设想，实际上是坎昆会议失败的影响。还指出：最近，我们不断讲加强第三世界的联合和相互支持、相互援助。我们的对外政策也由原来的两句变成了三句，即加强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 下午，同胡耀邦谈话。在胡耀邦提出向朝鲜人民大学堂赠送十五万册中国图书的意见时表示赞成。七月八日，文化部举行赠书仪式，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事业部副部长玄峻极专程来华接受赠书并出席赠书仪式。

△ 晚，由金日成陪同，和胡耀邦观看音乐舞蹈史诗《光荣颂》。

4月29日 下午，由金日成陪同，观看大型团体操《人

民歌颂领袖》。在中间休息时表示：这是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教材。在毛主席九十诞辰时，我们要重演《东方红》，当然有些内容需要修改和调整。

△ 晚，和胡耀邦出席金日成举行的饯行宴会。

4月30日 上午，和胡耀邦离开朝鲜回国。

4月 为《纪念柯棣华^[1]》一书题词：“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5月1日 和赵紫阳、李先念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和边疆少数民族青年参观团全体成员。

5月2日 上午，会见卢森堡大公国政府首相兼国务大臣皮埃尔·维尔纳^[2]。在谈到欧洲联合问题时指出：我本人是欧洲联合的一个热心支持者。欧洲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走联合的路，虽然有时会有些困难，办法只能是多做工作，要有耐心。在介绍中国情况时指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问题复杂，人均国民收入要想增长很快不可能。我们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一个小康水平。要接近而不是达到你们西方的水平，恐怕

[1] 柯棣华，原名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尼斯，印度人。1938年9月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41年1月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1942年12月在河北唐县逝世。

[2] 皮埃尔·维尔纳，当时还任卢森堡大公国天主教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

还要花三十年时间，即从现在起要艰苦奋斗五十年。为了保证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得以实现，我们首先注重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仅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还要使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专业化、知识化、比较年轻化。我们的干部队伍长期以来存在老化问题，工作活力不够。这件事我们只能逐步解决，估计起码要经过十年的努力。减少上层领导机构，有利于权力下放。权力必须下放，但这是在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权力下放。如果在五十年里，我们的方针、政策对路，组织上包括机构改革能见成效，工作效率高，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就有希望。

5月4日 上午，在住地同胡耀邦、胡乔木谈话。由胡耀邦汇报十二大报告的起草问题。

5月5日 上午，会见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迈克尔·莫里斯·基拉宁勋爵，感谢他任职期间为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代表权所作出的努力。在基拉宁谈到一九三七年他作为记者来中国采访时所目睹的旧中国的情况时，称赞客人是一位既了解旧中国又了解新中国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指出：尽管中国现在还很穷、很落后，但同旧中国比较一下确实有很大不同。我们现在下决心搞四个现代化，发展我国的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正朝这个目标前进。

5月6日 上午，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塞缪尔·卡尼翁·多伊。在介绍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我们现在正一心一意搞建设，力争经济有较快的发展。目前，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这一政策已开始有些效果。但

是，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再就是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搞工业，规模也不要太大，可搞些中小型项目。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 将一群众来信批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来信建议对中国留学生、驻外人员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制订切实有效的办法，防止留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向外国政府请求政治庇护事件的发生。

5月8日 上午，会见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指出：一九八〇年你访华时，我们在交谈中主要谈了中美关系的一些原则，即中美关系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要发展，而不要停滞，更不应该倒退。中美之间的中心问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它是检验中美关系稳固性的准则。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可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两国关系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发展。《与台湾关系法》是发展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里根政府多次声称，只有

一个中国，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但这要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首先是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表现出来，因为这不仅牵扯十亿人民的感情，而且是侵犯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的问题。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词可以研究。但我们一定要达成谅解和协议，内部一定要肯定这一点。在讨论中，你们要求把售台武器问题与台湾海峡局势联系起来，我在访美时曾对参众议员和卡特总统讲过，虽然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如果美国政府无限期地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给台湾提供保护伞。

5月13日 上午，会见泰国外交部部长西提·沙卫西拉。就柬埔寨三方〔1〕联合问题表示：中国愿意为促进柬埔寨三个方面实现联合继续努力做工作，但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只能出主意，从旁推动和促进。关键取决于他们自己。

5月15日 上午，会见佛得角总统、佛得角独立党总书记阿里斯蒂德斯·马里亚·佩雷拉。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说是大国，因为人口多，地方大，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说是小国，因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仅二百多美元，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我们花了五年多一点时间来消除“文化大革命”灾

〔1〕指以柬埔寨共产党为主体的民主柬埔寨政府，以西哈努克为代表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以宋双为首的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1982年6月22日，西哈努克、乔森潘、宋双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签署《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宣言》。

难性的后果。这五年中，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根据国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毕竟只有五年，面貌改变得不多。按现在的设想，八十年代的十年，变化不会很大，主要变化在九十年代，就是在本世纪末，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但也只是一个小康生活。可以说，那个时候中国日子很好过了，但并不富裕。到那时，我们将建立起很可靠的良好前进基础，然后再花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真正列入世界先进行列。这就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还指出：按说中国应对第三世界朋友做出更多贡献，但现在不行。也许到本世纪末，情况有所改变，可能对第三世界朋友做出更多贡献。

5月17日 上午，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名誉顾问、前会长滨野清吾一行，称赞八十四岁高龄的滨野为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并表示：相信包括滨野先生在内的许多日本老朋友所开拓的中日友好道路将会继续向前发展。

5月中旬 同意彭真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整顿公安部机关的“三种人”的建议。

5月21日 上午，会见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1〕和夫人。

5月29日 纪念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儿童科学公园基金会〔2〕在北京成立。任基金会名誉主席。

〔1〕 霍英东，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香港有荣公司董事长、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

〔2〕 1982年10月，基金会改名为纪念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基金会，简称宋庆龄基金会。1987年10月，又改名为宋庆龄基金会。

5月31日 上午，会见李汉魂^{〔1〕}、吴菊芳夫妇。对客人说：我们这一代人七十多岁、八十多岁了。你这样高龄还回国来看看，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也欢迎你们全家成员都回来看一看。李汉魂、吴菊芳是应廖承志邀请从美国回国访问的。会见结束后，设午宴招待客人。

5月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拟定军队建设“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的指示》。

6月1日 上午，会见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小霍华德·贝克。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考虑一切问题必须把着眼点放在战略问题上。只有从战略角度考虑两国的关系，本着既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又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的精神来处理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两国才能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中美两国之间现在面临的就是一个台湾问题，这是一个涉及中国自身国家利益和主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回旋余地。希望美国政府，特别是里根总统采取明智立场，比较早地比较快地处理这个问题。这样，存在于我们两国关系中的这个疙瘩就没有了。对中美两国关系投下阴影的主要是《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法太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这个法规定的不只是美国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文化、商务关系，而是涉及政治领域，特别是涉及中国的主权。即使解决了美售台武器问题，但也只是解决了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根本问题还是这个法。这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关键问题。这个法只要存在一天，

〔1〕 李汉魂，曾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总统府参军长。1949年后定居美国。

就存在一天的阴影。我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想把中美关系建立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排除这个阴影。我们希望发展两国关系，不要因为别的干扰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停滞，甚至倒退。

6月2日 上午，会见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

6月3日 上午，会见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重申中国支持柬埔寨三方联合的立场。

6月8日 上午，会见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1〕}。在谈到柬埔寨问题时指出：现在我们要支持抵抗爱国力量，三方不管哪一方，都支持，绝对不能削弱抵抗力量，关键是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柬埔寨是一个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如果柬埔寨本身愿意，我们支持它们加入东盟。

6月11日 阅赵朴初^{〔2〕}希望适当解决文物管理部门占有并破坏广州著名古刹六榕寺的来信，作出批示：“似可由中央统战部商同广东省委提出解决办法，并告赵朴初同志。”九月十六日，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向中共中央和赵朴初报送《关于六榕寺交还宗教部门管理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在八月底以前广州市文管处干部、职工已全部撤出六榕寺，从九月一日起，六榕寺已移交广州市佛教协会和六榕寺僧人自行管理。

〔1〕 伊梅尔达·马科斯，当时任菲律宾安置部部长、大马尼拉市市长。

〔2〕 赵朴初，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6月12日 上午，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1〕}。指出：这几年我们主要解决了让比较年轻的同志来接替我们的工作的问题。这件事做得比较好，加上最近体制改革第一步也是很成功的，这就表明中国确实已经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现在我们可以说能够安下心来搞建设了。搞建设是件不容易的事，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善于管理企业，一些重大的政策不可行、不可靠也还不是完全有把握。但我们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比过去好一些了。我们想加快建设步伐，提高生产发展的速度，所以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对外开放的同时，也会进来一些西方不好的东西，特别是一些青年人，没有理想，觉得什么都是西方的好。对青年的教育很重要。青年人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是危险的。教育青年是关系到下一代的问题。

6月13日 阅王之江^{〔2〕}、邓锡铭^{〔3〕}、张存浩^{〔4〕}请求尽快明确激光武器研究工作抓总单位的来信，作出批示：“我看以国防科委抓总为好。”

6月15日 上午，会见费彝民^{〔5〕}、王宽诚^{〔6〕}、汤秉

〔1〕 蒙博托·塞塞·塞科，当时还任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主席。

〔2〕 王之江，当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

〔3〕 邓锡铭，当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

〔4〕 张存浩，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5〕 费彝民，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大公报社社长。

〔6〕 王宽诚，当时任香港维大洋行董事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达〔1〕、李子诵〔2〕、梁培〔3〕等港澳各界人士，说明中央政府收回香港的决定和有关政策。

6月19日 审阅并同意全国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报告和刘澜涛的意见。报告和意见都提出希望邓小平主持该章程修改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6月22日 主持全国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指出：从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来，已经一年零九个月了。在这期间，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在广泛地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拟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改草案》（讨论稿）。现在将这个讨论稿提请第二次全体会议审定。政协章程修改草案（讨论稿）经这次会议审定以后，还要交付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人民政协各级地方委员会进行讨论。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政协章程修改委员会将再作进一步的修改，最后提请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审议。

6月25日 上午，在住地同胡耀邦、胡乔木谈十二大报告稿修改问题。在谈话时说：报告架子可以，但要写得精彩些、短些。经济部分可以多改，外交部分要注意策略，不要使人觉得我们的外交政策变了。稿子在十天左右改出来。

〔1〕 汤秉达，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2〕 李子诵，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文汇报社社长。

〔3〕 梁培，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工商联合会会长。

6月29日 上午，会见马耳他总理多米尼克·明托夫〔1〕。在谈到中国的外交方针时指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对超级大国，对霸权主义，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也不管霸权主义来自哪一方面，都是采取反对立场的。当然，我们有时侧重于这方面，有时侧重于那方面。我们同世界上所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要加强合作。在明托夫提出希望中国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表示：这我不赞成。千万不要想当什么头，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比那个牢靠得多。

7月1日 审阅政协章程草案，同意把“无党派人士”的提法恢复为“无党派民主人士”。

7月3日 阅乌兰夫、刘澜涛的来信，就他们拟同意陆定一提出的各级政协委员列席同级的人大会议、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发表任何意见不受追究的建议，并要求将这两点补充列入宪法一事，作出批示：“乔木同志阅，我认为这两条不宜列入宪法，实际上这样做就行了。”

7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指出：最近我有两次讲话，讲了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这四件事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我们不搞运动，但

〔1〕 多米尼克·明托夫，当时还任马耳他工党领袖。

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这四件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在谈到军队体制改革问题时，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提高工作效率。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也有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另外一点，体制改革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有利于选拔人才。过去那样臃肿，根本无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7月12日 上午，会见几内亚外交部部长阿卜杜拉耶·杜尔。指出：从历史经验看，第三世界国家必须靠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发展起来，才能受到人家的尊重。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要加强联合和团结，南南合作是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加强联合促进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中国很重视南南合作。在谈到非洲形势时，表示希望非洲国家按照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精神加强团结和合作。

7月13日 应美方要求，接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接受他转交的里根总统来信和美方关于解决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的新草案。里根在信中表示：美国不谋求执行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新草案除将上述意向写入条文外，还表示：美国无意在数量和性能上超过美中两国建交后几年的供应水平。美国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直至最终导致问题的解决。

7月14日 将林业部《关于飞机播种造林情况和设想的报告》，批送姚依林：“每年四千万元，为数不大，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地方做好规划和地面工作，保证质量。这个方针，坚持二十年，可能得到较大实效。如何，请考虑。”

7月16日 会见缅甸外交部部长吴漆兰。在谈到两国关系时指出：长期以来，中缅的友谊具有典范性，我们称之为“胞波”友谊。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是一个缅共问题。处理这个问题只能逐步地、在适当的时候用比较好的方式加以解决。我们希望这个问题不影响我们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是真心话，不是外交语言。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争取一个较长期的和平环境。这有利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确实希望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首先是邻国，包括印度在内，争取一个好的国际条件，以有利于我们的建设。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历史上有很长时间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地位，中国不会把自己经受过的屈辱强加给别人。

7月20日 审阅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关于同苏联商谈对我工矿企业技术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同苏联接触应先从政治问题谈起。”

7月中旬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五周年之际，为《星火燎原》题词：“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7月22日 上午，会见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主席诺罗敦·西

哈努克亲王〔1〕，祝贺柬埔寨三派联合，强调这是柬埔寨争取彻底解放的重要条件。同时指出：有人怀疑中国支持柬三派联合是策略性行动，这是错误的。将来重建柬埔寨时还是三方联合，搞和平、中立、不结盟的柬埔寨，就是亲王执政时的柬埔寨。那时，如东盟愿意接受，柬埔寨可以加入东盟。会见后，设午宴招待西哈努克。

7月23日 和彭真等一起接见参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的全体人员。

7月26日 上午，同姚依林、宋平〔2〕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指出：集中使用资金势在必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苏联在这方面也没有解决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决心要下，明年就要开始。现在资金太分散。我们历来解决困难，最后落实到集中统一。要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你们提出一批重大勘察设计项目，准备提前做好建设的前期工作，这件事要认真落实。要列出时间表，什么时间勘探清楚，什么时间拿出设计，专人负责包干，充分准备，并且要抓紧。大的建设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煤、电、油这些能源项目，还有交通项目，前期工作要抓紧，晚了

〔1〕 西哈努克亲王是在参加柬埔寨爱国力量三方首脑会谈，并签署《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宣言》，访问东盟五国和视察柬埔寨三方解放区后回到北京的。

〔2〕 宋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不行。企业的技术改造计划要专门搞，这个工作量很大。有些要引进外国技术。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方面，因为经验还不多，要组织人专门研究，提出计划。在谈到科学技术工作和人才培养使用工作时指出：我看最难的是这一条。没有一套办法，怎么能把几百万知识分子骨干用起来？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起来。说缺乏经验，只有使用他，才能使他积累经验。体制改革，中心应当抓住两条。第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制定出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一条可能比第一条更重要。没有“明白人”出来当家，一个单位搞不出什么成绩出来。现在是应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白的时候了。衡量一个单位改革是否见效，不仅看它定了什么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看它选的人好不好，这是问题的核心。二十年规划能否实现，关键就在这里。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规划的关键，是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这次谈话的一些内容与邓小平十月十四日同国家计委负责人的谈话要点整理为一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

7月29日 上午，同胡乔木、廖承志、姬鹏飞^[1]、黄华^[2]、邓力群谈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问题^[3]。

[1] 姬鹏飞，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

[2] 黄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

[3] 1982年春，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篡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为日本帝国主义开脱罪责。这年7月26日、8月5日，中国外交部两次就教科书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关于纠正课本中的错误的严正交涉。后日本政府相继表示：要充分倾听中国方面就教科书问题提出的批评，并予纠正；作为过渡措施，将用文部大臣发表见解的办法，指导教师在讲课中贯彻政府的认识。

指出：这个问题要抓。要针对他们所说的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是什么“内政”，别国不得干涉，围绕这一点进行批驳。所谓“内政”的说法，其目的就是把过去的活动说成不是侵略。要把他们的这个观点驳倒。今年“八一五”〔1〕，《人民日报》要写纪念社论。强调中日友好及其历史渊源，中间要有日本侵华的一段。在中日友好的长久历史中，只有一段短暂时间不愉快。问题是要对这段历史有个正确的认识和对待，不能也不允许进行歪曲。只有如此，中日两国关系才能按正常轨道前进，中日两国友好愿望才能真正实现。

7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讲话中指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的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这

〔1〕“八一五”，指1945年8月15日。这天日本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

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7月、8月间 和李先念、陈云等召集外交部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中苏关系问题。提出我们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1〕，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在谈到传递信息的方式时指出：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波兰华沙。八月十日，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赴莫斯科，向苏联副外长传递了中方建议双方共同努力改善中苏关系的信息。二十日，苏联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随后，邓小平在驻地听取钱其琛〔2〕、于洪亮汇报，并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十月，中苏两国副外长级特使第一轮磋商在北京举行，改善中苏关系的进程正式启动。

8月2日 上午，会见法国外交部部长克洛德·谢松。在谈到中法关系时指出：从政治方面讲，中法两国在大多数领域里的看法是相同的，甚至处理的方法也是相同的。我们历来欣赏法国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独立政策。这不是今天才说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世时就是这么评价的。中国也奉行独立政策。我们之间对个别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区别，这没有关

〔1〕 指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量驻军，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武装侵入阿富汗。

〔2〕 钱其琛，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系，是正常的，不可能什么都一样。在谈到中法经济合作时表示：中国需要的是技术。如果法国在经济合作方面把口子真正开大一点，法国所处的地位就比其他一些国家要优越。

8月6日 和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交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决定九月一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上午，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做了不少事情。我们取得的第一个成就就是农村政策见效，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农村空前安定。其次，我国在工业、商业等方面贯彻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看来这是十分必要的，特别要抓能源、交通，也包括通讯、科学和教育。要管理好经济，没有知识不行。我国的人才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文化大革命”前培养的大学生约有五百万人，自学成才的有上千万人，但他们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我们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光讲空话不行。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方针和政策。有一个问题是，到本世纪末，四个现代化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现代化这个名词很好。什么是现代化？一九七九年我回答日本大平首相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达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

长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到下一个世纪，再花三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包括对外开放政策在内的一些政策。我们要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力量，也要利用国际力量。我们建国以后长期处于孤立的地位，几乎是关起门来搞建设。现在情况不同了，国际条件不同了，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同发达国家建立联系。但是不管怎样，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搞四个现代化，基本点还是立足于自力更生。与过去不同的是，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条件，实行开放政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同许多国家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其中包括改造我们现有的企业。在弗雷泽讲到目前世界经济很不景气时指出：关于市场问题，国际上有这个问题，中国不担心这个问题，中国有最大的国内市场。农民增加了收入，就需要工业品，并且需要的东西很多。现在我们还不能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

8月10日 上午，同邓颖超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1〕}、陈树柏、牛满江^{〔2〕}、葛守仁^{〔3〕}、聂华桐等，听取他们对发展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建议，并介绍中国经济形势和改革开放的情况。在谈到中国的发展目标时指出：我们提出二十年改变面貌，不是胡思乱想、海阔天空的变化，只是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这是有把握的。小康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人均八百美元。社会主义制度收入分配是合理

〔1〕 邓昌黎，高能加速器专家。当时任美国费米加速器实验室加速器部副主任。

〔2〕 牛满江，生物学家。当时任美国坦普尔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研究所科学顾问。

〔3〕 葛守仁，当时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莱大学工学院院长。

的，赤贫的现象可以消灭。到那时，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分配到科学教育事业，情况就会大不同于现在。本世纪末有了这个基础，再花二三十年可能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不能说超过。搞了一二年，看来小康目标能够实现。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跑得快一点。前十年把比例失调解决，搞好农业、能源、交通、科学教育。其他方面不可能太快。农业第一靠政策，第二靠科学。在谈到精神文明建设时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正确的，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世界上腐朽的东西、中国老的东西重新出现，而且已经出现。没有理想、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行，精神面貌可以直接影响物质。延安时候我们有什么？物质条件很差，就靠精神文明。靠有理想，靠坚强的信念，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精神有决定意义。在谈到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问题时指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因为好多年没提这个历史问题了，这个题目出得很好。我们的娃娃不能只知道友好，还要懂得历史。最主要的是教育人，包括教育日本人。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指出：就是一个原则，一九九七年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宣布以后的政策。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是卖国贼，含蓄点是清朝皇帝。香港收回后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生活方式等都不变，力求保持现在的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称为“中国香港”。香港的管理，北京不派人，香港自己找人管，香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管理。

△ 阅一封反映广西与一九七九年相比群众生活严重下降，以及“文化大革命”后遗症严重，政策没有落实的来信，

作出批示：“耀邦、紫阳同志阅转乔晓光〔1〕同志。广西情况值得注意，省委应该好好总结一下经验，认真解决问题。”

8月14日 上午，前往陈云住地，同李先念、陈云商议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事宜。

8月16日 同意杨尚昆报送的《关于军委总部精简整编方案调整情况的报告》。

8月17日 上午，在中美联合公报〔2〕发表前，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首先对联合公报即将发表表示祝贺，说：我们很高兴公报的发表。有人把它称为第二个上海公报，这说明它是一个重要的声明，有极大的可能带来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但在执行这一公报中如果出现新的阴影，就会旧话重提。双方都已确定发表这个声明，在声明即将发表时，有些话说一说有好处。希望双方都珍视经过十年积累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接

〔1〕 乔晓光，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主席。这时正在北京出席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

〔2〕 指中美两国政府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又称八一七公报。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9点方针是按照这一大政方针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进一步重大努力。美国政府重申：美国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着宣读致里根总统的口信，说：我这个人讲话从来不用稿子，但为了郑重其事，这次外交部还是给我写了这么一个稿子，是我的意思就是了。我想讲三点：一、公报只是一个良好的新的开端，但重要的还要看今后美国的实际行动。根据中美建交公报规定的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美国本来早就应该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由于考虑到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中方才同意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售台武器能够逐步地但是明显地减少，能够尽早地停止，这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都将有直接关系。二、关于台湾问题，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在公报里，中国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决不意味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做出什么承诺，也决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三、中国重视中美关系，愿意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与美方一起做出努力。但在两国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与台湾关系法》，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

8月19日 上午，会见利比亚总人民委员会秘书贾达拉·阿祖兹·塔勒希。指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虽然问题很多，但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加强团结。我们很欣赏南南合作这个口号。第三世界有着广阔的领域进行合作，取长补短。第三世界各国发展程度有所不同，但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相互提供帮助的条件。当然，对于发达国家我们提倡同它们合作，但要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一些东西可不容易，所以我们的立脚点还是要放在同第三世界的合作上。

8月20日 将反映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政治生活方面存

在的问题的群众来信，批示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8月中旬 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关于三个兵种机关改为总参业务部的请示》报告。

8月21日 上午，会见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对他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希望联合国能比过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阐述中国对外政策时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意义。霸权主义的直接受害者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同时指出：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从联合国的角度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

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中国的对外政策》。

8月25日 审阅胡乔木汇报十二大报告稿《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修改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的信和报告修改稿，作出批示：“乔木同志：第四部分注了点意见，词句请斟酌，五十六页删了一句〔1〕。余无意见。”

8月29日 上午，和李先念、彭真等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为缅怀廖仲恺〔2〕先生、纪念何香凝〔3〕先生逝世十周年联合举行的大会。

〔1〕 指将56页中“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个人专断作风逐渐滋长”一语中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渐滋长”删去。

〔2〕 廖仲恺，1905年参加同盟会。积极协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政治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部长。1925年8月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3〕 何香凝，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廖仲恺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

△ 审阅中共山西省武乡县委、县政府《关于要求为武乡东部老区煤田修建铁路线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武乡是太行山老根据地。此件是该县经过一位去访问的老同志向我提出的要求，请计委斟酌。”

8月30日 下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会议通过了十二大的议题：（一）审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二）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三）审议通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四）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会上，邓小平被选举为十二大主席团成员。

△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

8月31日 上午，到宾馆看望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路易·梅尔马兹一行。在交谈时说：本来因为我年纪大了，同志们要减少我会见外宾的工作。但法国朋友来访，我总得见见面，因为我曾经在法国生活过五年，一九七五年我又到了法国，受到盛情接待。我深感中法两国人民间有着十分友好的情谊。

9月1日 上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执行主席并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回顾中共七大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后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

是正确的。但是，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同时，重申了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提出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二十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同日，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到本世纪末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努力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报告指出，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实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在战略步骤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

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报告还提出，要坚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劳动者，把中国建设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六日，邓小平出席大会全体会议。九日，出席大会主席团会议。十日，出席大会全体会议，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选举，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十一日上午，出席大会全体会议和闭幕式，为大会执行主席，参加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选举。九月一日至十一日，中共十二大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通过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这个章程的决议。还通过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邓小平的开幕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9月2日 阅胡乔木本月一日给胡耀邦、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退耀邦同志：可以考虑。如仲勋留，仍由胡启立〔1〕同志任常务书记。”来信说：胡启立同志找我谈话，谈到中央书记处和办公厅日常工作十分繁重，他又很生疏，认为仲勋同志对他帮助很大。来信建议习仲勋仍留中央书记处一段时间。十二日，习仲勋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9月8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客人十年前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所做的贡献表示赞赏，说：你第一次到中

〔1〕 胡启立，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国访问见毛主席时首先说，你是为美国的利益到中国来的，这个话讲得非常好。反过来，中国和美国改善与发展关系也是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的。遗憾的是，这种明确的战略观点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有。在谈到不久前发表的中美八一七公报时说：中美之间前一段吵了架，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现在可以算是告一段落，发表了八一七公报，人们称之为第二个上海公报。当然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要看今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应该冷静地承认，发展两国关系并不是没有障碍，障碍还很多。最大的障碍还不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比这更具有长期影响的还是《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关系还有漏洞。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来堵塞这些漏洞。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要做许多事情。中美关系发展，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全球战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方面以及文化、科技合作方面，领域宽得很。关心中美战略关系，热心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人，还要做许多工作。十年来建立的这种关系来之不易。我们党的十二大肯定了我们的对外关系，包括与美国的关系。但问题是还要走着看。

9月10日 审阅杨尚昆关于中共中央军委组成人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征求意见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就这样改定：秋里〔1〕去总政，丕显〔2〕管政法。问问三

〔1〕 秋里，即余秋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1982年9月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2〕 丕显，即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帅〔1〕、陈〔2〕、李〔3〕、赵〔4〕的意见。”

9月12日 下午，出席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 同意中共中央军委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全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草案）》。

9月1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讲话时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顾委的任务有四条：一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二是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三是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四是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总的说就是要按照

〔1〕 三帅，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

〔2〕 陈，指陈云。

〔3〕 李，指李先念。

〔4〕 赵，指赵紫阳。

新党章办事。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第二，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第三，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搞精神文明，关键也是以身作则。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 下午，和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批准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主任、副主任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

△ 下午，和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李先念、陈云等接见出席中共十二大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并合影留念。

9月14日 下午，会见冯玉祥^{〔1〕}的子女冯弗伐、冯理达、冯洪志、冯颖达、冯洪达。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回顾当年同冯玉祥先生交往的情景。指出：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冯玉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冯玉祥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还说：李德全^{〔2〕}大姐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很怀念她。随后，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冯玉祥，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解放战争时期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政治委员会主席。1948年9月，在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途中遇难。

〔2〕 李德全，冯玉祥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72年4月逝世。

△ 审阅胡乔木关于将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收入十二大文件汇编的请示，批示：“是否需要将重复语言删节一些，请乔木同志斟酌。”

9月16日 上午，和胡耀邦、赵紫阳、邓颖超等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

△ 在住地和李先念、胡耀邦、陈慕华〔1〕等听取李后〔2〕、卜明〔3〕关于香港目前金融情况的汇报。接着，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即将访华一事同大家交换意见。在交谈中再次肯定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决策是正确的，并指出：十五年中香港可能会发生波动，出乱子。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不仅对撒切尔夫人，而且对香港各界人士要说清楚，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保护各方面的利益，使他们不要抱其他幻想。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子里来做。这次同撒切尔夫人会谈，就是将原则定下来。希望英国同我们合作。要说明，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不得不作新的考虑。

9月17日 上午，前往钓鱼台国宾馆看望金日成。在谈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十二大开得很好，制定的所有方针政策都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重申，也有新的东西，主要是

〔1〕 陈慕华，在廖承志生病期间，负责国务院港澳工作。

〔2〕 李后，当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

〔3〕 卜明，当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新老干部交替问题。十二大同七大比，同七大起的作用一样，七大是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是把建设引向胜利。一九五六年开的八大是正确的。八大制定的路线没有贯彻下来，就是因为“左”。这以后，搞了“文化大革命”。犯错误，不只是毛主席，我们也有责任，要总结经验，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中午，设宴款待金日成一行。

9月18日 上午，陪同金日成乘专列赴四川访问。途中，同金日成单独会谈，主要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指出：我出来工作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当时有人抵制这个讨论。我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治路线的分歧，而且也是思想路线的分歧。我从朝鲜回来后，在东北三省沿路讲这个问题，一下子传到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还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时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这是关键。“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一心一意搞建设》。

△ 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同金日成单独会谈。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我们同苏联接触主要是要使中苏关系正常化。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解决苏联在中苏边界一百万驻军，包括苏联在蒙古驻军的问题；第二，解决越南侵略柬埔寨的问题；第三，解决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问题。苏联推行南下的政策不会变。越南和阿富汗都与中国有共同边界，因此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都构成对中国的威胁。要使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应在实际行动中有所表现，总要做点事情。我们主张，三件事最好先从一件事做起。这是个信用问题。在我看来，中苏谈判将是长期的。当然，我们还是愿意同苏联保持接触的。召开十二大之前，我们已答复了苏联，同意把两国之间的接触升格到副外长级。这是一个松动，当然一谈到实质性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其实，改善中苏关系，现在苏联比我们急，它的日子也不好过。具体反映在最近中东地区这个重要战略问题上的斗争，对以色列进攻黎巴嫩，苏联的态度很软弱。阿拉伯国家现在已经对苏联感到失望了。苏联要硬撑这个局面，也很难。同样，美国也是如此，力不从心。我们认为，美苏两霸主宰世界的形势已经有了一点变化。美国反对往西欧铺设苏联的天然气管道，但西欧国家不听，连英国也不听美国的意见。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最近，我们同美国也吵了一架，虽然说已告一段落，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说：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轻人需要上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

国投资，讲友好，就容易忽视这一面。

9月19日晚，抵达成都。下榻成都金牛宾馆。

9月20日上午，陪同金日成参观四川峨眉机械厂。返回宾馆的途中，游览杜甫草堂。

△ 下午，陪同金日成到灌县〔1〕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

△ 晚，出席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为金日成主席一行举行的欢迎宴会。

9月21日上午，陪同金日成到成都市郊双流县白家公社顺风大队第二生产队，参观农村沼气的开发和利用。参观中，向金日成介绍沼气利用情况，说：这东西很简单，可解决了农村的大问题。光四川省，每年就可以节省煤炭六百多万吨。沼气能煮饭，能发电，还能改善环境卫生，提高肥效。在参观农民家庭，看到农民家中堆放的稻谷时，向客人介绍说：我们搞了家庭联产承包，包产到户，农民都有粮食了。

△ 下午，出席成都市各界人民为欢迎金日成举行的大会。在讲话中说：四川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省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政策，较早地实现了安定团结，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金日成主席多次访华，但来四川还是第一次，我曾不止一次建议金日成主席来这里看一看。金主

〔1〕灌县，今四川省都江堰市。

席的光临，对四川的工作将是一个推动力量。我希望四川人民充分发挥“天府之国”的优势，在各项工作中争取更上一层楼。

△ 陪同金日成游览武侯祠，参观四川省工业展览。

9月22日 上午，乘专机返回北京。在专机上，听取胡启立、郝建秀〔1〕、李鹏〔2〕等汇报关于建设二滩水电站〔3〕等问题。指出：建设二滩水电站，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赞成。不只是二滩水电站，还有一批项目要上。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对于这些大项目，每一个都要做好前期工程。我看三峡低坝方案也应该搞嘛。这些项目，包括鞍钢的改造，都需要很长的建设周期，应该早一点动手。不要徘徊，一徘徊，一年两年就过去了。计委开列了一些大项目，其中就有二滩，问题是什么时候上马。建设二滩，要和外国包括美国的公司谈判，利用它们的技术和设备。五十万千瓦的机组我们还搞不了吧？可以合作生产嘛。可以考虑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还有加拿大、日本，利用它们的低息贷款。在听取关于四川有些县提出自办小水电问题的汇报时说：这件事，不要很多投资，国家不吃亏，群众有利，减少浪费，容易解决。可先在四川、湖南试点，要制定政策，把权力交给省。你们还要多下去调查，多发现这一类的问题。中央、国务院给个政策，群众、国家都得利。这就是搞

〔1〕 郝建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纺织工业部部长。

〔2〕 李鹏，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3〕 二滩水电站拟建在四川省渡口市（今攀枝花市）北40公里处的雅砻江上。

活，就是解放思想。这是胡启立等人随胡耀邦到四川西昌、渡口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后，根据地方同志反映的一些情况，按照胡耀邦的意见，专门向邓小平作这次汇报的。

9月24日 上午，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前途问题交换意见，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1〕}！不迟于一二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中国的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结束殖民统治时代。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

〔1〕 李鸿章，晚清军政重臣。曾代表清政府主持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和《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在撒切尔夫人提出有人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有可能发生波动时，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建议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撒切尔夫人同意邓小平的建议。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 下午，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

△ 晚，和胡耀邦等出席金日成举行的答谢宴会。

9月25日 审阅第一机械工业部一干部关于机构改革问

题的来信，作出批示：“这是一个问题，请紫阳、万里〔1〕同志考虑。”来信反映：目前政府机关编制庞大，组织机构也有所增加，办公房子紧张，车子还要增多。有些行政单位改为企业，人员增加更多，实际仍是国家支出，应重视这一问题。

9月28日 上午，会见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指出：明天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这是值得我们两国人民纪念的日子。中日关系有很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我们党的十二大强调这一点，说明是中国的长期国策。当然，中日两国也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完全一样，这也是正常的。类似教科书这样的问题今后还会有，还是要在相互谅解的精神下，继续解决发生的问题。就中日关系在政治上的问题来说，我们希望阁下和阁下的政府以及以后的日本政府，还是要注意军国主义倾向。我们不是怀疑日本政府有这样的倾向，因为你们的宪法有明确的规定。但日本确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违背绝大多数人的意愿，想复活军国主义。还说：在经济合作方面，我们希望能做更多的事。中国有资源，日本有技术，这种合作就了不起。我们历来强调，中日经济合作要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这种合作单单在政府间还不够，民间也要进行，希望日本政府对民间多做一些工作。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政策，在十二大得到了确认。最近几年，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让年轻一些的同志担任第一线的工作。可以说，我们的政策连续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六

〔1〕 万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十岁以下的同志占很大的比例，以后还要加大这个比例，四五十岁的人要多一些。

9月30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谈话时说：我现在是把自己放到顾问委员会里边去，就是说，让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第一线来。我退到第二线这样的事要早安排好。在谈到国内情况时说：实际上我一九七四年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主持党和政府的工作。一年时间我就垮下来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这十年的波折启发了我们。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十一大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继续过去的“左”的政策和思想，所以有两年的徘徊。真正的转折点是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肯定了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并将继续加以贯彻。十二大的最大特点是人事安排体现了三中全会政策的连续性，包括对外政策。这项工作还没结束，解决干部老化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继续做下去，但要有耐心。近几年我国农村形势变化最大，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城市也有变化，主要是人民的精神面貌变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增强了，对党和政府更加信任了，这将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总的说是好的，但近两年发生了一些波折。我们是重视同美国发展关系的，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向前发展。

10月1日 审阅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关于拟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苏中友协成立二十五周年活动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谈判还未开始，目前不宜派代表团，可由大使参加。”

10月2日 对《国内动态清样》反映的江苏省计划委员会一负责人关于创我国自己节能道路的建议一事，作出批示：“紫阳、万里、依林^{〔1〕}、宋平同志阅，这些意见很值得重视。”

10月5日 新华社报道，《刘伯承军事文选》即将由战士出版社出版。此前，邓小平题写书名。

10月13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卡尔·卡斯滕斯。重申中国支持德意志人民要求民族统一的正当愿望，指出：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由于人为因素强制造成分裂的，最终都是要统一的。还说：中德两国相互信任的关系正在发展。我们历来都希望加强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科技合作和经济关系。但要真正取得大的发展，希望贵国政府在技术转让方面帮我们点忙。在技术转让方面搞得好，可以加强我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我们同美国关系中有一些疙瘩，重要的疙瘩之一就是美国不愿意向中国转让技术。十年来，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没有给我们一件像样的比较好的东西。美国长期以来把中国划在“Y”类，是倒数第二位。美国名义上给了我们最惠国待遇，实际上只比“Y”类地位提

〔1〕 依林，即姚依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前了一些，但提得不多。^{〔1〕}我们同欧洲和日本的合作也存在技术转让问题。大家要从战略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不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相互关系的发展毕竟是有限的。在谈到世界经济发展问题时说：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不使第三世界的穷国得到发展，世界的市场就有限得很。西方的经济正处于衰退中，当然有办法使之回升。但归根到底，只要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贫穷，世界市场终归是有限的。

10月14日 上午，同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指出：你们提出二百七十九项重大勘察项目，要认真落实。到本世纪末，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定了，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靠不靠得住？十二大说靠得住。相信是靠得住的。但究竟靠不靠得住，还要看今后的工作。起码今后三年要有很好安排。你们在计划施工的建设项目之外，提出一批重大的勘察设计项目，准备提前做好建设的前期工作，要认真落实。到条件具备时，就可以动工兴建。不管怎样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不然，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了事。这批重

〔1〕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冷战，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1949年，美国制定“出口管制条例”，防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用于军事的产品和技术，并根据不同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和实力等因素，按管制的宽严程度分为7组——Z组、S组、Y组、W组、Q组、T组和V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和苏联一样被列入Y组。朝鲜战争时中国被列入管制最严的Z组。尼克松政府期间，将中国重新划入Y组。1980年5月，卡特政府单独为中国建立了一个P组，以示与苏联不同。在中国政府特别是邓小平的反复交涉下，1983年6月，里根政府决定将中国的管制等级调至V组，即美国技术出口限制中管制最弱、是友好国家但非盟国的一组。

大勘察设计项目包括了各行各业，各个部门都要认真抓，尽快开展前期工作，包括科学技术研究、技术经济论证、勘察设计等，要早点着手进行。要列出进度表，什么时间勘探清楚，什么时间拿出设计，由专人负责包干，充分准备，并且要抓紧。不然，有了钱也动不了。二十年时间分为前十年、后十年，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准备。准备，有个时间问题，要抢时间，不能不认真对待。哪些项目早上，哪些晚上，要有个安排，不能挤在一起。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能源不够，不仅是“六五”期间的问题，也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问题。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在谈到加强科技队伍的管理和人才培养、使用问题时说：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这个问题应当抓紧解决了。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科技队伍的组织管理问题，要认真考虑，现在的管理形式不行。怎样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是个很大的问题。科技人员分布在国防部门、民用部门、各种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要想法打破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当然，还有个政策问题。像上面说的这些勘察设计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审查，要有人负责。每个项目要有几个真正有本事的人作骨干，其他的人由他们去找，他们熟悉，很快可以把人组织起来。要是都由计委去组织，那就慢了。有些项目可以委托大学去搞，相应地要调些科技人员去参加工作。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

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现，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这条路还没有开出来，各行各业，包括企业，都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谈话的要点与邓小平七月二十六日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的一些内容整理为一篇文章，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

10月19日 上午，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指出：中国这几年的主要变化是真正取得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人们的精神面貌不同了，一心一意搞建设。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活力，我们要使各级领导逐步实现年轻化，这是个方向。我们党的十二大在这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今后要继续努力，使我们的领导层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谈到中巴关系时说：中巴关系是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的关系。这种关系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我们两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有着广泛的一致，今后要继续发展这种关系。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的情况下，加强中巴合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10月22日 上午，会见戈帕尔斯瓦米·帕塔萨拉蒂〔1〕率领的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在谈到中印关系时说：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一九七九年我见你们的前

〔1〕 戈帕尔斯瓦米·帕塔萨拉蒂，当时任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席。

外长时就讲过“一揽子解决”，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我们和好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我相信，我们之间最终是会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加强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在谈到南南合作问题时说：我们很高兴第三世界的国家提出南南合作问题，当然南北问题也应该解决。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啊！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这种合作总能解决一些问题。这些年来第三世界有一些发展，各国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相互交流与合作。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会见代表团后，应印方要求又单独会见了帕塔萨拉蒂。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形成的，因素复杂，从大局来说应该尽快解决。“麦克马洪线”〔1〕是殖民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要中国人民承认它可办不到。坦率地说，除了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一揽子解决”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有协调一下，双方都作些让步，这样才好说服人民。现在比较好的情况是，双方

〔1〕“麦克马洪线”，指1914年3月参加西姆拉会议的英国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制造的所谓的“中印边界线”。这条线将中印边境东段地区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版图。英国在长时间内未敢公开有关文件。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

都在考虑寻求一个好的办法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愿望是好的，在这个基础上找办法。只要采取合情合理的态度，问题是应该而且能够解决的。即使问题一下子不能解决，其他领域可做的事还是很多的。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增进中印友谊，加强南南合作》。

10月24日 上午，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谈到日本修改教科书问题时说：我们为什么对教科书问题这么注意？因为在教科书问题上有一个教育日本后代的问题。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实际上是用军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后代，这样，怎么谈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呢？所谓世代友好，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只是下一代，还有好多好多代嘛！所以，我们提醒日本，有那么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兴风作浪，我们双方都值得警惕。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中苏关系要改善，要正常化，首先是要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消除对中国的威胁。但中苏对话还要继续下去，不能设想两个国家永远这么僵持下去。

10月25日 上午，在住地同赵紫阳、彭真、胡乔木、万里、杨尚昆、陈丕显谈检察、司法机构的设置问题。在听取彭真汇报存在两种不同意见时说：检察院仍维持现状，不与司法部合并。

△ 上午，会见乔治·马歇^[1]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着重就党与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交换意见。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党自己独立处理，

[1] 乔治·马歇，当时任法共中央总书记。

任何外国党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肯定会犯错误。一个党对于别国的情况总是比较生疏的，总没有本国那样了解自己的问题。一个党即使犯了错误，也要靠自己总结、去纠正，这样才靠得住。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好，我们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法国共产党有些事我们是不赞成的。但不赞成是一回事，指手画脚又是一回事。这是个原则问题。中国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其中突出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独立思考，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才取得胜利的。在谈到中法两党以往的分歧时说：过去的事不谈了，我们大家都向前看。中午，设宴为马歇一行饯行。法共中央代表团在华期间，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三轮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正式恢复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中断的两党关系。

10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陈赓^{〔1〕}日记》最近由战士出版社出版。此前，邓小平题写书名。

10月28日 上午，会见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在谈话中说：我现在的年岁大了一点，已退到第二线，主要是减轻一些工作，大事管一管，小事就不管了。到了这个年龄，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所以，在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大家都要我当党的总书记，我坚决推辞掉了，国家和国际上事很多，让精力充沛的同志来担当比较好。我们中国存在干部老化问题。打了二十二年仗，我们的将军可编成一个团。所以，我们现行的干部政策是要年轻化。我们党召开了第

〔1〕 陈赓，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3月逝世。

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走的第一步是干部年轻化，中央委员会百分之六十的干部是六十岁以下的，我们五十岁的干部算是年轻的了。干部年轻化的过程还要继续下去。在谈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就是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中国的立场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所谓维护世界和平，就是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谁有资格发动世界大战，只有美苏两家。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是第三世界，因为首先受战争之害的是第三世界。中国历来主张第三世界联合起来，相互合作，同时要联合发达国家中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力量。在客人要求中国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时，说：中国的一贯立场是，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不是什么头头，什么特殊地位、当头头的想法都不能有。第三世界的联合和合作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处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真正联合起来。指出：我们对核武器的政策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二、达成协议，逐步减少以至最后销毁核武器。我们有一点核武器是为了更有利于达到这一战略目标。核武器方面的合作是干不得的。我们可以在别的方面同超级大国进行斗争、较量，在核武器方面不能同他们较量。在这方面，中国如果采取不恰当的政策，同其他国家进行核合作，就会带来很大的灾难性后果。第三世界国家不值得把钱花在这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方面进行战略合作，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午，设宴招待卡扎菲。

10月30日 审阅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党组本月二十七日《关于全国政协五届五次次会议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没有新的话要讲。闭幕时我出席，但不讲话。”

11月3日 审阅刘澜涛报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改草案）》，作出批示：“退澜涛同志，我看了总纲和工作准则，都同意。”十二日，审阅刘澜涛报送的《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改草案）〉的说明（讨论稿）》，作出批示：“退澜涛同志，不必看了。”

11月5日 中午，在北京四川饭店举行宴会，祝贺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六十寿辰。宴会前，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宴会上致祝词，说：西哈努克亲王同我们已有几十年的交情了。我们对亲王长期以爱国的热忱、充沛的精力、杰出的才华，为争取柬埔寨民族的独立与生存所作的努力，一向深为钦佩。同时，希望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

11月9日 上午，会见宇都宫德马〔1〕为团长的日中友好代表团。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战争的危險始终存在着，但看来近期内打不起来。仓库里核武器越堆越多，又不能吃，又不能穿，总得找个出路。当然最积极的出路就是销毁。如果不销毁，越堆越多，怎么办呢？所以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是摆在当代人类面前的迫切任务。我们对部分禁止核武器、部分裁军历来兴趣不高。我们提出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第二步再达成协议，逐步销毁，以至最后销毁核武器。要维护世界和平，只注意核武器不行，要注意常规武器。现在谈裁军只谈核武器，这不够，也要谈常规武器。要维护世界和平，就要从各个角度反对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有全球性的

〔1〕 宇都宫德马，当时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日本参议员。

霸权主义，有区域性的霸权主义。在谈到日本修改教科书的问题时说：复活军国主义在日本恐怕更大的问题是教育后代问题，是通过教育把后代引往哪个方向的问题。教科书问题实际上有军国主义的影子在作怪。日本确实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潮。

11月1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致函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转去邓小平为赵世炎〔1〕同志故居、刘伯坚〔2〕烈士纪念碑的题字。

11月13日 上午，会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袁绍文。他是作为美方主席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美能源资源环境会议的。

11月14日 审阅彭真十三日送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作出批示：“退彭真同志。赞成，无意见。”

11月15日 上午，会见前来北京参加中美能源资源环境会议的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密执安州大学教授伦纳德·伍德科克。指出：中国正在解决能源问题。要搞四个现代化，能源方面搞不好就会耽误。所以这次会议对我们很有益处。中国的资源，第一是水力，第二是煤。但是煤开采起来要花钱。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二十年、五十年。这个事情耽误了，今

〔1〕 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参加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7月被国民党杀害。

〔2〕 刘伯坚，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被国民党杀害。

年才算是认真开始。特别是在我国西北，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所以叫“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情况时说：工业方面的改革比农业方面晚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可以说现在才开始，人们头脑里的旧框框太多。但是农业改革会给工业一种启发。拿农业来说，强调了责任制，工业方面凡是向这方面努力也强调责任制的，就都见效。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我们提出要解放思想，但在当时有股思潮，有些年轻人以为解放思想就是要搞自由化，我们纠正了这种倾向。解放思想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工业、农业、商业或是其他行业，都要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根据本身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农业问题的解决，农民自己总结：第一靠政策，包括因地制宜，实行自主权、责任制这些政策；第二靠科学。现在看来，我们的政策是对的，要继续贯彻下去。科学方面的潜力很大，我们现在强调这一方面。比如种子，搞得不好，效果就非常显著；还有肥料，如果解决了肥料问题，复合肥料搞得不好，那末，潜力会更大，增产的效果就更大。又如多种经营，我们有很多水面没有利用，如果淡水养鱼发展起来，那就了不起。不但养鱼，还要养牛、羊、鸡、鸭等等。带来的问题就是要提供好的饲料，饲料生产将变成新的行业，变成一门工业。这种事情你们发达国家早就做了，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所以中国的农业潜力很大，要利用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不管怎样，由于人多，粮食还是首要问题。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的路子走对了，路

子走对了就有希望。在谈到世界经济萧条问题时说：是不是有一个南北关系问题，就是北方的发达国家和南方一大批穷国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不管是这种形式还是那种形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取得的“发达”，总是带有对穷国、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关系。这种关系使富的国家越富，穷的国家越穷。

11月16日 上午，和王震〔1〕会见小柳勇〔2〕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友好之翼访华团领导成员。指出：社会党的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对许多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最近，贵党在教科书的问题上，反对复活军国主义的斗争精神，我是非常赞赏的。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是得中日两国人民的心的，是有深厚的基础的。教科书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问题的本身，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后代的问题。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历来是存在的。我们不是讲执政党、政府，但作为一种思潮，战后是一直存在的。既然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就不能不对这种思潮、这种倾向提高警惕。中日关系在我国对外政策中占重要地位。希望日本不管哪位执政，都要把中日友好关系发展下去。发展两国人民的关系，不仅是官方和执政党的事情，也包括所有在野党和日本人民。在中国也是中国人民的事情。今后要做的事情还多，这个事情不仅本世纪要做，到下个世纪也要做。特别是当前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世界局势十分动荡，中日之间的合作关系，不仅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十分有利，对世界和平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谈

〔1〕 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

〔2〕 小柳勇，当时任日本参议院议员、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

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国内情况时说：中国是个大国，但又是个小国。大就是土地大，人口多，还有一个大就是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小是指国民生产总值小，每人平均才二百五十到二百六十美元，经济很不发达。这方面对我们来说要有自知之明。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件事情，使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饥饿和贫困，达到小康状态。长期以来，我们没有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人民的生活很困难。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局面改正过来，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太高是空的。步伐迈得太快，也会带来灾难。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这个目标就使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就为人类做了一件大事情。

11月19日 阅外交部部分同志本月十七日来信，批送胡耀邦、赵紫阳、廖承志〔1〕：“对外籍华人的政策和讲话，要十分慎重。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特别是东南亚。外交部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参加国务院侨办和外交部召开的国外华侨、华人工作座谈会的部分同志，在信中反映不赞成会上关于对外籍华人政策的一些提法。

11月20日 上午，会见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说：我们在相互谅解和合作精神下建立和发展两国关系。我们的关系很自然，没有强加于人的情况，甚至使对方为难的事我们互相都不做。我们的关系是牢固的。中国同东盟各国搞好关系，不

〔1〕 廖承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是权宜之计，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关系是我们的长期战略。泰国是中国同东盟国家合作的桥梁。中午，设宴招待炳·廷素拉暖一行。

11月24日 下午，主持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式。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是五届政协的最后一次会议。五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政协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我们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扩大了，不仅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还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前程远大，大有可为。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国的党外朋友们的合作，共同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开创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为开创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刘澜涛受邓小平委托，在会上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改草案）〉的说明》。十二月十一日下午，邓小平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闭幕会。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 邓小平办公室向洪学智^[1]、王平^[2]报告：关于全军后勤工作会议问题，两次报告了小平同志。第一次，小平同志

[1] 洪学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2] 王平，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说，请洪部长找杨^{〔1〕}副主席谈，他不谈了。第二次，小平同志翻看了叶、徐、聂^{〔2〕}三位副主席的指示后表示，他没有别的意见了。

11月26日 下午，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式，听取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受叶剑英主任委员的委托，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

11月29日 上午，会见孟加拉国部长会议主席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指出：经济调整正在顺利进行，将为我国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正在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审议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可以相信，我国的经济将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在当今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良好的。在经济建设方面，根据中国的经验，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但立足点是自力更生。希望从发达国家取得比较多的东西很难，最靠得住的是穷朋友，越穷的越慷慨，越富的越吝啬。穷朋友之间的帮助不可能太大，但靠得住，政治上、道义上的相互支持更是可以信赖的。我们两国的合作要长期进行下去。

11月 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这个题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植树造林》的第一部分。

〔1〕 杨，指杨尚昆。

〔2〕 叶、徐、聂，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

△ 为机要工作题词：“继续发扬机要工作人员对党忠诚、埋头苦干的优良传统，为实现机要工作现代化努力奋斗。”

12月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同意胡乔木意见，《邓小平文选》〔1〕公开出版发行。

12月3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向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转去邓小平为宁乡县刘少奇同志故居的题字。

12月4日 下午，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全体会议。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2月8日 上午，会见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指出：中国支持阿拉伯人民事业的立场是一贯的。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之一。那里有丰富的战略资源——石油，这是你们的幸运。但因此给你们带来了麻烦，那就是两霸争夺。麻烦和幸运联结在一起。我们都是第三世界，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共同的经历。我们衷心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团结起来。一旦你们联合起来对付霸权主义的挑战，你们那个地区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都对世界文化做出过伟大贡献。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没有任何矛盾，剩下的就是友谊、相互支持和合作。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都是如此。会见结束后，设午宴款待侯赛因一行。

△ 阅《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我国体操队的训练条件

〔1〕指《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亟待改善》一文，作出批示：“请万里同志督促解决。”万里随后会同有关部门商讨解决办法。十六日和二十四日，国家经委和国家体委分别就改善中国体操队训练条件提出具体意见上报中央。

12月9日 上午，会见外宾前，同中国银行行长金德琴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谈话，询问中国银行过去和目前的业务范围及海外机构设置的情况。指出：有些单位到国外借款受骗上当，中国银行知道不知道，管不管？今后各部门和地方向外借款要通过中国银行，只能是一个窗口。国务院要搞个规定，立个法，发下去，各方面都必须照办。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就是违反纪律。个别人想到国外找黑钱，这很蠢，是没有知识。

△ 上午，会见美国莱曼兄弟公司高级顾问、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和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说：中美两国发展关系符合两国自身的利益。我是主张中美交朋友的，这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尽管美方搞了许多小动作，但我们的这个方针和立场没有改变。两国关系正如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所说的，合乎两国自身利益。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但问题是关系正常化以后，我们看不出有多少令人鼓舞的事情。美国现在的领导人中是否有人并不这样认为？维护和发展这种用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关键是要互相信任。如果出现一些造成彼此不信任的事情，那就很难了。又说：回顾一下历史，我去华盛顿访问，当时我的职务并不高，但实际上是中国方面最高级别的访问。我受到卡特总统和美国人民的热情款待，对此我表示感谢。本来顺着这件事情两国关系是能够很好地发展的。但是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对

此，我们提出了交涉。我们当时考虑，按照美国的制度，到了总统任职的后期，总有某些为难之处。所以，我们一方面反对，同时也希望这个法不要影响我们关系的发展。后来就是新的总统竞选，有人讲了那么一大堆话〔1〕，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以后两国的关系确实有点冷淡，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信任的问题。从战略角度出发，中美关系应该发展，但必须相互信任。有没有令人鼓舞的消息，恐怕主要是这个问题。大家努力吧。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美国有不少人问，为什么现在中国也批评美国是霸权主义。你们在黎巴嫩搞的事情，使我们没有办法不讲。

△ 为纪念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柯棣华大夫逝世四十周年和爱德华〔2〕大夫逝世二十五周年题字：“柯棣华大夫”、“爱德华大夫”。

12月10日 阅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作出批示：“遵义会议的细节我也记不清楚了，‘鸭鸡’应是‘鸭溪’。”

12月上旬 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关于调整修改陆军军、师、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队编制的请示》报告。

〔1〕 指里根及其竞选班子成员在竞选期间发表的要同台湾当局建立“政府间关系”或“官方关系”的违反中美两国建交原则的言论。

〔2〕 爱德华，即马哈拉尔·爱德华，印度人。1938年9月任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57年12月逝世。

12月14日 上午，会见新增选的全国政协常委马璧、范寿康^{〔1〕}。说：你们的行动要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家总是要统一的，你们带了头，这很重要。你们在内地要交点朋友。我们的风气也变了，过去“左”，对交往造成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清理了这方面的错误。讲话不要有什么顾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真正搞“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至于孙中山的研究问题还可以继续搞，有益处。有些文章北京不便发表，可以在香港发表。台湾讲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有各种解释，真正实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是我们。你们会熟悉建国以来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熟悉这方面情况很重要，我们走的路是曲折的。现在可以说，三中全会以来走的路证明是对的，十二大肯定了，现在又体现在宪法中，起码到本世纪末，不会再有波折。人民害怕波折，波折会耽误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还叫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只是名词好听，而是生产力发展速度要超过资本主义。现在看来有希望。小的波折还会有，小的错误还会犯，大的波折、大的错误不会有。只要没有大的波折，中小波折没有关系，不会妨碍我们沿这条道路走到底。关于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经过仔细研究是可能的。关键是重视科学，肯定这一点，就有希望。马克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们过去对这个思想理解得很不够。发展生产力是很重要的革命，改革上层建筑、改革体制也都是革命。体制改革要当成革命来进行。

12月15日 上午，会见土耳其总统凯南·埃夫伦。指

〔1〕 范寿康，曾任台湾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82年4月从美国回大陆定居。

出：中土两国以后要加强交往，增进相互了解，相互了解是加强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战略中，土耳其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你们的位置最敏感。从沙俄时代起，土耳其就是沙俄南下的首要目标。你们那个海峡，一个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是达达尼尔海峡，厉害得很哪！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我们同苏联既然是邻国，争取改善彼此的关系这件事还是要做的，但要有原则。所以，我们恢复了中苏对话，但目标不是恢复到一九六四年以前的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就是说中苏关系改善的基础是，苏联必须改变以至放弃其霸权主义政策。中午，设宴招待埃夫伦一行。

12月19日 审阅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关于中苏科技合作与交流项目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与苏联科技交流，不要一哄而上，先做一二件事，切不可多。饥不择食的精神状态必须避免。”

12月20日 下午，和胡耀邦、陈云、邓颖超等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三十日下午，和胡耀邦、陈云、徐向前、聂荣臻等，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12月22日 阅章蕴^{〔1〕}本月二十日给胡耀邦、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可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来信反映了在广东了解的一些情况，提出要继续清除“左”的影响，对行之有效的政策要保持稳定性。认为地方上对奖金问题存在的

〔1〕 章蕴，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刀切”现象普遍反映不佳。

12月26日 审阅雍文涛〔1〕、杨钟〔2〕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这个报告令人高兴。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这个批示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植树造林》的第二部分。

12月30日 下午，和胡耀邦、陈云、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等，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参谋长会议的全体同志。

12月 审阅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关于同阿尔巴尼亚开展贸易往来的请示》报告、《关于一九八三年对苏贸易谈判的请示》报告、《关于向波兰提供长期无息贷款问题的请示》报告。

〔1〕 雍文涛，当时任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林业部顾问。

〔2〕 杨钟，当时任林业部部长。

1983年 七十九岁

1月1日 上午，在住地同受其父亲叶剑英委托前来看望的叶选平、叶选宁谈话。

△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参加桥牌比赛。

1月3日 阅章蕴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给胡耀邦、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这个情况应该引起重视，请国务院、财经小组一议。”来信反映一九八二年以来，广东的上缴任务一再加码，“条条”限制日益增多，特殊、灵活政策措施的余地越来越小。

1月6日 阅杨勇〔1〕治丧办公室报送的讣告，作出批示：请启立同志过目后送尚昆同志。七日，阅批杨勇治丧办公室《关于杨勇同志丧事安排的请示》报告。十三日下午，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向杨勇遗体告别。十五日，向杨勇追悼会送花圈。

1月8日 阅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廖承志、副组长汪锋本月六日的来信，作出批示：“拟同意。耀邦、剑英、

〔1〕 杨勇，1983年1月6日逝世，终年70岁。

陈云同志核阅。”来信说：近来，台湾一些上层人士同我联系增多，出现值得注意的动向。信中针对一些具体情况提出了七条处理意见。

1月9日 前往叶剑英住地看望叶剑英。

1月10日 审阅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报告，作出批示：“耀邦、陈云、先念、万里、依林同志阅。”报告说：我国第一台质子直线加速器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成，并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试运行，成功地引出了能量为十兆电子伏的质子电流。

1月11日 上午，会见巴勃罗·戈麦斯^{〔1〕}率领的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说：你们国家是个古老的国家，我们也是古老的国家。你们的文化给我最深的印象之一是银元，是在清朝传入中国的，那时叫“鹰洋”，我年轻时见过，现在没有了。中国的银元也是模仿你们的。在谈到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说：一切向前看嘛！至少可以从现在开始，发展我们的友谊和关系。我们以前吵过架，已经过去了。我们过去同意共、法共和西共的同志吵过架，不能说我们都对，也不能说他们都对，都有些事情没有想通，最好的办法是过去的就过去了，一风吹。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主要是苏斯洛夫^{〔2〕}，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

〔1〕 巴勃罗·戈麦斯，当时任墨西哥统一社会党总书记。

〔2〕 苏斯洛夫，曾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作。

一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我们有些东西今天看来也站不住脚。现在有两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搞通，一个是平等相处，一个是独立自主。平等就是没有老子党。老子、儿子的关系实际上是否认了独立自主。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列宁干成了十月革命，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他是根据俄国的特点来实行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根据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策，所以干成了十月革命，所以有列宁主义。如果列宁不按照俄国的实际情况，而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言，能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后国际共运中最重大的事件，如果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语言，而不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决定自己的革命道路，采取自己的斗争方式，结果会怎么样呢？那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历史经验教训就是，一个党对别的党指手画脚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这就是独立自主。犯错误是难免的，但犯了错误自己总结经验，这个经验才可靠。中午，设宴招待戈麦斯一行。席间，在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时说：建设量力而行，这是我们的方针。宁肯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欠太多的债，借债必须放在有能力偿还的基础上。

1月12日 上午，和胡耀邦同万里、姚依林、胡启立、张劲夫〔1〕、宋平等谈话。在谈到计划问题时说：总结历史经

〔1〕 张劲夫，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验，计划定得过高，冒了，教训是很深刻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注意。现在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年度计划定低了，而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1〕，会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年度计划要抓紧，工作不能放松，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总之，制定计划遵循的原则，应该是积极的、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在谈到粮食生产和农业翻番问题时说：一号文件〔2〕很好，政策问题解决了。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二〇〇〇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要从各方面努力，在规划中要确定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要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在谈到如何看待目前出现的一些新事物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在谈到实行职务工资问题时说：看来还得搞

〔1〕 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198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左右，大大超过原定增长4%的计划。

〔2〕 指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

职务工资。这个问题要组织力量研究，争取年底以前搞出个各行各业的职务工资条例来。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骨干问题的解决，要有职务工资才行。六十年代有些大学、中学的优秀毕业生，动员当教员去了，现在都是班主任、教研室主任，或担负其他教学行政领导工作，现在评职称，他们中有许多人评不上，搞职务工资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鼓励他们上进。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月14日 上午十时，在住地同秦基伟〔1〕谈话。

△ 上午十时三十分，在住地同杨成武〔2〕谈话。

1月16日 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向徐立清〔3〕遗体告别。

1月17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要求兰州部队制定一个支援地方建设的规划，下决心拿出二十年时间，协助地方搞好西北高原的绿化工作，改变西北自然面貌，为子孙后代造福。邓小平的这些意见，是不久前对行将赴任的兰州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讲的。在兰州军区党委最近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上，郑维山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

〔1〕 秦基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

〔2〕 杨成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

〔3〕 徐立清，1983年1月6日逝世，终年73岁。逝世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月19日 阅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来信，作出批示：“万里、依林同志：这件事归谁管，请批交研究处理。”尼克松随信将一项美国一公司拟议中的美中经济合作项目的备忘录转交给邓小平。

1月26日 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题词：“中国工人阶级要发扬二七革命传统，为把我国建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1月27日 上午，同杨尚昆〔1〕、余秋里〔2〕、张爱萍〔3〕谈国防武器装备问题。主要研究决定两个问题：一、关于电子工业部、船舶工业总公司有关武器装备的科研、试制、试验、定型、生产的业务归口问题；二、关于陆军、海军、空军、战略火箭部队的武器装备研制任务的安排问题。研究确定，为了改变当前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加速研制新型武器装备，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可能地引进部分先进技术。因此，必须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二月二日，阅张爱萍报送的关于研究决定以上两个问题的简报，作出批示：“这两条我是同意的，请国务院考虑和确定。”

1月 审阅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关于参加中罗政府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2〕 余秋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3〕 张爱萍，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请示》报告和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关于给南斯拉夫银行贷款的请示》报告。

2月4日 会见并设午宴招待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2月5日 上午，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指出：我们深感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人事变迁对美国政策的连贯性有很大影响。我们两国之间现在的问题是重新认识，是怎样才能建立相互信任关系的问题。中美关系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相互信任。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美国对台政策是否还存在杜勒斯的影子？中美关系一谈相互信任就要接触这个问题。关于技术转让，中国希望彼此把对方放在适当的地位，中国不乞求任何东西。但中国人懂得，这样的问题是从政治角度来衡量相互关系的标准。现在看来并未建立起这种相互信任。在谈到中国政府不接受美国法律管辖问题时指出：湖广铁路债券问题，我们外长已交一份备忘录^{〔1〕}给你，这是我们的最后态度，不会有什么改变了。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件事，就等于承认了你们的治外法权，你们的法庭就要管着我们。中国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法庭、议会的干涉，不管后果如何，我

〔1〕 指1983年2月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向舒尔茨递交就美国地方法院对所谓湖广铁路债券案作出“缺席审判”一事的备忘录。备忘录重申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湖广铁路债券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维护其统治、借口建筑粤汉铁路而向外国财团借款来发行的一种债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不承担偿还义务。

们都不能接受。这些问题还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为好。还有胡娜问题〔1〕，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是个危险的先例，此例一开，就会有连锁反应，最终会形成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如果跟你们一样利用法庭，我们可以举出一百多年来中国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那不是什么都谈不成了？我正式告诉阁下，美国法庭对中国没有用处。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对中国没有用处。《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如不改变此法，中美关系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满意的发展。我们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能够做朋友，建立比较长期相互信任的关系。

△ 下午，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视察。

2月6日 下午，抵达苏州，下榻苏州南园宾馆。

2月7日 下午，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和苏州地委负责人座谈。问：到二〇〇〇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人均收入八百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在听了江苏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苏州已有不少社、队人均超过了八百美元的汇报后，问：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在听到苏州社队企业凭借

〔1〕 1982年7月随中国网球队到美国参加国际网球比赛的网球运动员胡娜，由他人宣布要求在美国政治避难。1983年4月美国政府宣布给胡娜“政治庇护”。

灵活的经营机制得到成长和发展时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2月8日 上午，从苏州出发赴无锡，游览太湖。游览中，询问了太湖的保护和水产情况。对“文化大革命”中无锡在太湖“围湖造田”一事说：浙江对你们有意见，你们围湖造田，湖面缩小，影响了平衡。还询问了太湖周围的工业对太湖水质的影响情况，指出：太湖水要注意保护好，不要弄坏了。

△ 下午，返回苏州。晚饭后，再次召集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和苏州地委负责人座谈。

2月9日 上午，游览苏州名胜虎丘、留园，视察市容。游览前要求有关部门，园林要像往常一样开放，不要封园。在游览过程中，对当地同志说：苏州园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一定要好好加以保护。苏州作为风景旅游城市，一定要重视绿化工作，要制定绿化规划，扩大绿地面积，发动干部群众义务植树，每年每个市民要植树二十株。在乘车视察市容市貌时指出：要保护好这座古城，不要破坏古城风貌，否则，它的优势也就消失了。要处理好保护和改造的关系，做到既保护古城，又搞好市政建设。

△ 下午，乘专列离开苏州前往杭州。

△ 傍晚，抵达杭州，下榻杭州刘庄。在同铁瑛〔1〕、李丰平〔2〕等谈话时说：这次，我在苏州看到的情况很好，农村盖新房子很多，市场物资丰富。现在苏州市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已经到了或者接近八百美元的水平。到了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美元，社会是个什么面貌呢？吃穿没有问题，用也基本上没有问题，文化有了很大发展，教师的待遇也不低。江苏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六年时间里，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一九八八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浙江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听到浙江省委负责人表示翻两番不成问题时，说：浙江能否多翻一点呢？像宁夏、甘肃翻两番就难了。

2月11日 游览灵隐寺。

2月12日 上午，乘船游览西湖三潭印月。

△ 下午，游览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在北碑廊岳飞手书的《满江红》石碑前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在看到秦桧等四个跪像时，拉着外孙女的手，边看边指着说：英雄总为后人所纪念，坏人为后人所唾弃。望着左边门柱上的对联，对孩子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很对呀！你们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才是。

△ 晚，吩咐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不要宴请，吃顿年夜

〔1〕 铁瑛，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 李丰平，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省长。

饭可以。在刘庄，和家人、身边工作人员同省委领导、警卫、服务人员一道共度除夕之夜。

2月13日 上午，和彭真在杭州饭店参加浙江省暨杭州市春节团拜活动，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以及军民代表共庆新春佳节，观看文艺演出。

2月14日 游览龙井和九溪风景区。在前往景区的路上，对铁瑛说：浙江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地方，生活越好，越会控制生育。经济发展了，案件也少些。西方那些国家，不搞计划生育，但也会自动控制人口，因为他们不要人多，多了影响生活。在景区参观时说：你们这里的水杉树很好看，长得笔直。水杉树好，既经济，又绿化了环境，长粗了，还可以派用处，有推广价值。泡桐树也是一种经济树木，长得很快，板料又好，用来做箱子没缝，日本人可喜欢了。杭州的绿化不错，给美丽的西湖风景添了色。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西湖名胜，发展旅游业。

2月16日 上午，听取铁瑛、李丰平等汇报。在谈到省级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时说：有没有四十几岁的？太少了，下一步还得调整。调整班子是好事，这次还不够，还得一步一步来。在谈到翻两番问题时说：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到二〇〇〇年是多少？到那时要多少电？你们的收入在全国占第几位？辽宁、黑龙江的重工业产值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江浙。生活好了，人就不愿往外走。江苏、浙江，还有山东，这两年也上得快，鲁西北这两年生活也好了，人也不往外走了。苏州，现在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八百美元的水平。他们已

经解决了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江苏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南京还有一千多人。你们省哪个地方收入高些？经济发展了，案件也少些。到本世纪末，江苏说可以达到每人三千美元。你们少说也应该二千多美元。现在是五百多美元，翻两番应该有二千。你们人均二千美元，全国到不了八百。甘肃那些地方就低了，他们植树也不容易，首先是种草。在谈到科技、教育问题时说：现在大学招生增加一倍也可以，教师有，就是要盖点房子。干部、职工要轮训，文化水平要提高。在谈到上海经济协作区时说：搞协作区，你们高兴。江苏提出意见，经济协作要有个权威机构，太松散了不行。经济协作区是个新鲜事物，不同于过去的大区。路子是对的，要积累经验。肯定会有矛盾，有了矛盾就去解决。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搞规划，就可以解决技术交流、技术保密的问题。

2月18日 乘专列由杭州抵达上海，下榻西郊宾馆。

△ 上午，就审阅《邓小平文选》书稿一事，让秘书转告胡乔木：书稿乔木同志已看过，我不看了。三月四日，听取胡乔木汇报《邓小平文选》编辑过程中对一些文稿的重要的修改意见，表示完全同意。三月上旬，同意《邓小平文选》拟选用的相片，并为相片题签。

2月21日、23日、25日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讨论邓小平有关对美对苏工作的指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会议认为，要正确处理对美对苏关系，在外交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待任何国际问题，都应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

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能依附、屈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否则就没有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会议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在搞霸权。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苏美两霸，而不是只反一霸。

2月21日 上午，视察上海静安区胶州路农贸市场、虹口区曲阳新村^{〔1〕}。在胶州路农贸市场，先后到水果摊、知青合作商店、水产摊和蔬菜摊前，了解价格、销售和经营性质等情况。从农贸市场出来后指出：这个市场办得好，既能丰富市场，价钱也便宜。在曲阳新村，先后到曲阳菜场、百货商场和知青酒家，当了解到这些都是返城知识青年办的合作企业时说：知青办的好嘛。在与营业员交谈时问：你们在这里做得好不好？居民需要的东西都有得卖吗？在新建的居民住宅楼前，与居民们相互致意，并问：这里的住宅是哪一位工程师设计的？新村的文化设施跟上去了没有？随后，来到上海服装二厂一退休工人家中，看到新房中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一应俱全，说：这儿不错嘛，挺现代化的。你们生活好，我就高兴。

2月22日 打电话预祝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取得成功。

2月24日 参观上海龙柏饭店。

2月27日 乘专列返京途中，在山东兖州下车视察兖州

〔1〕 曲阳新村是20世纪70年代上海市政府筹划建设的13个新村小区之一。

县城关公社泡桐林场。当天回到北京。

3月2日 上午，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等谈话。指出：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修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举苏州例子，从六个方面说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接近八百美元后的社会面貌和发展前景：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还指出：搞经济协作区，这个路子是很对的。我主张不只是搞上海和山西两个经济协作区，也不要老是试点。经济协作有许多思想问题要统一，但现在要开步走。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包括职工教育在内的智力开发。大专院校要发展，重点院校增加一倍没有问题。我们现在一方面是有有些地方知识分子少，一方面是有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人到中年》这部电影值得一看，主要是教育我们这些老同志的。我这

里一位护士的丈夫，是个医生，从一九五九年起当医生，现在还是七十多元工资，这太刻薄了。怎么穷也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搞职务工资，这件事要快一点搞出来。许多事情，步子不能走得太慢，顾虑太多。还说：我在兖州，还看了一下种树。那里种泡桐的情况很好，很有规划，叫粮林间作，一亩十三株，根本不影响粮食生产。每年上两斤化肥十年成材，每株得材零点七立方米。十年后每亩收入就是二百元。苏毅然〔1〕同志告诉我，他们还引进欧洲的一种什么杨树，品种很好，生长很快，木材也很好。因此，种树也要有具体规划。什么地方种什么树，种子种苗从哪里来，都要扎扎实实抓。最近香港有个报道，说广东的速度放慢了，是什么原因？上海的同志问我，对中美和中苏谈判的立场应该不冷不热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懂你们问的意思了。我指的是政治上的态度，至于开放政策是不变的，不受这个态度的束缚。是不是有的地方也受了所谓不冷不热的束缚，如有，这说明我们有些同志对开放政策仍是有顾虑的，也要加以注意。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

3月3日 《中国教育报》试刊第一期同读者见面。此前，邓小平题写报名。

△ 上午，会见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

3月5日 《人民日报》报道，为纪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二十周

〔1〕 苏毅然，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发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董必武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手迹。邓小平的题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3月9日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对他为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并对他母亲病逝表示慰问。在听取他与台湾当局要人接触的介绍时，询问了蒋经国的身体情况，指出：蒋经国真是想通了，可以做一些对他们蒋家最有利的事情，包括对他父亲，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写得好一些。在谈到科技教育问题时说：你提的建立科研流动站的建议我已看到。我们也设想很多方案，但没有那么具体。人才流动问题不解决好，出不了人才，是巨大的浪费。国内知识分子担心待遇低，但最担心的是自己能否出力、发挥长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搞四个现代化，知识应放在第一位。我们现在正在搞改革，想步子快些，但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要避免头脑发热，但不管怎样，科学和教育要多投资。要多花钱办大学，我们的大学生太少，我们提出最近几年大学招生要增加百分之五十。师资问题不大，当然有个培训和考核问题，现在他们的水平太低。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要解决，要搞职务工资。讲师月工资不低于一百元，副教授不低于一百五十元，考核要严格。学位也要有工资标准。住房方面也要创造条件。几百万知识分子月收入超过一百元影响不会大的，现在财政情况还好，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奖金要控制，但知识分子的待遇要提高，首先是中年，是骨干，大多是四十岁以上。会见后，设便宴招待李政道。李政道母亲的骨灰已于二日在苏州安葬。邓小平送了花圈。

3月12日 上午，到十三陵中直机关造林基地参加义务植树劳动。对参加劳动的中直机关干部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

3月13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胡耀邦在会上作题为《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报告。

3月14日 上午，在住地同陈云谈话。

3月15日 上午，在住地就领导作风、经济工作归口等问题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谈话。

3月17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经委党组关于当前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汇报。在听完汇报后发言说：一九八〇年那次关于调整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进一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我记得那次我也讲了八个字的核心是调整。现在看起来，没有那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八字方针，而且以调整为核心，就没有今天的形势。但是，现在我们又避免出现头脑发热。既然一九八〇年那次会议以及以后确定的一系列对于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办法和一些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在谈到集中资金问题时说：这个是非做不可的。不把资金集中起来搞一些骨干项目，搞再多的小企业、小东西，也解决不了问题，而骨干项目正是解决后十年的问题，是后十年用的。在谈到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问题时指出：一段时间

里，我们中央的一些同志的讲话，人们感到有那么一些不一致，下面已经有些担心。这种状况应该结束。政出多门，下面难办，而且对中央的威信有损害。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书记处当然要领导经济，现在党的领导中心任务就是这个，但是领导的方法要明确。以后财经工作，通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所谓发号施令，所谓对问题的解释，都由这个口子，避免多头。如果我们大家对这个口子有意见，向它提出来。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常委会的决定，通过它去讲，通过它去做。这样，不但中央领导的一致性保持得好，而且工作也会顺利，即使有差错，也容易纠正。所以，我们确定这一条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精神，决定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好正在建设中的六百一十四项大中型工程中的七十项大型骨干项目，力争尽快投产。中央陆续派出五十个工作组，分赴七十重点工程进行现场办公，就地解决重点工程建设中的问题。

3月22日 指示胡乔木根据本月十七日中央确定的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起草一个决议，并请姚依林在正在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宣读。同日，胡乔木起草了《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并致信请示邓小平、胡耀邦、姚依林。邓小平在信上批示：“乔木同志，删去一些，请再酌后送耀邦、依林同志。”还在“请小平、耀邦同志审阅后转依林同志在工交会议上宣读”一语后增写：“并告参加会议的同志负责转达给自己党委和党组的领导同志。”

△ 阅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附件，作出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3月28日 上午，在住地同萧华^{〔1〕}谈话。

3月30日 上午，会见小托马斯·奥尼尔^{〔2〕}率领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随着美国政府的更迭，提出的新问题，就是存在着中美是否能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问题。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说，中美有广泛的相似的地方，当然这不是说全部。但是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两国都需要有一种政策的连续性。国际上相当长一个时期的议论，就是中国政策的连续性可靠不可靠？我可以告诉各位，中国政策连续性的问题早已解决，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三中全会确切地表明了这一点。相应地，我们对美国也提出一个政策连续性的问题，就是说一九七二年美国领导人尼克松、基辛格确定改善中美关系，结束过去的旧关系，建立新关系的这种政策是不是能够连续下去？我多次跟美国朋友谈过，我们彼此都应该珍惜符合世界和平利益的这样一个政策，珍惜这个局面，把我们这十年走过的曲折道路中的很多障碍消除掉，这对于我们两国都有利。《与台湾关系法》无论从内容来讲，还是从方式来讲都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努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中国决不能作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朋友们，我们是努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所以我们提出九条^{〔3〕}。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怎么办？最终用武力也必须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到那个时候，美国的选择有两个，

〔1〕 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2〕 小托马斯·奥尼尔，当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

〔3〕 指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的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见本书第72页注〔1〕。

一是不干涉；二是参战，中美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危险的选择。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宣布中国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实际上不只限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以后还必须坚持这三大任务。三大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个任务就是国内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第三个任务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这是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考虑和坚持的三大任务。希望美国朋友们充分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充分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坦率地说，《与台湾关系法》还是杜勒斯主义的产物。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吗？美国的议会通过一个什么法来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主义？我们希望美国议会的朋友们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来想一想这一个问题，就会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这一点。如果我们中美两国从全球战略角度上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相互谅解，相互协调行动，那就必须理解这一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根本的问题还是《与台湾关系法》。

△ 审阅张爱萍本月二十日报送的国家计委《关于确定卫星广播方案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同意”。张爱萍提出：如我国自行研制的同步通信卫星能如期于明年初发射成功，则改进的第二颗同步通信卫星，将与引进卫星并行研制。

3月31日 上午，在住地同彭真、杨尚昆谈话。

4月1日 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余秋里、杨得志〔1〕、张爱萍谈话。

△ 为李大钊〔2〕烈士陵园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 为北京育才学校编写的校史题词：“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

4月3日 上午，会见埃及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指出：我们两国关系历来很好。有些具体问题，由于各自的处境不同，只有自己去考虑和解决。有些问题看待的尺度不同，是必然的、正常的。在谈到中东问题时指出：中东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阿拉伯世界的团结。我们希望阿拉伯各国加强团结，希望埃及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会见后，设午宴招待穆巴拉克一行。席间，向客人介绍中国经济建设情况，指出：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有一条经验，就是要量力而行，不能盲目建设，不能操之过急。发展中国家希望很快发展经济，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搞建设不可超过能力太多，不可操之过急，急了就出毛病。

4月4日 审阅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

〔1〕 杨得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4月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

修改方案的请示报告》〔1〕，作出批示：“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

4月6日 《人民政协报》正式创刊。此前，邓小平题写报名。

4月9日 上午，在住地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薄一波〔2〕谈话。彭真提出，请中央免去他担任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职务，由陈丕显接任。次日，在彭真就此事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上批示：“同意。”五月，陈丕显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4月11日 上午，会见大卫·塔潘〔3〕为团长的美国福陆公司代表团。指出：人们都知道，中美关系得到相应的发展，对世界和平有重要意义。现在中美关系存在着一个相互信任的问题。能否建立起信任，能否恢复到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九年关系发展的势头，那要看一看。总的来说，我们还要观察。美国舆论界和执政的人有一个观点，认为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有求于美国。这个观点不得到改变，会给中美关系带来问题。我说两国关系的相互信任出现的某种曲折，都是讲的政治关系，不是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影响到文化、体育方面的

〔1〕指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上报的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后来中国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就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后形成的，并写进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2〕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3〕大卫·塔潘，当时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美国福陆公司总裁。

交往，我们力图不使之影响两国经济交往的关系。也许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会给两国的政治关系带来改善。在座的朋友对发展中美贸易，发展中美关系做出了努力，还能做很多的事情。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在这方面也应该取得相互信任。希望贵公司同中国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使双方正在商谈的合作项目早日成功。在回答客人提出的中国是否实行工业责任制的问题时说：责任制见效是在农村。实行责任制，农村面貌大变，不是小变。工业、商业各方面也要实行责任制，但不同于农业。这方面，我们要很谨慎，经过试点，在哪方面执行，要仔细研究，积累经验。

4月2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在会上讲话指出：这个“十二条”〔1〕，是我们下个月开始同英国谈判〔2〕的基本方针。谈判首先要确定前提，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这个问题是不容讨论的。第二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之后，香港怎么办？怎么样保持香港的繁荣？保持繁荣的办法就是若干不变。第三是从现在起到一九九七年这十四年过渡时期中，怎么保证香港不出乱子，双方都不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怎么做到顺利交接，确定香港人怎么样在各行各业，特别是政治、经济、法律、对外事务等方面逐步参与的方式。还指出：谈判可能谈好，也可能谈不好，如果谈不好，明

〔1〕 指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

〔2〕 指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1983年5月，因两国在议程问题上存在分歧，会谈未能如期举行。第一次会谈于同年7月12日和13日在北京举行，至1984年9月6日，中英会谈共举行22次，最终形成了中英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3个附件。

年九月，我们也要单方面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并同时宣布中国收回香港以后的一系列政策，就是这“十二条”。“十二条”里面有个“五十年不变”，这样规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减少他们的疑虑；可以使人们更感到我们政策的连续性、可靠性，有利于我们和英国谈判，有利于顺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荣。所以，“五十年不变”是个大问题。在谈到培养治港人才的问题时说：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由香港爱国者为主体组成。爱国者的标准就一条，赞成中国收回香港，拥护国家统一。现在就要考虑培养人才，并逐步参与管理。为此，有必要在香港成立若干政治性社团，以便从中锻炼一批政治人物。会议原则批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

△ 下午，出席刘斐^[1]的追悼会。

4月23日 阅叶剑英本月二十日关于六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人事安排问题致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和胡耀邦二十一日
的批语，批示：“同意耀邦同志意见（删了一句）。”二十日，
受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薄一波在王震（当时在广州休养）陪
同下，前往广州叶剑英住处汇报六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人事安排
问题。叶剑英听完汇报后，致信胡耀邦、邓小平并中央政治局
常委，表示对中央工作至为欣慰，并对个别人事安排提出三条
具体意见。

4月26日 阅胡耀邦拟在访问罗马尼亚期间的两个讲话
稿，在胡耀邦的来信上批示：“可以，删去了一些过分的不大

[1] 刘斐，1983年4月8日逝世，终年84岁。

得体的语言。”

△ 为《叶剑英诗词选集》题写书名。

4月27日 上午，在住地同薄一波谈话。

4月28日 上午，会见日本前外务大臣樱内义雄一行。在谈到干部队伍年轻化时说：我们现在准备花十年的时间，逐步使干部年轻化。我们党的权力机关是中央委员会。为了新老交替，我们设立了顾问委员会，我是这个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没有顾问委员会，就我们有。我们这个党是个老党，老人多，不妥善安排也不好。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说：中日关系的发展是健康的，我们是满意的。希望两国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指出：美国最近一个时期，在报纸上，在人们的谈话中，有一个观点，就是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有求于美国；或者说中国求于美国的多，美国求于中国的少。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是美国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认为美国怎样做损害中国的事情，中国也只能吞下去。所以，一些节外生枝的问题不断出现。网球队员的问题发生以后，最近台湾的要人不断到美国去。还有，大概快成为现实的，就是泛美航空公司和台湾直接通航〔1〕。第二点，美国认为，中国在全球战略中没有地位，中国只在亚洲有区域性地位。因此，对改善中美关系也就认为没有意义，没有兴趣了。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美关系究竟怎样发展，究

〔1〕 美国政府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坚持批准泛美航空公司飞行台湾航线。1983年6月泛美航空公司开航台北。

竟会怎样，就难说了。第三点，美国对外政策中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有几个“航空母舰”，台湾就是一个。里根说台湾是“老朋友”。什么“老朋友”？就是麦克阿瑟〔1〕时期确定的概念，实际上体现了杜勒斯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叫杜勒斯主义。美国副总统布什、国务卿舒尔茨来，我跟他们说，你们有几个“航空母舰”。所谓“航空母舰”，就是美国的战略基地。所谓“老朋友”，是空话，掩盖着真实的东西，就是它要霸占那个地方。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政界有不少人是不赞成这个政策的。除非这些基本指导思想有某些变化，不然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就难说了。我们现在还是力图改善同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明确地跟美国领导人讲，我们最近派副外长章文晋到美国去当大使，就是我们努力的一个表现。但我们重新提出了一个相互信任问题，中美之间能不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我们要观察。我今天讲的中美关系的实质性问题，请转告中曾根首相阁下。日本朋友，包括西欧，都对中美关系表示担心，这一点我们很理解。但我也相信，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对美国人来说，谁讲的话他也不一定听。

4月29日 上午，会见南布迪里巴德〔2〕率领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

〔1〕 麦克阿瑟，即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美国五星上将。1945年至1951年任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任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提出要联合在台湾的“老朋友”，一起进攻中国。1951年4月被解职。

〔2〕 南布迪里巴德，当时任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

发言人自居。一个党犯错误是难免的，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还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四年多的实践证明，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当然，还需要继续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全党党员都拥护目前党的路线，因为他们有切身的体会。人民群众也会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认识到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人民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正确与错误。这几年我们的变化确实不小，但最明显的变化是在农村。在客人高度评价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面所起的作用时说：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但个人作用的发挥要有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反映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要求。如发生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就表达了当时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要求。会见后，设午宴招待南布迪里巴德一行。席间，在谈到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时说：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1〕我是我们党的主要发言人，在二十六国会议〔2〕上我讲了四个多小时。但如果现在讲，有好多提法就不同了。同苏联打交道，我打得多了，我七次去莫斯科。同苏联谈判，中国党代表团差不多都是我出面的，他们是苏斯

〔1〕 莫斯科会议，指1960年11月至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2〕 二十六国会议，指1960年10月至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起草委员会会议。

洛夫。我们现在同苏联的接触，已提高到外长级的会见。但现在还是国家之间的接触，而不是党的关系。这不是说，党与党不可以接触，但首先要解决国家关系，为此要消除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这些障碍不是小事。苏联在中苏边境驻扎一百多万军队，还在蒙古驻军。这样的障碍不消除，中国人民能够放心吗？不可能。中国的政策，就是从这种具体实际出发的。因此要首先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当然在这段时间内，中苏之间的交往增加了，贸易增长了。在回答干部队伍年轻化的问题时说：我看要大胆提拔，让年轻人干，对这个问题要解放思想。我二十三岁就当中央秘书长。要讲马列主义水平，说实在的，马列主义的书看得不多，经验也不多。刚从国外回来，担任中央秘书长，这是个不低的岗位，但还是承担起来了。我们这一辈老同志都在二十多岁时独当一面了。现在二十多岁的人，比我们那时知识更多。对现在的年轻人，可以看一看，哪些好一些，哪些差一些。把好的提上来，或者给他们创造条件，先提到一个适当的岗位，然后过一二年再提上来。现在我们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但真正解决，预定目标是十年。对年轻干部，要鼓劲，要帮，要打破迷信。现在我们有个原则，要真正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一个党要兴旺发达，还是要逐步让年轻人干。年轻人至少精力充沛，可以多工作些。现在我的最高目标是每天工作四小时，以后改变为两小时，直到不工作。事情让别人干，自己多活几年有什么不好呀？这也叫解放思想。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说：我们提出“一揽子解决”，这是比较合理的做法。印度的政治家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同意，首先反对的是西藏人。所以用一揽子办法，就便于解决问题。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印度领导人都赞成在解决问题之前增加交

往，发展友好关系。凡遇到这样的问题，双方都要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把双方的情况考虑进去，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一厢情愿是不会成功的。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5月4日 为号召向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学习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 为号召向多年为群众做了大量好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干部朱伯儒学习题词：“学习朱伯儒同志，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月5日 上午，会见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说：自总统上次访华，我们相见已相隔两年了。两年中发生的变化很多。你再次来访充分体现了中法友谊，体现了两国人民间的友好感情。我们间的交往很有意义。我们欣赏法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也是执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两国在范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或近似的。在客人对中国取得的进步和大胆的改革行动表示称赞时说：是需要一点勇气。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一些新的东西。经过四年的时间，现在看起来，我们的路子是走对了，人民是高兴的。但毕竟积累的问题太多，中国又是底子薄、人口多的国家，还需要继续努力，不能粗心大意。在谈到柬埔寨问题时说：我们理解你们对波尔布特的评价，我们也不赞成他的做法。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对其他党和国家的内部事务采取不干涉、不过问的态度。柬埔寨人包括波尔布特在北京时，我们就对他们说过。波尔布特犯错误的时

候，还认为是在搞社会主义。将来柬埔寨搞和平、民主、中立和不结盟。那时，如果举行真正民主选举，西哈努克的机会较多。这点我们想得通，支持西哈努克。在谈到中法关系时指出：两国的合作关系不应只限于贸易，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也可以有所发展。法国可以在向中国转让技术方面多作出努力。会见后，设午宴招待密特朗一行。

5月10日 上午，在住地同万里谈话。

5月11日 上午，会见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给我国带来很多问题，很大困难，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考虑应该怎么办。但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两年又出现了徘徊，这两年基本上是“左”的思想作指导。直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局势扭转过来，制定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现在看起来，我们的路走对了。四年多来，中国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一月比一月好。但遗留的问题很多，总得要十来年的努力才能纳入正确的轨道。可以说，我们是有希望的，但还要走非常艰苦的道路。会见后，设午宴招待哈比亚利马纳一行。

5月15日 上午，会见莱索托王国首相莱布阿·乔纳森，祝贺中莱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指出：中国同莱索托之间的合作和支持是相互的。建交后，我们之间的来往将更多。中国一贯坚决支持非洲国家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斗争。莱索托人民是处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包围之中，你们坚持了斗争，这是不容易的。中国人民一直对你们的斗争表示钦佩。我们相信，正

义在你们方面，你们最终将取得胜利。

5月22日 上午，会见阿内罗德·贾格纳特〔1〕率领的毛里求斯政府代表团。在谈到国内经济问题时说：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比较落后。每年达到就业年龄的就有七八百万之多，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问题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的就业问题和欧美、日本的情况不一样。搞单一经济有很多问题不好办，很难解决就业问题，很难摆脱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我国农村过去十分贫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搞“以粮为纲”。当前，我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实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农村面貌就大大改观，大多数农民开始摆脱贫困，成效是显著的。粮食不仅没有减产，反而有较大的增加。在谈到农村人民公社问题时说：人民公社制度的试验也不那么理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与我国农村目前很低的生产水平不相适应。我国农村过去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现在我们把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分开，但在实行过程中，要进行充分试验，逐步进行。凡是已进行试验的地方都证明，政社分开是正确的。还说：我们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制订本国的方针、政策、目标和计划。过去，我们没有这样做，犯错误就犯在这里；这几年成功，原因也在这里。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事情。

〔1〕 阿内罗德·贾格纳特，当时任毛里求斯政府总理兼国防和国内安全部部长、机构改革部部长、毛里求斯社会主义战斗运动领袖。

5月24日 阅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本月十九日的来信，批示：“请紫阳、依林同志考虑，提出意见，在书记处一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信说：目前我国整个教育投资和经济建设投资不相适应，尤其是高等教育上不去，满足不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对科学技术力量特别是高等科技骨干力量的需要。我们四人经过共同研究，建议中央选定五十所左右高等院校列入国家重点项目，集中投资，争取一九九〇年前建成高水平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1〕}

5月25日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落成揭幕典礼在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举行。此前，邓小平题写碑名。

5月26日 上午，会见世界银行行长奥尔登·温希普·克劳森及随行人员。说：两年前，你是美洲银行行长。那时，我同你讨论了中国与美洲银行的合作关系。我们之间的合作很好。现在，你是世界银行行长，我们更应该合作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在本世纪末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建成一个小康社会，这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是一个重要贡献。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我们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要争取国际上的帮助，其中包括世界银行的帮助，这是很重要的。世界银行可以在资金、技术和经济管理方面给予帮助。我赞赏克劳森行长在发展世界银行和中国的合作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

〔1〕 指1983年5月15日匡亚明和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联名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关于将五十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议》。

△ 夜，乘专列赴天津蓟县。二十七日晨，乘汽车前往河北遵化参观清东陵。当日返回北京。

5月30日 上午，为《毛泽东书信手迹选》题写书名。

6月4日 下午，出席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邓颖超在开幕词中指出：在邓小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之下，五届政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十七日，会议选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领导人，邓颖超当选全国政协主席。

△ 阅国家民航总局局长沈图报送的反映民航上海一〇二厂原造反派头头情况的材料，作出批示：“造反派头头，仍在千方百计地进行活动。此件告上海市委。”

6月6日 下午，列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赵紫阳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十八日下午，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会议还分别选举李先念、乌兰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选举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

6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七五”计划基本建设规模的初步测算和财政部关于财政问题的汇报。在发言中谈到重点建设问题时说：现在的状态是资金太分散，这样下去日子怎么能过？有些东西硬是要停下来，这可能要损失一些，宁可损失一些也要停

下来。要搞重点。要想今后二十年能够搞上去，现在不搞重点不行。特别是能源、交通、通信这些重点项目，现在不抓，以后别的事情想干也干不成。现在我担心这个规划中能源到底够不够？特别是电够不够？本世纪末翻两番，电只增长一点三倍，行不行？现在不单是工业用电，生活用电也会大幅度增长，很多人家里都有洗衣机、冰箱，农村要用电代替柴火，这不是翻两番就能解决的问题。保证重点，要搞狠点，这关系到以后的发展速度问题。资金，一个用到重点建设，一个用到老企业技术改造，这个路子是对的。技术改造问题也可以通过同东欧发展关系来解决，他们好多东西比起西方更接近我们。中国这个市场潜力是很大的，我们越发展，市场越大。

6月11日 上午，和李先念、彭真、王震、习仲勋、杨尚昆、胡启立、姬鹏飞^{〔1〕}等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局书记金正日一行。在介绍中国的情况时说：我国的政治状况，党内也好，人民中也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了。在这方面，我们这些老家伙是起了一点作用的。现在，我们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准备交班，要找年轻人上来，帮助年轻人接替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由于我们党武装斗争的历史特别长，现在老人很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中革命化是主要的。在谈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时说：中国的特点是落后，贫穷，地方很大，人口太多，问题十分复杂。处理每一个问题，都牵扯到成千万以至成亿的人口。比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首先处理农村问

〔1〕 姬鹏飞，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国务委员。

题，这是牵扯到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问题。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在农业问题上的做法十分正确。同样，处理工人问题、干部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都要牵扯到左邻右舍，有时是要吵架的。如基本建设项目，光照顾地方，那末国家要建的大项目、要干的大事就没有钱了。我们现在问题很多，要经常调整各种政策，要处理好执行这些政策的结果所引起的同其他方面的关系。即使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今后也还会有失误，不可避免地还会犯错误。不过现在我们可以说，今后我们可以避免犯大错误。当前，我们要集中力量抓好两件大事，第一是把经济工作搞好，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核心；第二是使干部队伍逐渐年轻化、知识化。会见后，设午宴招待客人。

6月15日 上午，在住地同谷牧谈话。

6月16日 本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刊登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徐向前、聂荣臻等为纪念这个刊物创刊二十五周年的题词。邓小平的题词是：“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6月18日 上午，会见参加一九八三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并回答专家们提出的问题。说：这么多专家坐在一起，对我们的科技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益处很大。讨论会是一个新的方式，这次开了头，以后可以继续下去。这种讨论十分重要。搞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知识问题。就整个国家建设来说，能源、交通运输是重点，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智力投资。在谈到人才培养时说：我们这方面有缺

点。人有，当然要经过培养。大概希望还是在四十岁左右的人。要学点东西，学会管理，找青年、中年人来培养，这是全党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课题。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在谈到中国建设道路时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时说：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

6月21日 上午，会见民主柬埔寨领导人。在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说：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真正统一了，台湾一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马克思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大胆地提了。如果不这样设想，绝对不可能统一。这样的设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符合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精神的。历史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是列宁和毛泽东，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把本国革命引向胜利，核心就是实事求是。

6月22日 上午，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乌兰夫等，接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全体委员，并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6月23日 上午，在住地同邓颖超、杨尚昆谈话。

△ 前往北京医院，向廖承志^{〔1〕}的遗体告别。次日下午，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乌兰夫等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廖承志追悼大会。

6月24日 审阅赵紫阳本月二十一日《关于增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的报告》，批示：“同意”。报告提出的调整和增补后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胡启立、方毅^{〔2〕}、谷牧、张劲夫、杜星垣八人组成，赵紫阳任组长，姚依林任副组长，杜星垣兼秘书长。

6月25日 上午，会见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讲话。在谈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情况时指出：为了照顾英国，我们谈判可能不从收回香港问题开始，而先从一九九七年后香港实行什么制度、什么政策谈起。这个政策充分照顾外国人首先是英国人的利益。不仅保护中国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外国人的利益也不受损害。港人治港要有什么条件？只要一个条件，就是爱国者。什么是爱国者？赞

〔1〕 廖承志，1983年6月10日逝世，终年75岁。

〔2〕 方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成、主张祖国统一的就是爱国者。人们担心变。一九九七年以后我们谈的这一套会不会变？我们说不变。只讲不变还是空的。我们考虑定个年限，总的是保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有法律等等。我们先来个五十年不变好不好？五十年够长了。讲五十年比不讲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今天讲的有一点新话，就是五十年。中国根基在大陆，不在台湾，不在香港。四个现代化建设，香港出了点力，以后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们不希望小。中国的建设不能依靠“统一”来搞，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陆的基础。当然还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资，但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所以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不要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向你们伸手，不会的。最近港币贬值是有人为因素的。我们一定要使英国人承担责任，不要做损害香港的事。在谈到十四年过渡期问题时说：第一双方不要捣乱，文明点讲，双方都不要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中国政府不会捣乱，英国人就难说了。谈判的焦点可能是这个问题。英国对我们一九九七年后的政策的可行性、可靠性问题明了了，确实相信我们一九九七年后的政策不变，问题就好办。香港要培养人才，逐步参与他们的管理，行政也好，司法也好，财政各方面都要参与，搞好交替。香港的爱国者要考虑怎么样推荐和培养一批合格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逐步参与，将来才能把香港管好。在过渡时期，中央政府还准备采取措施参与香港的经济活动。这是增强港人信心的重要措施。一九九七年以后北京不派总督，不派头头。将来香港采取什么形式，由你们香港人去定。名字叫特别行政区。我们派个小军队去，不要香港负担费用。

△ 为纪念陈潭秋〔1〕、毛泽民〔2〕、林基路〔3〕、杜重远〔4〕烈士殉难四十周年题词：“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永垂不朽！”“杜重远烈士永垂不朽！”

6月26日 上午，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进一步阐明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谈话中提出：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强调：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

〔1〕 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39年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43年9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被盛世才杀害。

〔2〕 毛泽民，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8年到新疆做统战工作，曾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代理厅长、民政厅厅长。1943年9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被盛世才杀害。

〔3〕 林基路，中国共产党党员。1938年到新疆做统战工作，曾任库车县、乌什县县长。1943年9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被盛世才杀害。

〔4〕 杜重远，爱国民主人士。参与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活动。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1943年9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被盛世才杀害。

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这些内容，后来被概括为“邓六条”。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6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应该解决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最重要的是集中。一个是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一个是集中精力搞技术改造。体制改革是为了实现这两点。在谈到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时说：我们提出翻两番，每年增长多少，都必须是没有水分的。如果“六五”达到百分之六以上的速度，“七五”达到百分之七以上，而且在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等方面为今后十年打好基础，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那我们就能更有把握地说，后十年达到百分之八以上是可能的。这并不是冒险的计划，而是讲求实际的可行的能够达到的计划。但是，搞得不好，有可能改变十二大的决议，那就严重了！这不但在国内是个政治问题，在国际上也是个大的政治问题。不搞重点建设没有希望。能源、交通等重点项目，都是十年八年才见效的。比如三峡工程、长江上游的二滩工程，应该搞哪个，不要再犹豫了，犹豫一年就多耽误一年。外国人说我们翻两番靠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计划中电力只能翻一番多，光这条就断言我们翻两番要落空。我们加强了这方面。如果不搞点重点，到那时什么也上不去。所以这个决策十分重要。在谈到加强财经纪律问题时指出：这几年我们暴露出很多问题，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我们过去提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有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政策，这个不能变。要变，只能是越变越开放。另一手是必须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后来加了个“其他犯罪行为”。这件事情，一年多来我们

做得有成绩，但不能说做够了，手不是那么狠，以后还要经常注意。书记处、国务院把这件事作为经常性的工作，我赞成。这本来就要一直贯彻到底，不能松，但是如果作为经常性的工作就没人管了，就等于不搞了，那不行。要强调财经纪律，有些违反纪律的行为，本来是犯罪行为，现在我们没提那么高，因为有些事情我们没有讲清楚。这次讲清楚以后，就要提到法律的角度来看问题。我看经济立法工作还要加强。在谈到人才问题时指出：经济方面、体制方面的改革问题很多，但是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选用人才。事情总要人做。我们好多事情就是领导人不得力，浪费很大。所以选人要选对。一个企业改造得好不好，就看选人选得对不对。再一个问题是要加强责任制。选对了人，还要叫他承担责任。选用人才同搞责任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还提出：各地都要学习引滦工程提供的经验。就是注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利用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军队的力量，只要能为国家省点钱的，都可以用上。不仅引滦工程军队出了力，植树造林军队也出了力，而且成绩不小，其中包括空军飞机播种在内。这个事要坚持几十年。这次会议于六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北京举行，主要讨论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问题。根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邓小平讲话的精神，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宣传提纲，并在通知中指出：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是今后一个时期内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

6月 为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展览题词：“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展览题词：“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

△ 为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题写：“雨花台烈士纪念碑”、“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7月1日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邓小平文选》，收入作者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这段时间内的讲话、谈话，共四十七篇，其中三十九篇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一九七五年的著作，反映了邓小平在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整顿各方面的工作，为促进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所作的巨大努力。一九七七年以后的著作，反映了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和三中全会以来这两段时间里，邓小平在推动和指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在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我国国情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和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发挥的决策作用和做出的卓越贡献。十二日，中共中央就学习《邓小平文选》问题向全党发出通知。通知指出，《邓小平文选》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党的这个伟大转折时期的历史，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由来和发展，认识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保证，认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成果。通知强调，学习《邓小平文选》，是即将开始的全面整党的重要思想准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

7月8日 同万里、姚依林、方毅、宋平〔1〕谈话。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请依林、方毅、宋平三个人成立一个小组，赶快抓。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八月二十四日和九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作出《关于引进外国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引进外国智力以利四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姚依林任组长。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

7月16日 上午，在住地同胡耀邦、赵紫阳谈话。

△ 晚，乘专列离开北京，次日晨抵达北戴河。

7月18日 审阅公安部本月十六日《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2〕。认为报告写得“不疼不痒”，不解决问题，要求公安部领导人到北戴河汇报。十九日上午，和彭真在北戴河住地同刘复之〔3〕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问题。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

〔1〕 宋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2〕 这个报告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刑事犯罪案件增加的情况，根据邓小平关于搞好社会治安，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指示精神起草的。

〔3〕 刘复之，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

心。主要原因是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强调：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二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指示，讨论了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大政方针和行动部署。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以三年为期，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予以坚决打击。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专门听取了公安部关于当前社会治安问题的汇报，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7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主办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即将创刊。此前，邓小平题写刊名。

7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

桓》一书，已由战士出版社出版。此前，邓小平题写书名。

7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老年》（月刊）即将创刊。此前，邓小平题写刊名。

7月31日 上午，由北戴河前往秦皇岛港口视察。乘坐引水二号船，沿港区航线，视察了五、六、七号老码头，十四、十五号杂货码头，八、九号煤码头和正在施工建设中的丙、丁码头，油码头，又乘车到新煤区视察煤一期、煤二期工程，询问秦皇岛港运送煤炭的来源和流向，指出：你们的贡献对全国的建设关系重大。离开港口之前，又对港务局领导说：你们的领导班子怎么样啊？秦皇岛港的发展，关键在于你们，你们肩上的担子不轻。

8月1日 湖南省湘潭县彭德怀故居修复后正式开放。此前，邓小平题写：“彭德怀同志故居”。

8月5日 下午，乘专列从北戴河出发前往黑龙江省。

8月6日 晨，抵达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在齐齐哈尔参观扎龙自然保护区，游览市容。中午离开齐齐哈尔，前往佳木斯。

8月7日 晨，抵达佳木斯新友谊站。随后，乘汽车前往黑龙江垦区友谊农场视察。视察中，详细了解农场的生产、管理和荒地的开垦情况。在二分场观看机械作业、听取垦区情况介绍后指出：你们不仅要作商品粮基地，还要大力发展畜牧业、饲料工业，不然的话，搞那么多粮食，运输也难。看到农

场五分场试种的西德玉米长势好于本地玉米时说：特别要下决心，自己繁育良种，不要光靠买外国的种子，要引进繁育良种的技术。你们省农场这么多，基础又好，要把全省的力量组织起来，下决心三五年内把种子工作搞好。有了种子公司还要立个种子法。要规定不论农村或农场，都必须用种子公司的种子，这是增产的最经济措施。当了解到农场机械化程度高，从种植业分离出几十万劳力时说：你们分离出这么多劳力，要注意大搞多种经营。要多发展林业、林果业、渔业、加工业，全面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视察中，还特别了解了农场干部和班子情况，询问各级班子的年龄。询问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后指出：要使各级领导班子年轻化。农场的干部，活动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任务重，很辛苦，更需要年轻力壮些。要尽快争取平均不超过四十岁才好。

△ 上午，乘专列离开新友谊站。

△ 晚，抵达牡丹江市东京城车站，下榻镜泊湖宾馆。在牡丹江期间，游览镜泊湖景区，并题词：“镜泊胜景”。

8月11日 晚，由东京城车站出发前往吉林省。

8月13日 凌晨，抵达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车站。后乘汽车前往长白山游览。事先要求：一不要妨碍群众游览；二不准搞特殊化；三要轻车简从，不要省委同志陪同。在长白山天池气象站，慰问气象工作人员，并同气象站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参加全国计划生育会议的同志合影。说：吉林省是农业省，而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所以，搞好天气预报很重要。你

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希望你们为防灾减灾当好参谋。中午，到山下岳桦宾馆休息，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题词：“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设得更快些更好些。”并为长白山和天池分别题字。下午，乘汽车离开长白山。

8月14日 下午，乘专列抵达大连，下榻棒棰岛宾馆。

8月15日—20日 在大连休息。期间，乘车视察市容和滨海路。每天上午十时在棒棰岛海滨浴场游泳一小时。在获悉滨海路建设与某军队院校没有协调好的情况后指出：军队要服从地方的建设规划。随后，中央军委专门派人前往大连进行协调并解决了这个问题。

8月21日 上午，乘专列离开大连前往河北承德。行前与大连党政领导和警卫、医疗、服务人员合影留念。当日途经沈阳时，在车站接见辽宁省、沈阳军区及沈阳市的负责人。

8月22日 上午，抵达承德。二十三日，游览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等景点，询问文物保护情况，并接见参加避暑山庄建庄二百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代表。二十四日上午，分别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承德部队干部战士和承德地市新老班子成员。下午，回到北京。

△ 《人民日报》报道：为庆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儿童广播剧团成立三十周年，邓小平题词：“照毛主席的话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8月27日 上午，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一行。在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说：昨天安德罗波夫发表了一个对外政策的讲话〔1〕，讲话的末尾说，中苏关系的改善不能涉及第三国。这就把改善中苏关系的话统统推倒了。我们提出，要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它侵略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边境摆了一百万军队和三分之一的导弹，还在蒙古驻军，这些都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这是第三国吗？所以通篇讲话中，仅这一句就拒绝了中苏谈判的基础。中苏关系的前景，我还看不出来。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始终着眼于用和平方式。最近我出面谈了一次，提出一个和平统一的方案，实际还是过去的九条，内容是一致的，只是更具体、更明确一点。我们的底全部亮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要做损害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事。现在美国继续售台武器，卖得那么多，这就是损害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一种动作。美国作出的决定，实际上是不希望中国统一。现在大陆和台湾统一的条件是有的。中国统一了，对世界和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少太平洋会比较太平。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美国究竟把中国摆在什么位置还没有搞清楚。美国决策人曾一度说，中国只能起地区性的作用，对全球无足轻重。我们对这样的判断并不在意，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中国看成是了不起的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认为中国对国际安全和稳定是无足轻重的。美国要真正同中国改善关系，必须从全球战略来认识这个问题。如果始终抱着杜勒斯主义不放，把台

〔1〕 指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安德罗波夫答《真理报》记者问。

湾当作美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中美关系迟早要破裂。希望美国在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战略利益，不仅是台湾问题，而且在处理其他问题上都要从战略角度来考虑。之后，又与杰克逊单独会谈二十分钟。

8月29日 阅赵紫阳本月六日《在国务院第六次常务会议上的讲话》，作出批示：“退紫阳同志。这些题目〔1〕出得好，希望如期实行。”

△ 阅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萧向前七月十五日关于建议加强基础教育问题的来信，作出批示：“紫阳同志和国务院参考。”

8月31日 上午，会见美国参议员奥林·哈奇、爱德华·佐林斯基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一行，就中美关系和一些地区性问题交换意见。在谈到一九七九年对美国的访问时说：那次访问美国，我过得很愉快。那时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高峰，以后走了一点下坡路。中美关系经过一段曲折，最近向好的方面发展，究竟怎样还要观察。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中美两国应该加强人员往来，开展各方面的合作。这对增进相互了解是有利的，对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是必要的。

8月底 在住地听取胡乔木汇报当前思想领域里的一些情况。在谈话中说：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思想界的问题不

〔1〕指赵紫阳在讲话中提出的10个需要调查研究的题目，即引进人才工作、建筑建材业的发展、食品饲料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素质、利改税、计划工作改革、价格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劳动工资改革和机关工资改革。

少，有的问题相当突出。我准备在这次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个问题，请帮助搞个讲话稿。讲话的题目是灵魂工程师的责任。在征求胡乔木意见后，初步商定题目为党在思想战线的任务或思想战线的形势和任务〔1〕。接着，把话题转到所谓“社会主义异化”问题上，指出：有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异化，其实这是个特殊情况，不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有“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把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都说成异化呢？如果社会主义自身不断产生敌对的东西，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又指出：还有人说从一九四〇年以后才讲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的，还有人说五四运动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的，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领导的。实际上这是在批评《新民主主义论》，只是没有点出名来。事实上五四时期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9月2日 上午，会见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

△ 下午，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彭真等出席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致词。

9月7日 上午，在住地同邓力群、龚育之〔2〕等谈邓小

〔1〕 邓小平的讲话题目以后确定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2〕 龚育之，当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在询问谈话人的年龄后说：现在五十岁的都要算年轻人，还是要培养一些更年轻的，三十岁、四十岁的，不然难以为继。要有一些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年轻人。年轻人首先得读点书，不读书不行，遇到问题解答不了。接着，指出：异化问题总该谈谈吧，究竟哪里来的？什么意思？否则没有办法啊，遇到这样问题解决不了啊。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异化引申到社会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怎么异化？惟独社会主义制度异化？异化要否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异化要走到反马克思主义，或者非马克思主义？现在说社会主义异化，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认为没有希望。既然这样，还搞什么社会主义？在谈到人道主义时指出：我访问美国之前，一批议员跟我说，卡特要同我讨论人道主义问题。我说我不跟他讨论。要讨论我的话多得很。我的意思很明白，你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帮蒋介石打仗，杀了多少人，是什么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各有各的含义。社会主义是最人道的，共产主义是最人道的，保护绝大多数人。最后他们没有提出来，要讨论我就翻他的底。在谈到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稿的篇幅和内容时说：好。要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要走过场，再加上现在这个题目〔1〕。整党，第一位的就是发现和处理“三种人”的问题，再就是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这是个政策问题。又说：我这个讲话的范围小一些，我原来就是想讲不要搞污染。所有的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不要对社会风气、对青年思想搞污染。现在好多人是在搞污染。要引导人民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

〔1〕 指思想战线不要搞精神污染。

克思主义，引导人民前进。现在有些人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也是不遵守纪律的呀。好多搞污染的事情，要列举一下，在肯定成绩下面，讲这些污染误国害民。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的领导丧失信心的表现。强调：中心的办法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上的争鸣。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允许宣布资产阶级这一套，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出来争？现在是共产主义者不出来争。要搞批评，搞文艺批评，只奖励不批评是不行的。要向人民讲清楚，他们搞的是什么东西，至少使青年懂得什么是坏东西，是被污染的，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些是非界限一定要搞清楚。不这样，许多本来好的人也跟着变坏了。一切向钱看，低级趣味。又指出：现在思想战线是一片混乱。青年和人民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如果说我们这几年拨乱反正在各条战线搞得比较有条理的话，但思想战线还没有搞个头绪出来，是乱的。这在一个时期看不出它的坏处，但再乱几年，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运动就难讲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我几次讲是对的，错在扩大化了。那也是一片混乱，杀气腾腾。讲的那些内容同现在很相像。人道主义、异化，那时这些意思也有了，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四个坚持”，核心是这两个。实际上，这些思潮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对党的领导丧失信心，认为我比党正确，我怎么样做都是合法的。讲人道主义应当是讲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嘛，最后要战胜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现在有些人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认为实行开放政策是对资本主义投降。我们是把实行开放政策当作社会主义发展的补充。人道主义在一些大学反映很强烈，一片欢呼声。异化的污染，可能更深远。总是有人叫好就是了。首先台湾叫好，大概西方世界也叫好。奉劝这些同志注意是什么人在叫

好。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这就是个实践。形势分析要写这个战线的混乱，党的领导是软弱无力的。这个我们有责任了。最后说：我最近的有些话，要同我以前的讲话衔接起来。他们抓百家争鸣，我的讲话里还有别的话嘛。既然叫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至少算一家嘛，我还讲过要批评和自我批评。最近翻了一下自己的讲话，过去两面的意思都讲了。那一方面的意思讲得多一点，那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讲的。那时“四人帮”什么都不让搞。针对那种情况，那一方面讲得多，另一方面的意思也有。现在倒是要强调另一面了。

9月8日 上午，在住地同张爱萍谈话。

9月10日 上午，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在谈到中国国内问题时说：农业问题同工业问题不一样，工业问题更复杂。农村的责任制可以用到城市，用到工业，但基本经验还是要城市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积累。现在开始一些试点，还是有希望的。这不能一哄而起，要走一步看一步。现在，有些国际朋友感觉到我们搞得慢，提高效益好像不那么显著。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太快不行。我们过去的失误都是由于走得太快，就拿农村政策来说，过去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就是太快了点。其后，又由高级社进到人民公社，现在看来不是一个成功的试验。工业方面搞“大跃进”，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错误。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也想快点，现在看来我们是错了。我们过去许多东西是学苏联的。当然有些东西不错，那是就当时的水平来说，但基本的经验是不成功。我们经常说积重难返，就是说时间太长，一下子很难改过来。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台湾问题。这里的根本问题不是美售台武

器，是《与台湾关系法》。只要这个东西存在，中美关系就有不知在哪一天破裂的危险。美国政府要修改这个法不容易，但美国总统有权选择对这个法执行到什么程度，如果像前一时期那样执行，两国关系就有破裂的危险。在谈到日本扩大防御计划问题时说：我们历来不反对日本拥有自卫力量，但应该有个限度。日本应该知道自己的历史。它现在已经是经济大国，还进一步提出要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军事大国的含义是什么？日本想在一千海里内承担军事义务，这个性质就变了。如果形成政策，不但中国人民，整个东南亚人民都会提出问题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中国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四年，这十四年要过渡好，核心是一九九七年能顺利收回香港，不会引起动荡。比较顺当地交接对各方面都有好处。过渡期有个香港人参与管理的问题。参与管理，不当主角可以，但要开始知道哪些方面的管理。无论政治、经济、商业和金融方面等等，不知道怎么行，一下子拿过来怎么行！所以要逐步熟悉、参与，整个过程就完满了。希望本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英第四次会谈，英方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

△ 为内蒙古乌兰牧骑题词：“发扬乌兰牧骑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9月13日 上午，会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顾毓琇^{〔1〕}和夫人王婉靖。在谈到身体情况时说：许多外国人问我，你上上下下几次，经过很多曲折，为什么身体还那么好？我回答是乐观主义。顾毓琇请邓小平在一本《邓小平文选》上签名，并说：你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是科技现代化的宣言，可以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相比。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会见结束前，对顾毓琇说：立夫^{〔2〕}先生能见到吗？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完成祖国统一。请你在方便的时候，代我向他问好。我们这些老人很多观点是不同的，也打过仗，但有一个心愿是一样的，都希望祖国统一。

9月14日 为北京图书馆新馆题名。

9月15日 为第五届全国运动会题词：“提高水平，为国争光。”

9月17日 会见并设午宴招待柬埔寨宾努亲王和夫人。

9月20日 上午，同胡耀邦、赵紫阳、邓力群、胡启立、王鹤寿^{〔3〕}、陈野苹^{〔4〕}、胡绳^{〔5〕}等谈话。说：我看了中央组织部整理的一份整党试点的综合报告。如果整党都按照这样的

〔1〕 顾毓琇，清华大学工学院创始人，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央大学校长、交通大学校长。

〔2〕 立夫，即陈立夫，国民党元老。

〔3〕 王鹤寿，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

〔4〕 陈野苹，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5〕 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试点办法去搞，全国照此办理，整党的目的是不是能够达到？整党要解决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相当数量是共产党员，该开除的没有开除。现在的问题是，进行党纪处理下不了手，至少在我脑子里打了个问号。好多同志向我反映，这样搞下去，整党要走过场。这次整党的要求，是不是提四句话：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纯洁组织是整党的主要目的。纯洁党的组织，最核心的、最关键的是发现和处理“三种人”。“三种人”是真正的隐患、祸根，对党危害最大，这些人最危险，有些是埋藏、潜伏很深的。关于“三种人”，很多地方都提出，“文化大革命”中间反复很多，情况很复杂，对于跟着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各有各的理解。这个问题，话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实际上办起来也很好办。我同意这个意见：十年中间各种人都有变化，有的是越变越坏，有的是时好时坏，要进行历史的分析。一直坏到底的，和中间有变化的，政策上要有所区别。“三种人”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年轻人，也有老干部，是少数。“三种人”容易辨别，实际上，其中大多数人的政治面貌，我们也都清楚。对这些人的能量，对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危险性、危害性，千万不能低估。对这些人绝对不能信任。

9月21日 让秘书打电话给胡启立，对桂林机场飞机相撞事件指示：军委要过问这件事，要追查责任。空军和民航要通过这件事把关系搞好。

△ 和胡耀邦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大连。

9月22日 上午，抵达大连。下榻棒棰岛宾馆。

△ 下午，和胡耀邦等在大连火车站迎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一行。

△ 晚，和胡耀邦举行宴会，欢迎金日成一行。

9月23日 上午，和胡耀邦同金日成举行会谈。主要由胡耀邦通报中国国内的情况。

△ 晚，陪同金日成观看文艺演出。

9月24日 下午，和胡耀邦同金日成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通报中国的对外政策。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里根竞选时讲了一些话，上台以后，实际上执行的是“两个中国”的政策，一直发展到去年美国对战略的评价，认为中国只有地区性的作用，在亚洲只有日本有世界性的作用。去年中美关系降到了最低点。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在中东问题、南非问题包括南朝鲜问题上加强了对美国的批评，我们讲“四个航空母舰”也讲得多起来了。美国人说，你们为什么批评我们是霸权主义，不要这样讲，太刺耳了。我说，你这个“航空母舰”是什么东西，什么政策？《与台湾关系法》是什么政策？这不是霸权主义是什么？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技术转让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尽管我们这个时期关系好起来了，而且我们希望关系发展，但是《与台湾关系法》存在的本身就会带来危机。美国是干涉中国的内政，这就是对中国实行霸权主义，那不行。在技术转让

问题上，不久前，把中国由 P 组改为 V 组。P 组是指苏联等国家、敌对国家；V 组是非同盟的友好国家，但 V 组里又分很多类。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内部还没有统一。印度、埃及、南斯拉夫等都是 V 组，把中国放在哪一类现在还不明朗。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在作斗争，但我们不会用很多的力量去同美国争技术转让这个问题。现在中美问题主要是台湾问题，不是技术转让问题。美国政府的变化，就是在全局战略中对中国估计的改变。技术转让和贸易上的放松，同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始改善同苏联关系有关，也是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包括网球队员问题上进行了尖锐斗争的结果。在许多国际争端问题上，我们针对美国的做法进行了很多批评。在这些斗争中，我们加强了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而美国感觉到同中国搞好，它也不好过。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时，我们一直投否决票，坚决要求由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担任。我们的十二大报告中所讲的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我们的斗争中都体现出来了。冷静地判断一下中美关系，关系正常化以后，我去华盛顿访问，那时是高点。那以后，从卡特后期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开始降低，不仅是里根时期，卡特时期就已经开始下降了。有一段时期降得很低，面临破裂的危险。我们做了准备，准备破裂。因为我们的立足点放在不怕破裂上，所以取得了这一系列进展。我对美国人说，我们的关系现在开始回升，好起来了。我们希望恢复到关系正常化那个时候。但这不由我们决定，由美国决定。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最近安德罗波夫的讲话有变化，过去讲两国改善关系不要涉及第三国，现在讲不要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解决中苏关系问题，毕竟还有三个障碍，谈判还是要继续下去。

9月25日 上午，为金日成送行。后同大连市负责人及

市外事办公室、市公安局的同志合影。十一时二十分，乘专列离开大连。次日回到北京。

9月28日 上午，会见美国国防部部长卡斯珀·温伯格。接受温伯格转交的里根总统的亲笔信。在谈话中指出：我们一直认为，两国领导人互访对发展我们的关系，加深彼此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障碍和实质性问题。无可讳言，中美之间有共同点，但也确实有必须解决的分歧。三年来，中美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最近一个时期，有的问题在双方都作了让步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这很好。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希望进行国共两党对话，希望你们促进而不是妨碍这个对话。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还是台湾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就排除了，这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有利的。《与台湾关系法》是“航空母舰”战略的一种体现。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我们的方针，如果和平的方式不可能，那只有用武力。中国出于民族利益不能放弃统一。那时美国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并不要你答复，只要你理解就够了。在谈到朝鲜半岛问题时指出：还有一个问题与我们有关，即朝鲜统一问题。金日成主席提出在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和平、自主、统一，成立联邦。我们赞成。用这种方式可以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这对中国、美国和日本都是有益处的事情。我们希望双方都促进朝鲜半岛的统一，这是亚洲、太平洋地区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9月30日 上午，同邓力群、龚育之等谈话。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指出：

我看了一位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的劳动创造的成果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即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需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外国各方面对异化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全会。

△ 上午，会见黄文欢，并共进午餐。

10月1日 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个题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0月5日 下午，主持谭震林〔1〕的追悼会。

10月8日 上午，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

〔1〕谭震林，1983年9月30日逝世，终年81岁。逝世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戈。说：我现在少管日常工作，主要由比较年轻的同志来管。这几年的实践证明，他们管得不错。中国共产党是个老党，中国革命经历的时间长，老干部多。因此，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好的，我们准备再用几年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10月10日 审阅胡乔木、邓力群报送的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修改稿，作出批示：“照此定稿。”

10月11日、12日 和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十二日，在全会上讲话，着重讲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针对党内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问题，指出：必须下定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次整党，通过搞好这次整党，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还指出：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

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文艺界的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最后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在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一九八三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10月18日 下午，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乌兰夫等，出席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幕式。见到王崇伦〔1〕时说：你抓豆腐啊，抓得好！抓得好！

10月21日 上午，会见高理文〔2〕、罗亚南夫妇。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情景时说：我们那时在法国是一批一批去莫斯科的，我算是第一批。当时我们在法国的党员有三百多人，大体上有二百多人到莫斯科中大〔3〕。在中大呆了一年，我们二十几个人回国了，说是冯玉祥要人。结果交通不通，只有我们三个人随运子弹的车到宁夏。一路走沙漠，骑骆驼，一个月老晒太阳，很热。在询问蒋经国的近况后说：你看我们有希望联合起来吗？我是讲和蒋经国联合起来。如果能办成这件事，蒋氏父子的历史可以写好一些。我带信给台湾的老人，我说我们老一辈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炎黄子孙，这个观念比年轻人更明白，这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们不拿社会主义去统一台湾，你也不拿资本主义统一大陆。

10月29日 下午，和胡耀邦、彭真、邓颖超、乌兰夫等，接见出席中国工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特邀代表，并合影留念。

10月30日 上午，会见西班牙外交大臣费尔南多·莫

〔1〕 王崇伦，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80年8月至1981年8月带职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期间，解决了当地群众吃豆腐难的问题，受到群众称赞。

〔2〕 高理文，原名高衡。1925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蒋经国是同班同学。1972年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

〔3〕 指莫斯科中山大学。

兰，就国际形势和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交换意见。说：我们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有许多共同语言。西班牙在前进，中国也在前进。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问题也比你们多。不过，我们现在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我们的事情是可以办好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香港问题和直布罗陀问题〔1〕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我们相互都能理解彼此的立场。中英两国政府正在进行谈判，但谈判的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国必须收回香港。不管英国人怎么打算，到一九九七年必须收回。三个条约都得作废。最近，英国人又提出，不讲治权，讲某种程度的参与管理，我们说，还是不行。英国人在谈判中搞了一些手脚，前不久港币贬值，就是英国人搞的，这是一种威胁，这个吓不倒我们。我坦率地告诉了撒切尔夫人，如果在解决香港问题的十几年过程中，香港出现不能收拾的局面，中国政府将重新考虑收回的时间和方式。

11月5日 上午，会见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加斯东·托恩和夫人。指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一直希望欧洲联合，变得强大，也希望欧洲各国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当前，欧洲共同体和中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更加动荡不安的形势。这种形势是欧洲人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总之，我们都希望有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国对付当前形势的办法就是加强自己，搞好建设，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会见结束时，托恩和夫人感谢邓小平在中国外交部赠送给他们的《邓

〔1〕直布罗陀原属于西班牙领土，1704年被英国军队占领。1713年英国、西班牙两国政府签订乌德勒支条约，迫使西班牙将直布罗陀割让英国。长期以来，西班牙为收回直布罗陀进行斗争。20世纪80年代开始，两国政府就这一问题举行了多次谈判。

小平文选》的扉页上签名。托恩对邓小平说：我们希望尽早看到这本文选的外文版，也希望能看到这本文选的续集。

11月6日 上午，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说：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新的思想路线是把毛主席生前正确的东西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谈到中国党的历史时说：我们很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老党。我们党的整个历史的确是光荣的，经过那样艰巨的斗争才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前毛主席的领导一直非常正确，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来说，的确是光辉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他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从五十年代开始，严格地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确是有些地方不行了。概括说来，就是一个“左”字。同一些老同志、党的骨干的关系也不好了。这样的问题不能归咎于毛主席一个人。因为这与党的生活和制度也有关系。延安时期我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建党思想非常好，但是没有形成一套制度。这样的问题还很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总结经验，注意制度改革，废除终身制，注意革命的连续性和后继有人等问题。在谈到党的思想路线时说：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两个凡是”展开了辩论。三中全会以前党内对“两个凡是”就有意见。一九七七年二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我的文选中那篇文章很短，题目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讲的意思很简单，按照“两个凡是”办事，我就不可

能出来工作。现在思想界有人抓我提出的解放思想，认为这就是自由化。我讲的是真正解放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当时我提出解放思想时，是指任何单位、地区都应该从实际出发，小到生产队，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搞多种经营。不解放思想，什么事情只搬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词句和语言，我们进行的事业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和发展。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1〕}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至于这个观点、那个观点，都可以争论。关于国际共运如何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我们也改变了。对兄弟党，不要指手画脚，否则是很危险的。强调：如果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比重的增加，而且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会见前，在听取中方陪同人员关于接待希尔和回答他的问题的情况汇报时，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有效，指出：不要专政不行，无产阶级不搞专政，社会主义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无论哪个阶级都搞专政，资产阶级也搞资产阶级专政。

〔1〕 指20世纪60年代中苏双方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而导致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参与的一场大争论。

11月16日 阅《情况汇编》刊载的《一位获博士学位的留法学生回国一年半后还未分配工作》一文，作出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该文反映我国一公费留学生于一九八二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五月回国后一直没有被分配适当的工作，一年半后又被派回原来工作的陕西省富县广播站做普通工人。十二月二十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组织、宣传、统战部门在一九八四年上半年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再进行一次认真检查，边检查边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对待知识分子政治上—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

△ 上午，在住地同邓颖超、杨尚昆谈话。

11月17日 下午，和胡耀邦、彭真、邓颖超等，接见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11月22日 上午，出席庆祝马海德^{〔1〕}来华工作五十周年的招待会。对马海德说：五十年，不容易，祝贺你。

11月23日 上午，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总理康斯坦丁·德斯克列斯库。指出：战争的

〔1〕 马海德，医学专家，原籍美国。1933年到中国，1936年到延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顾问、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会长、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

危险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讲了多少年了。但我看至少五年内打不起来。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来发展自己，如果争取到十年不发生战争，那对我们是最有利的，看来还是有可能的。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总是利用时间发展自己。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各个领域，包括工业战线很不协调，尤其是能源、交通。如果说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协调，那就是科学技术水平不能适应，人才不够。根据我们总结的经验，发展速度定得低一点、争取高一点比较好。我们到本世纪末要翻两番，前十年增长速度低一些，后十年高一点。翻两番就意味着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二。我们这个五年计划因为要调整，要改变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状况，所以只定到百分之五。去年、前年超过了，今年也会超过。但这个超过有水分。比如去年超过百分之六，但一些产品不适用，放到仓库里，没有市场，这等于是一种浪费，所以叫水分。八十年代还有七年。这七年我们要逐步解决企业的改造，特别是能源、交通方面。如果前十年能达到百分之六点五，到本世纪末任务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说后十年达到百分之八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是有信心的，有希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快五年了，这五年来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11月26日 下午，前往北京医院，向杨秀峰^{〔1〕}遗体告别。

11月29日 上午，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在谈到防止核扩散问题时说：我们不搞核扩散，

〔1〕 杨秀峰，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11月10日逝世，终年86岁。逝世前任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

我们也没有这个本事。我们的立场是要发展一点核武器，但是有限的。我们的钱要花在工业、农业、教育和科学事业方面。从长远来看，中国拥有核武器只是象征性的。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花的力量太多，也会削弱自己。在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强调：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从六十年代我们就一直赞赏法国戴高乐总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七十年代，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我们同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采取了更接近的政策，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近几年有点变化，苏联还是咄咄逼人，但美国最近的几手表明，对美国也不能忽略。对美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这几年它搞的几手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认为，有资格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没有别人。这是近几年我们对事物观察后的看法。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争取和平。

12月1日 上午，会见美国大西洋富田（阿科）公司董事长罗伯特·安德森一行，就中国莺歌海合同区天然气的开发利用问题〔1〕交换意见。问：最快什么时候可以生产？合资搞行不行？甚至你们的投资可以占大头。说：我们是朋友，要很好地合作。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想和中国合作搞一些事情，请转告他们，我们对这种态度表示感谢，我们愿意积极地进行这方面的合作。还说：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古代我们做得不错，对人类有突出的贡献。但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

〔1〕 1983年8月，在中国莺歌海中美石油勘探开发合作区打成一口日产天然气120万立方米的高产天然气井。安德森一行就是为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商讨如何使用天然气来北京的。

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我们落后了近一百五十年，这一段对人类的贡献较小。

12月3日 下午，和胡耀邦、彭真、邓颖超等，接见出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四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三次全盟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台湾同胞为祖国做贡献经验交流大会的代表，向这些大会再次表示祝贺，并同代表们合影留念。

12月9日 收到邓力群、王任重分别送来的涉及雇工问题的讲话稿和有关材料及信。让秘书打电话给胡启立，谈对农村雇工问题的意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

12月14日 阅夏之栩^{〔1〕}关于建议整修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来信，作出批示：“请中央书记处酌处。我认为应予积极支持。”来信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负责同志亲自过问，让上海市委和当地军工厂的同志协商，把龙华地方让出来，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

12月17日 新华社报道，在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和纪念馆整修一新，纪念馆的陈列内容作了部分调整和修改。此前，邓小平分别题写：“毛

〔1〕 夏之栩，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20世纪20年代曾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泽东同志故居”、“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12月20日 审阅林涧青^{〔1〕}起草的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稿，作出批示：“这篇谈话的用意，是点明我们在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打交道时，同时也非常重视台湾人民意见的（也明确批判台独）。”“一个问题几句话就够了，不宜解释太多。我看文字压缩一半，更为恰当。以上，请大姐^{〔2〕}、乔木斟酌。”二十一日，阅胡乔木修改后的邓颖超的讲话稿，批示：“我看可以了，删去几个字。”

12月22日 上午，听取姚依林、宋平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指出：今年粮食、棉花产量提前两年达到了一九八五年的计划指标，这很好。我国农业这几年持续丰收，增长这么快，很不简单，这对世界有震动。粮食多了，不一定着眼于出口，要着眼于发展饲养业。农业增产还有潜力，特别是科学种田方面大有潜力。今后要进一步提倡科学种田，还要大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我们有大量中学生，要把他们培养成土专家，让他们在农村发挥作用。雇工问题，先不要随便发表意见，现在问题还不十分严重，可以稍微缓一缓，等两年再说。关于集中财力，这是大事情，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中央手上没有钱，就办不成大事，钱在地方手里，他就不一定听你的。中央财政收入要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利改税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件事能不能两年做到？搞能源、交通、钢材、水泥、木材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该上的就得上，不搞这些，以

〔1〕 林涧青，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

〔2〕 大姐，指邓颖超。

后经济还是上不去。电力建设一定要超前一些。钱不够，要想办法借点外债。我们现在借的外债不算多，还可以借一点，多借一点没什么大的风险。经济发展，现在快点慢点并不重要，问题是有没有后劲，为以后准备得怎么样。“七五”、“八五”、“九五”能不能搞上去？我看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能源，二是交通，三是原材料，四是智力开发。“七五”要上去，后十年要上去，不搞能源、交通行吗？原材料不上去行吗？还有智力投资，不搞行吗？教育与科学，很重要，这两年比较注意了，如果有可能，还要增加点投资。一定要抓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这些方面的骨干项目不上去不行。看来，宝钢二期要搞，能不能提前上，可否定下来？如果能解决三百万吨钢材，那也是很大的事情。对外谈判工作也要抓紧。也得有个谈法，不要因为舍不得一点小利而耽误了时间。小的方面可能受些损失，吃点亏，关键是争取了时间。三峡工程怎么样？能不能上？投资安排不可能那么准确，要安排得十分科学不可能，重要的是要争取时间，要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这方面要勇敢点，太稳了不行。没点闯劲，翻两番翻不起来。从前三年的情况看很有希望。这几年要争取时间，把企业改造好，整顿好。基本建设要很好总结，运用京秦线和引滦工程的经验，集中力量，缩短工期。过去修建人民大会堂也是这样做的。还指出：现在出国的代表团太多，好多是游山玩水的，能不能归口管起来，把出国的审批权收回来。当然，要管得合情合理。对出国人员要实行责任制，出国一定要办成几件事，不是出去游山玩水。

12月23日 阅胡耀邦本日的来信和他写的文章《最好的怀念》，作出批示：“好，退耀邦同志。”来信说：为纪念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我勉为其难写了这一篇，请乔木等几位同志

帮助修改过。请你看看能不能用。二十六日，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 下午，和胡耀邦、李先念、彭真等，在人民大会堂分别接见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12月24日 上午，会见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联合政府总理宋双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乔森潘。说：你们代表团的最重要特点是体现了民柬三方的团结和联合。这个团结和联合是你们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保证，也是在实现独立和解放之后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中立、不结盟的柬埔寨的保证。

12月26日 上午，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彭真等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随后，参观纪念堂内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纪念室。

12月28日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在谈到国内建设时说：中国发展经济的政策，经过五年的实践，已见成效，证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指标，今年就可以达到。原来计划工农业年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今年实际情况是，农业增长百分之七点一，工业增长百分之七点二。根据这几年的经验，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是很有希望实现的。听到杨振宁关于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立软件小组的

建议时说：这个意见很好。要看得远一点，要不然来不及。科技大学要作为重点支持。科大少年班可以扩大吗？别的大学为什么不能搞少年班？请与方毅和何东昌〔1〕谈一下。

12月29日 阅陈云本日关于雇工问题的来信和在《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送审稿上的批示，作出批示：“中央书记处再议。”来信说：“我在明年一号文件的清样上提了一点意见。请你先看看，然后再送书记处。”陈云的批示是：一、雇工政策还可以再看几年，即使出一点问题也不可怕。二、对党员雇工要慎重。

〔1〕 何东昌，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教育部部长。

1984年 八十岁

1月10日 阅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的来信，作出批示：“耀邦同志：杨振宁先生的意见是比较妥当的，请再考虑。”来信就我国研究的小麦种子是否宜于赠送外国提出意见：一、送给外国只会有利于第一、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很难得到很多好处。二、向第一、第二世界讨论交换条件可以，赠送之办法太理想了，太天真了。国际对“赠送”之反应将不是感激，不是叹服，而是惊讶，是讥嘲。

1月11日 审阅胡乔木本月三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稿《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出批示：“乔木同志：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二十七日，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1月12日 阅一封外籍友人反映旅游部门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来信，作出批示：“这是一个热心友好的批评和建议，请中央办公厅转知有关部门，注意改进工作和作风。”

1月17日 审阅中共国家科委党组关于将劳动人事部主管的科技干部管理局划归国家科委主管的请示报告，作出批示：“请国务院早作决定，我认为应划归科委主管。”七月，该

局划归国家科委领导。

1月18日 上午，在住地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

1月22日 晚，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视察。

1月24日 上午，抵达广州火车站，作短暂停留。对刘田夫^[1]、梁灵光^[2]等人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 中午，抵达深圳，下榻迎宾馆桂园。

△ 下午，听取梁湘^[3]汇报。在听到经济特区缺乏专业人才时指出：深圳要办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可以吸引华侨投资来办。华侨在这里办大学，由他们聘请国外水平高的教授，从国外购买教学设备，这样可以给我们培养一批人才。听完汇报后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问题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

△ 下午，参观深圳市容。看到沿途附近山头光秃秃的，对陪同人员说：好多山头不种树。我们经过韶关时，看到那里的山头也都是这样。荒山、水域，这些都是潜力很大的发展生

[1] 刘田夫，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 梁灵光，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

[3] 梁湘，当时任广东省副省长、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深圳市市长。

产的广阔天地。随后，登上罗湖商业区国际商业大厦的天台，俯瞰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

1月25日 上午，参观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工贸中心，听取关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产电脑设备和软件的汇报。指出：软件占百分之八十，硬件占百分之二十，这就要靠脑子。杨振宁说美国都是十六七岁的娃娃搞软件，好多尖端技术都是娃娃搞出来的。还说：要积极培训青少年。搞软件，我们有条件，中国有一大批好的娃娃。现在不少下象棋、围棋的都是娃娃。

△ 下午，参观渔民村，到渔民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家了解情况。在看到这个村先富起来的情况后说：经过长期奋斗，全国广大农村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

1月26日 上午，视察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听取工业区董事长、总指挥袁庚汇报。在听到工业区的党委副书记才三十多岁时说：现代化没有年轻人不行，要鼓励年轻人挑起重担，多干工作。

△ 上午，参观中外合资企业华益铝材厂。参观中向陪同的企业负责人了解资金和设备引进、产品销路、职工收入和人才培养情况。随后，登上蛇口微波山参观微波通讯站，并从山顶俯瞰蛇口工业区。

△ 中午，参观即将开业的明华轮游乐中心，题写：“海上世界”。

△ 下午，乘海军舰艇前往珠海。

△ 晚，住中山县〔1〕温泉宾馆。

1月27日 上午，参观温泉宾馆购物中心。

△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1月28日 上午，登温泉宾馆北面的罗三妹山。在有人建议原路返回时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 晚，在温泉宾馆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2〕以及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等，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

1月29日 上午，前往珠海经济特区视察。途中，听取中共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关于特区工作的汇报。

△ 上午，参观正在兴建中的九洲港、直升机机场、石景山旅游中心、拱北海关和香洲毛纺织厂、狮山电子厂以及珠海市市容。

△ 中午，在珠海宾馆休息时说：这里发展旅游的条件比

〔1〕 中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

〔2〕 马万祺，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深圳好。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

△ 下午，离开珠海，在前往广州途中视察顺德。听取中共顺德县委领导的汇报。在谈到发展养鱼业时说：山和水能解决大问题。我们的山用得还可以，水就用得很少。

△ 晚，到达广州，住珠岛宾馆。

1月31日 上午，参观白天鹅宾馆^{〔1〕}，说：“白天鹅好！”

2月1日 在广州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将落款日期写为离开深圳的一月二十六日。

△ 晚，出席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军区礼堂举行的春节联欢会，同各界人士一起欢度春节。

2月5日 晚，乘专列离开广州前往福建。

2月7日 上午，抵达厦门。

2月8日 上午，视察东渡港五万吨位码头、集装箱码头、渔业码头。指出：发展经济特区，一定要基础设施先行。

〔1〕 这是霍英东投资兴建的五星级宾馆。1983年建成开业。当时一些人对白天鹅宾馆的经营方法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

△ 上午，乘鹭江号游艇游览海上风光。其间，听取项南〔1〕汇报。在项南建议厦门特区应由现在的二点五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一百三十一平方公里时，表示同意这个意见，指出：厦门特区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还表示赞成将正在建设中的厦门机场拟改称为“厦门国际机场”。

△ 上午，游览鼓浪屿。指出：厦门是个好地方。像鼓浪屿这样的地方不多，要好好保护。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鼓浪屿“好八连”和厦门水警官兵代表，分别和他们合影留念。

2月9日 上午，视察厦门大学。和厦门大学校系负责人、教授、先进工作者、学生代表合影留念。

△ 上午，视察湖里工业区。听取邹尔均〔2〕汇报，就他提出将特区扩大到全岛一事，回答说：你们的要求，我转告第一线的领导同志，让他们去作决定。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 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厦门机场。

〔1〕 项南，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2〕 邹尔均，当时任中共厦门市委副书记、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 参观陈嘉庚^[1]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故居，听取集美校委会负责人关于集美学村发展过程和今后规划的汇报。指出：陈嘉庚是个爱国华侨。福建华侨多，进出都经过厦门。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厦门要加强侨务工作，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在厦门市委负责人汇报厦门落实华侨房屋政策的任务很艰巨时说：华侨的房子，要承认他们的所有权，然后分期交还。

△ 接见居住在厦门的台湾同胞和归国华侨代表。

2月10日 上午，在厦门万石岩植物公园植树。后乘专列离开厦门前往上海。

2月11日 下午，乘专列抵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2月14日 和王震、陈丕显^[2]等听取陈国栋^[3]、胡立教^[4]、杨堤^[5]、阮崇武^[6]等汇报。指出：我这次看了几个经济特区，看了几个饭店。中山温泉宾馆是霍英东独资经营

[1] 陈嘉庚，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今属厦门市）人。1890年赴新加坡经商。曾创办集美小学、厦门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1961年8月逝世。

[2] 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 陈国栋，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4] 胡立教，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5] 杨堤，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6] 阮崇武，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

的，每年赚两千万元，几年后产权归我们。像这样的事，你们也可以搞嘛！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上海要搞十个大饭店，也可以让国外海外的人独资搞，包括建筑材料也从国外进口。旅馆可以利用外资。你们要加快速度，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在谈到汽车工业的发展时说：要搞一个汽车设计研究机构，经常改改样子，搞得新一些，怪一些也可以。在谈到建筑体制问题时指出：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在谈到宝钢建设时指出：宝钢二期必须上，不要等“七五”，今年就上。不上是个浪费，要争取时间。中国借二三百亿美元的外汇不会有什么问题，还得起。在谈到财政问题时指出：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中央财政收入少，大项目上不去。要恢复到中央掌握百分之七十，地方百分之三十。方针已经定了，说是三年做到，可不可以两年就搞成。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些大项目就可以上得快一点，也可以给你们上海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历年来的一个矛盾，我做总书记时就是这样办的，要把地方的钱收一些上来。在谈到上海的人才情况时说：现代化和干部年轻化相关，没有年轻人不行。

2月15日 上午，视察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听取黎明^{〔1〕}的汇报。指出：宝钢二期工程肯定要上，问题是

〔1〕黎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冶金部副部长、宝山钢铁总厂工程总指挥。

什么时候上。原来国家计委考虑宝钢二期工程在“七五”期间上，如果一九八五年只要两个亿，还可以考虑上得快一些，不要耽误时间。为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在视察宝钢主原料码头时指出：我们要把日本的技术都学过来。

2月16日 上午，参观上海市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听取工作人员对电子器件、基础材料、设备、人才培养、科研开发、计算机应用等各部分的介绍。指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 上午，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负责人。

△ 上午，参观上海交通大学，接见学校主要领导和部分教授。对上海交大的教育改革工作表示满意。

2月17日 乘专列回到北京。

2月20日 上午，在住地同李先念谈话。

2月22日 上午，会见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阿穆斯·乔丹^{〔2〕}率领的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指出：中美建交，是一九七二年以来中美关系的高峰，以后不

〔1〕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当时任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2〕 阿穆斯·乔丹，当时任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席。

幸出现曲折。这个曲折，是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开始的。这个法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是不能低估的。我们对全球战略看法的改变来自美国的变化，当然主要是台湾问题，也有其他问题。我总感到美国至少有一部分政治家又把杜勒斯主义拣起来了。从全球战略看，美国要取得主动就必须从“四个航空母舰”的圈子里走出来，否则取得不了主动。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还是消除三个障碍，我们仍然坚持这一点。只要苏联不在消除三个障碍上迈出一步，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戏剧性的变化。但既然是邻国，可以在其他领域改善和发展一些关系。这对于稳定国际局势有益处。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我多次讲过，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好国内建设。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

2月24日 上午，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杨尚昆、姚依林、胡启立和宋平等谈话。指出：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

性认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1〕}在谈到高收入与高消费的问题时指出：中国发展经济从何着手？有位日本朋友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第二点，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后面这一点，我们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但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

〔1〕 1984年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派人到厦门传达邓小平以上谈话的内容。3月18日，胡耀邦会见外宾时公开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厦门经济特区由2.5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131平方公里。3月26日至4月6日，为贯彻落实邓小平2月24日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决定开放由北至南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讨论了进一步搞好对海南岛的开发建设。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

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在谈到基本建设问题时指出：在发达国家，建筑业是经济的四大支柱之一，中国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大家要想点办法。在谈到宝钢二期工程时说：从长远看，是否能想想办法，争取早些上。宁肯借点债，付点利钱，我们早一点拿到钢材，总算起来，还是划得来的。这事要确定下来，今年就干，争取时间。还说：西安是一个重要的旅游城市，要进一步开放。谈话结束时，指定姚依林、宋平将谈话的内容向陈云汇报。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

2月25日 阅李先念在港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送审稿，作出批示：“好，赞成。”

2月28日 同薄一波谈话。对雇工问题〔1〕提出两点意见：（一）农村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没有什么了不起，将来经济发展了，如果有了偏差，一个命令就可以收回来。（二）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究是要搞社会主义的。〔2〕在薄一波谈到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

〔1〕 1984年2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王鹤寿作中纪委关于《加强党的纪律的若干规定》的说明时，就《规定》中提出的共产党员不准雇工剥削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从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看，雇工有多种情况，十分复杂，涉及到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对党员雇工问题作出合理的规定。

〔2〕 1984年3月3日，薄一波致信胡乔木，将邓小平对雇工问题的意见告诉他。同日，胡乔木将薄一波转告的邓小平对雇工问题的意见转送陈云、赵紫阳、万里、王鹤寿等阅。

化问题》的文章在国内外反应很好时说：反应不一，有些人还在准备反驳。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来镇住了，把文艺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气势压下去了。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一时间闹得很厉害，我说过，他们实际上是搞自由化，现在这样就可以了。我讲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

△ 就中共四川省广安县委询问邓绍圣^{〔1〕}有关情况一事，让办公室工作人员致信广安县委组织部：“小平同志说：邓绍圣与他一起去法国。一九二五年在法国入党。同年底一起到莫斯科，就读于中山大学。后来听说回国。回国后的情况不详，多半是病死或牺牲了。应按烈士处理。”四月二十五日，南充地区行署办公室致函广安县人民政府：“邓绍圣同志可按建国前对敌斗争失踪的地方工作人员对待，由你县人民政府审查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3月5日 阅《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著名科学家谈镐生^{〔2〕}在科学院受到种种非难》一文，作出批示：“方毅同志：为什么这种情况，现在还不能改正。科学院是些什么人在管事，请查一下。”文中说：谈镐生一九六五年从美国回国后，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甚至受歧视，工作上受到非难，应补发的工资至今未给补发。谈镐生的遭遇对近几年回国的青年科学工作者产

〔1〕 邓绍圣，邓小平的远房叔父。

〔2〕 谈镐生，物理学家，曾任美国高等热工研究所所长。1965年回国。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生了不好的影响。六日，方毅批示：“嘉锡〔1〕、东生〔2〕同志：请重视小平同志的批示，并将情况写一报告上报小平同志。”

3月12日 上午，和胡耀邦、习仲勋、韦国清、方毅、杨尚昆等以及中央直属机关一百二十多名新长征突击手、优秀团干部、共青团员一起，前往十三陵水库中直机关造林基地植树。在植树过程中，向中共北京市委和昌平县委负责人了解从延庆向十三陵水库引水和去年植树造林成活情况，指出：全国种树，主要是提高质量，提高成活率。栽的多，活的也要多。还指着面前的一片山坡说：这一片都种上树，这个风景区就非常漂亮了。

3月14日 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在谈到同外国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问题时指出：还是按照中央已经定下的方针办。政治问题上要维持和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对他们的理论、思想观点，我们不替他们宣传。他们自己宣传什么，主张什么，我们不作评论，不同他们争论，更不要像过去那样公开地批评他们。是对是错，由他们自己去判断。在谈到翻译世界名著问题时说：这个工作很重要，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除了组织国内人力进行翻译，还可以在英国、日本、西欧分别成立编辑部，组织外籍华人和华侨中的学者进行这一工作，订立合同，稿费从优。在谈到改进大学政治课教学问题时指出：在青年中发现和培养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现在发

〔1〕 嘉锡，即卢嘉锡，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

〔2〕 东生，即严东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现的还少。大学、中学的政治课都要认真改进。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在谈到农村问题时指出：农村政策很见效，农村状况确实很好。我们要继续采取措施，使形势更好。在农村，我们终归还是要让农民搞集体经济。这个意见，我在一九八〇年有个谈话，已经收到我的文选里去了，文中说了四个条件。在谈到对外开放时说：吸收资金，引进技术，不进一步对外开放不行。主要对象是美国、日本、西欧。对苏联，政治上坚持消除三大障碍，不松口，经济上可以解冻，多做些生意。在谈到思想工作时指出：思想工作，党委当然要加强领导，但是加给他们的东西不能太多。思想工作、思想建设的很多事情，要在党委领导下，主要由思想工作各部门各自承担，制定计划，长期做下去。

3月19日 审阅《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报送的拟将他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的报告收入丛书发表的报告，作出批示：“编委会同志：对宣传队的报告，我看了一遍，觉得内容还可以，但文风欠佳，以不再发表为好。”此文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后，又批示同意发表。

3月21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海军东海舰队防险救生船大队原大队长张达伍“献身海军事业的模范干部”的荣誉称号。命令说，张达伍是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突出的先进典型。

3月25日 上午，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指出：去年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到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在谈到中日两国经济合作问题时指出：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中日关系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我想我们双方都是满意的，但双方关系发展得还不足，两国的民间经济技术合作还很薄弱。我们欢迎贵国的大中小企业加强同我们的合作。我们将逐步改善、健全法制等方面的条件。希望日本政府对他们做点工作，劝他们看得远一点。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在谈到中国翻两番的目标时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翻两番，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放政策，欢迎国际资金的合作。在谈到个人经历时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

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

△ 阅彭真的《关于草拟国营工厂法的谈话要点》，作出批示：“赞成。工厂法最好早点搞出来。”

3月27日 《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试验基地副研究员钱绍钧“国防科技工作模范”荣誉称号，表彰他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攀登科技高峰，为发展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的贡献。

3月31日 阅胡厥文反映对外经济贸易部在促进大陆与台湾的贸易方面工作不力的来信，作出批示：“紫阳、慕华同志：各方反映，对外经部意见很多。此事表明，不守信用，官僚主义，指挥不灵，总应下定决心，从速纠正。”

3月 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题写馆名。

4月1日 《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最近为北京科学会堂题字，中国科协准备做成匾额，悬挂在科学会堂。北京科学会堂于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建成开放，它的匾额是郭沫若题写的。“文化大革命”中，匾额被破坏。

4月6日 下午，和李先念接见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联合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

4月16日 下午，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彭真、

邓颖超等接见出席第三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侨办主任会议的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

4月18日 上午，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指出：自从大臣阁下一九七八年访华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同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仅仅是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的发展前途不取决于个人的作用，而取决于政策是否正确，路子对不对头。中国过去几年的变化符合人民的利益，人民喜欢，因此我们的政策将继续下去。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指出：我们已经多次宣布，一九九七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的现行制度五十年不变。我们采取这一主张是同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联系起来考虑的。解决香港问题是中英两国之间的事，与其他国家无关。香港问题只能由我们两家解决。双方的协议应该更原则一些，太烦琐了往往会出差错，不合实际，也会束缚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特区的自治权。解决香港问题将是中英合作的一个范例，这不仅会增强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过渡时期这十三年不会是很平静的，有人要起破坏作用，并且已经有了信号。现在意识到，提出来是必要的。英方也要想到这个问题，采取预防措施。必须看到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双方合作。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可以考虑这个机构设在香港，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在谈到中国在香港驻军问题时指出：一九九七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

△ 会见结束后，同吴学谦〔1〕、鲁平〔2〕谈话。指出：要了解香港的金融和人事方面的问题，处理过渡时期香港人的逐步参与问题。中心的问题是参与问题，主要是香港人逐步参与，中国银行、香港的华人银行也要参与。这个问题很重要。

4月28日 上午，会见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指出：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世界局势不稳定，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中国同美国前一段吵了一架，近来是好的。但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这种判断不准确。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统一。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中国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利。中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看法，也有不少分歧。两国都有发展关系的愿望。希望两国领导人、政府成员更多往来，交换意见，解开疙瘩，较快地发展中美交流和中美关系。会见后，设午宴招待里根。里根是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一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这是中美两国自一九七九年建交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在职的美国总统。

〔1〕 吴学谦，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

〔2〕 鲁平，当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秘书长。

4月29日 上午，会见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率领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和美国基威特公司代表团。在谈话中对中美共同开发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合作获得成功表示祝贺，指出：中美双方通过协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协议，这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带了个好头。同中国进行合作风险最小，因为中国不是缺乏偿还能力的国家，而且潜力很大，只是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现在仍有些外国朋友担心中国的法律不完备，我们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在哈默提出下一步想在肥料上与中国加强合作时，表示同意，并说：复合肥料搞成功，对农业很有益处，希望这件事快点搞成。在谈到开采南海石油时指出：我们决定开发海南岛。海南岛自然条件不比台湾差，面积相当于台湾。

4月 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在关于驻军问题一条旁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5月6日 为北京饭店题字。

5月7日 上午，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指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同阿拉伯问题的解决是密切关联的。你们把努力放在政治活动上，放在巴解内部的团结上，放在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团结和联合上，我看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赞赏这个政策。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又是非做不可的事。这件事做起来不容易，但最终总会有结果。阿拉伯的力量很大，人口虽然只有一亿五千万，但在世界上所占的政治分量超过人口的比例。如果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收复阿

拉伯失地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问题就解决了，以色列问题也解决了。当然不是消灭以色列，要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你们为建立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已奋斗二十年。凡是这样的事业都是艰难的。有两点很重要：第一，要充分估计到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心急不得。第二，斗争到一定阶段，政治斗争比军事斗争更复杂，更困难，也更重要。

5月12日 上午，会见尼日尔国家元首、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赛义尼·孔切。指出：中国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概括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反对霸权主义。第二，维护世界和平。第三，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不反对霸权主义，和平就靠不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使世界不得安宁，美苏两家不管哪一家得分，吃亏的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谈到中国国内建设问题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把国内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努力摆脱贫困状态。要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必须发展生产。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美元，把中国建成一个小康社会。这个目标看来很渺小，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却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目标。我们准备再用三十年、五十年的时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提高这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的的生活是个关键。搞好社会秩序，这个百分之八十也是关键。一九八〇年以后，农村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普遍增长了一倍到两倍。由于现行政策见效，带动了其他方面的发展。

5月17日 上午，会见厄瓜多尔总统奥斯瓦尔多·乌尔

塔多。指出：我看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第二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发达国家尽管也有其经济困难，总的说是越来越富，而第三世界是越来越穷。解决南北问题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一个长时间、很重要的问题。发达国家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还不是靠剥削和掠夺。解决南北问题，北方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联合国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并不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走南南合作的道路。我们虽然很穷，但穷国之间的合作余地还是很大的，可以互取长处，不能把我们的命运完全放在发达国家的恩赐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多起来，积累起来，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南南合作。在谈到中国国内问题时说：我们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为此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对内搞活经济也是开放政策。经过五年的努力，农村开始见效了。工业的改变比农业稍慢一点。

5月20日 上午，会见德拉戈斯拉夫·马尔科维奇^{〔1〕}率领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将它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政策，同样也要尊重别的国家、别的党的实际。对别的党指手画脚肯定要犯错误。我们不可能比铁托同志

〔1〕 德拉戈斯拉夫·马尔科维奇，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

更了解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同样，中国人民最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通过总结经验更明确地认识了这一点，我们用这条原则来发展同各国兄弟党的关系，同样用这一原则来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在谈到中国“左”的失误时指出：一九五七年夏，毛主席发表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不幸的是在那中间开始“左”。反右是对的，但是扩大化了，犯了错误。更重要的是，从反右运动开始就出现了“左”的思潮。反右以后，“左”的思想扎下了根，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还有两年的徘徊。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才明确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大字。在谈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时指出：关起门来无法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要靠发展生产力。贫穷、生产力落后，有什么优越性？要发展主要靠自力更生，实行开放政策能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补充。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为人类文明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为什么后来落后了？就是闭关自守。火药是中国发明的，可是在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就是用炮舰、火炮把我们打垮的。建国以后，虽然也有一段时期发展是好的，但是，使我们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也正是闭关自守。要总结这个经验教训。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时指出：这不容易。我们这次人大提出要解决城市中的改革问题。我们在农村已经做了，收效较大。城市难些，要下大决心。城市不仅有工业问题，还有商业问题。改革很复杂，肯定会受到抵制，但不改革不行。我们不仅对外要开放，对内也有个开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什么时候才能肯定这个方针是正确还是错误的？看来要到本世纪末。大概五年会得出初步结论，初步看出成绩也要五年。现在西方反映，国

内人民也是这样，就怕我们的政策改变。他们特别说我已经八十岁了，一旦我不在，政策就会变。我对他们说，改不改变不决定于我这个人存在不在，而取决于事情办得对不对。如果这样的政策导致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谁要改变也不行。

5月21日 上午，听取胡耀邦关于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的情况介绍。赵紫阳、陈云、万里、杨尚昆参加。

△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和夫人秦惠箬，就发展科学、培养人才问题交换意见。在李政道谈到中国要快点确定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建设时，指出：要解决具体问题，不要拖，拖是最大的官僚主义，财政拨款找万里。对李政道提出的在中国国内培养博士后和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议〔2〕，表示赞成，指出：博士后，对我来说是新事物、新名词，我第一次听到。在询问国外对于博士后培养的情况后说：成千上万的人回来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十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动站，要成为制度。主要是先定点，定了点后拨款，盖房子，买些必要的设备。看准了要行动。以后各行都可以参照这个办法，是使用培养，也是考核。现在已出现回来的人不知怎么用的问题，专

〔1〕 1984年5月4日至11日，胡耀邦访问朝鲜。

〔2〕 李政道向邓小平建议，为了给中国在海外的科研人员回国后的工作创造一个有利条件，可先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做试点。如果有几百个流动站、几千个站员，可以使全国年轻的科技人员流动起来。198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博士后制度。

业不对口，零零星星已有这个反映。会见结束后，设午宴招待李政道夫妇。

5月23日 上午，会见斯里兰卡总统朱尼厄斯·理查德·贾亚瓦德纳。指出：你们在国内采取了好的政策，发展很快。我们同你们想到一块了，我们建了四个经济特区，像你们的自由贸易区一样很见效。我们好起来是最近五年的事。“文化大革命”带来灾难。粉碎“四人帮”之后还有两年的徘徊，就是继续执行“左”的政策。真正的变化是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对内以农业带头把经济搞活，实际上也是开放政策。近五年经济增长比较快，大体上平均年增长百分之七到八。总之，闭关自守解决不了我们的贫穷和落后。我们制定一个战略目标，是在本世纪末成为小康社会，人均八百美元。在那个基础上，再搞三十至五十年可以接近西方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争取和平，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我再加一句话，就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是发展起来之后，也是属于第三世界。那时也不会丢掉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发展起来之后更有条件同穷朋友合作，共同发展。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同美国人的事不大好办。美国有“三个政府”，一个政府叫总统，法院是另一个政府，议会也是个政府，打交道可麻烦了。从一九七二年起，我们同美国的关系逐步开始发展，尽管有曲折，总的还是发展了。有发展并不意味着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不反对，不批评。我们多次批评美国“四个航空母舰”政策。台湾问题是中美间最大的疙瘩，可能今后还是这个问题。如果处理

不好，带来某种冲突都可能。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差不多中断了十多年，但我们还是要同它改善和发展关系。中苏之间的贸易近年有发展，今后还会有发展。其他方面，如文化、体育交流都会有增加。尽管如此，两国关系正常化还是要消除三大障碍。

5月25日 上午，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针对本月二日香港《明报》报道中央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一九九七年后中国不会在香港驻军一事，指出：趁这个机会，我要对记者们说几句话。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讲话，不是中央的意见。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外相也说，希望不要驻军，但承认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在记者们退场后，又指出：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国政府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请代表和委员们充分相信，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5月28日 上午，会见包玉刚，对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同大陆方面的合作表示赞赏。指出：这种合作很好，要继续下去，还可以扩大。

5月29日 上午，会见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

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但这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在谈到中国对外政策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美元。这是雄心壮志。它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到那个时候，中国就会对人类有大一点的贡献。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日子就会比较好过。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我们很注意学习你们的经验，也注意你们的教训。你们的经验就是我们所说的开放政策，发展速度快。不到十年时间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不容易。你们的教训是债务太多。据说你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能力，我们很高兴。我们接受你们发展快的经验，但也避免债务过多的教训。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

5月30日 上午，会见维利·勃兰特^{〔1〕}率领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会见后，设午宴招待勃兰特一行。

5月 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就浙江代表提出的建设金华至温州铁路的建议作出批示：“金温铁路要列入议事日程。”

6月9日 《人民日报》报道，为纪念廖承志逝世一周年，画册《廖承志的一生》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此前，邓小平题写书名。

6月13日 上午，会见圭亚那总统林登·伯纳姆。在介绍中国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情况时说：中国真正变化比较大的是这五年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的方针，确定了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政治生活安定团结，经济方面稳步发展。看来这个势头可以保持下去，我们的目标可以实现。以本世纪末为起点，我们再好好干三十至五十年，中国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谈到中国的经验时说：制定政策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违背这一原则就会受到挫折。这一点，我们历史上也有过教训。你们的条件同我们不一样，重点向什么方向发展，只有你们自己才清楚。

6月16日 上午，在住地同秦基伟谈话。

〔1〕 维利·勃兰特，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6月17日 阅严济慈〔1〕本月十五日关于不同意中国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贮存核废料的信，批送赵紫阳、万里、姚依林：“此事反映十分强烈，应加慎重考虑。”信中说：核废料运来我国，即使把它埋到人烟稀少的西南地区，也将是后患无穷的。此事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有关方面切不可图近利而不虑埋下的长期隐患，轻率从事。

6月18日 上午，前往中南海怀仁堂设立的投票站，投票选举北京市西城区第八届人民代表。这是一九八二年新宪法公布后的第一次基层选举。

6月19日 阅薄一波本月十七日的来信，作出批示：“科委与经委合并之议不可取。”

6月21日 上午，会见缅甸副总理兼计划、财政部部长吴吞丁。指出：我们讲的中国最大的变化还是国内政策。国内政策的立足点就是搞社会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发展比较快的制度。建国后，如果说我们有错误，最大的一条就是不重视发展生产，所以我们国家落后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上虽有地位，但经济还不发达，这同十亿人口的国家不相称，也同我们在国际上应该承担的责任不相称。所以，我们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方针政策，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设。用我们的话，叫四个现代化建设。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不受任何干扰。除非天下大乱，打世界大战，

〔1〕 严济慈，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

那没有办法。即使发生世界战争，打完仗后还是要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搞建设总的来说，是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时间闭关自守，没有很好发展。制定这个政策后，这五年来开始见效。首先在农村，农村政策一搞活，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生活有相当大程度的改善。世界上有人在议论中国稳定不稳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中国的农村。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稳定了，发展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活有比较显著的改善了，中国就稳定了。我们中国现在存在着干部老化问题，是个很大的弱点，所以我们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也叫干部“四化”。这件事不做不行，否则目标是空话。不论怎样难，一定要坚定不移朝这方面走。

6月22日、23日 两天上午，先后会见以唐翔千^{〔1〕}、唐骥千^{〔2〕}、倪少杰^{〔3〕}为首的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4〕}、邓莲如^{〔5〕}、利国伟^{〔6〕}等。在二十二日的谈话中，介绍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有关情况，并就香港人关心的十三年过渡期的经济繁荣问题发表意见。指出：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过去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误解，认为越穷越是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应该在发展

〔1〕 唐翔千，当时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

〔2〕 唐骥千，当时任香港总商会主席。

〔3〕 倪少杰，当时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

〔4〕 钟士元，当时任香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

〔5〕 邓莲如，当时任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

〔6〕 利国伟，当时任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香港恒生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生产力方面优于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发展生产力是基础。我们如果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建国后不搞社会主义的话，就没有今天。我们为什么敢于提“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因为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路子走对了，人民赞成，变不了。在二十三日的谈话中指出：中英谈判没有“三脚凳”〔1〕，只有两脚。过渡时期还有十三年的稳定问题，这不决定于北京，我们的担心不比你们小。我们为什么主张成立一个中英联合小组，就是为了十三年过渡期的稳定，而且这个机构要设在香港。我毫不怀疑会有波动，问题是大小，希望不出现大的波动，小的肯定会有。成立联合小组就是为了随时解决问题，以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创造好条件，到了一九九七年能顺利地接管政权。不在十三年里做好准备，一朝变动，就会出现大的波折。在这两次谈话中，阐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指出：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

〔1〕 英国政府要求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时，还应有所谓的“香港民意代表”以第三方的身份参加，以加强其在谈判中的地位。中国政府坚持这是中英两个主权国家间的谈判，绝不允许第三方参加。以后，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被英国政府接受。

主义制度。这个政策不会变。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线索。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在谈到港人治港问题时说：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够干得好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了，是会完全有信心的。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在谈到过渡时期的问题时指出：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这两次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6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签署中央军委命令，给成功研制中国第一台“银河”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计算机研究所记集体一等奖。

6月28日 上午，在住地同胡启立谈话。

6月30日 上午，会见前来参加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的日本委员会代表伊东正义〔1〕、冈田春夫〔2〕、向坊隆〔3〕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谈到中日民间往来问题时说：中日友好合作不仅对当前有着重大意义，而且将影响两国的未来，影响千秋万代。中日建交前的二十多年，中日关系是在两国民间开展起来的。如果只有两国政府间的合作，而没有民间交往，两国关系是不可能有着扎实基础的。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构想。指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

〔1〕 伊东正义，当时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

〔2〕 冈田春夫，日本社会党人。当时任众议员。

〔3〕 向坊隆，物理学家。当时任日本原子能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日中协会副会长。

变。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我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在谈到改革开放问题时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现在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

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内容，最早在一九八四年《瞭望》周刊第三十四期上发表，题为《邓小平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7月1日 四川省巴中县举行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开馆仪式和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此前，邓小平题写馆名。

7月3日 共青团中央主办的《农村青年》创刊号出版。此前，邓小平题写刊名。

7月11日 前往叶剑英住地看望叶剑英。

7月12日 会见并宴请柬埔寨客人。在宴请时指出：到本世纪末，我们翻两番的任务能够完成。目前突出的问题是能源和交通。中国农业潜力大，现在肥料不足，要解决肥料和种子问题，总之，农业是很有希望的。农民不能只靠种粮食，要多种经营，农工商结合，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做。

△ 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北戴河。

7月27日 就香港问题同姬鹏飞〔1〕、吴学谦、周南〔2〕谈话。指出：要把基本法制定的时间提前，不迟于一九九〇年，最好更早一点，不要等到一九九三年才公布。这不但有利于稳定香港局势，而且有利于中方参与，因为英方说过，基本法公布后中英将加强非常密切的合作。

7月30日 审阅外交部关于黄华〔3〕是否可参加“相互行动委员会”〔4〕的请示信，作出批示：“同意黄华同志参加。”

△ 深夜，乘专列离开北戴河，次日晨回到北京。

7月31日 上午，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指出：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十三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一九九七年后的事情。在过渡时期，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

〔1〕 姬鹏飞，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

〔2〕 周南，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首席代表。

〔3〕 黄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4〕 “相互行动委员会”，由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联合国前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等发起成立的一个非官方的政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团体。它的宗旨是，约集亚非拉和发展中国家一些有政治影响的前政府首脑，不定期开会，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调整南北关系、搞活世界经济等重要问题。

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还指出：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今后中英两国要更好地合作。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

△ 晚，乘专列去北戴河。

8月1日 和谷牧会见包玉刚。指出：要加快宁波改革开放的步伐，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派卢绪章〔1〕去宁波，帮助搞好宁波的对外开放工作。并指示：宁波的民航机场问题要解决。

△ 八路军总部旧址——山西省武乡县砖壁、王家峪，经过全面整修，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七周年时重新开放。此前，邓小平为左权〔2〕旧居题写“怀念左权同志”。

〔1〕 卢绪章，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

〔2〕 左权，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红1军团代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在战斗中牺牲。

8月6日 向周建人〔1〕遗体告别仪式送花圈。

8月15日 阅《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情况简报》刊登的《海峡两岸加速器讨论会明年十月在美举行》一文，批送赵紫阳、姚依林、方毅：“我们的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请加以检查和督促。”

△ 同意将自己一九四二年发表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的《庆祝刘伯承同志寿辰》一文，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刘伯承回忆录》（第二集）。

8月16日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在谈到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时指出：台湾在和我们竞赛。要快一点。比台湾还慢不行，速度要加快。在赶速度方面我们有些办法。会见结束后，设午宴招待客人。在宴请时说：从现在情况看，本世纪末翻两番肯定可以实现，到那时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一万亿美元，我们就不会那么小里小气了，有百分之一用在科学、教育上就是了不起的数字，那时造加速器就可以大一点了。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香港问题解决后对台湾的压力会很大。我们提“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他们怕得很，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反对。说我们搞统战手法，没有什么手法，都摆到桌面上来了嘛。在谈到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时指出：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几个大学都应办少年班，不知办了没有。至少北大、清华、交大、复旦应办一点少年班。同时，对丁肇中提出的想

〔1〕 周建人，1984年7月29日逝世，终年96岁。逝世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

让他的父亲、台湾大学教授丁观海回大陆参加国庆活动一事，表示欢迎，并指示中国科学院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

8月17日 向李维汉〔1〕遗体告别仪式送花圈。通过治丧办公室转达对李维汉逝世的沉痛哀悼，对李维汉夫人吴景之及其亲属表示慰问。

8月24日 乘专列离开北戴河回到北京。

8月25日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和夫人郑士宁。在谈话中希望海外科学家对中国教育工作多提批评意见。指出：我们在教学上“满堂灌”的现象还存在，要多多鼓励学生自己发展。我们准备在这方面搞些改革，但不很容易，要慢慢来。要用好出国留学人员，我们正在考虑如何充分使用这批人。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发展，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看来可以实现。实现了翻两番，人民生活就可以大大改善，教育科学事业也好办了。只要拨出国民经济预算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就相当可观了。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指出：香港问题的解决，不仅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有积极的影响，它还将有广泛的国际意义。世界上有许多“热点”，即发生冲突和可能引起战争的地区，都存在这个问题，能否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加以解决，我看可以嘛。这些问题的解决用武力是行不通的。世界上有些有争议的领土，能否采取由争议双方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所谓共同开发，就是避开主权问题，所得利益平均分

〔1〕 李维汉，1984年8月11日逝世，终年88岁。逝世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配。会见后，设午宴招待陈省身和夫人。

8月29日 阅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的来函，就他们整理《邓小平同志在广西》专题资料中碰到的问题，作出书面答复：“一、我是中央的代表，任务是做上层统战工作和领导广西全盘工作，七月到南宁。二、我在广西时，广西特委（不是省委）没有设立军委。三、一九二九年底中央电令我回上海报告工作，途经香港住了两三天，那个报告〔1〕，谈了左江的发动，从内容看，可以确定是我作的。”

△ 将美籍华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副校长田长霖教授对中国高等教育学制建议的来信，批转赵紫阳酌处。

△ 《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前不久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据我了解，科技大学办得较好，年轻人才较多，应予扶持。”

8月31日 为清华大学纪念吴晗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而修建的纪念亭，题写“晗亭”；为四川省广安县凉滩电站题写站名；为《经济日报》题写报名；为西柏坡纪念馆题写馆名。

8月 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题词：“勇于创新，多作贡献”；为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题词：“红军烈士永垂不朽”；为遵义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题名。

〔1〕 指《关于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的补充报告。原文刊载于1930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编辑的《军事通讯》第2期。

9月1日 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主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9月5日 就中国人民大学一教师反映盛成〔1〕待遇问题，致信胡启立：“请你批示一下，请教育部应抓紧解决。”六日，胡启立批示：“东昌同志：请查明情况，征求学校党委意见，妥善解决。”二十九日，何东昌致信胡启立：盛成的职称及待遇问题，已将情况查明。他的待遇确实有些偏低，我们正会同有关部门以求尽快解决。

9月6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

9月8日 上午，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弗朗切斯科·科西加。指出：我们正在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一个台湾问题，一个香港问题。香港要回归祖国，中国正在同英国谈判，可以达成协议。在谈到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途径时指出：现在世界上有好多潜在的爆发点，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两国之间的主权争端问题。如果不根据新的问题采取新的方法，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有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与日本有钓鱼岛问题，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有南沙群岛问题。世界地图上，南沙群岛历来被划为中国领土。解决这些问题，一种办法是中国按照历史，收回这些领土。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是否可以避开主权，采取与南沙群岛有关的国家搞共

〔1〕 盛成，原台湾大学教授。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78年10月经美国回大陆定居，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

同开发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新的办法。世界上还有其他问题，比如英阿马岛问题〔1〕，现在并没有解决，联合国议程上还有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多得很。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爆发点，解决的方式，或是战争，或是其他办法。和平谈判，就要双方相互让步。香港、台湾问题，从中国内部来讲，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想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共同开发解决争端的办法，都是为了和平而不用战争方式，都叫和平共处。

9月上旬 阅赵紫阳本月九日关于计划体制、价格改革、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三个问题，写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的征求意见信。

9月19日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吴健雄教授和袁家骝教授。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说：现在的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好，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看来是有把握的。农村的形势很好，现在决定在城市进行改革，如果改革成功，国家的情况会更好。

△ 为《经济参考》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

〔1〕 马岛，指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1982年4月至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就该岛的归属问题在该岛发生战争。

9月23日 《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文选》英文版已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9月24日 审阅胡乔木起草的邓小平在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上的讲话稿,作出批示:“我看可以,两点照耀邦同志的意思改。”后再次审阅修改后的讲话稿,作出批示:“照此定稿。”

9月27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指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国家更加注意独立自主。九年前,我们见面时我就说过,我们历来希望欧洲国家独立自主,有自己的独立性。会见后,设午宴招待施密特。

△ 阅王首道〔1〕转来的全国政协委员秦德君的来信,作出批示:“请中组部处理。她的情形,我不清楚,也许邓大姐〔2〕知道一些。她讲的冯玉祥一段是确实的。”

9月28日 晚,同赵紫阳、李先念等在中国剧院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

9月30日 将李政道等海外华人对西方国家报刊文章说中国将要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达成协议,接受其核废料一事表示关注和忧虑的来信,批送赵紫阳斟酌处理。

10月1日 上午,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

〔1〕 王首道,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2〕 邓大姐,指邓颖超。

周年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在阅兵总指挥秦基伟陪同下检阅部队。检阅后在天安门城楼发表讲话，指出：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讲话还重申了我国的对外政策和统一祖国的决心。在随后开始的群众游行中，一些大学生自发打出“小平您好”横幅。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

△ 晚，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乌兰夫等在天安门城楼参加首都群众国庆联欢晚会。

10月2日 上午，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等六十多位外籍华人科学家。指出：好多年没有举行庆祝仪式了。举行庆祝仪式有点作用，就是教育人民，是一种鼓舞的作用。可以说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五年来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实际政策的一种检阅，对人民解放军的检阅也是一部分，开拓新的局面，鼓舞士气。今天同你们见面，是对你们付出的知识和劳动表示感谢。为开拓新的局面，也希望你们

今后付出更多的知识和劳动来帮助我们。我在昨天讲话中特别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在一些老干部思想中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所以要专门讲。这个问题很迫切。不久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我相信在将来的历史上会表明它的重要性。会议的主题是城市改革。如果说开拓新局面是从农业开始，这次则是全面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范围很广。改革是很迫切的。因为农村政策见效，农民好起来了，如果城市不进行改革，就会妨碍农村继续前进，城市也满足不了占我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需要。城市改革要有更大的勇气。农村改革说明，城市改革不但必要，而且相信会成功。这就可以保证我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指出：“一国两制”，马克思没说过，世界历史上没有过。这是我们从实际遇到的问题即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大陆十亿人口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允许部分地区实行特殊政策，继续搞资本主义。这个政策不会变。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尽管一九四九年到“文化大革命”中间犯了一些错误，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但不管怎么样，中国人在世界上不再是二等公民了。中国人有十亿在大陆这边。台湾有些人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太不可能，太不现实，也太不谦虚了。

△ 上午，会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宋双和乔森潘。

△ 下午，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彭真、邓颖

超、乌兰夫等，接见参加国庆观礼的少数民族、全国劳动模范、解放军代表团全体成员，以及参加国庆活动的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部分离休老同志和农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10月3日 上午，会见由二百人组成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指出：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这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在今后十三年和十三年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大家共同努力，这个目标肯定可以实现。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我还讲过十三年的过渡时期参与的问题，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参与

不是北京方面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为了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希望香港同胞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一九九七政权顺利移交作出贡献。在谈到澳门问题时指出：澳门问题的解决，想用香港的方式，我们以前不讲，是不要因为澳门问题影响了其他。澳门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 阅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提出的解决大陆、台湾的物理学会共同加入国际物理学会的建设的来信，同意按李政道的意见办，并批转方毅处理。五日，周光召^{〔1〕}和李政道在北京签署备忘录，解决了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台北物理学会共同加入国际物理学会的问题。

〔1〕 周光召，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10月4日 阅胡启立、田纪云^{〔1〕}报送的《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意见》，批送赵紫阳：“总的方针，我很赞成，具体办法，提不出意见，请国务院审定。”

△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和他的父亲丁观海教授。对丁观海说，你离开大陆三十五年了，回来看看好，百闻不如一见。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的家乡日照，发展得不错，整个山东都不错。这几年农村搞得好的，按省的范围讲，第一是江苏，第二是山东。考先生如果愿意回来定居，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觉得方便，没有什么问题。会见结束后，设午宴招待客人。在午宴中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说：“一国两制”对台湾更宽一点，他们还可以有军队。在经济、文化、民间交流等问题上也和香港一样。我们不用社会主义统一台湾，台湾也不要三民主义统一大陆。在丁肇中提出希望能在台湾见到邓小平时，说：好啊，我很愿意。

△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黄翠芬“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

10月5日 晚，由王兆国^{〔2〕}、李锡铭^{〔3〕}等陪同，视察北京地下铁道第二期工程 and 三元立交桥。

〔1〕 田纪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2〕 王兆国，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李锡铭，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 签署中央军委嘉奖令，表彰参加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受检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指战员和民兵。嘉奖令指出：这次阅兵，深刻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军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展示了我军武器装备已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生动表现了人民军队优良的军政素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10月6日 会见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时说：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等等。澳门收回后，赌业可以继续下去。

△ 上午，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要有一系列正确的对内对外的方针和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了城市改革的试验。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差错，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

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相信，城市改革也会成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写上很重要的一笔。在谈到开放问题时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现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很小。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翻两番，对外贸易额就会增加许多，中国同外国的经济关系就发展起来了，市场也发展了。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

10月7日 上午，在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典礼前，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对李政道在工程论证过程中付出的艰巨劳动表示感谢。又参观工程模型，听取关于对撞机性能和用途的汇报。在听到工程将于一九八八年竣工时说：祝工程如期完工。随后，参观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质子加速器。

△ 上午，出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典礼，

在电子对撞机工地为基石培上第一锹土。基石上镌刻着邓小平书写的铭文：“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随后，在工地现场接见中美双方参加中美高能物理第五次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全体成员、中国科学院的一些专家和参加这项工程的各有关单位代表，并合影留念。

10月8日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第七稿的电话意见：文件看过了，写得很好，政治局会议我就不参加了。

10月10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谈到拨乱反正问题时说：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在谈到改革将从农村转到城市时指出：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在谈到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时指出：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说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的力量合作。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10月11日 上午，会见竹入义胜〔1〕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在谈到中国国庆阅兵时说：这次阅兵也反映出—个弱点，一个八十岁的人检阅队伍，这本身就是一个缺陷。毕竟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好在现在管事情的人比我年轻。我们的方针是要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党政军领导骨干的逐步年轻化始终是我们—个重要的任务。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我们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要消除三大障碍，即使—时不能解决，在其他的领域，包括经济、文化等领域也可以加强和发展我们之间的交往。消除三大障碍，哪怕是先解决—个，阿富汗问题或者柬埔寨问题，也是好事，我们欢迎。如果有实际行动，哪怕是一种，就表明苏联的领导人对人类、对和平有了—种好的贡献。我们期待有这么—天。在谈到中国与东欧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时指出：现在做了不少事情，东欧各国的情况不同，就发展和改善关系方面，有的做得快—点，有的做得慢—点。我们相信这种关系是会发展的，因为双方都需要。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中美之间存在的障碍主要是台湾问题。这个障碍不消除，美国同十亿中国人民的疙瘩就解不开，而且是个爆发点，不晓得哪—天要爆发，到那时十亿中国人不能不表示严正态度。我们没有放弃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没有作这个承诺，美国多次要求我们，我们没有答应。在谈到中国对外开放问题时指出：我们从现在到本世纪末的十六年要—心—意搞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同国际上进行交往，实现到本世纪末的目标。我们更需要下一个五十年继续坚持这个方针，实现更伟大的目标。我们为什么讲出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的话呢？这是因为中国到下一个世纪还需要五十

〔1〕 竹入义胜，当时任日本公明党委员长。

年的发展。既然中国要发展，就不能闭关自守。所以，对外开放政策不但本世纪不变，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也不会变。前几天，在北京开了一个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我见他们时讲了这个道理。我讲，下一个世纪的前五十年不会变，下一个世纪的后五十年会不会变？我看更不会变，更不容易变了。因为这七十年我们同国际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能变吗？这不能变。而且还有一个因素不怕变，就是我们的对外方针是服务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国是社会主义，要坚持这个道路，发展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吸收外资、合资经营等都不可能伤害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会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中国发展三十年、五十年到七十年，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强大了，就更不怕对外开放的冲击了，不会影响我们的大局了。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指出：有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香港基本法就容易产生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种构想来解决香港问题，这是一个新事物。就中国自己来说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我们也是根据这样的思想来解决台湾问题的。

10月12日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成立。此前，邓小平题写校名。

10月15日 为本月八日在北京成立的中国第一支南极考

〔1〕 1984年9月26日，中国和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草签。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

察队首次考察南极〔1〕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10月1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工委为中国原子弹首次试验成功二十周年举行纪念活动。邓小平为纪念活动签名。

10月20日 上午，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发言，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但是要到五年之后才能够讲这个话，证明它正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10月2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并讲话。指出：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在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指出：“一国

〔1〕 1984年12月下旬至1985年2月，中国南极考察队在南极半岛地区建立中国第一个科学考察站——长城站。

“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香港问题能够谈成，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有力量、值得信任的国家。当然，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在谈到国内建设问题时指出：翻两番的目标肯定能实现。它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

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公有。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雇工问题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1〕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在谈到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个文件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讲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

〔1〕 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

卷，题为《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0月23日 上午，会见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实际上也是“一国两制”，而且对台湾的条件更宽，即允许台湾有自己的军队。“一国两制”的方案就是谁也不吃掉谁，两不吃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坚持和平方式，而且有耐心，但我们从来没有承诺过不采取非和平方式，因为我们一旦承诺，和平统一就不可能。台湾的那些老人，想的太近，姿态太低。香港问题的解决会使更多的台湾人想一想。美国有些当权的人不愿放弃杜勒斯的的东西，把台湾看成是“航空母舰”，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日本也有少数人，但那是个别人，起不了多大作用。在谈到朝鲜问题时指出：朝鲜北方提出的联邦方案，实际上也是“一国两制”，是合情合理的。为了使之实现，朝鲜提出了三方会谈，中日两国应从侧面推动三方会谈。朝鲜实现统一，对亚太地区，对世界都有好处，消除了一个爆发点。“一国两制”可能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行方案。

△ 上午，会见突尼斯总理穆罕默德·姆扎利^{〔1〕}。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但当时主要是对着发达国家的，近三年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南南合作，即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当前世界面临的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发达国家的前进也会遇到障碍。发达国家的市场在哪里？发达国家的人口大体上不超过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地方还处于

〔1〕 穆罕默德·姆扎利，当时还任突尼斯社会主义宪政党总书记。

贫困状态，那就没有市场了。南北问题提出很久了，至今看不到解决的迹象，发达国家有钱但不慷慨。南南合作事业的发展可能会推动南北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在谈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时说：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的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在谈到中东问题时说：要解决以色列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关键是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一旦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了，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

10月26日 上午，会见马尔代夫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指出：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发现不对就赶快改。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10月31日 上午，会见缅甸总统、缅甸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山友。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

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在谈到中国对外开放问题时指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些人理解只是对发达国家开放，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开放，共三个大方面。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

△ 为《农民日报》题写报名。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中国农民报》改名为《农民日报》出版。

10月 为防治地方病工作题词：“防治地方病，为人民造福”。为纪念陈嘉庚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编辑出版的画册《陈嘉庚》题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

11月1日 上午，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并讲话。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

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现在军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做得不错，有成绩，这个很好。还强调：要解决我们高层的老化问题，不要把这个矛盾留给后来人。提拔干部，过去我们讲台阶，按部就班地搞，现在要修正一下，要破点格。凡是看准了的人，要大胆地提升上来，把他们放到重要的或者更重要的岗位。在讲到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国的对外政策时，指出：我们现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是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因为中国这个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我们说十年打不起来，包括我们这个对外政策的作用。最好的是我们现行的政策，这个最有分量，最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形势的稳定。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不消肿就不能应对战争。大家都很赞成减到三百万这个方案。减到三百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我希望用两年、三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决策。在讲到改革开放问题时指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军队要服从整个

国家建设大局》。

11月6日 上午，在住地同李先念谈话。

11月7日 上午，会见美国使节基金会主席赫伯特·阿姆斯特朗一行。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小仗一直在打，但无关大局。和平因素不断增长，和平是有希望的。在谈到中国国内建设时指出：我们从一九四九年建国至今有三十五年了。这三十五年内，我们为中国人民做了不少事情。但中间也有波折，最大的波折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波折使中国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所以我们还处于落后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主要是最近五年，我们进行了拨乱反正，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政治上强调民主和法制；经济上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实行把经济搞活的政策。在谈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时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虽然还很低，但日子好过。在此基础上，再花三十年至五十年的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设。我国人民对这个目标充满信心。问题是我们国家大，人多，办事情不是很容易的。我们现在一要大胆，二要兢兢业业。

△ 上午，会见布基纳法索全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托马·桑卡拉^{〔1〕}。指出：最近五年来，我国情况发生了有利的变化，但是要摆脱贫困还需要时间。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大就是地方大，人口多；小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很低。我国大而贫

〔1〕 托马·桑卡拉，当时还任布基纳法索总统、政府首脑。

穷，还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或者称发展中国家。对内设法摆脱贫困，对外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我们工作的总纲领。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个国家关起门来固然搞不好建设，但对外开放政策也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根据自身条件，制定独立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困境。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只要政策对头，而且以自力更生为基础，振兴经济就大有希望。一个民族既然站起来了，就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

11月9日 上午，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成员、书记处书记贾恩卡洛·巴叶塔。指出：自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五年内，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措施，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二是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这两件事上，我们是胆大的，但不是妄为的。提出“一国两制”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即香港和台湾问题。这是从我国的实际需要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这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它是不是正确？归根到底是看生产力能不能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得到提高。只要这条得到证实，谁也不能说我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胡思乱想。为什么现在我们党通过了这一决定？近几年来，我们在农村进行了改革，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但这不是要搞平均主义。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目前，有的雇工达二十人，有些同志就着急了。我说，不要着急，这只是个别现象，不必改变现行的政策，过几年再

说。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不少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物价问题。我们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市场上曾出现抢购物品的现象。这不怕，我们早就意识到这一点。由于前几年搞得不好，物资丰富，所以我们不怕。现在抢购情况已经少了。在改革过程中还会出现其他问题。我们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干，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就总结一步的经验，不妥当的就改。这样做就不会出大问题，犯大错误。至于小问题、小错误，那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经济改革是会成功的。会见结束后，将自己亲笔签名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选》送给巴叶塔，并设宴招待巴叶塔一行。

11月10日 四川省诗书画院在成都成立。此前，邓小平题写院名。

11月17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举行座谈会，纪念邓宝珊〔1〕诞辰九十周年。此前，邓小平为《邓宝珊将军》史料专辑题写书名。

11月20日 上午，会见挪威首相科勒·维洛克。指出：我们五年前确定改革从农村开始。我们叫改革，实际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我们在三十五年前搞了土地革命，那也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这次改革实际上是那次革命的继续，也可以说是继续和发展。农村改革，我们搞联产

〔1〕 邓宝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为北平和缓远的和平解放做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甘肃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68年11月逝世。

责任制，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使农民有积极性搞多种经营。这个决定一下去，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见效非常快。因为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有的农村一年翻了身，有的两年翻身，摆脱了贫困状态。我们制定了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翻两番在城市说来是不困难的，但对占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农村来说就是很大一个问题了。这就是我们决定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根据，果然，三年就见效。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使我们对进行全面改革增加了信心，也给我们进行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对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我们意识到，城市改革的问题要比农村复杂得多，而且搞不好容易出乱子。我们要在改革中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总结一步经验。走的当中发现某一点有问题，不对，我们就改，不是方针政策改，而是在具体措施方面协调一下。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在大胆的行动中要采取谨慎步伐。在介绍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后指出：我们在今后十几年，再加五十年，一共六十年的时间里都要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国内条件是全国上下十亿人口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干扰；国际条件是要求有一个和平环境。就这两个条件。我说过，即使发生了战争，战争过后我们还要搞这件事。

△ 《人民日报》报道，在吉鸿昌^{〔1〕}牺牲五十周年前夕，天津吉鸿昌故居整修一新。此前，邓小平为故居题字。二十六

〔1〕 吉鸿昌，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挥。1934年11月被国民党杀害。

日,《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为《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题写书名。

11月21日 中国科学技术馆在北京破土动工。此前,邓小平题字:“中国科学技术馆奠基”。

11月26日 上午,和胡耀邦、陈云、彭真会见前来中国进行内部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就进一步发展两党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中午,同金日成共进午餐。二十八日上午,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与金日成话别。

12月6日 《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由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并向世界各国发行。这本书是作为该公司组织编辑的世界领袖丛书出版的。文集收入作者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八四年二十多年间的九篇论著。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该书出版第二版,增收了三篇文章和九幅照片。

12月10日 同意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委员会《关于改革大军区体制的设想》的报告。

12月13日 上午,会见苏丹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1〕。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经济改革和干部年轻化是我国目前具有战略意义的两件大事。国际上好多人认为中国的现行政策是可取的。但也还有另外的议论,说我们这些人

〔1〕 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当时还任苏丹社会主义联盟主席。

不在了，特别是讲我，中国的政策就要变。如果以某一个人存在与否来判断中国政策是否会变，那就很危险了。逐步更换更年轻的人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来，这是一个战略决策。在谈到中国的发展变化时说：近六年来，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见效了，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原来的预计。但现在的变化还不大，到本世纪末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后，就会发生比较显著的变化。中国要到下一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或五十年代，才能发生大的变化。到那时，中国将会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大问题，就是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东西问题也就是和平问题。和平有利于世界人民，特别有利于第三世界。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连在一起的，所以中国对外政策第一条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最希望和平，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希望打仗。当前国际形势是，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总的说来，和平力量在发展。南北问题对第三世界国家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南方国家首先要摆脱贫困。发达国家要持续发展，也面临着南北问题，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南方国家不发展起来，发达国家就难找到市场。南南合作很重要，进行南南合作的条件是存在的。南南合作可以推动南北合作。

12月14日 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编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的送审报告，作出批示：“同意”。十五日上午，将送审的文稿全部看完退中央文献研究室。

12月19日 下午，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并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同撒切

尔夫人谈话时指出：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如果说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在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谈到对国际局势的看法时指出：我们总的看法，战争的危險始终存在。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險，现在有了些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和平的力量发展壮大，不仅是第三

世界，而且东欧、西欧都反对战争。关于中苏关系，我们非常赞成打破僵局，增加接触，我们也在努力增加接触。僵持总不是办法。会见结束后，请撒切尔夫人在过几天见到美国总统里根时介绍一下中英两国合作解决香港问题的情况，并祝贺里根先生连任总统。还说：里根总统认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是可取的话，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特别是里根总统本人。签字仪式结束后，再次对香港记者表示，如果一九九七年身体还行，一定会去香港看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是信守诺言的》。

12月20日 上午，会见包玉刚。对包玉刚提出的宁波北仑港的建设和筹办宁波大学等表示支持。在谈到香港基本法起草问题时指出：制定基本法要征求香港人的意见，但制定的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有关主权的问题。基本法是搞得简要些，还是搞得详细些，既然是法律，搞那么烦琐干什么？联合声明是国际上都承认的，有法律效力，联合声明已经规定很详细了，有了它，基本法就可以搞得简要一些。现在香港人老要求基本法订得细一些，越细越好。搞得越细，将来就非变不行。他们不是怕变吗？搞得那么细，规定得那么死，情况发生变化后，哪能不变？香港人担心的问题，联合声明中差不多都有规定，还有什么需要更详细的规定呢？目前香港的问题，第一，十三年中不出现乱子，做到繁荣稳定。第二，顺利过渡到一九九七年港人治港。要找些人出来，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出来。不仅是人，还有金融方面的事，到一九九七年还只是汇丰、渣打发票子吗？汇丰、渣打可以参与，但不能只是他们发，在香港的中国人的银行可以参加。票子什么时候换？总不能等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才换吧。所以要创造条件。其他

方面的事，都要创造条件。港人治港有个前提，港人必须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一爱祖国，二爱香港。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中美之间的问题还是一个台湾问题。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消除了中英之间的阴影。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如果用于台湾，将对大家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谈话中还接受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的请求。谈话结束后，设午宴招待包玉刚一家。

12月21日 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召开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具体方案，让秘书回复：请耀邦同志主持。

12月27日 上午，在住地同彭真谈话。

12月28日 阅韩先楚^{〔1〕}关于转送安徽省芜湖县一群众手抄的《邓小平文选》的来信，作出批示：“存中办。由中办复信致谢和勉励。”

12月30日 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送审稿，作出批示：“我看十条都好。”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十项政策是：（一）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二）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三）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四）积极兴办交通事业；（五）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六）鼓励技术

〔1〕 韩先楚，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转移和人才流动；（七）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益；（八）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九）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这十项政策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出。

本年 题写《国际商报》、《马叙伦^{〔1〕}政论文选》、《淮海战役史》、《傅作义^{〔2〕}生平》、“中国革命博物馆”、“周恩来同志故居”、“古柏^{〔3〕}烈士纪念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1〕 马叙伦，教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70年5月逝世。

〔2〕 傅作义，曾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1949年1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后又帮助董其武举行起义，实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水利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74年4月逝世。

〔3〕 古柏，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红4军前委秘书长、中央劳动部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1933年受到“左”倾临时中央的打击，并被撤销职务。1935年3月牺牲。

1985年 八十一岁

1月1日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出版。该书是继《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之后，将邓小平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之间的讲话和谈话编辑而成的，共二十二篇。这本书反映了邓小平在这两年多时间内，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不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和阐述的一系列思想和主张。一月十五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的中文繁体字版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

△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参加桥牌比赛。

1月2日 晚，在住地同胡耀邦谈话。

1月4日 上午，约谷牧谈话。在听取谷牧汇报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以来八个多月的主要情况后指出：看起来大有希望。关于人才不足问题，可以考虑从香港，从东南亚、日本，从其他国家，请一批人来做顾问。不只是华侨、华人，外国人也可以；不是请一个两个，而是请一批。任务就是教我们的干部怎么同外商打交道，怎么搞好城市的开放和管理。此外，还

可以考虑选一两个地方、一两个学校，办对外开放专题速成班。你们研究一下，在哪里办。时间短了不行，半年一期，固定下去。在谈到沿海城市老企业技术改造的问题时说：工作要有规划，主要改造哪些项目、引进哪些技术，应该规划好。要有计划地展开对外经济活动。关于办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大学归国家办，他出钱。这是一件好事，我答应给题校名。你们应该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好。在谈到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时指出：沿海连成一片了，这很好。要再加上闽南三角洲。^{〔1〕}对台贸易方面的工作一直做得不够。要研究台湾市场，看它多什么东西、缺什么东西，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有哪些东西可以和它竞争。比如水果，要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从品种改良、保鲜技术、包装装潢，到国家政策，都要为打进国际市场考虑。开始的时候不赚钱也可以。第一步先打出去，打进香港，通过打进香港国际市场再打进日本，打进其他国家。你们要一项一项地研究，一项一项地落实。对台贸易这件事，光福建办还不行，它牵涉到全国。广东也有对台贸易问题，也要考虑。在谈到修通福建到广东的铁路问题时说：广东、福建的铁路不连起来不行。从国家当前的情况看，一下子搞也有困难，但必须有规划。哪年搞，什么时候搞，要有个计划。

〔1〕 1985年1月25日至31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继而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是我国在进一步实行改革与开放的新形势下，加速沿海经济发展、带动内地经济开发的重要战略部署。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1月6日 下午，在文津俱乐部参加桥牌比赛。

1月18日 致信英国专家迈克尔·夏庇若〔1〕，对他来中国工作三十五周年和他的七十五岁诞辰表示祝贺和敬意，信中说：“三十五年前，当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时候，您远涉重洋，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您同中国人民一起参加了抗美援朝斗争。您为宣传社会主义中国和发展、改进新华社的对外报道，为提高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质量，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您在十年浩劫期间蒙冤受屈，然而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热爱和信赖始终不渝。您不愧是坚贞不屈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真挚朋友。我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1月19日 上午，会见罗兰士·嘉道理〔2〕勋爵为首的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在谈话中祝贺合营的广东核电站合同正式签字，并说：你们敢冒这个风险，你们带了个头。前一段，中英在商谈解决香港问题时，香港有些波动，你和你的公司采取了友好积极的态度。我们向你们表示感谢。中国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香港合营建设广东核电站，是我们合资的最大一个项目，这是了不起的事情，甚至在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都会发生影响。它将使内地和香港在经济上的联系更加紧密，对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增加港人的信心，有

〔1〕 迈克尔·夏庇若，早年从事英国工人运动，并投身于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1950年1月来北京参加新华社对外报道工作，曾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修改定稿工作。

〔2〕 罗兰士·嘉道理，英国人。当时任香港中华电力公司主席、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着重要的意义。在谈到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时指出：这是中国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前五十年也不能变。五十年以后中国同外国在经济上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断得了呢？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如果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的这个政策就失败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比重将始终占优势。中国在同外资合作中，不会让外资吃亏，但是希望大家都能过得去。在考虑政治、经济问题时，一厢情愿是不行的，我们在同英国就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进行谈判时，考虑到中国、英国和香港各方面的利益，最后达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下一步要着手解决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更宽，所谓宽就是台湾可以保留军队。解决台湾问题也不能一厢情愿。大陆的利益、台湾的利益以及同台湾有关的外国资本的利益都要考虑到，否则就搞不成。

△ 在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后，听取李鹏^{〔1〕}等关于电力建设问题的汇报。在谈话中指出：电的问题，我主要关心后十年电是怎么安排的。二〇〇〇年前电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证翻两番的需要。在谈到三峡水利工程建设时指出：三峡是个大项目，我们要从长远利益考虑，给子孙后代留下点好的东西。要认真考虑中坝。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可以开到重庆，这是多么了不起，今后有意识地把工业项目摆在那里，可以帮助那里发展经济。成立三峡行政区是个好主意。可以把

〔1〕 李鹏，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1〕，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建设性移民的办法很好。可以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第三产业、旅游业，也可以搞经济作物，那里是亚热带，可以种柑桔。

1月中旬 审阅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关于同朝鲜孔镇泰副总理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

1月23日 上午，听取赵紫阳、姚依林、胡启立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汇报，并就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在谈到有的企业挪用生产基金滥发奖金时指出：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如不严肃对待，会冲击经济体制改革。在谈到国营企业扩权后谁来代表国家利益时说：应该立法，没有法律，就会各行其是。要有制约的人。在得知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份财政赤字大大超过原来的估计后指出：连信息都不通，发了那么多的票子，要过好久才反映上来。资本主义国家当天就能知道。在谈到控制发行货币可能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时指出：生产增长速度降低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不要紧。改革走一步看一步好，但是也不要丧失时机。时机丧失了很可惜。票子发那么多，外汇降下来那么多，这是风险。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的经济情况总的讲仍然是平稳的，经受住了考验。这就很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没有料到，没有经验，也不要紧，我们的经济状态还是扎实的。工资改革，我赞成慎重初战，务求必胜。在谈到三峡问题时指出：如果采取中

〔1〕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确定重庆直辖市管辖原四川省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所辖行政区域。

坝方案，虽然增加五十万人的搬迁，但可以增加装机容量七百万千瓦。有了这一条，就可以把那五十万人养活下来，万吨船也可以到重庆。反正是两条：一条是万吨轮要能到重庆；第二条是能防洪。建设周期延长二三年可以。基础按中坝方案做，没有危险。在谈到与外资合作问题时指出：包玉刚准备出资五千万在宁波办大学，还想投资办钢厂，不要让他吃亏。如果有风险，我们同他分担。凡是搞这些投资的人，我们都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如果有的时候必须国家补贴，我们也可以干。在谈到宁波的开放问题时指出：宁波的发展速度可能不会慢，同大连展开竞争。发展“金三角”〔1〕，如果把上海、宁波连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

1月29日 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余秋里谈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总部的领导班子问题。

1月31日 晚，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江苏、上海、广东等地视察。

2月1日 上午，抵达南京。

2月2日 上午，游览玄武湖。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参观金陵饭店，并在饭店签名簿上留名。在听取饭店负责人的汇报时指出：一定要在改革上下功夫，把饭店管理好。

2月3日 上午，游览灵谷寺。参观中山陵。参观中山植

〔1〕 指长江三角洲。

物园，并听取植物研究所负责人关于该所为经济建设服务和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等情况的汇报。

△ 上午，参观紫金山天文台。听取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紫金山天文台名誉台长张钰哲关于中国天文学家在探索自然和宇宙规律，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方面取得的成就的汇报，对他希望一九八六年到澳大利亚观察哈雷彗星和进行考察的要求，表示支持。

2月4日 上午，接见江苏省、南京军区以及南京市主要负责人和部分老同志。

△ 下午，乘专列离开南京抵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2月7日 上午，和王震、陈丕显等听取陈国栋、胡立教、杨堤、汪道涵〔1〕、阮崇武等汇报。指出：外商兴趣比较高的是上海，他们愿意到上海来投资。上海投资环境改善了，人家就来投资了。上海第三产业是个缺门，潜力很大，你们的路子要走得宽一些。产品质量要搞好一点，优质的可以提点价。上海的高层建筑建设要快一点。上海港口条件差，要综合利用。你们还要利用宁波、张家港这两个港口。关于上海的机场建设和整体发展问题，你们要搞一个计划。在谈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急需培养技术工人时说：上海人脑筋活，最容易培养。搞点速成的学校，半年为期。在谈到干部问题时指出：领导班子，就是要年轻一点，他们有这个条件，一上来就能干

〔1〕 汪道涵，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

二三十年，老的当顾问，帮帮忙。在听到上海治安情况有了好转时说：真正的治安好转，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美元、实现翻两番那个时候。

2月13日 晚，乘专列离开上海前往广州。

2月19日 和邓颖超、徐向前、王震等同广东省、广州市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出席文艺晚会，欢度除夕。

2月22日 和王震、余秋里会见马万祺，祝新春佳节好，并向澳门同胞致以节日问候，希望他和澳门同胞为澳门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2月23日 下午，和王震、余秋里会见霍英东及其子霍震霆夫妇，并设晚宴招待。席间，多次谈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的开放问题。

2月27日 乘专列由广州回到北京。

2月 为瞿秋白^{〔1〕}同志纪念馆题写馆名。

3月2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给在医学科学战线上取得突出成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姜泗长记二等功。

〔1〕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6月牺牲。

3月4日 上午，会见五岛升〔1〕为团长的日本商工会议所百人访华团。在谈话中赞扬日本企业界对发展中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抱积极态度，是一种有战略眼光的决策，强调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指出：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險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3月7日 上午，出席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闭幕式，接见与会同志和首都科技界代表，并作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去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现在，中央还要作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2〕。你们这次会议为中央作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了准备。这个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

〔1〕 五岛升，当时任日本商工会议所所长。

〔2〕 指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件，这个文件的方向，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这个讲话之后，又即席讲话，指出：现在我们国内形势很好。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1〕}，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

〔1〕 五讲四美三热爱，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及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

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这个讲话和即席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即席讲话题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3月8日 阅《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情况简报》，就简报提到李国鼎〔1〕、陈履安〔2〕、吴大猷〔3〕等台湾要员将出席海峡两岸参加的同步辐射讨论会一事，作出批示：“请方毅同志处理。要参加。主要问题是对方人身份较高，我们也须确定合适的人选。”

3月9日 分别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及国防科工委和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班子调整问题，签署中央军委任免命令。其中任命：杨得志为总参谋长，徐惠滋为常务副总参谋长；余秋里为总政治部主任，周克玉为常务副主任；洪学智为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赵

〔1〕 李国鼎，当时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中美科学学术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2〕 陈履安，当时任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3〕 吴大猷，物理学家。当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南起为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丁衡高为国防科工委主任，伍绍祖为政治委员；朱光亚为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3月12日 上午，和胡耀邦、赵紫阳、彭真等前往天坛公园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3月19日 上午，同乔石〔1〕谈话，提出对黄镇〔2〕、李雪峰〔3〕等工作安排的意见。九月，黄镇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上增选为常委，李雪峰增选为委员。

3月22日 就美籍华人陈树柏教授为建立中国实验大学筹办教学器材和聘请外国教师一事，作出批示：“请何东昌同志婉劝陈树柏教授：办校筹资不易，他的盛情和辛劳，我们很感谢，但希望不要勉强搞。”

△ 为山西省黎城八路军兵工厂遗址“黄崖洞”题字。

3月25日 上午，会见由蒂尔曼·德丁等十九位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4〕。指出：中国太穷了，同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地方的地位不相称。我们有个雄心壮志，从八十年代起，到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小康社会。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八百至一千美元，说准确点是八百

〔1〕 乔石，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2〕 黄镇，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3〕 李雪峰，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

〔4〕 该团大多数成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中国做过新闻工作。蒂尔曼·德丁，曾任《纽约时报》记者。

美元或稍多一点。这还并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些。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达到一万亿美元，在国力上就有较多的增强。那时我国的人口将达到十二亿左右。这个目标达到了，就为我们的继续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再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建设，我们就可以接近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办好这件事，要花七十年的时间，但这是我们坚定不移要做的事情。如果在本世纪末，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达到一万亿美元，中国就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多一点贡献。如果再花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末，我们这个国家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一些。我们有信心做好这件事情。对人类做出贡献，我是从两方面来讲的：一是我们摆脱了贫困，表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做到了这件事，就可以给人类做更多贡献。这种贡献，包含对不发达的国家提供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对他们的发展提供比较多的帮助。二是中国每发展一步，就使国际的和平力量增加一分。中国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力量。我们最需要和平，不希望战争。我们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不行的。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和平。我们希望至少二十年内不打仗，更希望七十年内不打仗，可以从从容容地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当然，如果打起来了，怎么办？那就打完了再搞建设。现在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动态、新的情况，那就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在发展。还指出：从我们制定战略目标起，就把我们的建设叫作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经常讲四个现代化，往往容易忽略了主词：社会主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其中最大的政策是两个开放，即对内和对外的开放政

策。开放政策现在已经开始见效了。我们对内对外实行开放会出现一些不健康的因素，但是比较起来，最大的益处是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3月28日 上午，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我们已经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对于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方针不是收，而是继续放。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指出：日本企业界要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应大胆地把资金、技术投到中国市场上来。中日两国是邻国，要互相合作和帮助。中国发展了，也会给日本带来好处。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3月 为《人民日报》海外版题词：“向海外朋友问好！”七月一日，题词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号头版。为《经济法制》杂志题写刊名。为音乐舞蹈史诗影片和舞台摄影画册《中国革命之歌》题写片名和书名。

4月3日 阅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不许领导干部的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建议》送审稿，对陈云批示的意见表示：“赞成，要早出决定。”陈云的批示是：“这件事，应由中央像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问题那样，作出明确的决定方能制止。不然的话，发展下去，党的肌体、党群关系必将受到损害，有所好转的党风也会受到影响，改革也难以顺利进行。应退出的干部子女的范围，是否再扩大一点。”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

4月11日 阅原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关于改善中国与印尼关系的建议信。

4月15日 上午，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1〕。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

〔1〕 阿里·哈桑·姆维尼，当时还任坦桑尼亚革命党副主席。

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要实现经济发展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

4月17日 上午，会见比利时首相维尔弗里德·马尔滕斯。在客人谈到自他一九七八年访华以来看到中国变化很大时说：是有些变化，但还不能说很大。再过十几年到本世纪末，会有更大的变化，但真正大的变化将在下个世纪的前半期。还指出：我们制定了两个阶段的目标，第一个阶段的目标是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达到八百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三十至五十年时间，我们有可能接近你们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两个阶段的目标。五年来的经验证明，我们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现在我们人民的信心提高了，绝大多数人心情舒畅。在谈到欧洲联合问题时指出：西欧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有强大的技术力量，也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霸权主义要称雄世界，第一个目标是欧洲。要取得欧洲，不一定采取正面进攻，那是下策，可以从两翼包围欧洲，特别是从中近东着手，取得中近东的资源，卡住欧洲的脖子。正因为国际战略态势如此，所以我们的愿望是有一个强大的联合的欧洲。欧洲只有联合，没有别的出路。单独一个国家即使比较强大，也对付不了霸权主义。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联合的欧洲，同时也希望有一个执行独立政策的欧洲。欧洲只有在联合强大基础上才能有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策，分裂的欧洲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很穷，但我们可以不考虑任何内外因素而建立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所以在此基础上，中国和欧洲可以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帮助。我们把欧洲的发展当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也希望欧洲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但也要靠朋友。为什么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就是为了赢得朋友，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不仅从中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从国际战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考虑问题。一九七八年底我们的三中全会制定的目标就是从全球战略来考虑的。在谈到中国和欧洲经济合作问题时指出：应该说我们同欧洲的经济合作困难比较少，但发展有些不足。中欧双方都要采取一些实际步骤加速经济关系的发展。欧洲的商品要进入中国，中国商品也要进入欧洲，否则中国就没有支付能力。没有支付能力就很难

扩大我们双方的贸易总额。同时，双方贸易的发展也有一个开拓问题。这样的问题看一两项不行，看短期也不行，要看长期。中国发展后，其市场容量是不容忽视的。中国越发展，市场越大。中国对外贸易额刚超过五百亿美元，而只有一千万人口的比利时的出口贸易额比我们大得多。如果我们达到二千亿美元，欧洲就将会在其中占更大的比例。你们现在所占的比重大小小于日本、美国，应树立一个雄心壮志，争取同日本、美国占到同样的比重。会见前，对中方陪同会见的杨泰芳〔1〕、周南〔2〕、贾石〔3〕等说：同西欧加强经贸关系很重要，可以促使日本和美国在同中国经贸关系上采取积极态度，这是一个环节。西欧同中国的贸易问题，关键是西欧要容纳中国的商品。中国出口欧洲的东西太少，受限制。所以，要提出西欧开放对中国的纺织品市场。会见中还回答了比利时电视台记者提出的关于中苏关系的问题。

4月18日 上午，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指出：香港问题的解决对解决台湾问题是一种推动。但台湾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其中有个美国干预问题。我曾请撒切尔夫人带口信给里根总统，希望里根总统连任期间对解决台湾问题有所作为。美国政府对我的口信作了答复，还是老话，即美国不参与中国人内部问题的解决，就是说不那么热心。当然，台湾问题总要同台湾当局打交道，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但台湾问题的解决有某种迫切性。台湾政权的存在现在靠蒋经

〔1〕 杨泰芳，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邮电部部长。

〔2〕 周南，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3〕 贾石，当时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

国，蒋经国一去，如果台湾发生动乱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提出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因为我们有共同语言，我们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我们按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甚至比香港方式更宽，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美国的投资和其他经济利益也不会有任何损害，它的政治影响也不受损害。中美之间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关系也会更密切。这是一件有百利无一害的事情，但这需要有敏锐而远大的政治眼光，胆子也要大，有勇气才能下决心。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中苏关系正常化，我们坚持消除三个障碍。三个障碍一下子消除很难，但是总应走出第一步。三个障碍消除都很重要。苏联人比较容易做而无任何损失的是，让越南人从柬埔寨撤出去。苏联整个战略态势对我们威胁很大。坚持消除三大障碍，就是要解除对我们的威胁。在谈到美苏裁军谈判的问题时指出：如果达成协议，我们赞成，但不容易。我们观察二十年了，双方水涨船高。即使达成协议也不等于真正做到，对世界人民的威胁并未解除，实际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维护世界和平不能只看到他们两家的谈判。在谈到中国同欧洲的经济关系时说：中国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会增加。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中，欧洲应占相应的份额。在外贸上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转让，欧洲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这只是比较而言。第二个是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贸易总是一来一往的，中国买欧洲产品，欧洲也要买中国产品。中国买外国产品总要有偿付能力。你们在技术上帮助我们，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能随着发展。三年来，我们一直在考虑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这是作为一项政策来考虑的。希望欧洲的企业界为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创造条件。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

4月19日 上午，在住地同彭真谈话。

4月20日 下午，和邓颖超等出席由宋庆龄基金会、外国专家局、文化部外文局、《中国建设》杂志社举行的招待会，庆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七十岁寿辰和他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五十二年。招待会开始前，同邓颖超等会见爱泼斯坦一家，称赞爱泼斯坦：五十二年来一直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工作，确实不容易。

4月24日 上午，会见欧文·比伯〔2〕率领的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代表团和威廉·温皮辛格〔3〕率领的美国工会领导人访华团。指出：随着相互熟悉，美国工人和美国工会会相信，中国工人和中国工会是可以打交道的，是可以交朋友的。同样，中国工人和中国工会也会感到美国工人和美国工会是可以交朋友的。希望中美两国工会之间今后有更多的来往。在来往中，把意识形态问题撇开，根本不去管它，就讲友谊，谈可以合作的东西。美国工会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力量，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工会的社会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同美国工会不同，可能更大一点。因为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工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我在法国呆过，知道西方对“专政”不容易接受。其实，任何国家都有专政职能。我们还是讲民主

〔1〕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生于波兰，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建设杂志社总编辑。

〔2〕 欧文·比伯，当时任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

〔3〕 威廉·温皮辛格，当时任美国机械师和宇航工会主席。

的，讲民主和法制。我们现在还要扩大民主，要相应地加强法制。谈到自己在法国的经历时说：我也是一个工人，一九二〇年在法国当工人，那时才十六岁。当时是勤工俭学。勤工就是劳动，想挣一点钱上学。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在法国呆了五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四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当时工资很低。但也有个好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4月27日 为四川大学题写校名。

4月 为《冯玉祥选集》题写书名。

5月4日 晚，会见并宴请应他本人邀请来访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吴奈温。将陪同会见的李鹏、田纪云介绍给客人，说：你这次来，除了看望老朋友，还会结识新朋友。这两位在我们中央是比较年轻的。我们各级的领导班子都要逐步年轻一些。老同志要把位子让出来，让比较年轻的干部接替。这项工作要长期抓下去。在介绍中国改革的情况时指出：我们进行的改革也包括军队，我们准备减少一百万军队，节省点钱来搞建设。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也是我们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这一方针，解决国际间的问题，解决我们同国际间的问题，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我们的对外政

策有了一个调整。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1〕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我们也不搞集团政治，不依附任何集团。这一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中缅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国，也是执行五项原则的典范。七日上午，前往钓鱼台国宾馆看望吴奈温。在谈话中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正在设法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蒋经国身体不好，一旦去世，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估计。我们主张一个中国，蒋经国也主张一个中国，这是我们的共同点，是我们和谈的基础。我们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实在不行，也只好动武。我们不能承诺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将如何发展还很难预料。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台湾永不和谈怎么办？台湾出现外国军队、外国力量占领又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承诺不用武力！台湾问题是中国实现统一的问题，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是从整个民族利益考虑的。九日上午，到钓鱼台国宾馆为吴奈温送行。在告别时说：你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你过一段时间再来走走亲戚，看看中国有没有新的变化，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否成功。搞改革就是一种探索，探索需要勇气。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改革，比农村的改革复杂得多，也确实有风险。城市改革进行半年了，势头不错。今年明年后年是改革关键的三年。如果改革成功了，就会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还可以向第三世界提供一些经验。

〔1〕指20世纪70年代中国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提出从东边起，日本、中国、欧洲、美国，加上同一条线上的第三世界各国，联合努力，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思想。

5月11日 上午，会见亚西尔·阿拉法特〔1〕率领的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指出：中东问题的解决，阿拉伯问题的解决，主要靠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要超级大国发善心是没有希望的。美苏两家谈判取得某种进展，从而推动中东问题解决的可能性不大。第一，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不会停止。而两霸争夺的焦点之一就在中东。第二，美苏表现在核武器竞争上的争夺也不会停止。但是对世界的形势，我们并不悲观，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虽然战争的威胁始终存在，但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发展，制约战争的因素在增长。制约战争的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独立、发展每增加一分，制约战争的力量就增加一分。其次是不希望爆发战争的发达国家，例如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它们也是不愿意打仗的。我们这个估计是否符合实际，当然要让历史来证实。我们争取一个比较长时间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这个判断不是依据美苏两家谈判进展如何决定的。

5月15日 上午，会见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吴庆瑜〔2〕博士及其一行。指出：城市改革涉及到各个领域，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也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有勇气，有信心，相信是会成功的，当然也很容易出偏差。去年十二月，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刚刚公布不久，就出现了多发行一百亿元票子事情。对我们来说这种事应当避免，但也难以完全避免。因为改革是新事物，而我们的知识还不够，鼻子不通，信息不灵。这样的事情出现后，国内有人提出了疑问，更多的人是担心。对这种

〔1〕 亚西尔·阿拉法特，当时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

〔2〕 吴庆瑞，当时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主席、中国沿海开发经济顾问。

事，我们应该十分注意，切实总结经验教训。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还有可能再出现。倘若出现，发现要早，纠正要及时，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事业顺利进行。我们自己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心，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正视现实，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在不断地克服困难和纠正错误中前进。现在正是改革的最好时机，搞好改革，不但会为九十年代，而且会为下个世纪我国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搞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是知识和人才。我们最大的弱点恰恰在这里，知识不足，人才不足。我们请你们来，就是请你们提供知识。不仅请你们来，还要广泛地请发达国家退休的专家、技术人员来帮助我们工作，他们来当顾问或到企业里担任实职都可以。

5月18日 审改准备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

5月19日 上午，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指出：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

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作出了三项改革决定^{〔1〕}。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次会议于十五日至二十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研究了实行教育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措施。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

5月20日 上午，会见应邀来北京大学讲演的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和他的妹妹陈桃桃。指出：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在谈到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时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

〔1〕 指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允许台湾保留军队，这是正视现实的决策。既然要与台湾谈判，不允许他保留军队，什么也谈不成。台湾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要花时间。打交道要同当权的打交道，不同当权的打交道就是说空话。我们提出国共两党搞第三次合作，以台湾当局为对手，具体来说，现在以蒋经国为对手进行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不这样，那什么事都搞不成。当然，台湾问题的解决，只靠台湾当局这一条，是靠不住的。各界人士要在解决台湾问题方面出力。会见后，设午宴招待陈鼓应兄妹。这个谈话的部分内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部分。

5月21日 上午，在住地听取杨尚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领导班子配备问题的汇报。

△ 晚，会见包玉刚，并共进晚餐。

5月22日 在住地听取杨尚昆汇报军队精简方案。杨得志、余秋里、张爱萍、洪学智参加。

5月24日 上午，会见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指出：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在介绍中国国内形势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因为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叫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比我们搞得早的有苏联，还有东欧。我们开始的时候搬他们的，看来他们的东西也并不那么成熟。即使是很成熟的，但毕竟国家不同，各有各的历史，各有各的政治经济状况、社会状况，照搬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的。当然我们有些错误不是照搬来的，那是我们自己犯的。有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自己搞得太急了，违背了事物的客观规律，要求太急就必然要犯错误，犯极左的错误。总结了这个历史经验，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底制定了一系列合乎中国自己情况的新的政策。中国的底子薄，不能太急，制定的目标不能太高。我们正在进行的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人们有一些担心，是有理由的。我们对城市改革的态度是胆子要大，要坚决地改，不丧失时机，现在是一个好时机。但是，我们的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犯了错误，及时发现，及时改正。只要我们把事情办好了，也能说服那些对城市改革担心的人。我个人相信，这个改革肯定会成功。因为全国人民赞成改革，懂得不进行改革，就不能争取到今后几十年的稳定持续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较好地比较快地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体中国人民。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中国也并没有被搞垮，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又加上我们

这个国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我们潜在的力量是大的，这也就是我们以后能搞好的一个依据。总之，我们还要去干，看来有希望。

5月27日 上午，会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介绍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形势。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美国人不放手台湾，我们老早就看清楚了。我们说美国是“航空母舰”政策，就是说把台湾看成它的势力范围、军事基地。它不希望看到中国统一。我们同台湾的谈判，还是要以台湾当局为对手。我们的谈判不是中央对地方的谈判，而是国共两党谈判，国共第三次合作。会见结束后，与客人共进午餐。

5月29日 三十一位红军老战士和当年参加夺取泸定桥的红四团代表同四川省三千军民在泸定桥头集会，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夺取泸定桥胜利五十周年，并举行红军夺取泸定桥纪念碑奠基仪式。此前，邓小平题写“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

5月 为《红军女英雄传》题写书名。

6月4日 上午，和胡耀邦、李先念、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接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并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讲话阐明了我国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

变，指出：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在谈到军队建设问题时指出：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这次会议是五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六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的提议，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支持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通知》。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

三卷，题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月5日 分别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广州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领导班子调整问题，签署中央军委命令。其中任命：赵先顺为兰州军区司令员、李宣化为政治委员；傅全有为成都军区司令员、万海峰为政治委员；尤太忠为广州军区司令员、张仲先为政治委员；向守志为南京军区司令员、傅奎清为政治委员；李九龙为济南军区司令员、迟浩田为政治委员；刘精松为沈阳军区司令员、刘振华为政治委员；秦基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杨白冰为政治委员。

△ 上午，在住地同谷牧谈话。

6月6日 下午，和邓颖超等接见参加“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的海内外学者，并合影留念。在接见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时指出：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当然这不是指同台湾的统一问题，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强调：至于同台湾的统一谈判问题，要谈，只能以台湾当局为对手。如果国民党要谈判，才能考虑是否包括台湾的党外人士和台湾本地人民的代表。我们坚持只有一个中国。我们为什么和国民党谈判？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都承认一个中国，虽然各讲各的，他们讲以台湾为主体，我们讲以大陆为主体，这个不同。但共同点非常重要，即承认一个国家，一个中华民族，这是个关键

问题。在谈到人权问题时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部分。

6月7日 上午，会见民主柬埔寨客人。指出：九月，我们要开党的代表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七五”计划，二是讨论中央领导层的年轻化问题。两项议程中，主要是年轻化问题。十二大决定要开这个会。那时就想到进一步更新中央委员会。干部年轻化是世界性的趋势，越是现代化，越要年轻化。这件事要有决心，有勇气，我们做得不够。我们党是个老党，革命历史长，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同志、老党员比较多，趁我们这些人还在，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容易。

6月8日 上午，在住地同王震谈话。

6月14日 签署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问题的命令。命令指出：合并整编大军区，是我军组织体制的一个重大改革，是适应未来作战需要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经党中央批准，决定将十一个大军区合并整编为七个大军区，即：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整编为兰州军区；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整编为成都军区；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整编为南京军区；武汉军区分别与济南军区、广州军区合并。将河南省军区和驻河南省的陆军部队划归济南军区领导指挥；将湖北省军区和驻湖北省的陆军部队划归广州军区领导指挥。北京、沈阳军区不变。

6月15日 为《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题写书名。

6月20日 通过办公室给中共广西百色区委员会党史征集办公室回信，答复关于百色起义和红七军史料中的几个问题。回信说：“我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对俞作柏〔1〕、李明瑞做统战工作的。同时对广西党（当时是特委，而不是省委）有领导责任。”“在第四、第五大队撤向左、右江时，就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并派龚饮冰〔2〕同志回上海，向中央报告。到百色后，即得中央电示，予以批准，遂决定于十月革命节打红旗，建立红七军。”“河池会议改选了前委，我仍是前委书记，陈豪人〔3〕是前委的成员。”

6月21日 向华罗庚〔4〕骨灰安放仪式送花圈。

6月27日 同彭真谈话，就立法问题和立法力量的组织问题交换意见。提出：一、今年秋冬，要努力争取把几个法搞出来。民法总则一定要搞，不可能那么完备，不完备不要紧，有错就改，总比没有好。海关法的修订中，还有个受贿的问题。我看，应该明确一条，一切罚没物资统统上缴国库，“一

〔1〕 俞作柏，1929年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支持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1929年反蒋失败后寓居香港，继续从事反对蒋介石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2〕 1929年，龚饮冰随邓小平赴广西，负责机要联络工作。

〔3〕 陈豪人，当时任红7军政治部主任。

〔4〕 华罗庚，数学家。1985年6月12日逝世，终年74岁。逝世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切缴获要归公”嘛。二、应该搞一个立法咨询机构，吸收全国各方面的专家、教授、学生参加立法工作。这样，立法的过程也就培养了干部。三、一个法律院校，一个管理学院，要发展，要扩大。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很多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中，许多是学过法律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法律院校搞掉，这是不对的。建国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

6月29日 上午，会见伊朗议长哈什米·拉夫桑贾尼。指出：我们两国间在很古老的时候就有密切交往。中伊两国共同点很多。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需要发展自己，相互间的合作有广阔前景。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希望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生活逐步改善起来。中国关心两伊战争，希望这场战争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早日结束。伊朗也好，伊拉克也好，都面临着发展自己的任务，而实际情况是如果有和平环境，第三世界是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我们实在不希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自己消耗自己的力量，请阁下考虑一下，能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结束这个战争。如果为了结束这个战争需要中国方面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十分愿意做的。

△ 上午，会见穆罕默德·谢里夫·迈萨迪亚〔1〕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指出：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试验嘛。搞社会主

〔1〕 穆罕默德·谢里夫·迈萨迪亚，当时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设书记处负责人。

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要理顺各种经济关系需要几年时间。如果关系理顺了，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就有把握。我们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

6月30日 上午，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和夫人一行，对中美合作经营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将于次日破土开工表示祝贺。指出：这个项目是双方长期合作的一个开端。这个良好的开端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要有许多像安太堡露天煤矿那样的大型合资企业才能改变我国的面貌。表示可以对该项目的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工作继续谈判，并就海上石油开采的问题征询客人的意见。

6月 为《回顾长征》题写书名。

7月1日 上午，会见蒙拉差翁·克立·巴莫^{〔1〕}亲王、

〔1〕 蒙拉差翁·克立·巴莫，泰国前总理。

西提·沙卫西拉〔1〕、差猜·春哈旺〔2〕率领的泰国友好访华团。指出：中泰建交十年了。十年的实践证明泰国是个守信用的国家，中国也是个守信用的国家。我们同东盟多数国家的关系是好的，但现在有的国家对我们还不信任，他们认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威胁是中国。消除这样的错误观点，也许还要时间，但时间将证明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人口这么多，地方也不小，处理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还能去干涉别人的事情？诸位知道，我们真正忙的是怎样把自己的国家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状况，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力量，这是很不容易的。关键是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没有和平环境谈不上建设。现在我们看到国际上可能取得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希望有七十年的和平环境，以便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在下一个世纪的三十年至五十年内，确切地说是五十年，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刘华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李耀文为政治委员。

7月2日 上午，会见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指出：我们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只能说是试验。改革搞了五年多了，先从农村着手，见了效，现在扩大到城市。扩大到城市的改革就是全面改革。随着国防、教育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改革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试验。到底是搞对了还是搞错了，搞好了还是搞坏了，大概需要三至五年

〔1〕 西提·沙卫西拉，当时任泰国外交部部长。

〔2〕 差猜·春哈旺，泰国前外交部部长，当时任泰中友好协会主席。

时间才能说，但我们相信能成功。因为这是为国家为人民办最好的事，能取得人民的支持。凡是符合人民利益，又能得到人民支持的事，大体上肯定会成功。在谈到中国和土耳其两国关系时指出：中土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加强彼此的合作，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国家。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可能争取到较长的和平环境。和平环境对中国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这些国家发展起来了，维护和平的力量就会增长，就可能争取到更长时间的和平。

△ 阅柯庆施夫人于文兰要求解决生活困难问题的信，作出批示：“请中央办公厅酌处，如确有困难，可适当予以解决。”

△ 邓小平办公室给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回信，对拟将邓小平的文稿收入《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一书等问题作了回答。并说：小平同志现在工作很忙，不能为该书另提供回忆文章、写序言和题写书名。

7月5日 上午，和胡耀邦、李先念、彭真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并合影留念。全体会议于本月一日至五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一九九〇年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并颁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时在香港成立一个民间性的、有广泛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王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朱光为政治委员。

7月6日 上午，会见孟加拉国总统侯赛因·穆罕默

德·艾尔沙德。指出：我们正在进行的主要是两大改革，一个是干部年轻化，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干部年轻化。干部年轻化是我们的战略决策。有了大批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两件事最关键。目前我们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畅，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的赞同和支持。还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将更加广阔。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这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制定的国策。

7月11日 上午，听取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田纪云、张劲夫、宋平等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指出：不是说慎重初战，务求必胜吗？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现在需要回顾一下，务务虚。要抓住时机，推进改革。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摆到第一位。乡镇企业也要抓质量。要提高质量，就必须改革。要立些法，要有一套质量检验标准，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严格执行。前一段在人心惶惶的时候，我心里是踏实的。今天听了你们的汇报，我心里更踏实了。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抓住时机，推进改革》。

7月14日 上午，在住地同胡启立、乔石^{〔1〕}谈话。

7月15日 上午，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乔治·迈克尔·钱伯斯。指出：一九七五年，我主管了一年的工作，做了一点试验，在各方面进行整顿。当时整顿很快见效，各方面都有点起色，人民高兴，但“四人帮”不高兴。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新路。所谓新路，就是两个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开放的作用，就是加速或者说比较快地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我们叫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深圳对我们来说是个试验。看来，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还是正确的。深圳的发展还是很快的，但毕竟是个试验。我们的开放政策，一系列的政策以及我们搞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一种试验。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关，这个关必须过。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任何这样的事情的结果无非是两个，一个成功，一个失败。我们相信会成功。中间一定会有曲折，甚至于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那不要紧，有了错就纠正。这种办法不成功，就改一种办法。总之，要及时地、经常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回答客人提出的身体健康的“秘诀”时说：好多朋友都问我，我的回答是“乐观主义”四个字，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总有人顶住。我是三下三上的人，没有乐观主义态度，没有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的思想，不可能活到今天。

7月16日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指出：我

〔1〕 乔石，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们说要有理想，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搞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条是爱国主义，就是要使祖国兴旺发达，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具体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我们从青年时就干的事情。为什么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坚持下来，就是有这个理想。那个时候天天准备被杀头，还不是个别人，而是成百万成千万的人。有理想要有个内容，就是爱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把我们民族发展起来。在谈到人才问题时指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人。我们现在就是缺乏人才，在好多事情上缺乏本领，各个领域都如此。现有人才不合拢来，丧失了可惜。在李政道提出中国应建立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由第一流科学家负责的提议时，表示：这是一个新方法，我们没有经验。但只要是新的事物，管它对不对，管它成功不成功，试验一下。^{〔1〕}

△ 上午，听取胡启立、方毅、宋健^{〔2〕}、严东生、周光召等汇报。指出：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有几万名留学生在国外，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一个是搞博士后的方法，一个是特区、开放城市招聘留学生的方法。把他们吸引回来，还要想更多的方法。博士后只是一小部分人，要从更多的方面来考虑。有许多框框束缚我们，要改革。招聘要有对象，有名单，要赶快搞规划。尤其是科学研究机构，现在就要去招聘，把最优秀的先招聘回来。所谓少讲空话，多做实事，这就是实事，要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

〔1〕 1986年2月，国务院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唐敖庆任主任。

〔2〕 宋健，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最优秀的，招聘的条件要提高。

7月18日 深夜，乘专列离开北京，次日凌晨抵达北戴河。

7月21日 上午，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木村睦男。指出：我们不久要开一个党的代表会议，代表会议的权力相当于代表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次党代表会议？就是十二大的时候，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在年轻化上不怎么理想，相应地，我们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这个问题上也不理想，所以这次会议的中心目的，是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的成员更年轻化一些。此外，这次党代表会议还要对第七个五年计划作出决定。人们担心我们政策的连续性，担心会不会发生变化，比如开放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我们说不会变化，如果说将来有变化，只能是变得更开放。这几年我们不就一步一步更加开放吗？为什么呢？不搞开放就没希望。所以我们不但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还要从人事制度上搞年轻化，像建立第三梯队，以后还要建立第四、第五梯队，来保证我们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开放政策是个新事物，开放会带来积极成果，发展生产力，给四个现代化建设带来积极影响，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没有开放，四化就没有希望。但是我们也充分意识到开放会带来一些消极的东西。所以我们每进行一段，就要及时总结经验。现在我们不但坚持对外开放，还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问题会更多，像物价、工资、管理体制的改革，都是新的问题，而且都有风险，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要犯大大小小的错误。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我们现在在贸易、文化交往这些领域同苏联的关系有改善，政治领域的正常化还看不到迹象，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有某种改善的迹象。

7月23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刘海清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兼政治委员。

7月30日 上午，会见乌吉·蒙空那温〔1〕率领的泰国国会代表团。指出：中泰两国建交十年来，两国政府、议会和民间等方面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这反映了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反映了两国的政治关系是密切的，可以说中国人上上下下和泰国人上上下下都是朋友。我们要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就要增进我们之间的了解。中国目前的情况总的说来还好，现行政策是成功的，但毕竟还是在发展中。你们到中国各地看一看就会有更多的了解。你们会看到中国是有希望的。在本世纪最后十几年和下个世纪初，我们都可能成为世界上发展比较快的国家。总之，两国都有兴旺的气象。在谈到自己的工作和身体情况时说：我的方针是少做工作，毕竟八十岁了，力争多活几年，能亲眼看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发展。但希望不能太高，希望太高就会变成奢望。按照五年来计划，争取延长。测量我的健康有两条标准，一是游泳，二是打桥牌。能打桥牌就说明我的大脑还能起作用，能游泳说明体力还可以。哪一天我不能到北戴河来，就是我差不多的时候了。

7月31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李旭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刘立封为政治委员。

8月1日 上午，会见竹入义胜〔2〕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

〔1〕 乌吉·蒙空那温，当时任泰国国会主席、上议院议长。

〔2〕 竹入义胜，当时任日本公明党委员长。

十三次访华团。指出：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向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议论，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关于经济特区的判断。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对美苏首脑会谈我们欢迎，但把很大希望寄托在他们的会谈上也不很现实。至于核武器问题，我们注意到美苏双方都表示要减少核武器。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减少一点总是好的，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美苏两家拥有的核武器可以把世界毁灭几次。如果核武器只减少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五十，它们还是拥有毁灭世界的核力量。我们对待核武器有两条基本原则：第一，美苏两国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第二，逐步减少核武器，直到最后销毁核武器。如果美苏两国能在这方面达成协议，世界人民才放心。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中苏之间现在在经济、贸易关系方面有发展，人员交流方面有发展，而政治关系仍同过去的情况一样。至于党的关系，还提不上日程。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中美关系一般还算好。但也有障碍，就是台湾问题。他们说不介入，不参与，这实际上是一种拒绝的口吻。我们说，美国对台湾问题向来是参与的，向来是介入的，从来没有不介入过。推动海峡两岸对话，促进中国统一，美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不是无所作为的。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疙瘩。我们说美国总是搞

一些小动作，他们主要用国会的面貌出现，今天一个台湾问题的决议，明天一个台湾问题的决议，这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谈到朝鲜半岛局势时指出：我们希望朝鲜南北对话取得进展，也希望南北双方加上美国三方会谈能够实现。中国虽然希望同南朝鲜建立和发展关系，但这取决于三方对话，特别是两方对话的进展。中国的做法就是要有利于促进南北对话和三方会谈的实现，有利于南北双方以联邦制形式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

8月2日 下午，会见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总经理、《镜报》集团董事长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一行。在谈到中英关系时指出：中英关系是良好的。双方正在努力扩大合作领域，双方对相互间的合作都抱积极的态度。我们很愿意同欧洲发展经济关系。如果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技术转让方面采取更开放的政策，中国同它们的经济关系将会有更大的发展。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国不能从西方包括欧洲在内取得技术，因而生产出能适合这些国家市场的产品，那末，相互间的贸易是不能发展下去的。希望欧洲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到中国市场来。在谈到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1〕时说：“星球大战”同增加几个核弹头、改换几个新型号的导弹有着质的不同。“星球大战”干不得，它会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发生质的变化。

〔1〕“星球大战”计划，指1985年1月美国政府公布的《总统战略防御计划》。该《计划》提出建立一种以太空为主要基地的多层次、多手段的反弹道导弹综合立体防御系统。因为该《计划》的基本内容同美国科幻电影《星球大战》相似，所以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

△ 为林伯渠故居题名；为上党战役牺牲的烈士题词：“在上党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题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题写书名。

8月上旬 发表谈话：我看了几场国际足联十六岁以下柯达杯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看到各个队无论在技术方面、体育道德方面都表现很好。他们踢得很有朝气，是世界足球运动的希望。中国队也踢得不错。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从少年抓起。国际足联把这次世界锦标赛安排在中国举办，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帮助。要感谢他们。从青少年抓起，举办这类的世界锦标赛，是个很好的创举。十一日晚，李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将邓小平谈话的中文和英文稿转送给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阿维兰热说：邓小平先生的谈话将在国际足联的杂志上发表。

8月11日 上午，余秋里在接见云南边防前线的英模报告团时转达邓小平对前线部队的评价：听过枪响和没有听过枪响的部队大不一样。没有打过仗的经过训练可以打仗，打过仗的经过训练更能打仗。

8月15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江苏南京举行揭幕仪式。此前，邓小平题写馆名。

△ 乘专列离开北戴河回到北京。

8月21日 上午，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指出：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

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搞活、开放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但有办法解决，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谈到中国对国际和平前景的看法时指出：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我们过去一向讲战争不可避免，现在观点有了改变，有了一种新的看法，战争因素、战争危险存在，但和平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所谓战争，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打，但谁都不敢先动手，因为双方都拥有能够毁灭世界几次的军事力量。这对世界战争就是一个制

约。更重要的制约力量，是全世界除两个超级大国外都不赞成战争。第三世界强大了，和平力量也就强大了。中国强大了，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就会有相当可观的增长。东西方两个集团内部也有制约战争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在发展。东欧、西欧都逐渐表现出独立的倾向。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有改变。过去我们讲“一条线”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我们现在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倾向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愿与我们友好，我们也愿与谁友好，但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我们相信这种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

8月23日 上午，在住地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乔石、尉健行〔1〕谈话。

△ 向萧华〔2〕遗体告别仪式送花圈。

8月27日 上午，会见罗伯特·多尔〔3〕率领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指出：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以及中国政府、中国全国人大和中国人民，都希望发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台湾问题、贸易、技术转让，包括“巴统”〔4〕审议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各行各业相

〔1〕 尉健行，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2〕 萧华，1985年8月12日逝世，终年69岁。逝世前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3〕 罗伯特·多尔，当时任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4〕 “巴统”，指巴黎统筹委员会。

互间的来往，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重要的是要加强相互的了解，要有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8月28日 上午，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在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社

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8月29日 上午，会见田边诚^{〔1〕}率领的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团。在谈到中国的改革问题时指出：我们正在搞大胆的试验。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过去几十年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理想、不大好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总的来说是“左”。我们都想把事情搞好，想搞快一点，心情太急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就是心情过急。心情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心一急，出的主意就容易违反客观规律。搞“文化大革命”这种想法、做法违反了事物的客观规律，也违反了人民的意志，方向偏离了，又被林彪、“四人帮”利用了，成为一场灾难。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进行了拨乱反正，建立了安

〔1〕 田边诚，当时任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经济上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谋求比较快、但不能太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路子。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合乎中国的实际，以比较好的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发展生产力，比较快地进行四化建设，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特别是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指出：我们两国关系还是好的，当然也还有一些问题，比如日本企业家胆子太小，算盘打得太精。当然，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他们是出了力的，但不理想，可能日本有一部分人担心中国发展太快，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会成为同日本竞争的对象。去年我跟日本朋友讲，我看这个担心不必要，中国落后日本至少二十年，到那时候中国有某些发展，日本可能发展会更快。再有就是东南亚国家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动向。历史毕竟是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特别希望日本政界不要忘记古人的教导。

8月30日 上午，会见日本亚洲交流协会顾问冈崎嘉平太和该会理事长北村博昭。指出：冈崎嘉平太先生是中日友好事业的掘井人，是二十多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见证人。对于那些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我们总是记得他们的。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我们真正拨乱反正，制定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这七年我们在“四个坚持”的情况下，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四个坚持”之一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对毛泽东主席做实事求是的评价，他的正确方面是主导的，他的正确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今天还发挥着指导作用。当然，他也有失误。现在看来，这七年的路

子是走对了。这七年每年都有点进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现在看来，翻两番有希望，可能超过一点，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过去我们搞土地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现在搞体制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也是一场革命。

8月31日 上午，会见法国对外关系部部长罗朗·迪马。指出：中国人对法国有特殊感情，这有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创始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法国受过教育，这包括社会知识的教育。我曾在法国呆过五年半，在工厂做工近四年。我同工人关系很好，但你们的资本家也教训了我，使我和我们这批人受到教育，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信仰马列主义。法国人民是非常友好的。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世界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增长，整个第三世界要求和平，包括欧洲、日本、大洋洲在内的发达国家也要求和平。欧洲曾经经历两次灾难，因此他们不希望战争。中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指出希望有一个独立、联合、强大的欧洲。有了一个这样的欧洲，必将增强制约战争的力量。我不谦虚地说，如果中国发展起来，每发展一步就增加了一分和平力量。我们一贯强调西欧联合、强大、繁荣，就是着眼于维护世界和平，制约战争。我们支持你们的“尤里卡”计划^{〔1〕}，也是希望欧洲强大起来。我们有共

〔1〕“尤里卡”计划，是1985年4月法国提出、1985年7月欧洲工艺技术会议通过的一个多技术目标协调发展计划。计划提出建立一个“欧洲科研协调机构”，以加强西欧国家在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缩小同美国、日本的差距。这是在美国推行“星球大战”计划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由于“欧洲科研协调机构”的英文缩写的读音与古希腊语中“尤里卡”（意为“有办法”）一词相近，故称“尤里卡”计划。

同的利益。在南北问题上，我们双方有共同和近似的观点。欧洲在南北问题上刚刚起步，希望欧洲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事情。

△ 向王昆仑^{〔1〕}遗体告别仪式送花圈。

8月 为《回忆张闻天》题写书名。

9月6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指出：我们注意培养年轻人是根据国家的安全和长远利益来考虑的，要使干部逐步年轻化，让更多比较年轻、有专业知识、身体好的人逐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经受锻炼，参与制定政策。有了正确的政策和干部年轻化这两条，可以保证改革取得成功，也能保证我们政策的连续性。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七年。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们说这是一场革命。美国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可逆转，这种见解比较正确，比较符合实际。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成功，就可为中国在本世纪甚至下个世纪，奠定一个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当然，城市的经济改革还要三五年才能说肯定的话，但现在看来改革会取得成功。在回答客人提出的中国国内对改革是否有反对力量问题时指出：这样大的国家，说没有反对意见是不可能的，但确实不存在比较大的反对力量。担心现行政策能否成功的人是有的，有些担心也是有道理的。要解除这种担心，就要使我们的政策见到成效，使经济的发展速度比现在更好，人民生活逐步好起来。七年的实践已基本回答了这些问

〔1〕 王昆仑，1985年8月23日逝世，终年83岁。逝世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

题。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改革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逐步总结经验，否则人民会遭殃的。在谈到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时指出：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专门对付苏联的战略。中国不能把自己拴在一辆战车上，否则只能增加战争的危險，不利于和平。中国也要与苏联对话，如果中苏关系有所改善，对和平只会有利，而不会有害。但我们不是在美苏之间搞平衡政策。几年来，中苏关系有些改善，主要是贸易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有所增加。但我们一直向苏联提出，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必须消除三大障碍。中苏关系能否改善是与三大障碍能否消除密切联系着的。坦率地说，我们之所以用消除三大障碍作为衡量苏联是否有变化的标准，就因为这关系到世界战略格局，关系到世界和平，而不只是因为它威胁中国的安全。我们担心军备竞赛的质的升级。我们反对一切外空军备竞赛，无论谁搞外空武器，我们都不赞成。会见后，设午宴招待尼克松。

9月7日 上午，会见西班牙首相、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费利佩·冈萨雷斯·马克斯。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不仅是十年八年的和平，也不只是本世纪的和平，还要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的和平。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只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不够，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不赞成谁，这样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包括欧洲、日本和大洋洲人民的利益。要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发展和平的力量，即制约战争的力量。中国把自己看成是维护和平的力量，我们把整个第三世界看成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也把包括西欧和东欧在内的欧洲看成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基于这种判断，中国不卷入集团政治，采取独

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符合维护世界和平和第三世界的利益，也符合西欧、东欧以及世界其他不愿战争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我们从“一条线”的外交政策改变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依据。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台湾问题比香港问题复杂，坦率地说，其中有个美国问题。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干涉中国内政，每年卖那么多军火给台湾。台湾当局一直到现在不愿意同我们对话，他们依靠的就是美国还有一部分势力坚持“航空母舰”政策。日本也还有一部分人很怀念过去对台湾的占领。台湾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时间，但是我们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最终还是能解决的。

9月10日 上午，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祝贺中美双方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取得初步成果。指出：这部百科全书是非常有用的，这是知识读物。现在搞四化建设缺乏知识，应该从多方面取得知识。在客人问及美国在发展中美经济关系中还应该做些什么时回答说：最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这件事美国经济界比较热心，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对这件事情应该更热心一些。总的讲，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不错的，只是还有不足。在谈到中国经济形势时指出：我们正在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七五”计划期间发展速度不要太高，希望能保持在百分之七或八，实际执行的结果可能会超过。我们不追求发展速度，速度太快不利于均衡地发展，更不利于持续地发展。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

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在回答中国搞改革采用一些市场经济的办法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时说：我们的改革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欢迎外商到中国投资，允许一些个体经济存在，不会影响走社会主义道路。会见开始时，接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姜椿芳赠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一至第三卷，还接受吉布尼赠送的一七六八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英文版第一版的第一至第三卷的复制本。

9月11日 向史良〔1〕遗体告别仪式送花圈。

9月14日 上午，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在谈到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时指出：现在我们对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有了变化。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劣势。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和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改善了。那时我们的判断也有缺陷，所以现在改变了，更大的原因是情况变了。我们现在的判断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现在发生战争就不只是来自一家了，所以我们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我们对战争的判断和采取的政策比过去更妥当一些。现在不仅西欧在一定范围

〔1〕 史良，1985年9月6日逝世，终年85岁。

内采取独立政策，东欧也在一定限度内采取独立政策，这是十分可喜的，是国际政治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我们现在观察国际战略形势，不仅把中国看作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而且把西欧和东欧也视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制约战争的最大力量是第三世界，这些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有这么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存在，尽管仍存在着战争的危險，但如果我们搞得不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本世纪战争打不起来，下个世纪和平就更有希望。我们在战争问题上由悲观变为乐观。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和平必须争取才能赢得。在谈到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时指出：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我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但是，我考虑这对国际上是否也有些益处？我是指对和平会不会有点益处。维护世界和平，最大的问题是各国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不依附于集团政治，同时也要考虑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历史纠纷的方式。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不只是考虑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中国与有关国家的问题，也向国际社会提出这样一个构想，看是否对和平有利，一切都着眼于维护和平。在谈到开放问题时说：只有对内、对外开放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我国的力量。我们过去多年搞的是苏联的方式，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在国际上是闭关自守。所以，经济虽有发展，但速度很不理想，绝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9月16日 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全会决定十八日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全会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讨论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

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同意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的请求，并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全会同意叶剑英、黄克诚由于健康原因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请求，通过了给他们的致敬信。

9月18日 上午，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式，并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会议。下午，在住地同胡乔木、邓力群、林涧青^{〔1〕}谈在这次会议上讲话稿的修改问题。二十二日下午，出席全体会议。二十三日上午，出席闭幕会议并讲话。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在谈到“七五”计划时指出：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

〔1〕 林涧青，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

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在谈到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时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在谈到干部的新老交替和理论学习问题时指出：中青年干部接好老同志的班，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敢于说真话，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要任人唯贤。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因此，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

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次会议是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召开的。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一九八六年——一九九〇年）的建议》，讨论了局部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问题，一致同意一百三十一位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请求，增选中央委员五十六人，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五人，中顾委委员五十六人，中纪委委员三十一人。邓小平在闭幕会议上的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 上午，会见加纳国家元首、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主席杰里·约翰·罗林斯。指出：建国三十六年来，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做得不够理想。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我们的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国家经济建设上来。一九七八年召开的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三中全会到现在将近七年了，可以说这七年发展得比较好、比较快。一个国家经历一些波折当然不是好事，但波折也可以是很好的教员，可以使领导人和人民从中得到教训。现在，中国人民上下一心搞建设，也是因为有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人民有个比较，那十年是什么情况，这七年又是什么情况，人民一看就清楚了。在谈到中国改革的经验时指出：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和实际制定的。过去我们照搬苏联模式，也有发展，但不妥当。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看来，我们的路子走

对了。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在前进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中国也同你们一样，经验不足，人才不足。缺少经验和人才是我们的弱点，可能也是你们的弱点。人才可以培养，但更重要的是善于使用现有的人才。人才难得。至于经验，要靠自己积累。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宏伟的发展规划是有风险的，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确定了一条方针，就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总结一步的经验，对的就贯彻下去，不妥当的就改。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9月20日 上午，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回答客人的提问时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年轻化的工作多年前就开始了，但解决得还不够理想，所以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要进一步调整。这件事情以后还要继续下去。由于中国的事情安排得妥当，因此我的心情很好，无忧无虑。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不管怎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果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美国、日本都有一股势力支持台湾独立。我与里根、舒尔茨、温伯格都说过，中美关系的焦点是台湾问题，应该好好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像美国国会那样干涉中国内政，将会在中美关系中引起冲突。蒋经国不在了，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我们怎么能承诺不使用武力？我同他们谈得很坦率，确实存在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先把话讲明白好。如果蒋经国先生从中华民族利益着眼，同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将会有很多好处。事情只能由他来决定。你下次见到他

时，请代为问候。希望同学〔1〕之间合作一下。

9月21日 上午，会见稻山嘉宽〔2〕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在谈到中外经济技术合作问题时指出：日本引进外国技术，主要是为了掌握和发展技术。你们的这一宝贵经验我们还没学好，这与我们的教育不发达有关系。现在我们是知识不够、人才不够。今后希望有更多的合作，并在这些合作中真正学到你们的经验。我们也要同欧洲、美国进行合作。在所有的合作中，都要学习这一点。在谈到中日贸易问题时指出：要平衡才能持久，才能发展。平衡国际贸易，发展国际贸易，这也是一种知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外资，包括借款。希望日本朋友在合作时帮助我们出主意，帮助我们进行技术改造，使更多中国的商品进入日本市场，进入世界市场，这样的合作才能够持久，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才有广阔的前景。现在世界上都注意中国市场，这个市场应当是有进有出的市场。确实，中国这个市场还有待开发。

9月23日 和胡耀邦、李先念邀请部分退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共进午餐。彭真、邓颖超、薄一波等作陪。

9月24日 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进行了

〔1〕 1926年邓小平和蒋经国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2〕 稻山嘉宽，当时任日中经济协会顾问、新日本制铁公司董事长、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

局部调整。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为：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全会批准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增选的中顾委常务委员和副主任人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增选的中纪委常务委员和第二书记、常务书记、书记人选。

9月26日 为杨靖宇^[1]烈士纪念碑、吴焕先^[2]烈士纪念碑题写碑名；为《李济深^[3]诗文选》、《东北抗日联军史料》题写书名；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城乡建设》题写刊名；为《战友报》题写报名；为南湖革命纪念馆题写馆名；为中山大学、宁波大学题写校名。

10月4日 上午，会见马达加斯加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指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执行的政策见效了，有所发展，但这仅仅是开始。从一九八一年开始，这五年发展速度还可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出现发展太快的问題，经济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二十。今年初，也是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表明经济发展中有不健康因素。现在我们已采取措施尽量压低发展速度。速度太快，发展就不平

[1] 杨靖宇，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1940年2月牺牲。

[2] 吴焕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25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1935年8月牺牲。

[3] 李济深，曾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担任要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1959年10月逝世。

衡，特别是能源、交通、通讯等都跟不上。由此而带来的麻烦也更多。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下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七，要稳定、平衡发展。在谈到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时指出：当“星球大战”计划出现时，中国就表示反对。美国人说苏联人早就开始搞了。我们的观点是：不管谁搞，我们都不赞成，都反对。这个观点，我曾通过撒切尔夫人转告了美国领导人。我认为，“星球大战”计划实际上是军备竞赛的质的升级，不是一般性升级。空间军备竞赛比地面军备竞赛更厉害。“星球大战”计划将导致军备竞赛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10月5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在回答苏联的政策是否会有根本性变化，中苏关系将如何发展时指出：前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苏联的全球战略采取的是进攻政策，后来美国带头对苏联的进攻政策做了强有力的反击。近年来苏联得手不多。苏联本身需要改变这方面的战略态势。苏联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情况迫使它谋求改变。但如何改变，戈尔巴乔夫上台半年多了〔1〕，还看不出明显的变化。从中苏两国关系来看，我们还要观察。我们有明确的标准，改善中苏关系存在三个障碍。这三个障碍无论苏联愿意先消除哪一个都行，愿意先走一步或两步都可以。如果苏联真正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一步，它对和平就做出了贡献。不管走的是哪一步，边界撤军问题、柬埔寨问题或阿富汗问题，对世界来说都没有害处。在谈到美苏军备竞赛问题

〔1〕 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3月开始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时指出：我们不赞成“星球大战”计划。两个超级大国不管哪个搞，我们都不赞成。这是我们对“星球大战”计划的态度。对苏联现在提出的削减战略核武器建议，国际反应不同，我们对此问题未研究清楚。有一点可以肯定，苏联对控制核武器竞赛历来的态度是小打小闹，这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对核武器问题有两项主张：第一，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第二，通过谈判逐步减少直至全部销毁核武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人类遭到毁灭。

10月8日 在住地同杨尚昆谈话。

10月9日 上午，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指出：搞改革还是一种探索、一种试验。在改革中难免犯错误，或者不是错误而是有些措施不恰当，办法不妥当，这些都会带来一些问题。城市改革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了两条：一是我们的改革时机抓对了，势头很好，而且现在可以看到，改革会成功；二是改革确实会出问题。改革是一个新的事物，我们好多问题都没有搞清楚，难免犯错误。问题是要及时总结经验，不要犯大错误。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指出：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看来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这对于两个超级大国发动战争都有一种制约的作用，使得它们不敢轻易地发动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比过去乐观一点。所以，我们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减少一百万军队，都是从这个考虑出发作出的决定。有这样的判断，才能使我们用全力来发展经济。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请你给戈尔

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够办到，我或者胡耀邦同志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愿意去。你向他转达后，我们等候答复。^{〔1〕} 会见后，接受齐奥塞斯库授予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一级勋章，并致答词。这枚勋章是罗共中央、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和罗马尼亚政府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日颁发的。

10月11日 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指出：中国同日本的合作，应该说是满意的，又是不满意的。满意的是我们的关系发展是正常的，而且在逐步发展。所谓不满意，就是经济关系方面有些问题。我们过去也多次讲过，就是贸易逆差问题。不存在日本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而是存在中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的问题。还有技术转让，日本甚至落后于美国和欧洲。如果我们的关系真正是正常的，而且持续发展，那末在经济贸易方面应该是又发展又平衡。我们双方应寻求一些办法，注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总是一个大问题，可能导致我们之间贸易额下降。政治上的问题过

〔1〕 1985年10月22日，齐奥塞斯库在保加利亚开会期间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邓小平的口信。戈尔巴乔夫当即表示要予以认真考虑。11月下旬，戈尔巴乔夫主动会见访问东欧回国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的李鹏。在谈话中强调两国关系应该完全正常化，恢复和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同时还提出了两国最高级会晤的具体建议，作为对邓小平口信的答复。

去也出现过，最近发生了日本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问题。这些年我们没有给日本出过难题，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还有蒋介石遗德显彰会〔2〕问题，是给我们出了很大的难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国领导人都要经常注意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一出现，人民就联系到历史。我们知道日本政府有自己的解释，但对人民来说，不仅中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他们看问题要看事实，看本质。我说的不但是中国，而且整个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国家的人民都有这个感情问题。所以，出于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愿望，我建议日本的政治家、日本政府的领导人和各位朋友关注这个问题。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那就不是现在这样的状况。这是真话。对日本方面来说，不做这些事没有任何损失，不做这些事也可以很平静地、很稳定地、持续地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真正达成谅解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10月15日 上午，会见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就中美

〔1〕 靖国神社，是日本祭祀自明治维新以来在历次战争中（包括侵略战争）阵亡军人的场所。1978年，日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判处死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14人的牌位放在该神社祭祀。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其内阁成员不顾亚洲各国政府的劝告和日本公众舆论的反对，以政府公职人员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谴责。

〔2〕 1985年10月3日，以日本自民党、民社党的亲台湾派国会议员、经济界人士为主组成蒋介石遗德显彰会，该会通过举办各种活动，纪念蒋介石诞辰一百周年。中国政府对该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多次表示坚决反对，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但日本政府以所谓“民间举行的活动，政府无法制止”为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经济贸易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在谈到美苏首脑会晤和限制军备竞赛问题时表示：第一，所有走向缓和的步骤，我们都是欢迎的。第二，我们不相信这样那样的措施，包括削减百分之五十的核武器，能解决问题。我们不赞成“星球大战”计划。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风波，后经过彼此增加了解，协调立场，一些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谅解，关系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正常的，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真正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还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如得不到很好解决，我们两家不知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又会发生冲突。这个问题解决了，中美之间就没有障碍了，双方就可以畅通无阻地发展各个领域的关系。当然，这个问题需要从容地加以考虑，但我们之间总是存在这么一个大问题，需要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中方贸易逆差问题。我们同日本也有这个问题。如果中国对美逆差每年达二三十亿美元，对日逆差每年也是二三十亿美元，中国就会像拉美国家一样变成欠债大户，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解决办法无非是两个：一个是让更多的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另一个是中国减少从美国的进口。而减少从美国的进口就会使近年来迅速增加的中美贸易额降下来，这从另一个角度看，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两国政治关系的退步，这决不是我们双方所希望的。可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鼓励美国商人来中国投资，帮助中国提高出口能力。我指的出口不光是向美国市场出口，还包括向国际上其他市场的出口，这样也能实现贸易平衡。建议美方主管机构从长远的观点考虑中美贸易的发展和平衡问题。平衡和发展是一个问题，没有平衡就不会有发展。

△ 会见布什后，就如何改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问题，向

陪同会见的胡启立^{〔1〕}等中方人员谈了几点意见。指出：中国产品打入不了国际市场，主要是自己没本事。要解决这个问题，靠这样的外交谈判根本没有用，主要要靠自己。能否增加出口，关键在于产品质量。出口产品，一是要“新”；二是质量要“高”，“高”是指要达到国际水平；三是价格要“低”。靠这三条才能真正增加出口。要逐行逐业进行研究，可以搞一个研究机构。例如我们的芝麻香蕉、烟台苹果，质量就很好。问题是运出的时间要快，现货现运，这也是个保证质量的问题。哪一个企业产品质量后退就关它的厂。通过改革，凡是不能改进质量的，就要打屁股。这样抓十年，就有办法了。

10月16日 上午，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在谈到“尤里卡”计划时指出：“尤里卡”计划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赞成。随后，设午宴招待纳塔一行。在席间说：我们两党都在搞试验，你们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是在执政条件下探索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应该说，我们两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勇于探索的党。在意共《团结报》驻北京记者提起一九八〇年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一事时说：她给我出了很多难题。那对我是一次考试，不知道通过了没有。那是我同外国记者谈话最长的一次，大概谈了六七个小时。法拉奇还采访过其他一些政治家，基辛格就是其中的一个。基辛格曾对我说，法拉奇是很难对付的一名记者。我在见法拉奇之前咨询过基辛格，他也很赞赏法拉奇。

〔1〕 胡启立，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0月18日 在住地同胡耀邦、赵紫阳、李鹏^{〔1〕}、万里、姚依林^{〔2〕}、胡启立、田纪云^{〔3〕}等开会。

10月23日 上午，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亨利·格隆瓦尔德^{〔4〕}为团长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在回答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解决出现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现象的问题时指出：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现象。在回答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的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

〔1〕 李鹏，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2〕 姚依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3〕 田纪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4〕 亨利·格隆瓦尔德，当时任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

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总之，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在回答对现在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变动是否满意，是否会继续执行改革政策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主要看两条。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政策对，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使人民生活逐步好起来，这种政策本身就保证了它的连续性。其次要看执行政策的人。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有一批勇于探索、精力较好的人。在美国《时代》杂志海外版编辑普拉格提出如果今后你不在了，你希望人民如何怀念你

时，说：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

10月25日 上午，和万里、习仲勋、杨尚昆、谷牧等出席兆龙饭店〔1〕落成典礼。晚，在钓鱼台会见包玉刚〔2〕，并共进晚餐。此前，为兆龙饭店题名。

10月29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在谈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时说：从赫鲁晓夫起，苏联一直在说大话。其中赫鲁晓夫说得最大。他说一九八〇年建成共产主义。一九八〇年已经过去了，就算是一九九〇年，也还只剩下五年。他的大话吹破了。不过赫鲁晓夫的大话有他的根据，就是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你也许还记得，赫鲁晓夫给共产主义下了个定义，就是“土豆烧牛肉”。那样的“共产主义”，欧洲不少国家恐怕在一百年前就实现了。中国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我们不讲大话，讲大话没有用。中国底子薄。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一九七九年底我们考虑花二十年时间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将拥有十二亿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美元，将有一个中等的变化。我们设想，在本世纪末小康水平的基础上，再花三十至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目

〔1〕 这是以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的名字命名的。

〔2〕 包玉刚，当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

标。现在看来，本世纪这个目标肯定能实现，还会超过一点。在谈到中国和联邦德国的双边关系时指出：技术转让我们寄希望于欧洲。中国商品进不了联邦德国，出口不增加，进口就受到限制。中国与欧洲，特别是同联邦德国、法国发展关系前景很好，双方都要注意创造好的条件。还说：我们很赞成你们的“尤里卡”计划。欧洲有能力和美国、日本在这个领域处于平等地位。我们希望将来能享受你们的部分成果。

10月30日 上午，会见日本船舶振兴会会长笹川良一一行。指出：我们都是近百年来中日关系的见证人。中日关系史上是有过不少波折的。新中国成立后，日本许多朋友与我们一起努力，发展了中日民间友好关系。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十几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好的。我们还要为中日两国在二十一世纪更加友好而共同努力。

10月31日 向许世友^{〔1〕}遗体告别仪式送花圈。

11月1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科技报》将于明年元旦正式创刊。此前，邓小平题写报名。

11月初 阅国家教委所属三十六所大学校长反映国家对教育基建投资远远不能满足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的来信，作出批示：“再穷，也要照顾科教经费。”

〔1〕 许世友，1985年10月22日逝世，终年80岁。逝世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1月11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谈到中国改革问题时，基辛格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邓小平说：不说是个伟大的试验，但确实是个重大的试验。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唯一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行不行，还要看这十亿人口怎么做。中国落后许多年了，近几年可以看到一些兴旺的气象。更早一点的时候，在一九四九年，黄面孔的中国人站起来了，但是真正的翻身还要两代人的努力。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美国有些人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议论很愚蠢，这些人随便对别国指手画脚，引起别国的反感，对美国也不利。他们的中心目的是破坏中美关系，不顾大局，不以美国的利益为重。在谈到朝鲜局势时指出：美国应搞三方会谈，这样可以促进南北朝鲜有更多更深的接触，这对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极为有利。三方会谈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南北双方会谈。在谈到南亚局势时指出：我们赞成印、巴改善关系，不赞成搞核扩散，也不赞成对印、巴采取不公正的态度。中印主要是边界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很难。中印两个大国应该搞好关系。

11月19日 上午，会见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汗·居内久。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指出：农村改革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发展乡镇工业，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了，才能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否则农村人口都要往大城市跑。这是我们农村改革的重

要内容。看来，这个路子走对了。强调：不管今后怎么发展，中国始终是第三世界国家，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在客人提到邓小平领导制定的国家现代化计划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时说：并不单是我个人的作用，实际上是我们集体的作用。我只是出了点主意。个人的作用如果不同集体结合起来，就发挥不了大的作用。国际上普遍议论，如果中国某人不在，中国现行政策是否能够持续下去。我们的干部和领导班子的逐步年轻化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11月20日 为渭华起义纪念塔题写碑文：“渭华起义烈士永垂不朽”；为云南省宜良县烈士纪念碑题写碑文：“为保卫祖国边疆英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为武昌独立团烈士陵园题名；为《于右任^{〔1〕}先生书法》、《王若飞传》、《杨秀峰教育文集》、《华东抗日解放战争摄影集》题写书名；为《中华英烈》题写刊名；为华中师范大学、河海大学题写校名。

11月22日 上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谈到两国关系时说：中国很重视同亚太地区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你率领这样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这象征着我国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两国的关系应该发展，因为我们是近邻。中国和马来西亚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发展自己，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相互了解和合作。对付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就要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这是

〔1〕 于右任，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冯玉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1949年被迫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

唯一的出路。我们中国在考虑自己发展问题的时候，提出了对外开放。向谁开放？当然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要从那里得到技术、资金和市场。但是中国对外开放一个重要的内容、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开放。这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我们发现同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领域是非常广阔的。第三世界人口最多，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我们相互变成对方的市场，这个市场就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我们在很多方面相互帮助，相互合作，彼此都有好处。甚至在技术方面，也不能说我们全都落后，我们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特点。现在世界舆论说，二十一世纪是太平洋世纪。我们太平洋地区国家要加强合作。我们两国关系发展的潜力很大。

11月24日 同薄一波谈话。在薄一波谈到农村党员干部在发展经济中有三种情况〔1〕时指出：对第三种，要控制，可以收累进税。贷款也应有区别政策。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是必要的。三中全会以来，差两个月到第七个年头了。农村形势是好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不承认不对。这几年所采取的各项办法是对头的，是为了保护前两种发展，如果不保护就会乱，这必须认真注意。但对后一种要管一下，是管一下的时候了。占用国家的资源、国家的贷款，不管一下不行。将来还是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最终要引导到集体经济。不能说总的形势不好，如果不采取这一套政策办法，试问农村出路何在？社队企业也要办，有个就业问题。有一个报告说，雇工经营出现是必然趋

〔1〕 薄一波提到的三种情况是：一、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二、带头个人致富；三、依仗特权谋私致富，其中有的是雇工经营者，得到上边特殊扶植，占用公有资源、大量贷款。

势，不可避免的，现在要考虑如何纳入轨道。这个意见对。

11月25日—27日 接待来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并举行会谈。二十五日下午，和胡耀邦会见金日成，并共进晚餐。二十六日上午，和胡耀邦同金日成会谈，指出：看来，国际上的所有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不管大国也好，中等国家也好，小国也好，谁要发动战争，自己倒霉，而且这样的战争谁也得不到胜利。二十七日上午，和胡耀邦同金日成举行第二次会谈。在谈到奥运会时指出：我们准备申请举办二〇〇〇年奥运会，就是花十几年的时间准备，结合起来发展我们的旅游事业。

11月30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张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李德生为政治委员；郑文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王诚汉为政治委员。

12月3日 上午，会见樱内义雄^{〔1〕}率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在谈到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时说：你们来访的目的之一是探索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要扩大两国经济交流，发展贸易，不平衡不行。我同美国朋友也谈过这个问题，我们与他们也有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我们同你们的贸易逆差更大些，这种情况不改变不行。当然，这其中与我们的工作有差错有关系，需要改变、纠正，但重要的是要同日本企业界和商界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坦率地说，在这方面我们知识少，经验不足。要在本世纪末实现贸易翻两

〔1〕 樱内义雄，当时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

番，靠现在的市场情况是不能适应的，因为你们接受中国的石油和煤炭的能力毕竟有限度，所以不开辟新的商品市场不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你们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不困难，而我们的商品进入日本的市场很困难。总之，希望你们很好地合作，帮我们出出主意。在谈到美苏首脑会晤时指出：我们对美苏首脑的会晤表示欢迎，会晤本身是件好事。他们双方商定今后将继续会晤，这也是件好事。但是对这样的首脑会晤能解决多少实质问题，我们从来不抱期望。美苏两国还会竞争下去，谋求世界和平还是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努力。和平力量发展了，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和平力量发展了，而且发达国家的和平力量也发展了，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谈到在北京日本子弟的学校校舍问题时说：此事我不太清楚，请你们大使馆和外交部继续谈。送走客人后，就这件事对中方陪见的人员说：这是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并不苛刻。恐怕子弟学校的校舍问题不止日本一家，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要求。这个问题，要解决，不要拖下去。可以和北京市商量一下，北京市的地皮紧张，价钱贵一些，但人家出得起钱。

12月9日 上午，会见由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民主柬埔寨代表团。指出：今天我见你们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表示热烈欢迎民主柬埔寨代表团访华。二是表示对你们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爱国斗争的坚决支持。

12月14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指出：中美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很广阔，但合作成效不足，特别是在投资和技术转让方面。技术转让可能欧洲比美国好些。希望贵国在这方面前进一步两步。一九七九年我访问华盛顿

时，我们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至今好多年过去了。直到最近，巴黎统筹委员会才稍微放松了一些，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还有许多限制。这些很不必要，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处。最近，你们国会又通过了一些决议，对中国出口又多了些限制。对你们的法律，我们懂得太少了，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了解，帮助我们对付那么多非常繁杂而又是不合情理的法律。在回答客人提出的政府体制改革的进展如何时说：正在逐步进行，步子迈得不算小。我们是一步一步走的，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过去搞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国革命历史很长，有许多老革命，都是有功绩的。要他们把位子让给年轻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可喜的是我们的老革命家都挺开明，是支持我们的政策的，所以改革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没有一批有雄心壮志、精力充沛、事业心很强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是不行的。

12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赵紫阳谈到巴西愿意购买中国的粮食、煤、石油时说：巴西是个很重要的国家。政治关系的发展要立足于经济关系发展，没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发展不长。我们同巴西的关系有许多领域可以大发展。在谈到利用海外华人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时指出：尚昆同志转来一封信，来信建议要利用华人、华裔为我们工作。我已批了，这是最节省的办法。有些人回来工作也可以，回来几个月也可以，但要解决待遇问题。这个好的建议，过去我们谈过，也在做，但是不是真正做了，效果如何？如果吴庆瑞真的把我们的旅游事业带起来，到本世纪末旅游收入达到一百亿美元，旅游的人只要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就很了不起。用一个人成功带来的利益很大。这方面我们要舍得花钱，不要怕影

响左邻右舍，就是要给特殊待遇，因为带来的利益太大了。在谈到南南合作问题时指出：要找出一条路子来。欧洲市场有限，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所以我们要在第三世界找出路。通过以货易货搞贸易有前途。一个拉美，一个北非，东南亚也可以研究，如泰国，可不可以用我们的东西同它的糖、米交换，也给它找一个出路。对东南亚，我们还没有找到路子。对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都要整体研究一下，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出路。总之，南南合作有出路，我们要寄很大的希望于南南合作。

12月24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12月30日 意大利联合出版社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邓小平文选》意大利文版的赠书仪式，把《邓小平文选》意文版送给邓小平和中共中央。《邓小平文选》意文版的书名是《邓小平文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选编了邓小平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四年期间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二十二篇。

1986年 八十二岁

1月8日 阅航空工业部所属有关厂、所、院校几位科研技术干部和教授给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关于加速航空发动机发展的建议书》，作出批示：“请紫阳同志决定。（我认为所提建议很重要，近期花钱也不算多，似可同意。）”

1月上旬 美国《时代》周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以邓小平像为封面，并载文评介邓小平。该刊评选邓小平为一九八五年度世界风云人物。

1月12日 阅荣毅仁^{〔1〕}本月四日致邓小平、赵紫阳的信，作出批示：“请紫阳、劲夫^{〔2〕}同志处理。荣毅仁同志的意见，我认为是对的，应加支持。”来信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六年多来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某些单位官僚主义严重，要花相当精力去周旋，影响到认真考虑公司改革创新，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业务活动。建议公司继续由总理委托张劲夫负责具体领导，一切重大事务，由张劲夫批示审定后，有关单位应及时办理相应事宜。

〔1〕 荣毅仁，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

〔2〕 劲夫，即张劲夫。

1月17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关于一九八五年经济工作情况和一九八六年经济工作安排的报告，讨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布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在讲话中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书记处抓整顿风气抓得好，建议狠抓两年，抓出成效。这件事抓好了，就可以真正促进改革和建设。就是这样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在整顿风气中确实有些人要开除党籍，要清理一下。抓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十年的努力不行。十年育人嘛！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

和事。二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这个讲话印发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贯彻执行。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1月20日 阅罗桂祥〔1〕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关于推进城市改革的建议》，作出批示：“紫阳同志：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请印发财经小组各同志一阅，最好批交研究机构议论一番。”

1月24日 为《周恩来传略》一书题写书名。

△ 晚，乘专列离开北京。二十六日上午，抵达桂林，住榕湖宾馆。

1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最近发布命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某种型号导弹增程试验的江绍华、裴景峰记一等功，并给他们各晋升一级。

1月27日 由陈辉光〔2〕、韦纯束〔3〕等陪同游览漓江。在游船上问韦纯束：一九七三年来的时候有个工厂污染漓江，漓江的污染问题解决了没有？还询问漓江的管理、旅游等问题。说：现在漓江的水好多了，到桂林就是为看水中倒影。游江可乘帆板船，把帆板船改造一下，做旅游用。帆板船吃水

〔1〕 罗桂祥，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2〕 陈辉光，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

〔3〕 韦纯束，当时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

浅，水大点，倒影可以清楚些。现在石头都看得见了，这里山确实很美，别的地方没有。一九七三年陪客人来时，水比现在大，但是黑色的。在游览途中，回忆一九二九年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以及与李明瑞、张云逸^{〔1〕}、雷经天^{〔2〕}等交往的情况，说：到过广西不少地方，一九二九年在东兰一带，到过河池、柳州、梧州、南宁、百色、都安，在龙州碰到了土匪，被抢走了二十个光洋。李明瑞是红七军、红八军建立时的总指挥，我是红七军、红八军的政委，当时才二十五岁。红七军很能打仗。李明瑞后来牺牲了，你们应照顾李明瑞的家属。

1月28日 上午，游览芦笛岩、伏波山等景点。

1月29日 上午，游览甑皮岩、盆景、七星岩等景点。晚，乘专列离开桂林。

1月31日 上午，抵达重庆，转乘汽车到大足县宝顶，参观大足石刻。中午，乘专列离开重庆。晚，抵达成都，住金牛宾馆。

2月3日 参观武侯祠。

2月4日 在金牛宾馆接见甘孜州白玉县金矿的同志，观

〔1〕 张云逸，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29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任红7军军长。

〔2〕 雷经天，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29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看他们带来的含金量高的金矿石，说：可要看护好啊。

2月5日 上午，游览望江公园。

2月7日 上午，前往新都县参观宝光寺。

2月8日 上午，由杨汝岱^{〔1〕}等陪同，出席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在金牛宾馆举行的春节团拜会，接见四川省党政军负责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解放军战斗英雄、教师、工人、农民和学生代表六百多人。

2月10日 在金牛宾馆东楼大堂审看在北京兴建的四川大厦模型。

2月13日 上午，在金牛宾馆接见中共广安县委书记、副县长等。说：今天终于见到我的“父母官”了。你们年轻、有文化、有希望，你们要把广安建设好。还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2月14日 上午，参观杜甫草堂。

△ 晚，乘专列离开成都。十六日上午，回到北京。

2月21日 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

〔1〕 杨汝岱，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教授的来信，批示有关方面答复：“我本人从不赞成搞我的自传。”来信说：美国的矮脚鸡出版公司希望我写《邓小平传》，个人写这样的书是否可行，请您考虑。

2月23日 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题词：“工作努力，服务周到”。

2月26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端正党风领导小组工作汇报。在领导小组汇报到航天部广宇公司案〔1〕公布以后的反应时，插话指出：党外人士说我们有两顶帽子，一个叫官僚主义，一个叫不正之风，掩盖了犯罪的行为。本来是犯罪的，用官僚主义开脱了；本来是违反党纪国法的，用党内不正之风开脱了。还指出：不管什么人，只要犯了法，都要按法律办事，党员还要按党纪办事。现在我们的缺点是不够严格。对党员要更严格一些，不管多老的党员，都应该严格。因为我们法律还不完善，法律处理要慎重一点。但是党员的标准总是明确的吧！在这项工作中，把一些确实该开除出去的人清除出党很有必要，也是一个好机会，这方面不要软弱。在打击经济犯罪、刑事犯罪中，清除一批人不会犯错误，这样办可以纯洁我们党的队伍。总的来说，我们现在还是处理上比较软。要继续狠抓下去，我们要认真严肃地搞两年，人们对我们的信心，包括国际上的信心，才会建立起来。上海陈小蒙、胡晓阳那个强奸、流氓犯罪案〔2〕判得好，党内外、国内

〔1〕 指航天工业部广宇工业贸易总公司走私18万套彩电组装件的重大案件。该案涉及2名部级干部、5名局级干部和4名处级以下干部。

〔2〕 陈小蒙、胡晓阳，均为上海市领导干部的儿子。1986年2月19日因犯强奸罪、流氓罪被判处死刑。

外觉得我们有希望，但并不会因为这一两件事就坚定了人们的信心，还要看。我们就认真地做，证明我们不是说空话。

3月5日 阅王大珩^{〔1〕}、王淦昌^{〔2〕}、杨嘉墀^{〔3〕}、陈芳允^{〔4〕}本月三日致邓小平、胡耀邦的信，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紫阳同志主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来信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据此，国家科委邀请部分科学家进行座谈。座谈中，对选择高技术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产生了不同意见。四月六日，邓小平阅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五日关于座谈情况的来信，作出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此后，国家科委成立“八六三”计划^{〔5〕}编制小组，组织论证，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十月六日，邓小平审阅赵紫阳九月二十五日关于该计划给邓小平并胡耀邦、李先念、陈云的报告和有关文件，作出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耀邦、先念、陈云同志审核后，提政治局讨论、批准。”十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计

〔1〕 王大珩，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2〕 王淦昌，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3〕 杨嘉墀，当时任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

〔4〕 陈芳允，当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专职委员。

〔5〕 “八六三”计划，即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这个计划是1986年3月提出的，故简称“八六三”计划。

划纲要确定从世界高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选择十五个主题项目，分别属于七个领域，包括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以此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

3月6日 上午，在住地听取杨尚昆关于台湾问题的汇报。

3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台湾问题讲话。

3月25日 上午，会见丹麦首相保罗·施吕特。在谈到前不久香港谣传邓小平病倒，股票市场随即下跌的情况时，说：这几年来我有意识地少做工作，让别人多做。中国的现行政策并不仅仅体现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好久没有露面就是这个原因。现在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退休对人的健康有好处。我不做工作，不参与工作，中国的现行政策照样顺利地进行。这就直接回答了国际上的担心：邓某人不在，中国是否会变？其实，中国的政策并不是我一个人提出的，中国的现行政策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广泛支持，得到广大干部的支持。干部和群众都要求改革。国际上对我讲得太多，不符合实际。当然，我也算一个。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希望欧洲国家也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深信这种政策有利于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中国、欧洲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强大起来，加强团结，维护世界和平。这样，和平是有希望的，战争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世界大战一旦爆发，首先受害的是欧洲。战争没有胜利的一方，即使有一个名义上的

胜利，实际上也是失败。现在中国考虑的是国内搞建设，国际上搞和平。就中国本身来讲，要取得发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没有和平的环境不行，所以，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我们应该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3月28日 上午，会见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戴维·朗伊。在客人谈到西方有人说你的身体不好，但我看你身体很强健时说：我已经十年没患感冒了，夏天还能到海里游泳。我身体这么好，是因为在战争年代洗冷水澡。冬天北方很冷，我洗澡也是一桶冷水。在介绍国内情况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改革的政策，人们一开始并不是都能理解的，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现行政策不能变。只要坚持现行政策，搞它几十年，中国会发展起来的。还

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拿事实来说话》。

3月31日 上午，和杨尚昆会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三峡工程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4月4日 中午，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拉多万·弗拉伊科维奇。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会见后，设午宴招待弗拉伊科维奇一行。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

4月6日 上午，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彭真等前往天坛公园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4月9日 上午，会见希腊总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在谈到改革时说：我们面临着一个发展问题。中国和希腊都是古老的文明国家。我们建国以后有所发展，但失误比较多，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二百五十美元，在全世界次序恐怕是一百位以下。这个状况不改变，人民是不高兴的。我们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以后，决心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自己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搞了七年了，有点收获，给我们的领导和人民带来了信心，带来了希望。现在正在进行改革。这件事并不容易，没有前人的经验，全靠自己摸索。过去五年农村改革的经验很宝贵。改革中出现一些差错是难免的。要继续进行改革，还会出现差错，有了错误就努力去改。在谈到南北问题时指出：南北问题不仅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现在贫穷的国家太多了。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因此，不解决南北问题，人类的发展将遇到困难，这将是一个全球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不晓得要花多少精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4月13日 上午，会见缅甸总理吴貌貌卡。在介绍中国的改革情况和现代化建设目标时说：如果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五年中成功了，中国的变化可以比过去的七年更大。更重要的是通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为今后的十年长期稳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创造好的条件。在谈到中缅关系时说：我们之间的“胞波”关系要长期坚持下去。中国对任何朋友的帮助都是真心诚意的，也许再过十四年，我们的力量增强了，对朋友就可以更多地尽点力量。

4月16日 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蚁美厚三月二十日的来信，作出批示：“请中央财经小组参酌。”来信反映海外侨胞对祖国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4月19日 上午，会见在大陆捐资兴学的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王宽诚〔1〕、霍英东〔2〕、李兆基〔3〕、李伯中〔4〕等。指出：你们为国家教育事业出了很多力，这是为国家、民族做的好事。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政策上的失误容易纠正过来，而知识不是立即就能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这就要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一九七五年我提倡科学和教育，“四人帮”把这当成一大罪状。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七年，我还没出来工作的时候，几个同志和我谈这些问题，我就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次谈话收到我的一本书〔5〕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长远的根本大计。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从教育着手，特别是从小学教育着手的。他们很注意品德方面的训练。德育不是社会主义专有的，资本主义也是有的。国家现在努力在教育科学方面稍走快一点，但是国力有限。改革的根本意义是取得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发展教育也是为了国

〔1〕 王宽诚，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维大洋行董事长、香港中华总商会荣誉会长。

〔2〕 霍英东，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3〕 李兆基，当时任培华教育基金会主席、香港地产商会副会长。

〔4〕 李伯中，当时任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副主席。

〔5〕 指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收入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题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家长期稳定的发展。现在我们是知识缺乏、人才缺乏。越往前走，这方面的问题越大。同发达国家比较，我们落后很远，但不是一切都落后。我们有原子弹、导弹、氢弹，同步卫星上天，通信卫星也可以出口。有和没有不一样，就是有这么几个东西，国家的分量就不同了。但是在许多领域还是落后，要急起直追。现在世界上科学技术发展得很快，美国搞“星球大战”，欧洲搞“尤里卡”计划。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多大，它代表了科学知识的飞跃前进。不只是在军事方面的作用，还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工业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看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搞。在高科技领域里要投点资，投资不能太少，起码要做到在若干领域里，人家有的我们也有，不一定比人家更好，但要有，如激光、生物工程、粒子束、计算机等。搞这些要利用现有人才，将来香港人才也应该容纳在内，还有海外留学生、华人学者，希望他们出力。华人中有很多人才，如李政道、杨振宁，多几个这样的人才就好了。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题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4月20日 阅胡耀邦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关于党风和党内矛盾问题》。

4月中旬 阅李嘉诚^[1]提出的他捐资兴建的汕头大学师资不足，希望国家教委给予支援的来信，指示国家教委对汕头大学创办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尽力设法解决。

[1] 李嘉诚，当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

4月21日晚，会见包玉刚。指出：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不会在香港这么做。对能否实行“一国两制”，总是会有人担心的，其实用不着担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是不会不讲信用的。会见后，同包玉刚共进晚餐。

4月23日上午，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1〕。当客人谈到不久前召开的国际行动理事会讨论了裁军问题时说：我们赞成裁军。从当前总的趋势看，军备竞赛还停止不了，关键还是苏美两国。中国一直在裁军。我们裁减一百万军队，今年内完成。这就是说，我们在两年内就裁减了一百万军队。我们这样做是基于以下的判断：世界局势仍处于紧张状态，但争取和平的力量在壮大。我们认为，有关裁军的会议也是争取和平的会议。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和平是可以争取到的，当然赢得和平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在谈到南北问题时说：讲世界经济发展，要提高到全人类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现在人类处于贫困状态的，可以说是四分之三。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不发展，能设想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吗？首先是市场，四分之三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或叫不发达状态，市场从哪里来？所以，世界形势有两个带全局性的而且带长期性的问题，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看来可以找到出路，赢得和平。但南北问题目前还没有可行的建议，不知道怎么办好。在谈到中国的人口政策时说：中国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力争在本世纪内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这是中国自己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美国国会干涉我们，说中国控制人口、节制生育不人

〔1〕 福田赳夫，当时任日本国际人口问题议员恳谈会会长。

道。他们希望中国不要控制人口，使中国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中国控制人口，使国家发展起来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在谈到国内情况时说：“七五”计划期间的五年十分关键。这五年将决定改革能不能成功。我们这条路是正确的，是必须走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搞好搞坏要看我们的本事，我相信会成功的。当客人说希望你永远健康，站在前列指挥中国时说：不能决定在我一个人身上，不能寄托在我活多久。像我这样的年龄，不知哪天见马克思。实际上好多主意都不是我出的，是其他同志出的，事情要靠他们办。

4月24日 上午，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1〕、查济民〔2〕。说：“一国两制”是国策。香港有人担心这个政策靠不住。要使人有信心，就要做工作，要使他们通过实践相信“一国两制”不会变，我们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作出的承诺不会变。信心问题最终要靠实践来证明，现在不相信，到一九九七年看到政策不变，他们就会相信，到了二〇〇〇年还是不变，他们就更相信，到二〇五〇年他们就完全相信了。“一国两制”首先体现在基本法里，但基本法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要靠实践。有许多香港人主张基本法要搞得非常细。太细了不好，越详细越管不住。你晓得事情会怎么发展？总的来说，我们的政策没有变的理由，变了对我们不利，香港会成为国家的包袱，几百万人的生活怎么办？要靠国家来养怎么行！变不得的。在

〔1〕 安子介，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香港南联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2〕 查济民，当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求是基金会董事长。

过渡时期，香港是会有波动的，一九九七年以后，香港也还会有波动，不会平平安安。问题是不要发生大的波动，我们要做工作不发生大的动荡。小动荡可以预料，不可怕。英国人是要搞一些把戏的，这一点我们要清醒。福利主义不能搞，搞不起。香港问题解决的程序，第一是搞基本法，这是非常郑重的事情。第二就是交接，要顺利交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体在基本法制定出来后，从一九九〇年开始就要认真搞参与，要有参与的时间，即中英联合声明说的过渡时期的后七年。参与，是香港人的参与。当然，也有中央政府的事。从现在起，四年内就要物色人，创造这些人参与的条件，做好准备工作。直接参加管理的人，要找一些四十岁、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一定要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参加进去，才能接得上。参与得好不好同接收得好不好是一回事。驻军是体现国家主权，是个安定因素。不要以为香港不会发生动乱。等到发生了动乱再派军队，问题就严重了。有点象征性的军队，就可以防止爆发动乱。

4月26日 为毛泽覃^{〔1〕}同志纪念碑题写碑名。

5月10日 上午，会见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指出：中国人太多，事情比较难办，再加上底子薄，所以我们确定的发展目标不能太高，要实事求是。“七五”计划不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主要目标是实现城市改革。现在看来，势头不错。发展要有后劲，后劲要从改革中来。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城市改革的同时，农村改革还要继续进行。

〔1〕 毛泽覃，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4月牺牲。

农村改革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明显好了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农村改革，普遍出现了农工结合的局面，大办多种经营和乡镇工业，容纳了剩余劳动力。这是我们成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中国还有一个广阔的天地没有开发，就是第三产业。又指出：中国最近通过了《外资企业法》，就是为了吸引外资。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一个长期不变的政策，不仅要管这个世纪，下个世纪的发展也还得靠它。有人担心中国的法律会变，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投资没有风险，我们会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如果法律不完善还可以补充。

5月13日 为谭启龙^{〔1〕}题写赠言：“人间重晚晴”；为日本亚洲交流协会题词：“面向未来 日本亚洲交流协会留念”；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碑题名；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纪念碑题词：“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为《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孙中山先生画册》、《西南军事文学》题写书名；为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新闻学院题写校名。

5月20日 上午，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霍克。指出：我们的事情很多，但是归根到底是两件大事，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发展问题。两件大事中最重要的是发展，但两个方面密不可分。中国把自己看成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但是究竟能为世界持久和平发挥多大力量，还要取决于我们发展的程度。如果中国发展了，意味着争取世界和平的力量壮大了，我们对和平的贡献也就更多了。发展自己和赢得和平是相互密切

〔1〕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联系的两个方面。中国发展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发展了，就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战争就可以避免。在谈到改革时指出：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还包括改革人事制度。过去的经济体制调动不了积极性，农村因为进行了改革，才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城市改革首先要权力下放，没有权力下放就调动不了每个企业和单位的积极性。国家发号施令少了，下面活动的余地就大，发展就会快。国家发号施令少了，上面的机构就没有很多事情可干，就可以精简了，就可以按才能合理地使用人才，减少官僚主义。中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影响至今还有，也要在改革中逐步消除。我们过去的经济工作背着沉重的大包袱，国家把什么都包起来，下面的积极性发挥不了。企业没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一切靠国家计划，没有主动性，吃“大锅饭”。企业没有权利，也就没有义务，权利和义务都在国家手里。企业对生产的好坏不承担责任，包袱都由国家背起来。如果改革成功，就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现在我们满脑子想的是改革。城市改革每个措施都会影响到千家万户，每个家庭每个人都面临像物价一类的问题。改革中抱怀疑、等着瞧态度的人是有的，办法还是让事实去说服他们。

5月21日 阅荣毅仁本月十八日的来信，作出批示：“请谷牧同志约他一谈。”同日，谷牧批：“已办”。来信说，他将应邀参加在纽约举办的中国经济讨论会，向美方介绍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表达希望美国投资的意向，希望行前邓小平给予指示。

5月22日 审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关于李明瑞的释文，批复：“称李为‘左右江领导人之一’的提法，是正确的。”

5月24日 阅外交部的一份收电，让秘书打电话给李先念秘书转达意见：请外事小组很好研究一下，如何控制中央同志出国的问题。

5月25日 在怀仁堂和胡耀邦、赵紫阳、陈云、李先念谈话。

5月26日 将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初版稿费四千零二十五英镑捐赠给宋庆龄基金会，用于发展儿童文教科技事业。

5月29日 在宋庆龄逝世五周年之日，宋庆龄纪念碑在宋庆龄陵园落成。此前，邓小平为宋庆龄纪念碑题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

5月 审阅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与南朝鲜开展间接贸易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

6月3日 上午，约赵紫阳、杨尚昆谈国防工业问题。在谈到军工体制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军工体制基本上还是苏联的模式。苏联体制的突出问题是军事工业孤立地一马当先，带动不了民用工业，带动不了整个经济和技术。军工力量不纳入整

个经济发展范围，是极大的浪费。军工企业的人才、设备都是好的。这个力量用不上，对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利，对国防建设也不利。因此，要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要在第三季度完成军工几个部移交给国务院的工作，这件事关系到明年计划的安排，不能再晚了。这也是改革。二十七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传达了这个谈话。

6月6日 在住地同邓颖超谈话。

6月9日 上午，会见扎伊尔第一国务委员肯戈·瓦·东多。指出：发展与和平是相互关联的。第三世界国家越发展，和平就越有希望。同时，也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第三世界国家才能得到发展。

6月10日 上午，听取当前经济情况的汇报。参加汇报的有赵紫阳、姚依林、万里、胡启立、田纪云、张劲夫等。邓小平指出：有两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到二〇〇〇年，以十二亿人口每人八百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现在粮食增长较慢。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二是外汇问题。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包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产品不能只讲数量，首先要讲质量。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能力。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三是政治体制改革

问题。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九八〇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通过改革，要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现在我们是背着大包袱前进，每年几百亿元价格补贴，越背越重。这个问题总得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解决。权力不下放，企业没有自主权，也就没有责任，搞得好坏都是上面负责。全部由上面包起来，怎么能搞好工作，调动积极性？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

6月14日 上午，会见秘鲁部长会议主席路易斯·阿尔瓦·卡斯特罗。在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指出：经验是两方面的，一种是好的、成功的经验，另一种是不好的、失败的经验。中国的经验可以研究，但不能照搬。我们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是中国比俄国还落后，中国自己的特点决定了我们的方式是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我们一直把马列主义当作指导思想，但是农村包围城市，马克思没讲过，列宁也没讲过。道路是一条，用什么方式来走，完全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建国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有一段时间照搬别人的经验吃了亏，有时是自己太性急了，还搞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建国几十年来做了些事，也经历了很曲折的道路。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当我们

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遵照毛泽东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政策时，我们会成功，否则就会受到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策。至今七年多的时间证明，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有效的。中国的经验合乎中国的实际，不一定合乎别国的实际。一定要尊重历史，尊重自己的现状，一切从自己的情况出发。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前进中总会遇到不少困难，但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总会胜利。犯错误是难免的，有了错误就总结经验，跟人民讲清楚，取得人民的支持，困难就可以克服，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

6月17日 上午，会见菲律宾副总统萨尔瓦多·劳雷尔。在谈到南沙群岛问题时说：现在世界上很多地图都可证明南沙群岛属于中国。我们倾向这个问题先搁置一下，不急于解决。这样做是为了不使这个问题妨碍我国同有关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过几年后，我们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商讨一个可为各方接受的方式。可否考虑对有关争端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发展，我们有充分的条件成为很好的朋友。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办法。使用同样的模式，也可解决很多热点问题。“一国两制”别人提不出来，由于中国有香港、台湾的具体问题，为了和平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才有可能提出“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问题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还有很多国际争议问题也可用和平方式解决。劳雷尔对邓小平提出的解决南沙问题的立场表示完全同意。

6月18日 上午，会见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西以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部分成员和中国内地的荣氏亲属，同观光团全体成员合影留念。在会见时称赞荣家〔1〕在历史上为发展祖国的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说：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这次你们亲属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你们有本领、有知识，是能够为我们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时说：第一步是到二〇〇〇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可以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金以上的国家的行列，这样的国家不多。国家总的力量大了，那时办事情就不像现在这样困难了。比如，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办教育，就是五百亿美元，现在才七八十亿美元。如果拿出百分之五去搞国防，军费就可观了。但是我们不参加军备竞赛，总收入要更多地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办学。有了本世纪末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更加强大，对世界和平就更加有利。我们欢迎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相信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是会热心支持我国

〔1〕 指以荣毅仁、伯父荣宗敬、父亲荣德生为代表的荣氏家族。荣毅仁的父辈创业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企业是旧中国民族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1956年，荣氏家族在大陆的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这次参加会见的有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成员和内地的荣氏亲属共200多人。

的建设事业的。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6月20日 上午，会见李嘉诚，对他几年来为祖国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和感谢。指出：许多华侨和外国人士都愿意为汕头大学的建设贡献力量是一件好事，全国应调一些比较好的教员到那里去，把这所大学办好。希望通过这件事能够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办事效率。

6月21日 上午，会见马里总统穆萨·特拉奥雷。指出：人的经验当然有用，但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衰退了，所以这几年我在逐步退出政治舞台，力求不要变成事业的障碍，在这方面我们这些岁数大的人要自觉。在介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时说：到本世纪末，我们的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实现小康社会。不富，但日子好过。更重要的是奠定一个很好的前进的基础。下一个世纪再花三十年至五十年的时间，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了这个奋斗目标，首先，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了，再加上全世界的和平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和平力量，战争就更有条件避免。其次，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的五分之一摆脱了贫困，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在历史上为人类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但是长期的封建制度阻碍了我们的进步和发展，后来受到帝国主义的欺负，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所以对人类的贡献少了。第三，到那时，中国仍然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国政策的基础。那时我们已经不在了，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来执行这个政策。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即使发展起来了，还是要把自己看成是第三世界，不要忘记第三

世界所有的穷朋友，要帮助第三世界穷朋友摆脱贫困。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中国，仍不忘帮助穷朋友，这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是在搞社会主义。

6月27日 下午，和赵紫阳、彭真、邓颖超、乌兰夫等接见出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6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乔石〔1〕关于端正党风工作情况的汇报。在讲话中强调要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指出：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明年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纠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社会范围的问题，应当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

〔1〕 乔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策的正确执行。在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时指出：党政分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7月3日 上午，会见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指出：中国把自己看成是和平力量，也把包括东欧、西欧在内的欧洲看成是和平力量。中国同欧洲有许多共同点，没有利害冲突。最大的共同点是彼此都希望和平，都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这也是中国同欧洲发展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础。在政治观点上，你们同我们接近，在技术转让方面，你们比美国和日本开放。但也有问题，例如贸易中我们的逆差很大。我们有很多弱点，发展经贸关系的障碍不少。中国同欧洲的关系必须发展。和平看来有希望，而南北问题尚无着落。南北问题也关系到和平，只有发展中国家发达起来，和平才真正有保证。中国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也是同样的性质。

7月9日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贺龙故居、梅兰芳^{〔1〕}纪念馆、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左权将军纪念碑、民族英

〔1〕 梅兰芳，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梅派”艺术的创立者。曾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1961年8月逝世。

雄范筑先^{〔1〕}殉国处、西藏电视台题名；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毛泽东诗词选》、《吴贻芳^{〔2〕}纪念集》、《为了民主与科学》题写书名；为《科技日报》题写报名。

7月12日 阅章蕴推荐年轻干部的来信，作出批示：“请中组部了解和处理。这是一个发现人才和正确使用人才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一直没有学会的问题。”

7月14日 上午，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钟玉。在谈到干部年轻化问题时说：年轻人有优势。我们注意干部年轻化问题，这要一步一步做。老人有老人的长处，经验丰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毕竟活力不够了。老实说，老同志知识面也不够广，科学的东西我就懂得很少。所以，要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来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

7月15日 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月二十一日呈请确认拟收入《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的九篇文稿作者的报告，在九篇文稿目录旁分别批注意见。

△ 晚，乘专列离开北京，次日晨抵达北戴河。

7月20日 审阅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农牧

〔1〕 范筑先，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时期，坚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1938年11月牺牲。

〔2〕 吴贻芳，教育家。曾任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1985年11月逝世。

渔业部等部门起草的《关于保障农业持续稳步增长的建议》，作出批示：“基本同意，请财经小组审议。”建议提出，根据小平同志最近指示精神，应当将农业发展的两个目标突出起来，确定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可动摇的战略要求：（一）保证人均八百斤粮食供给，努力攀过总产九千亿斤和一万亿斤两个台阶。（二）保证农民收入稳步提高，逐步向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接近。实现这两个目标，农业必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8月5日 下午，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在谈到个人身体状况时说：我测验自己的身体靠两条。一条是不能下海，一条是能不能打桥牌。能打桥牌证明头脑还好，能下海证明体力还好。前不久香港传说我病了，股票就下跌。其实他们很容易知道我身体好不好。只要知道我在打桥牌，夏天还在游泳就行。不过毕竟八十二岁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身体不好也是不可避免的。几年来我一直尽量不做工作，一旦我不在，可以向世界证明，中国的事情仍然可以办得好，现行政策仍然能执行得好。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国家和党的安全问题。我真诚希望身体好的时候退休，退休以后我还是个党员，有意见还可以以党员的身份讲。我人还在，但是别人做工作，这就可以向国际国内证明，现行政策不是决定于我一个人，而是决定于政策本身是否正确。排除个人因素，也许对中国对国际有好处。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指出：我们注意到日本政界有些人很强调日本人的感情，请他们注意不要忘记还有个中国人民的感情。最近有些麻烦，如参拜靖国神社，还有其他的事情。这些问题同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相比，要更本质得多，更实际得多，更重要得多。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正确对待历史也是对日本人民进行教育

的一种形式。二阶堂进表示回去后对邓小平指出的问题要充分反省，该改正的要改正。

8月15日 审阅提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稿，作出批示：“同意。没有意见。”

8月19日 晚，从北戴河乘专列抵达天津。在车站对前来迎接的李瑞环^{〔1〕}说：我要看看你们的开发区，看看市容，还要到港口看一看。在迎宾馆听取李瑞环、吴振^{〔2〕}、聂璧初^{〔3〕}等的汇报。在汇报到他们请了日本神户的港口专家团搞了一年，情况不错时，说：就是要请人，请外国人最节省，花不了多少钱。实际上引进人才也引进了技术。

8月20日 上午，视察天津市区。在中环线西半环的八里台立交桥上俯瞰街景。在李瑞环汇报到三十四公里长的中环线用十个月建成，连外国人都表示惊讶时，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在听到天津还经常搞义务劳动时说：你们经常搞义务劳动，这也是政治嘛。察看东半环的中山门蝶式立交桥，并接见设计者胡习华，称赞他干得好。在得知他是一位三十岁的中专毕业生，并即将被破格批准为工程师时，说：应该，这是谁也不应反对的，这也叫改革。

〔1〕 李瑞环，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市长。

〔2〕 吴振，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副市长。

〔3〕 聂璧初，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副市长。

得知中环线搞得这么快是因为搞了承包时说：就是要搞改革，搞承包，分段、分级承包，实行责任制。之后，视察红桥区咸阳北路居民小区的楼间花园和河西区体院北居民区园林小品。高兴地说：人民群众有了好的环境，看到了变化，就有信心，就高兴，事情也就好办了。在观看从联邦德国和日本引进设备和技术制造的摩托车和小汽车时说：我们要自己解决小汽车问题。要研究出几种新的汽车型号，外型要经常换，像商品的包装一样。在参观天津部分轻工产品陈列时，特别询问了轻工业产品的品种、花色和质量情况，强调：质量问题是最重要的。中午用餐时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 为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题写碑名。

8月21日 上午，视察天津新港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去新港途中对李瑞环说：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你们这里有些基础设施比上海好，有些事情办起来可能容易些。你们准备向外国借一百亿美元，有没有对象？可以多找一些国家。人家借给我们钱都不怕，我们怕什么？我向来不怕。十年时间，有一两个地方，借百把亿美元，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两百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在询问京津塘高速公路情况后说：要研究投资方向问题。日本人说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讯上入手，我看有道理。我们在这方面老是舍不得花钱。在听取天津港负责人汇报港口下放两年来经济效益提高很大，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压船问题时，说：人还是这些人，地

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无非是给了他们权，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权。在经济技术开发区，接见合资企业的中外双方经理，参观丹华公司的车间和试生产出的自行车。指出：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并为开发区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结束对开发区的视察后说：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在听到开发区的年轻人都是自己去闯，有些年轻人是市里的第三梯队时，说：把年轻干部放到第一线压担子，这个路子对，不能只靠人家扶着。他们受到了锻炼，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在参观天津市容和古文化街时说：天津这几年变化确实很大，比以前漂亮多了。古文化街很有特点，对外国人一定有吸引力。在听到保护和修整过去外国人建的小洋房过程中，有人说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不应该修时，说：根本不懂。这怎么能拆呢？要好好地保留，这是文化。这种小洋楼今后盖不起来了，占地多，花钱多。这次谈话的部分内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视察天津时的谈话》。

△ 晚，乘专列离开天津回到北京。

8月29日 阅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建议在北京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中心的来信，作出批示：“我原则赞成，请紫阳同志确定。”

9月2日 上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

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在回答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1〕有何看法时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在回答是否愿意同戈尔巴乔夫进行最高会晤时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在回答中美是否存在大的分歧时说：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在回答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时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

〔1〕 1986年7月2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的讲话中，就苏中关系提出：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苏中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1989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

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在回答致富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时指出：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在回答为什么没有看到中国公众场合挂邓小平的照片时说：我们不提倡这个。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倡导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在回答以后政策会不会变时说：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在谈到退休问题时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9月3日 上午，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听说他去了新疆参观后问：敦煌去了没有？你们不是有敦煌学吗？敦煌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去过天水麦积山吗？那是很有特色的地方。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中苏前一段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贸易、文化交流方面都有一些发展，这不仅对中苏，而且对世界都有益处。估计今后在经济、文化方面还会有一些发展。我们需要苏联的东西，苏联也需要我们的东西。中苏关系正常化仅仅限于国家关系，不会回到五十年代的关系。关于国家关系，我们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平共处。你们日本是全方位外交，如果全方位外交意味着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与全世界各国友好相处，那末中国也可以说是全方位外交。中苏关系正常化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在客人问到中国将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

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一部分。

9月5日 上午，会见日向方齐^{〔1〕}为团长的日本关西财界代表团。指出：我们实行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也暴露出一些弊端。我们还缺乏知识，知识不多，本领就不大，勇气就不够。不克服这些，我们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很快。我赞成大胆使用外资，但大胆以外还要加一个“会”字，即要会使用外资。日本会使用外资，并根据自己的情况走自己的道路，因此发展得比较快。正像日本战后经济起飞时需要帮助一样，我们也希望从各方面得到帮助，也需要学习别人好的经验。我们引进外资时，在技术转让问题上还不够积极，管理人员胆子就更小了。克服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更加开放，创造比较优越、比较合理的投资环境，勇于和敢于使用外资，这是我们的方针；另一方面，希望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时，在技术转让方面更加开明一点。要人家来投资，不让人家赚钱是不行的。有些费用太高，人家就赚不了钱，这方

〔1〕 日向方齐，当时任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会长、日本住友金属工业公司董事长。

面我们要下决心解决。目前关键的问题还是环境不好。外商认为天津的情况还比较好，可惜这样的地方很少。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个障碍。我们还发现有很多问题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提倡改革，不从改革着手不行。这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复杂得很。

△ 为四川省乐至县陈毅故居、江苏省常州市张太雷〔1〕故居、郑州黄河公路大桥、汕头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题名；为《叶剑英传略》、《西安事变简史》题写书名；为安徽省江淮烈士纪念碑题词：“江淮英烈永垂不朽”。

9月10日 上午，会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团长，宋双〔2〕、乔森潘〔3〕为副团长的民主柬埔寨代表团。指出：中国对民主柬埔寨三方爱国力量的支持是坚定的、无条件的、无限期的。希望你们三方合作到底，现在的合作是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胜利后的合作仍然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到那时将出现一个新的柬埔寨。

9月11日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吴健雄、袁家骝教授。

9月13日 上午，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等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在

〔1〕 张太雷，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27年12月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

〔2〕 宋双，当时任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总理、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主席。

〔3〕 乔森潘，当时任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副主席，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临时主席。

汇报到农业情况时指出：美籍华人吴健雄教授说，中国解决农业问题要搞生物工程，投资少，见效快。我看二〇〇〇年粮食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要靠这个。当然还要解决复合肥料等问题。在汇报到财政情况时说：要研究日本人讲的道理。日本在经济起飞时期也发生外汇短缺和财政赤字的问题。怕赤字，怕借外债，就不能起飞。在汇报到劳动制度改革时说：不愿改革劳动制度，实际是鼓励懒人。在汇报到今后借外债主要用于增加钢、石油化工、铝的生产能力的情况时指出：广西平果铝厂要搞。在汇报到外贸改革的设想时说：外贸改革后，经贸部主要是一管政策，二管信息。在汇报到住房改革的设想时说：住房商品化，时间放得长一点，也得加以解决。在汇报到目前企业工资改革已有一些新的办法时说：解决工资问题，关键是企业有自主权。管理权力下放，涉及厂长负责制。现在中国环节多，有些行政公司要改，不搞厂长负责制不行。要搞负责制，首先厂长要负起责任，要明确企业的第一把手是厂长。企业党委的机构太大，人数太多。这两条要下决心予以解决。厂长负责制不要只是试点。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汇报结束后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改革总要有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

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二部分。

9月14日 上午，会见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萨阿韦德拉。指出：我们现在主要是做两件事。第一件是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力争在本世纪内摆脱贫困状态，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水平。最根本的就是这件事。第二件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凡是有利于和平的事情，我们就拥护、赞成；凡是搞霸权主义的，我们就批评、反对。不管是霸权主义，还是小霸权主义，我们都反对。美国和苏联两家谁也不敢首先发动新的战争，双方都有几次毁灭对方的力量。当然不排除有朝一日出现一个疯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就是一个疯子引起的吗？所以我们说战争危险存在。但总的趋势是战争可以避免。我们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既不同这家联盟，也不同另一家联盟。这种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我们的一切对外政策，一切方针、步骤，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八十年代中国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争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这个任务同前两个相关联。要统一，首先我们自己要取得比较可喜的发展，国家力量比较强大，人民生活有较大的改善，再加上国际和平环境这一条件，统一就比较容易了。我们就是根据这三大任务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的。

9月15日 阅胡耀邦、赵紫阳就精神文明决议〔1〕起草过

〔1〕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决议》。

程中提出的意见，作出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胡耀邦、赵紫阳在意见中说：同意起草小组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因为讨论中理解极不一致，“为核心”说法，确实不怎么确切，执行起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矛盾。我们今天自然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在全会后从容讨论。

9月16日 上午，会见芬兰总理、芬兰社会民主党主席卡莱维·索尔萨。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要同步建设。精神文明的内容是什么，需要明确规定。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忽略社会主义。我们是一个人口很多、底子很薄的国家。每一项政策及其实施都涉及千家万户，涉及十亿人口。照顾到这个方面也要照顾到那个方面，照顾到这个地区也要照顾到那个地区，确实不容易。我们对内对外开放政策，不可避免带来一些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所以需要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又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确定的政策，就叫开放政策。没有开放政策，本世纪的第一步目标就达不到，下一个世纪的目标更达不到。我们非常欢迎友好国家和人民同我们加强合作。随着中国摆脱贫困，进一步发展，中国市场的潜力才会真正发挥出来。现有的合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投资者得不到利益。我们告诉他们，这个问题应该解决，而且会逐步得到解决。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知识，缺乏经验。

9月20日 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薄一波谈话。

9月23日 上午，会见第三世界科学院院长阿卜杜拉·萨拉姆〔1〕。说：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应当为促进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科学交流尽力。回顾中国历史，一个多世纪以来，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就受人欺辱，中国最理解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心情。我们现在还比较穷，但我们愿意尽力，我们要量力而行。在客人表示希望中国在第三世界发展科学方面发挥更多的领导作用时说：我们的领导资格不够。我们建国以后对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做了一些事情，但还不很多。中国常说的一句话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可以多尽些力了。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后，我们就可以为第三世界国家做更多的贡献。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第三世界的穷朋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事中国决不去干。在谈到农村改革时说：中国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百分之九十的地区初步摆脱了贫困，日子比较好过。农民说，这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结果。因此，发展生产力离不开科学，包括教育。

9月27日 上午，会见斋藤英四郎〔2〕为最高顾问、河合良一〔3〕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指出：中日经济合作是长远的事情。两国是近邻，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可能到下个世纪更为明显。从实际情况来看，日本有

〔1〕 阿卜杜拉·萨拉姆，巴基斯坦人，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还任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主任。

〔2〕 斋藤英四郎，当时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新日本制铁公司董事长。

〔3〕 河合良一，当时任日中经济协会代会长、日本小松制作所董事长。

的，中国缺乏；中国有的，日本缺乏。中国的问题是还没有开发出来，所以希望日本能从长远出发帮助中国发展起来，这样对日本也有利。可能人们会担心，中国发展起来了会和日本竞争，其实不然。如果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这不仅对中国有利，对日本也没有害处。从长远看，你们在世界上要再找一个大的贸易伙伴，我看只有中国。将来不论中美贸易、中欧贸易怎样发展，中日贸易总是要领先的。中国现在资金不足，而你们的资金又找不到出路。中国政府欢迎用多种方式，开辟新的渠道，增加政府、民间以及金融机构的贷款。美国、日本、欧洲都讲我们的投资环境不好。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工作，让大家放开胆子，新的法规公布以后，也许还有不足的地方，那不要紧，听取意见，再改进就是了。总之，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将带来两国政治关系和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9月28日 上午，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在会议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发表讲话。对决议中要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

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这次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邓小平在全会上的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9月29日 上午，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指出：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摆脱落后。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搞社会主义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究竟什么叫社会主义？有没有穷的社会主义？这些问题过去我们解决得不好。“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讲究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要是很穷，拿什么东西来分配？在谈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

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三部分。

10月8日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王安电脑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安博士。指出：我们主张多吸收一些外资来加快建设的步伐。至于偿还能力，中国人不担心，外国投资者也不必担心。外国企业家在中国投资最没有风险。中国这个市场大得很，现在还没有开发出来，希望你能为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我们讲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穷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搞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国家和人民一步一步富起来。会见时，接受客人转交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和美国前国防部部长施莱辛格的两封来信。来信邀请邓小平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一日出席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并接受该校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二十一日，外交部在建议邓小平接受该学位的报告中提出：接受方式有两种，一是请哈佛大学派人来京授予学位，二是邓小平委托我国驻美国大使韩叙届时出席该校毕业典礼，代表邓小平接受学位。邓小平批示：“第二种方式最好。”

△ 阅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九月二十八日的来信，作出批示：“请李先生转达对安德雷奥蒂^{〔1〕}先生的好意表示感谢，对安先生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来信说：先进科技中心^{〔2〕}能在短时

〔1〕 安德雷奥蒂，即朱利奥·安德雷奥蒂，当时任意大利外交部部长。

〔2〕 指世界实验室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1986年10月17日在北京成立。成立科技中心的目的是在中国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建立国内外研究机构之间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以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内做出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李政道任主任，周光召任副主任。

间促成，一个主因是通过世界实验室的齐吉基〔1〕主席，得到意大利外长安德雷奥蒂的大力支持，由意大利捐助了巨款。

10月9日 上午，会见美国国防部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在谈到中国在广东省建立核电站，引起香港人反对一事时，说：核能是个好东西，不能抛弃。我们在这方面起步太晚了。香港人应该责备我们起步太晚，而不应该责备我们现在积极搞核电站。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美国现在有一种议论，说中美关系比过去更加成熟了，我赞成这种观点。在谈到美苏首脑将在冰岛会晤〔2〕时说：世界上的事情经常出现新问题、新方式，在冰岛会晤就是一个新方式。识时务者要跟得上时代。总之，对话比对抗好。

10月13日 上午，会见由高夫·惠特拉姆〔3〕率领的澳中理事会领导人代表团。指出：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同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关系将只会加深，而不会削弱。凡是对亚太国家有利的事情，中国都将尽力去做。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当然也对所有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开放。中国现在同亚太国家的合作情况是令人满意的。中澳之间没有什么疙瘩，可在广泛的领域里进行合作。中国今天所起的作用虽然有限，但它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力量。

〔1〕 齐吉基，即安东尼诺·齐吉基，意大利物理学家。当时任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室主席。

〔2〕 指1986年10月11日至12日美国总统里根和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会谈。

〔3〕 高夫·惠特拉姆，澳大利亚前总理。当时任澳大利亚—中国理事会主席。

10月14日 上午，会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指出：随着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努力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会见后，设午宴招待客人。席间，就美苏首脑冰岛会晤、中苏关系等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10月1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刘伯承^{〔1〕}的追悼会。

10月18日 上午，会见意大利物理学家齐吉基夫妇和美籍华人李政道夫妇。在齐吉基感谢邓小平对世界科学技术的支持，提出世界科技发展需要伟大领袖人物的支持，把科学无国界、科学为和平的工作推向前进时，指出：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你们成立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室，是一个重要的创举，特别是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得到益处。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积极参加这个世界实验室的工作。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在齐吉基告辞后，继续同李政道谈话。指出：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前几年有的外国科学家问我，你们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速器^{〔2〕}？我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

〔1〕 刘伯承，1986年10月7日逝世，终年94岁。

〔2〕 指中国自行设计、研制和建造的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在李政道说现在搞的这几个中心就是要创造条件，找一些点，争取十年内有所突破，然后再普遍提高时，说：我赞成，你的想法很对。要让出国深造的人回来。不仅在这几个中心，在其他高技术方面也要开步走，使他们回来后有些地方工作。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

10月中旬或下旬 审阅胡乔木本月十八日就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辞条中的问题给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的报告，作出批示：“我赞成。”报告提出：人名条目后所加颂扬性评价语（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建议传略部分均用客观陈述体裁，各主要领导人条目后亦不必署撰稿人姓名。而各卷负责编辑人集体编定后送审，以便尽量减少形式主义。上述处理原则同样适用于古今各方面人物的条目，但只限于百科全书、各种辞书和各种代表性著作（如毛选、邓选）的注释。

10月21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悼念刘伯承的文章《悼伯承》。文章指出：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他始终是把自已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已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这篇文章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0月23日 上午，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在国内政策、国际政策和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都有一些新的做法、新的观点。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要向前看。国内政策是向前看，国际事务方面也要向前看。在处理共产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过去有正确的方面，也有失误的方面。在回忆一九二五年离开巴黎去莫斯科途经柏林短暂停留的经历时说：住了一个星期，受到德国党非常热情的照顾。二十几个同志分住在德国同志家里。当时德国工人生活很困难，德国同志夫妇只有一个房间，让我们睡床上，他们睡地板，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真是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除了参观，还专门请我们看了红色赤卫队的训练。所以，我对德国共产党不生疏。那个时候我们从接触中了解到，德国党对中国革命抱有很大的热情。我们两

党、两国工人阶级、两国人民声息相通，历史很久。我们要相互关心，发扬那个时代的友谊。会见结束后，设午宴招待昂纳克一行。

10月24日 上午，会见宇都宫德马〔1〕率领的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称赞日中友协是最早为中日友好尽力的团体，是开拓中日友好事业的掘井人，喝这个井水的不仅有本世纪的人，还有下世纪甚至下下个世纪的人；不仅有日本的后代，也有中国的后代。在谈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时说：我们的生活水平同你们的差距太大了，我们下决心花七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搞经济建设，第一步摆脱贫困状态，实现小康。第二步再花三十年至五十年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那时中国人口估计是十五亿，国民生产总值六万亿美元。那就意味着中国是中等发达国家，总的国家力量并不弱了。按社会主义制度分配，人民的日子普遍好过。目标不宜定得太高，太高了反而造成人为的紧张。这两个目标都是可以达到的，甚至有可能超过。有什么保证呢？第一，世界的和平是有希望的，战争可能打不起来。就是说，中国可以争取到五十年左右的和平环境来搞建设。第二，中国的资源刚刚开发，很有潜力。我们现在就是一心一意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在谈到中日贸易问题时说：日本经济界人士胆子小，眼光不够远。设想日中贸易额达到日美贸易额的三分之一，中国当然会得益，但是恐怕日本得到的益处更大。同中国做贸易，其他国家竞争不过日本，因为我们离得近。在客人提出年轻人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对此有没有担心

〔1〕 宇都宫德马，当时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日本参议员。

时，说：年轻人思想开放，最支持改革。他们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总之，干部要年轻化，否则没有出路。

10月28日 上午，会见冰岛总理斯坦格里米尔·赫尔曼松。说：欧洲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写了一部小说叫《冰岛渔夫》，我在二十年代时就看过，了解到冰岛人民当时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现在你们干得很好，发达起来了。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指出：中国一直在做维护和平的事。维护和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为了维护和平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不管霸权主义来自哪一方面，我们都反对。我们赞成对话，不赞成对抗。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和平。不管谁要发动战争，连它的盟友也不会赞成。因此，和平是有希望的。但和平不会自动来到，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争取。

10月29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叶剑英^{〔1〕}的追悼会。

10月30日 同陈云、李先念谈话。

11月1日 阅彭真十月二十三日报送杨尚昆转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的《对〈从进军东北到全境解放——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综述（送审稿）〉几个主要问题的说明》，作出批示：“我同陈云、先念同志商定，这种问题不要再扯了。”

〔1〕 叶剑英，1986年10月22日逝世，终年89岁。

△ 上午，会见意大利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指出：我们实行的是集体领导，有事情大家一块商量决定，我自己只起一份作用。这几年我做的工作很少了。与我同龄的人有一批，我们在酝酿让位的问题。干部需要年轻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七年多的时间，我们走了几步，但是还不理想。现在基本上还是老年化或者叫年龄偏大，非改革不行。拿我来说，已过了八十二岁，还能干吗，该让路了。明年我们党召开十三大，要使领导机构更年轻化一点。我们提出进一步改革，政治改革，全面改革，这能为人民所接受，人民会懂得不走这一步中国没有希望。但问题不简单，这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在谈到开放问题时说：就我们领导来说，胆子是够大的，但我们有的干部胆子不大，这也是个障碍。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吸收外国资金 and 知识方面的本领小，各级干部的素质比较低。比较老的同志，五十多岁，革命经历很多，但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比较缺乏，吸收外国资金、技术为我所用的本领太小，要逐步提高才行。我们的开放政策，以后的领导也会坚持，没有这一条，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前景至少是五十年。如果中国发展起来了，更需要合作。

11月3日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陈省身^{〔1〕}教授。说：你一直在南开数学所工作，辛苦了。你立足国内培养人才，这个方法好。用这个方法可以培养更多的人。最好的人才不用才是真正的损失。要努力争取在国外学习的人回国，并为他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回国后能发挥专长。国内办高科技中

〔1〕 陈省身，数学家。曾任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所长，当时任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

心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吸引人才回国。对少数尖子人才的待遇可以高一些，应该向尖子人才提供较优厚的待遇。对有才能的人应该破格评级提升，对成名的学者为何不可以破格提升？中国目前人才往往从五六十岁的人中挑选，这样就不能体现活力。中国只有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家和企业家，并由这批人担负重任，国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长久。我们建国时一些领导人都是四十多岁。当然，我们那时已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革命斗争。现在选拔的四十多岁的人缺乏这个锻炼，三十多岁就应该注意从基层培养锻炼，逐步提到领导岗位。学术界也是一样，有才干的年轻人要上去，学术界才能活跃，光靠老同志还不行。论资排辈的状况一定要改变。学术界、教育界应该在年轻化方面带个头。学术上的本领是不能弄虚作假的，当教授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上了年纪？二三十岁当教授也可以嘛。在陪同会见的宋健、何东昌〔1〕建议每年选拔、重用几十个年轻的科技教育方面的专家，用财政部拨的经费奖励特别优秀的人才时，说：我拥护你们的建议。经费不够可以多拨一些。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题为《要破格选拔优秀人才》。

11月5日 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2〕等谈话。

11月9日 上午，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指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1〕 何东昌，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2〕 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对我们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仍然不能丢掉，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在军队里要讲信念，在人民中间，在青年中间，也要讲信念。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许多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们并不懂。要使他们懂得自由和纪律的关系。在回答应该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谈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内容时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明年党的十三大要进一步，

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所以必须解决效率问题。当然，提高工作效率不仅是党政分开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解决。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这个谈话已分为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篇是《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一篇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四部分。

△ 阅关于核燃料工厂需要特殊措施以保证安全的材料，批转赵紫阳，请他过问这件事，提出要做到保证不出事故，多花点钱也在所不惜。

11月14日 上午，会见前来北京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

会〔1〕的约翰·范尔霖〔2〕为团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指出：实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中叶的两个目标，关键是坚持开放政策。不仅对外是开放政策，对内也是开放政策；不仅是在本世纪，下个世纪实现更大的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离开开放政策也不行。现在人们议论邓某人如果不在了，中国会不会坚持开放政策，我说，不是哪个人在不在的问题，而是这个政策对不对。根据我们近八年的经验，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如果哪一天有人想改变这个政策，人们不会支持他，他就会被打倒。所以说，既然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也是中国的希望，谁也改变不了，下个世纪也会坚持下去。我们实行开放政策的这几年，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合作，但规模还不够理想。可以设想，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到七万亿美元的时候，这个合作的规模是很大的。人们都说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强大市场，可能在下个世纪才能充分表现出来。这次金融市场研讨会，一是要“剥削”你们，从你们那里学点东西，另一个是让美国金融界充分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认识本世纪的中国，认识二十一世纪前半世纪的中国。在回答将来美国商界在中国投资是否可以有直接的拥有权，是否可以同中国共享利润的问题时，说：合资也好，独资也好，都可以，既然合作，不分享怎么行。你们担心我们这方面的法律不完备，这可以逐步解决，最近我们又作了一些补充。我看还有缺陷，以后再补充。请你们相信，在中国投资风险最小，中国的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现在我们确实对这方面的知识不够。

〔1〕 这次研讨会于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北京联合举办。

〔2〕 约翰·范尔霖，当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

为什么法律不完备，就是因为知识不够，本领不够。我们的同志有点怕，怕吃亏。随着我们的知识多一点，就会逐步好一些，胆子会大一点。其实在这方面吃点亏不要紧。外国投资者也不要怕开始的时候吃点亏。你们的知识是足够的，胆子要大一点。在谈到干部年轻化问题时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与领导干部逐步年轻化有关。没有一批年轻人，活力保持不了。还有一个创新问题，这需要年轻人。在接受客人赠送给他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和证券样后，将飞乐股票〔1〕回赠给客人。

11月15日 上午，在住地同邓颖超谈话。

11月18日 阅中国驻莫桑比克使馆反映的中国新闻单位报道失误的电报〔2〕，作出批示：“这样大的失误，出于新华社还是外交部，请外事小组检查，防止类似错误的产生。看来，重申外事纪律，又是时候了。”

11月26日 为四川省开县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和刘伯承同志故居、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中山图书馆、中国金融学院、广西北流县明瑞中学、江西瑞金第一中学题名；为新华书店五

〔1〕 指1986年公开发行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这是新中国首批公开发行的股票之一。

〔2〕 指中国新闻媒体在1986年10月21日的新闻报道中，误将没有随行的莫桑比克外交部部长若阿金·希萨诺列入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专机坠毁身亡的名单中。萨莫拉总统乘坐的飞机是19日晚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回国途中在南非境内坠毁的。11月初，希萨诺继任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莫桑比克总统。

十周年题词：“新华书店五十春秋”；为四川省高县李硕勋〔1〕烈士纪念馆题词：“李硕勋烈士永垂不朽”；为《精神文明辞书》、《神圣抗战》题写书名；为《军事历史》题写刊名；为《金融时报》题写报名。

12月2日 上午，和胡耀邦、赵紫阳等接见出席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的同志，以及出席全国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经验交流会议的代表，并分别同他们合影留念。

12月6日 上午，会见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指出：我们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要留有余地。我们的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政策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在谈到外债问题时说：墨西哥现在是债务太多，而我们是债务太少。债务太少也是个缺点，但我们要避免你们债务太多的问题。你们和巴西、阿根廷借债虽多，但取得了短期内的高速发展，这一点你们是得益的。我们过去常宣传中国既无外债，也无内债，以为这是优点，现在看起来是个缺点。可以借债，但要适度。我们要重视你们的经验。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一要大胆、要坚决，第二要谨慎，要照顾到我们的传统，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引起的波动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相比的，波动更大。就我个人来说，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

〔1〕 李硕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党代表、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两广省委军委书记。1931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而被军阀杀害。

们这一代要搞，年轻一点的同志要搞，我们的娃娃将来也要搞，当然那时他们不再是娃娃了，在管事了。只有这样搞，才能扫除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在谈到人口问题时说：我们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指责我们的人口政策，这是用心不良，是干涉我们的内政，是他们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们当老大当惯了，到处指手画脚。他们说他们讲人道，我们不人道，其实他们是想让中国走投无路，发展不起来，永远处于落后的地步。

12月12日 上午，会见樱内义雄〔1〕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经济体制改革、权力下放、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主要方面。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不够理想。权力下放、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不只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中国的体制改革不容易，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明确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改革不仅是这一代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只要搞改革，左右前后都要碰到障碍。所以我们要慎重，做这件事不能太急，太急了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坚持改革。中国古代有个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我们的改革不只是过五关，但是我们下决心改革。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头绪，但看不到改革的完成。在谈到中日贸易和中日关系时说：中国的逆差太多了不行。这是中日经济贸易关系能否持久发展下去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中日关系，以经济纽带带动政治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才会真正成为亚太地

〔1〕 樱内义雄，当时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

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力量。

12月13日 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谈对台湾工作问题。

12月14日 上午，会见贝宁总统、贝宁人民革命党主席马蒂厄·克雷库。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改善人民生活速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苏联也在研究，他们也没有解决。总之，贫穷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本世纪末中国会出现一个小康社会，虽然不富裕，但日子好过。那时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达到一万亿美元，就是人均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下个世纪，在一千美元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元，还需要花三十年到五十年，设想那时的人口控制在十五亿，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六万亿美元。人均四千元，只能说中国是个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国家总体力量至少将位于世界前几名。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以大胆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讲这个话，我们只能说，社会主义总的来说比资本主义优越，但要靠我们的发展来证明这一点。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我们坚持马列主义理想，过去我们靠这个理想打赢了战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但由于一些失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很好地体现。我们要做这件事，但不是几年时间就能做到的，看来要用五十年至七十年。我们的信念不是空洞的，但必须去做。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要发展自己就要坚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我们要搞活经济，要开放，就必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并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12月19日 上午，听取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等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改革设想。指出：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研究一下。在谈到解决农业后劲和企业改革时说：从长远看，粮食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的，就为谁服务。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要搞企业联合。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在谈到金融改革时强调：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对借外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他们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很快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借外债不可

怕，但主要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在谈到非生产性建设时说：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基建规模特别是非生产性建设规模不能过大，有些开支不能完全由中央承担。要把地方上和社会上的钱，转一部分用于基础建设。我们只能走这条路。还要注意消费不要搞高了，要适度。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

12月25日 上午，和胡耀邦、赵紫阳、彭真、聂荣臻、乌兰夫等接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军以上高级干部。看到军队整编后有许多年轻干部，说：看来我们部队领导干部真是年轻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于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部署军事、政治、后勤等方面的工作。

12月30日 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就学生闹事问题〔1〕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

〔1〕 1986年12月中下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背景下，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发生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张贴大字报的学潮。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潮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煽动。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犯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和学校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

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们。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1〕}。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

〔1〕 这次学潮后，中共中央于1987年1月15日发出通知，要求向全党传达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学习和贯彻执行。

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1〕。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一九八七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向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传达这个谈话的要点。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本年 为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题名。

〔1〕 这个讲话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收入1987年3月出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后又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7年 八十三岁

1月1日 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送审的邓小平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稿，批复：“同意”。讲话稿拟收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学说著作选读》一书。

1月2日 晚，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桥牌冠军赛。

1月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月7日 下午，出席黄克诚〔1〕的追悼会。

1月10日 审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草案）》，作出批示：“同意，紫阳同志处理。”二十二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通过这个决定。

1月13日 上午，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在谈到学生闹事问题时指出：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

〔1〕 黄克诚，1986年12月28日逝世，终年84岁。逝世前任中央军委顾问。

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也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因为他们这次的口号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共产党要有纪律。学生闹点事，影响不大，搞不垮我们。学生闹事不会出大问题，不会影响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处理这样问题的结果，只会使我们的政治局面更加安定，更加团结；只会使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包括开放、改革、建设的方针政策，更加顺利地、稳步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当然，我们也会在处理这种事情的过程中，总结经验，逐步消除弊端，如消除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等等。这样做，最终会使坏事变成好事，使领导者更加清醒，使人民更加清醒。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如果没有秩序，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把我们的精力都消耗在那上面，改革就搞不成了。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这就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还指出：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就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而现在有些人却想把我们的社会引到无法无天的境地，这怎么行呢？连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无法无天，何况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有十亿多人口，几十个民族，建国后三十多年又经历了曲折的历史，所以，发生这

样的事情也不奇怪。“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排除干扰，继续前进》。

△ 下午，在住地同杨尚昆等谈胡耀邦的失误。在谈话中提出“软处理”。大家表示同意。

1月15日 上午，会见阿尔沃·阿尔托^{〔1〕}为团长的芬兰共产党代表团。在谈到中芬两党关系时说：很高兴地看到我们两党恢复了关系。结束“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党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确立了一点，就是我们党历来反对党与党关系中的不平等状况是正确的。所有的党，不管大小和历史长短，都应当平等，相互尊重。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自己国内的情况相结合。我们过去在这方面也有责任。有一个时期我们党对其他党的事情发表过一些议论，有些议论并不妥当。我们两党关系的恢复是在一种新的基础上，即在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我们党根据同样的原则，处理和发展跟苏联党、东欧党、西欧党以及世界上所有党的关系。在谈到当前国内的情况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一心一意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说就是两大任务，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要完成这两项任务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排除阻挡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切障碍。

〔1〕 阿尔沃·阿尔托，当时任芬兰共产党主席。

1月16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上检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通过公报，决定：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会议指出：全党要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内外政策，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实行全面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努力完满实现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1月20日 中午，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在谈到学生闹事问题时说：为什么学生会闹事？根本上是反映了我们领导上的软弱。我们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需要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学生闹事和总书记更换都不是小事，但我们党有足够的力量处理这些事情。这两件事的处理，都不会影响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影响我们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影响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会影响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只会使我们的党和人民更加清醒，更加相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谈到中国取得的成绩时指出：八年来，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

顺利的贯彻，国家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人民生活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学生闹事也否认不了这个现实。八年来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我们政策的制定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我们的目标是现实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个长期奋斗的过程。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在谈到对外开放时指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因为我们的承受能力比较大，加上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即使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也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1月24日 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十日报送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选目，批复：“同意”。

2月4日 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薄一波、姚依林、王震^{〔1〕}、宋任穷、伍修权^{〔2〕}、高扬^{〔3〕}谈中共十三大人事工作问题。

〔1〕 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2〕 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3〕 高扬，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3月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2月6日 上午，在住地同赵紫阳、杨尚昆、万里、薄一波等谈十三大的筹备和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等问题。指出：要组织一个好的政治局，多数是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四十岁的更好。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要，因为再过几年就是他们上来了。又提出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还指出：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十三大报告应该是一篇好的著作。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2月12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题写院名；为中国工艺美术馆、渡江胜利纪念馆题写馆名；为湘南起义纪念塔题写塔名；为赵世炎烈士像题名；为杨闇公^{〔1〕}烈士陵园题名，并为杨闇公烈士题词：“杨闇公烈士永垂不朽”；为《李富春选集》、《纪念钱宁同志》、《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太行革命根据地画册》、《神州学人》、《漆南薰^{〔2〕}遗著选编》题写书名。

〔1〕 杨闇公，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共重庆地委书记。1927年在重庆三三一惨案后不久被四川军阀杀害。

〔2〕 漆南薰，国民党左派，经济学家。1927年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被四川军阀杀害。

2月13日 为《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回忆四川解放》题写书名。

2月18日 上午，会见加蓬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指出：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我们干四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还指出：几年来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是成功的，但是在发展中也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强调：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2月19日 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编辑出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的报告和该书的送审本，批复：“同意”。报告说：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我们准备将您近两年来的一些重要讲话、谈话和一九八三年十月《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增加进去，篇幅由二十二篇增加到四十四篇，字数由近四万字增加到八万字。该书于三月二十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月26日 上午，会见泰国王储玛哈哇集拉隆功一行。指出：中泰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很好，两国之间确实存在着朋友和亲戚的关系。近十年来，两国领导人的来往很频繁。这些交往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亚洲局势总的说来是不错的，但是由于越南侵略柬埔寨，使亚洲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东盟各国的观点是一致的。

3月3日 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余秋里商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度和授予军队离休干部功勋荣誉奖章等问题。

△ 上午，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谈到学生闹事问题时指出：我们这次用很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不搞运动，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减轻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分量。有两条要讲一下。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闹事就使我们不能安心建设，我们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文化大革命”。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搞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发展起来，就要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建设。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在回答是否计划访问莫斯科时说：访问的条件就是解决柬埔寨问题。如果我真的去莫斯科，那是好事，说明柬埔寨问题解决了。看来

希望不大。再过两三年我也走不动了。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3月8日 上午，会见坦桑尼亚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1〕}。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确定了两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这两个阶段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根据这一方针，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的政策，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将带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消极影响。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所以我们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

〔1〕 阿里·哈桑·姆维尼，当时还任坦桑尼亚革命党中央副主席。

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当然，对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因此，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也要改革。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3月9日 下午，在住地同杨尚昆谈话。

3月10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邓力群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和薄一波关于十三大中央委员人选考察情况的汇报。

3月19日 上午，会见加拿大总督让娜·索维。在谈到苏联和中国的改革时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现在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是在摸索中前进。如果中国改革成功了，可能为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为贫穷落后的国家提供一些经验。

3月25日 审阅赵紫阳《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作出批示：“这个设计好。”《设想》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说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

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

3月27日 上午，会见喀麦隆总统、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全国主席保罗·比亚。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谈到农业问题时说：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4月5日 上午，和赵紫阳、彭真等到天坛公园参加北京市全民义务植树日活动。在植树的过程中，指着孙女、孙子对身旁的同志说：我这个小孙女和我一起种了六年树，今年植树我又多带个小孙子。要让娃娃们养成种树、爱树的好习惯。

4月6日 上午，会见瑞典首相、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英

瓦尔·卡尔松。指出：你们是发达国家，我们是发展中的落后国家，但仍可以相互合作，而且合作领域很广泛。在回答现在中国强调经济效益和市场的作用会不会影响党的领导的问题时说：不会。我们正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党要善于领导，党政要分开。这件事我们没有经验，但又必须做。我们的官僚主义与这个问题有关。我们国家太大，问题很复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多时间里，我们办了不少好事，人民生活有显著提高，但群众意见还是不少，所以说不容易。不管怎样，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变。之所以不会改变，是因为效果显著。群众意见虽然不少，但真要放弃这些政策，人民会普遍反对。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指出：干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第一个要数日本。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中国，十分蛮横、残酷。由于有过这段经历，所以我们对日本有斗争，但斗争非常克制。经过这些斗争，中日两国人民理解更深了，从而使中日关系更加成熟。

4月8日 上午，和赵紫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乌兰夫等接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全体委员，并分别同他们合影。

4月10日 为廖仲恺像题字：“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廖仲恺先生像”；为《当代军人风貌》丛书题写书名。

4月12日 上午，会见冈比亚总统、冈比亚人民进步党总书记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指出：我们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是政策对头，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走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

放。这个政策几十年不变。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中国后退了，要改变政策了，这是乱猜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既然我们八年里搞对了，为什么要变呢？要变，人民不会赞成，违背人民意志的事，绝对不会成功。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有时放得多些，有时要收得多些，这是很正常的。看到我们在某一领域里收一下，就说我们改变政策了，这是一种误解。第三世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 and 支柱。第三世界虽穷，但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不能小看自己。中国是真正的第三世界。我们在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做一些试验，对整个第三世界有益，这也是我们的义务。

4月13日 上午，会见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指出：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在客人谈到有的国家对中国能否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有疑虑时说：不会变，没有理由变。要变，我们就什么也搞不成，会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对。中国越发达，同各国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越多。到那时，国际上需要中国市场，中国也需要国际市场，怎么变得了呢？因此，七十年后也不会变。会谈后，和席尔瓦出席《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4月15日 上午，会见坦桑尼亚前总统、南方委员会主席朱利叶斯·克·尼雷尔。表示中国积极支持成立南方委员会，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谈到南北关系问题时指出：目前世界上带全局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人类要发展，不解决南北问题不行。现在的趋势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发展中国家不摆脱贫困，发达国家要发展也会遇到障碍。解决的办法是南南之间发展合作，加强南北对话。只有在南方国家自己发展的基础上，这种对话才比较容易。会见前，在听取外交部部长吴学谦汇报时，表示赞成向南方委员会捐款，并说：对不结盟运动等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组织，我们都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但不要扮主角。扮主角，我们块头太大了，人家难办。

4月16日 上午，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1〕的全体委员。指出：“一国两制”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

〔1〕 这次会议于1987年4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的征集和审定办法》。

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在谈到要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需要的条件时指出：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这个不变的意义。比如雇工问题，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就这个问题本身来说，既然是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允许雇工？因为我们搞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雇工和过去的雇工不同。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还指出：说不变是两个方面的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现在有人议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收。我要说，我们的物价有点问题，对基本建设的投资也收紧了一点。但问题要从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

很自然的事情。总的是要开放。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问题时指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还指出：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这种想法不实际。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那就非干预不行。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

△ 在钓鱼台会见包玉刚。

4月17日 上午，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说：削减导弹问题应该东西方同步进行。东方的导弹转向西方不行，西方的导弹转向东方也不行，都应消除。

如果东西方同步削减百分之五十，其实际意义并不大，但毕竟是好事。美苏两家都有能使地球毁灭几次的导弹，应进一步消除。消除战争的危險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在谈到中国同欧洲的关系时说：欧洲国家都对中国采取很友好的态度，在技术输出上比美国、日本开放些。当然不能说完全满意，希望你们更开放，更大胆些。我们希望有个联合强大的欧洲。欧洲的政治家也一定看到中国的发展也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所以，我们同欧洲发展关系是从这个战略全局出发作出决定的，不是只为捞点技术和资金。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我们相信英国只有一个政府，香港也应只有一个政府，不要“三个政府”。香港现在如搞选举，我看要出乱子，部分选举还可以。总之，问题是稳重、妥善地处理要好些，不谨慎会带来后患。在客人问到台湾问题时说：港澳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对台湾没有影响。没有理由不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我们首先提出“三通”，他们没有理由反对。台湾公开声明反对“三通”，但也有松动。还有一点，蒋经国讲一个中国，我们也讲一个中国，这就是基础，这表明是民族愿望。既然是民族愿望，谁也阻挡不住。“一国两制”是个好方式，迟早要成功的。在谈到自由化问题时指出：中国有些人主张全盘西化，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甚至煽动学生上街。这些人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妨碍中国政治形势的稳定，所以我们迅速处理了这个问题。中国不能再乱了，所有影响稳定局面的事情都要避免。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要健全民主与法制。民主也好，法制也好，都要有领导地进行，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只能稳步渐进。

4月18日 上午，会见刚果共和国总统、非洲统一组织

执行主席德尼·萨苏—恩格索^{〔1〕}。指出：中国现在力量有限，对非洲的帮助不多。现在中国正在向现代化的道路走，如果中国发展起来了，就可以对非洲人民尽更多的力量。又指出：政策不但要对头，而且要稳定，要有连续性。有人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变。我说不会变，不能变。变了，就实现不了我们的总目标了。在介绍中国人口发展趋势时指出：我们制定发展计划包括人口政策，要控制人口增长。如果让人们拼命生孩子，我们的发展就落空了。中国考虑发展问题要从人口多、底子薄这个实际出发，发展目标不能定得太高。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制定政策。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外国的东西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自己搞难免失误，那不要紧，总结经验，自己纠正错误。这就能引导自己不断前进，逐步发展。我们非常强调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坚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月20日 上午，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指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只能合情合理地“一揽子解决”，就是东西段“一揽子解决”。如果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国际国内政策，都摆在非常实际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解决国际争端，都照顾到对方，讲“一揽子解决”就是照顾到对方。中国照顾到印度，印度照顾到中国。会见后，设午宴招待客人。席间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说：我们国家总的情况不错，前不久学生闹事是

〔1〕 德尼·萨苏—恩格索，当时还任刚果劳动党主席。

个小插曲，很快就解决了。现在政治形势稳定，经济发展也正常。在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打苏联牌，不打美国牌，也不许人家打中国牌。在得知客人参观了宋庆龄故居后说：宋庆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蒋介石叛变后，国民党内有两位女性是真正左派，一位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一位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她们一直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4月22日 参加北京市西城区人民代表换届选举，在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投票。

4月26日 上午，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指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还指出：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所

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

4月28日 上午，在住地同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谈话。

4月30日 上午，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一行。在谈话中阐述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已经过去的八年多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确实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在世界上一直处于卑下地位，人家看不起中国人。一九四

九年，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但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现在三十八年，这中间我们又确实有不少失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但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5月4日 上午，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马尼亚·曼内斯库。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世界总的趋势是和平力量在发展，特别在欧洲。第三

世界是和平力量的主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谈判上，和平力量应该团结起来。从全局看，在本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我们的力量越发展，这个仗就越打不起来，从而维持更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即使不说是永久的和平。对第三世界和整个欧洲来说，发展自己同维护和平是一回事。

5月5日 上午，会见前来北京参加第二次中日“亚洲形势与和平”座谈会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一行。指出：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受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我们赞赏日本舆论界、政治界的许多人士对这种倾向持批评态度，持警惕态度。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警惕日本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

△ 上午，会见法国外交部部长让-贝尔纳·雷蒙。指出：中国和欧洲的发展都是和平力量的增长。我们两国都有一点核力量，那只是吓唬人的，只是表明你有我也有，但数量是微不足道的。欧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人，不仅西欧，东欧也一样，不愿意打仗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联合的欧洲，当然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在谈到对法国的

印象时说：我在法国呆了五年多，一九二五年底离开。五十年后再去，感到法国变样了。我问了警察，我原来在巴黎住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了，是在意大利广场。我看到法国的农村也变了，我喜欢你们过去的农村，很漂亮。会见前，对外交部副部长周南汇报英国前首相希思提出向我国借大熊猫一事，表示同意。

△ 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谈话。

5月7日 上午，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在介绍中国发展目标时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整整八年时间，见效了，但这还只是我们走的第一步。因为我们制定的政策是搞七十年的政策。中国的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实现现代化要七十年时间，即本世纪二十年、下个世纪五十年。中国事情难办，没有这样长的时间不够。中国是又大又小。大，就是人多，地方大；小，就是很穷，底子很薄。到了下个世纪五十年代，实现第三步目标，我们中国人可以说，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搞对了。如果搞资本主义决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于还摆脱不了贫困的状态，可能有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得很好，但是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要重新提出闹革命。所以，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5月11日 上午，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1〕。在谈话中说：五年多的实践证明，选你当联合国秘书长是对的。为什么这个职务只能由发达国家的人来担

〔1〕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鲁人。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二位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秘书长。

任呢？指出：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实际受害的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开放政策，中国也坚持开放政策。发展中国家不搞开放，就发展不起来。如果不懂得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又闭关自守，根本不可能发展。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策得不到发达国家的响应，就非常困难。西方要发展，从长远讲，如果只在它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搞保护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它需要新的市场。在发达国家内部已到了饱和程度的情况下，新市场在第三世界那里。在谈到解决世界热点问题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大原则，是任何人不能用武力去侵略别国。

5月12日 上午，会见荷兰首相吕德·吕贝尔斯。指出：听说荷兰不少土地是填海造出来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了不起。中国有句话，叫做“愚公移山”，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你们称得上是“愚公移海”。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我们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

护和平的力量。只要欧洲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險。在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后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的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我们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们着重在教育。这是长期的任务。我们不搞运动，这也不是运动所能解决的问题。一切工作照常运转。我们今年秋季召开党的十三大，将更加清楚地阐明我们的现行政策，而且要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来适应经济的发展。我们现行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变化，开放政策只会更加开放。不但本世纪如此，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后还会如此，以后更是如此。中国是稳定的。过去我们多灾多难，党和国家经过许多波折，有些事情人们难以理解也不奇怪，但我们自己是有清醒估计的。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

5月14日 为中央警卫团题词：“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为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大会题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广州起义烈士纪念碑题词：“广州起义烈士永垂不朽”；为《新华

日报》总馆纪念碑题写碑名；为井冈山根据地军事博物馆题写馆名；为《冯玉祥五原誓师》题写书名。

5月16日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李远哲〔1〕教授、李政道教授及夫人秦惠箬。指出：我们都是立足于振兴中华民族，口号是“振兴中华”。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一个根，但如果光是根深蒂固，不发扬光大，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光彩的。我国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处在这样一个地位，要急起直追，要努力赶上。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谁也拿不去。现在台湾经济尽管比大陆好，但差距正在缩小。蒋家带去的老人多数希望统一。我们现在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台湾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这一方针本世纪不会变，下个世纪也不变。有人问道，为什么讲五十年不变？有什么道理？我说，没有变的必要。这也同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不变有关。到下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变了就没有希望了。到那时，台湾、香港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的比重就更小了，这就更没有变的必要。台湾问题的解决，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希望国家能早点统一。中国人脸上开始有光彩是什么时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祖国统一后，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就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飞起来了。会见后宴请客人。

5月22日 上午，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在介绍将要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时说：十三大要进一步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更加肯定我们十一

〔1〕 李远哲，当时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如果说有更新的内容，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最主要的是要搞个好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以进一步贯彻我们的领导干部逐步年轻化的方针。现在说年轻化，是比较年轻，希望在下一个十年中出现更多四十岁左右搞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的人。我们十三大完不成这个任务，十四大、十五大也许差不多。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把这项工作耽误了。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未来是他们的，他们不能闹啊。他们一要有理想，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理想、四个现代化的理想；二要有纪律。我们强调有理想，有纪律，用这个来教育青年，教育后代，培养人。在谈到国家统一问题时说：我们两家都有个统一问题。你们解决同南朝鲜的关系问题，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关键都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搞好。总有一天，要体现出我们的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现在世界总的局势表明，各个争端问题都不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世界总的形势是谁都不想发动战争。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要利用这个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

5月24日 上午，到钓鱼台国宾馆同即将到天津参观的金日成话别。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说：现在国际问题更加复杂化，处理国际问题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方法和方式，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回答问题。现实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千变万化，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党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处理问题，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别的国家的同志要理解这一点。朝鲜半岛问题，我们谋求的目的是一个，就是朝鲜半岛的统一。

我们支持你们的统一。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现在我们搞开放，对问题的认识也要开放，我们要把经济搞活，也要把政治搞活。在谈到开放问题时说：金主席去过深圳没有？下次有机会可以去旅行。最近深圳技术比较高的产品可以打入国际市场。开放政策的成功就要看这一条，这是真正的成功。深圳只用六七年时间，从一个小城镇变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经验是很宝贵的。还有烟台、青岛，一搞对外开放，也是五六年时间就变样了。现在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农业问题。我们要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更重要的是实行正确的政策，要使农民重视农业，生产粮食有利可图。调动积极性要靠政策。使农业更加现代化，是更重要的政策。这不是两三年能见效的。很可能整个九十年代我们其他方面都很顺利，就是农业不顺利，我们担心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正在研究解决。

5月29日 上午，会见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在回答有人担心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说：中国政治上是稳定的，可以放心。不同的意见有，但对搞四个现代化的总路线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大家是拥护的。因为是新事物，世界上也没有经验，对某些具体问题有怀疑有担忧，这也难免，可以用实践来回答。在谈到中国的发展同世界和平的关系时说：中国这么穷，但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三角之一，其原因就是我们块头大。中国坚信自己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谁要挑起战争，中国站到哪一方面，对方都吃不消。中国的发展需要新加坡的帮助。会见时，接受吴作栋赠送的邓小平一九七八年访问新加坡时亲手栽种的海苹果树的照片。

5月30日 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刊题词：“把马

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为《欧美同学会会刊》题写刊名。

6月2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通令嘉奖参加大兴安岭扑火救灾的全体解放军指战员。

6月4日 上午，会见矢野绚也^{〔1〕}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在谈到中朝关系时指出：中朝关系用我们通常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中国的立场很清楚，不赞成南朝鲜北进，也不赞成朝鲜北方南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损害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点，都希望朝鲜半岛有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关于中国是否参加汉城奥运会问题，中国历来主张完全按照奥运会的章程行事。在回答对中日关系有何见解和忠告时说：总的前提是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从新中国建立到一九七二年邦交正常化之前，中日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两国民间的交往还是比世界任何国家都多。一九七二年建交后，总的来说关系还是正常的，特别是经济关系发展得比较快，在中国对外贸易额中日本占领先地位，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中日建交时，中国并没有因此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中日是两个伟大的国家，又是近邻，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我们作出了不要赔偿的决策。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人数不多，能量不小。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台湾，没有忘记从另外的角度解释日本

〔1〕 矢野绚也，当时任日本公明党委员长。

战后宪法，没有忘记制造中日之间的隔阂，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们对此始终是担心的。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日本，主张同中国友好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会世代发展下去。无论是两国的政治家还是人民，都要从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不仅限于政治问题，还包括经济问题。在介绍将要召开的十三大筹备情况时指出：十三大总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什么变动，如果说有新内容，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要符合中国的实际，不能照搬外国的东西。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中国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搞经济建设。所以我们不赞成青年闹事，一乱，人们就会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我们的所有精力就不得不花费在处理那些问题上，那样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为搞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领导层将更加年轻化一些。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所以现在还不能太年轻化，可能还要经过两次代表大会，这样做也许更好一些。但是，这次党代表大会要体现我们的领导层更加年轻化，准确地说是比较年轻化。

6月9日 在住地同王震谈话。

6月11日 在住地同彭真、王震谈话。

6月12日 上午，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指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事情

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同样，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指出：改革步子要加快。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我们的对外开放采取了多种方式。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我们正

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1〕。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强调：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都已经确定，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快。现在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今年十月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议程之一。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增强活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调动积极性

〔1〕 1987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海南建省，海南岛为经济特区。

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6月26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奖励参加大兴安岭扑火救灾有功单位和个人。命令说：为表彰扑火救灾中涌现出的大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中央军委决定对其中功绩卓著的七个单位和三名个人予以奖励。

6月28日 上午，会见出席第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双方正式成员。指出：我们总的方针是世代友好下去，这一方针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制定的。当时两国还没有官方关系，民间往来很多。毛主席、周总理多次重申我们要世代友好下去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会因为中国领导人的变动而改变。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没有理由不友好下去。在谈到目前中日关系的状况时指出：两国交往有发展，但不能令我们很满意，日本可以而且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有些不愉快的事情，需要妥善处理，这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中日关系历史上的纠葛，坦率地说中国方面没有责任。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的评价，要强调以新的向前看的态度，不要找麻烦，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新的纠葛。现在这些纠葛没有一件是中国引起的。对这些问题中国采取了最大的克制态度，包括说

服人民。麻烦来自多方面、多种形式。如“光华寮”问题〔1〕，日本采取司法审判的形式肯定是错误的。“光华寮”问题的确涉及“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的问题，要从这个角度来处理，不是值多少钱，不可以当买卖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希望尽快解决，不要拖。对这样的问题，日本政府不是无可作为的。我们考虑同日本的关系不是几年的关系，是世代友好下去。我们双方考虑问题都要立足于长远，要解决长远问题。对现在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纠葛，都要冷静、迅速地通过合作，尽快解决好，以免影响我们长远关系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考虑长远的方针和政策。我们一心一意地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改革。

6月29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

〔1〕 光华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中国政府在日本京都市内购置的作为中国留日学生宿舍的一座属国家所有的房产。1967年台湾当局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光华寮住客迁出。1977年该法院驳回起诉，将该房产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后台湾当局又以“中华民国”名义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大阪高等法院受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1986年2月，京都地方法院据此又改判所谓“中华民国”胜诉。光华寮住宿生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年2月大阪高等法院维持原判。根据国际法原则，光华寮产权应归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西藏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如果在那里的汉人多一点，有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不是坏事。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这个谈话已分为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和《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

7月1日 在住地同赵紫阳、杨尚昆、李先念、邓颖超等谈话。

△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人民日报》及其他各大报重新发表已收入《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的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该文根据原记录增补了有关厂长负责制的内容。

7月4日 上午，会见孟加拉国总统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我们国家大，党的历史很长，建国也已经有三十八年，因此好多习惯势力不能低估，而右的干扰也帮了习惯势力的忙，所以我们也不能忽视右的干扰。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落后状态，中国要发展起来，要实现四化，政治局面不稳定，没有纪律，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功。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在谈到十三大时指出：我们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使我们领导层比较年轻化一些。这两件事都不容易，但是非干不可。政治体制改革如能在十年内搞成功就很了不起了。领导层年轻化要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恐怕要十年时间。还指出：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当然战争的危險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利用这段时间

发展经济，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状况。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

7月6日 在住地同赵紫阳、杨尚昆谈话。

7月7日 在住地同赵紫阳、杨尚昆、万里、薄一波、胡启立谈中共十三大的人事安排。

7月8日 为湖南省宁乡县刘少奇纪念馆和湖北省蕲春县李时珍^{〔1〕}纪念馆、药物馆题写馆名；为广州叶剑英纪念碑题字：“叶剑英”；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创建四十周年题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影片《伟大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题写片名；为《回忆司徒美堂^{〔2〕}老人》、《战斗在云贵高原的光辉历程》、《马万祺^{〔3〕}诗选》题写书名。

7月9日 为中国艺术节题名。首届中国艺术节于九月五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

7月10日 上午，在住地同邓颖超谈话。

7月14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谈到中德两国关系时说：我们发展相互关系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不但要看到本世纪，而且还要看到下一个世纪，

〔1〕 李时珍，明代医药学家，著有《本草纲目》。

〔2〕 司徒美堂，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5年5月逝世。

〔3〕 马万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

要长期友好合作下去。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八年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不相适应了。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并且会影响到许多事情。政治体制不改革，官僚主义就消除不了。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这是我们十三大的基调。十三大以后，我们党和国家机构领导班子要相对地年轻化，以增加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力。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老党，领导层里老年人比较多，这种状况不改变不行。因为老年人往往有一种习惯势力，精力也不那么充沛了，对新鲜事物不那么敏感了。所以要力求做到逐步年轻化，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相应地还有国家机构的领导成员，要年轻化。会见前，听取吴学谦汇报。在得知目前中国在联邦德国的留学生已超过两千人时说：告诉国家教委，今后要增加去欧洲的留学生，去欧洲一样可以学到东西。欧洲不只是联邦德国，还有其他国家，各有特长，都可以学到本领。

△ 晚，乘专列离开北京，次日晨抵达北戴河。

7月24日 上午，接见由中共中央邀请到北戴河休假的十四位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年科学技术工作者，并合影留念。在讲话中说：对于你们在各自领域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今天没有在场的许许多多科学技术领域里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同样地，国家感谢他们，党感谢他们，人民感谢他们。

7月25日 同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谈话。

△ 《解放军报》发表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的题词：“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

7月28日 会见来访的客人，谈台湾问题。指出：起码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个是“三通”，一个是国共谈判，先谈起来。如果台湾认为不可能马上统一，那末，也应先造成这么一种声势。还是先谈起来好，谈的过程可以是长期的，而且什么都可以谈。一谈起来就是造成了一种形势，表明我们总要统一。有了这种形势，台湾出现什么不测都可以对付。美国刚与我们建交，几个月后就搞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这是民主党搞的。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对台湾的政策是一致的，就是不愿看到中国统一。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就要形成一种制约力量。不承诺不使用武力就是一种制约。台湾与大陆统一是有共同基础的，这就是民族统一，发扬光大。虽然台湾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毕竟也是统一。我们所提的第三次合作的基础，就是都同意一个中国。

△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前线某部政治指导员张新奎烈士“舍身救战友的模范指导员”荣誉称号。张新奎在执行战斗任务中，临危不惧，先后五次冲进大火，救出五名伤员，在最后抢救一名战士时壮烈牺牲。

7月30日 深夜，乘专列离开北戴河，次日晨回到北京。

7月31日 上午，和赵紫阳、李先念、彭真、徐向前等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大会。

△ 深夜，乘专列离开北京，次日晨抵达北戴河。

8月15日 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本月十三日报送的关于编辑出版《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报告和随附的六篇送审文稿，批复：“同意”。

8月25日 上午，会见泰国外交部部长西提·沙卫西拉。指出：中国历来主张，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后，柬埔寨应成为一个独立、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国家。这个国家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

8月28日 深夜，乘专列离开北戴河，次日晨回到北京。

8月29日 上午，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利昂妮尔德·约蒂〔1〕和雷纳托·赞盖里〔2〕及其家属。指出：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在谈到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时说：

〔1〕 利昂妮尔德·约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成员、意大利众议院议长。

〔2〕 雷纳托·赞盖里，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成员、意大利共产党众议院党团主席。

我们真正的变化还是在农村，有些变化出乎我们的预料。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同时，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在回答是否出版新的邓小平文集时说：我的东西没有什么高深的语言，只能说是对解决当前中国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随后，接受客人赠送的意大利议长使用的铃和新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9月1日 上午，会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团长和宋双、乔森潘为副团长的民主柬埔寨代表团。指出：柬埔寨胜利之后，我们希望柬埔寨还是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领导的立场不变。到那时，中柬关系要恢复到五十年代那样，当时中柬对外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对这个信念，我们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中国就是这样奋斗出来的。

9月4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的邓小

平《论当代中国基本问题》英文版、俄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邓小平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七年六月的谈话和讲话共四十七篇。

△ 上午，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谈到中国国内形势时说：人民看得很清楚，现行政策使所有的人都得益。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不仅本世纪，就是我们这些人不在了，这样安定团结的局面和稳定的政治局势还能得到保证。这主要是因为，一个是政策正确，一个是人民赞成。还指出：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新事物，没有前人的经验，也没有外国的经验，某些方面不一定搞得那么准。所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几十年内，在某个时候作些调整还会有。我们现在加快步伐，在加快中有时也要作些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每一个措施都要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要更稳，必须是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地进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力求国家的政策和实行这些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自己的实际，力求及时总结经验，有错赶快改。有人说中国有两派，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保守派。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赞成改革，是全党赞成改革，如果说是一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一派。至于保守派问题，保守的人有，但作为一个派，中国没有。中国确实有一些人对改革的某些问题、内容、步骤有不同意见，但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也是赞成改革的。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在谈到干部队伍年轻化时说：我们领导层年轻化大体需要十年，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让一些比较年轻的政治人才起来。像我们这样年岁的人，首要任务是寻找新的、年轻

的接替人，因为这关系到政治、政策长期稳定的问题。

9月5日 上午，会见二阶堂进^{〔1〕}率领的日本自民党“星期四俱乐部”访华团。指出：一九七二年中日双方采取友好决策，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应当珍惜。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结束了过去大约一个世纪的不幸，开辟了未来，是实现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政治基础。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过去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这次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十三大要作的报告将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是十三大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逐步年轻化。十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都将比较年轻一些。领导层年轻化是九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但做起来不容易。年轻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一要保持政治的活力，第二要保持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年轻不行。

9月6日 在住地同赵紫阳、陈云、薄一波、乔石、邓颖超、吴学谦谈话。

9月11日 上午，会见冢本三郎^{〔2〕}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八次访华团。指出：这些年来，我尽量少做事情。没有其他理由，只想多活几年。我只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在本世纪末中国实现小康社会；另一个就是我要活到一九九七年七月，到香

〔1〕 二阶堂进，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

〔2〕 冢本三郎，当时任日本民社党委员长。

港做一次旅行。那时我以退休后的身份去，只能说是旅行。在谈到十三大使领导机构成员年轻化问题时说：我的本意是完全退休，提了好几年，但大家不赞成。从现在的情况看，从中国人民的愿望来说，还需要我。我搞半退休，这能实现政治局常委的比较年轻化，又能保证自己还能起应该起的作用。这种处理方法是中国的，别的国家没有，只要在中国行得通，也是可以的。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说：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应该把中日关系看远一点，短视是有害的，是不可取的。在“光华寮”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不大一致。你们看作是法律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政治问题，分歧就在这里。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能离开政治原则。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是确定两国关系政治原则的两个文件。而“光华寮”问题，是“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的问题。希望你们是和—个中国打交道，中国也是和—个日本打交道，来解决问题。我们对“—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或者是“—个半中国”的问题非常敏感。在客人谈到中国变化很大时说：北京有些高楼，但它不能表明中国实质上的变化。建高楼很容易，而要解决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吃穿问题，使他们生活好一点，可不容易。看中国的变化，首先要看农村的变化，看中国的稳定，首先要看农村的稳定，因为它毕竟是百分之八十的人的问题。

9月13日 上午，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指出：中国要更加开放，加快改革步子。同中国合作兴建像山西平朔安太堡煤矿这样大的项目，有些外国人还缺乏勇气。希望有更多的外国企业家同中国合作。哈默说：八年前你在美国访问时同我谈到“你以前曾帮助列宁发展工业，现

在为什么不去帮助中国呢？”我当时答应了，现在我的承诺终于实现了。

9月14日 委托李先念在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二次大会〔1〕上代为接受第三世界科学院授予的特别荣誉勋章。

9月16日 上午，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指出：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件新事情，既没有外国的经验，也没有先人的经验。改革开放的内容很多，每走一步都要影响一些人的利益，所以力求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在动乱中完成不了这些任务。我们搞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三部曲”，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局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根据本国的特点和经验稳步前进，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

9月26日 新华社报道，《邓小平文选》罗马尼亚文版由布加勒斯特政治出版社出版。

9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内部出版。该书收入邓小平一九八七年二月至七月的文稿九篇。十一月，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10月6日 上午，在住地同邓颖超谈话。

〔1〕 这次大会于1987年9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有5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和科学院院长、科学部部长参加大会。大会旨在促进南南国家、南北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

10月7日 审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本月五日送审的邓小平一九五〇年《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的整理稿，批复：“可以，就是罗嗦了些，最好删节一半。”送审报告说，该文拟作为《刘邓大军征战记新闻编》的代序言。

10月13日 上午，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在谈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我们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四人帮”时期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简直荒谬得很！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资的极大丰富，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够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能够是贫穷的吗？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

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再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又如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所以，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见后，设午宴招待客人。席间，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指出：那时各国反应不一，许多国家对中国丧失信心，而你们没有。“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灾难，但这期间并不是一点好事都没做，比如那时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同日本建交，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在谈到十三大人事安排时说：我们老人要交班。人们担心年轻人不行，我们过去管大事时都很年轻。我二十三岁时担任中央秘书长。一九五六年八大的准备工作是我主持搞的，那时我才五十二岁。为什么过去我们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时可以，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就不行呢？锻炼一下，不行就下去嘛。要年轻化很不容易，大体上要用十年时间，才能做到比较理想。现在找四十来岁的人比较困难，原因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所以要花十年功夫。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人中选拔就比较容易了。在谈到改革时说：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

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

10月15日 为建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玉章^[1]雕像题字：“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吴玉章”；为《还我河山》、《新时代的英模》、《今日北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工作》（画册）题写书名；为邓宝珊将军纪念亭、夏理逊^[2]大夫纪念碑、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题名。

10月16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谈到将要召开的十三大时说：十三大后会加快改革。十三大本身就是个改革，不仅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也要改革。各级领导机构要年轻化，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改革。这一时期，我

[1] 吴玉章，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1966年12月逝世。

[2] 夏理逊，即蒂尔圣·莱孚·夏理逊，加拿大人，医学博士。1922年来中国支持孙中山工作。抗日战争中，帮助新四军开展医疗救济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曾将数千吨救济物资押运到解放区。1947年1月逝世。

提出全退，但都不赞成，所以半退，保留军委主席。根据国家的需要，根据党的需要，我还是可以起现在起的作用。这样的安排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旦马克思召见，不会引起什么波动。在有生之年做好后事安排，非常有利。这次人事变动更加体现了政治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比较年轻的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不是五年的安排，而是十年的安排。中国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我们与你们历史不同。你们西方民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不能照搬你们的東西，一切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去办。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指出：达赖喇嘛和美国参议员给我们制造点麻烦^{〔1〕}，对我们影响不了什么。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谁也没有这个本事。我们对西藏采取扶持的方针，要内地帮助西藏发展。我相信西藏会比较快地发展起来，关键是要使西藏人民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谈到中国国内形势时说：总的形势是好的。至少在本世纪九十年代会像现在一样平稳地、速度不算慢地发展。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发展速度不要太快，要适当控制速度，否则配套跟不上，能源、原材料、资金都跟不上，特别是不能为下个世纪发展的后劲打下很好的基础。我们计划连续几十年的发展，要避免曲折，更要避免倒退。总的是要加快步伐，在加快步伐中，头脑要冷静，步子要稳妥。

10月20日 和赵紫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主持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全会决定本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党的第十

〔1〕 1987年9月19日，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到美国活动，鼓吹西藏独立。此前，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所谓《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问题的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违反人权的修正案》，对中国政府进行攻击。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中央委员会向十三大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十三大审议；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三大的报告；确认本年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请求和推选赵紫阳代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决定。

△ 阅余秋里本月十九日给杨尚昆并报邓小平、赵紫阳的信，作出批示：“（一）完全同意接受秋里同志的请求，秋里同志可改任中顾委常委。（二）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信中说：我已年满七十三岁，历史上多次负重伤，近几年又做过几次大的手术，体力、精力已明显下降。我衷心恳求中央不再提名我为十三届中委、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同时恳请辞去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请求中央不再安排我其他任何职务。

10月25日 上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主持大会开幕式。赵紫阳受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托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明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报告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报告根据中国国情和邓小平的设计，确定二十世纪后二十年和二十一世纪前五十年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即

第一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报告还提

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務。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邓小平同志一九八〇年八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还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做出了重大贡献。十一月一日上午，邓小平出席大会闭幕式。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

11月2日 上午，和王震会见日本船舶振兴会会长笹川良一。说：我们刚开过党的十三大，我已经退出中央委员会，我相信年轻人一定会干得很好。

△ 下午，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1月3日 上午，和李先念、彭真、邓颖超、聂荣臻、

乌兰夫等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老同志，会见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11月7日 在住地同李鹏谈话。

11月9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给援建福马公路〔1〕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步兵团记集体一等功，赞扬该团为修筑福马公路做出重大贡献。

11月11日 上午，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总理李根模。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改革，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到今年为止已经过了九年时间。九年来，发展比较顺利。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肯定这九年是搞对了，对过去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这个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解答了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能够持久地延续下去。十三大报告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讲了到建国一百年时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下个世纪中叶，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将发展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一百年已经过去三十八年，还有六十二年，所以说我们的路还很长。以后的六十二年，我们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很谨慎，并且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还是要讲，一点不能疏忽，要勤俭办一切事情，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也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还不能说服人家相信社会主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时，我们就可以放胆地说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我们第一步要解决温

〔1〕 福马公路，指福建省福州市至马尾港的公路。

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比我们原来的设想提前了两年。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的目标，看来也有保障。进入下个世纪，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会相当激烈。就是说，我们的发展很不容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要五十年。实现下世纪五十年翻两番也要在本世纪打好基础，特别是智力方面要打好基础。因为那时候管事的是我们现在的娃娃。从娃娃时代起就要打好基础。我们的发展战略规划，第一位是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国家大，人口多，这是我们的优势，但人口太多也是我们的弱点。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有好多事情我们预料不到，比如今年物价并没有调整，但上升了，而且幅度不小，这就使多数人承受不了。这是没有预料到的失误，估计今后还会有失误，但我们相信，及时总结经验，可以纠正错误。在谈到中共十三大做出的人事安排时指出：解决人事问题，也是改革问题。我们党的领导成员有大幅度的更新，这件事很重要。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出了乱子就是大乱子。中国出了大乱子，收拾起来很不容易。现在我还保留军委主席职务。我原来同一些老同志商量全退，大家都不赞成。现在叫半退，但总有一天要全退，这也是一种过渡。我会力求减少自己的工作，力求减少对党和国家事务的过问。我的任务是逐渐使自己从党和国家的事务中消失掉。在谈到朝鲜统一问题时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自主和平统一方针。中国有统一问题，朝鲜也有统一问题，看来要解决还会经过许多曲折，但一个民族的统一事业最终是会实现的。

11月16日 上午，会见土井多贺子^[1]率领的日本社会

[1] 土井多贺子，当时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

党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有许多内容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我的看法和意见，但大部分是集体的意见。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个是更新了中央领导班子，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并且加快步伐。在十三大以前，国际舆论和国内的人民还有些担心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是会连续下去，十三大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国人民和国际朋友都放心了。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五六十年时间，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要用上百年的时间。我们要坚持建党几十年来最好时期的传统，就是要艰苦奋斗，谨慎办事，兢兢业业。还要看到我们的路是漫长的，还会遇到许多困难，错误也是难免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我出国访问的任务早已完成了，不准备再出国了。但我答应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两年前我曾捎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他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和平的国家，我

可以到苏联任何一个地方同他会面，这件事还能办得到。如果在两年内我身体还可以，就还能实现这个诺言。^{〔1〕}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说：希望所有日本朋友，包括贵党在内多出力，推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日友好不仅对亚洲、太平洋地区很重要，归根到底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十三大的两个特点》。

11月18日 在住地同赵紫阳、杨尚昆、刘华清^{〔2〕}、洪学智谈话。

11月21日 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任副秘书长；任命迟浩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白冰为总政治部主任，赵南起为总后勤部部长。

11月28日 为《中国军事科学》、《炎黄子孙》、《党的文献》题写刊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册》题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文汇报》五十周年题字；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拟在建校三十周年落成的

〔1〕 戈尔巴乔夫1987年11月27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苏联领导注意到了邓小平在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的谈话中所表达的关于他准备与苏共中央总书记会见的愿望。这样的会见也是符合我们愿望的，会见可以在莫斯科、北京或其他任何方便的地方举行，但反对有任何先决条件。

〔2〕 刘华清，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郭沫若〔1〕铜像题字：“郭沫若像”；为山东财政学院题写院名。

12月4日 上午，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樱内义雄。在谈到中共十三大时指出：十三大主题就是开放和改革。十三大实际上制定了至少五十年的路线和方针。大会主要讨论了国内的改革和开放，国际政策讲得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忽略。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强调同苏联领导人会晤是有先决条件的，指出：我上次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时只是重申了我过去说过的话，如果苏联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到莫斯科或者苏联其他地方同戈尔巴乔夫会晤。但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拒绝了，虽然他说愿意同我会晤，甚至说愿意到中国来，但是反对有任何先决条件。我的说法是有先决条件，就是苏联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12月5日 《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国记者协会编辑的《中国记协五十年》特刊画册即将出版。此前，邓小平题写书名。

12月25日 上午，会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拉伯也门全国人民大会总书记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在谈到中共十三大时说：最近召开的十三大很成功，对我们国家和人民来说，是一个解放的大会，它进一步解放了党和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今后我们的经济会搞得更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条件会更好。对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个解放。我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争取过一段时间全退下来。在谈到中东问题时说：不管世界形势发生什么变化，中国支持阿拉伯事业和

〔1〕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任校长。

巴勒斯坦人民正义斗争的立场不会改变。我们对待两伊战争严守中立、积极劝和的立场也是不会改变的。

12月31日 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刘华清、迟浩田等谈话。

1988年 八十四岁

1月1日 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

1月14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人代表大会上，以全票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月20日 上午，会见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指出：中国要发展，没有国际合作，不搞开放，关起门来是不行的。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二十年，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很快的二十年，我们要补上这二十年的损失不容易。还指出：现在看来，完全由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希望缓和，欢迎美苏对话，并欢迎他们在进一步裁减核军备方面作出更积极的努力。强调：中国争取和平的实际行动就是努力建设和发展，因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每发展一步，就是为世界和平增加一分力量。我们发展自己不仅是为了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是对整个国际和平的贡献，也就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我们正是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的。

1月22日 为《周恩来传》、《缅怀刘少奇》题写书名；为《党建》题写刊名；为《大公报》复刊四十年题词：“贺大公报在港复刊四十周年”；为周恩来纪念馆题写馆名；为海南文昌县

宋庆龄祖居题字：“宋氏祖居”；为国家信息中心题名；为国家旅游局开展北京国际旅游年活动题字：“北京国际旅游年”。

1月23日 审阅赵紫阳报送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报告提出：一、沿海地区要抓住有利机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二、加快外贸体制改革；三、进一步搞活企业机制，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生力军作用；四、切实提高管理水平，让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来中国管理企业；五、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充分发挥我国科技开发能力强的优势；六、既要加快沿海经济发展，又要稳定全国经济。

1月28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次日抵达杭州。

1月29日 同薛驹〔1〕、沈祖伦〔2〕谈话。在听到浙江省五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多，人均收入也翻了一番多时，说：一个浙江变成三个浙江。在听到浙江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时说：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农民自己的创造。乡镇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在听到浙江的商品市场、农贸市场发展很快时说：把市场当作一种手段，也可以搞社会主义经济。在谈话中还询问了宁波市利用外资办大学、建钢厂和北仑港的建设情况，说：可以利用外资，要学会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人家来投资，只要是好的，能带动我们工业发展的，我们应该让他们得利多些，才有竞争力。

〔1〕 薛驹，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省长。

〔2〕 沈祖伦，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副省长。

2月5日 上午，游览西湖。

2月10日 乘专列离开杭州抵达上海。

2月16日 由江泽民〔1〕等陪同、出席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演出结束后，同演员合影留念。

2月17日 同江泽民等谈话。

2月23日 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并合影留念。

△ 晚，乘专列离开上海，次日回到北京。

2月26日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邓小平》发行仪式在北京举行。画册收入照片五百多幅，并附有《邓小平传略》。

2月27日 阅李雪峰、翟英夫妇本月十二日反映漆克昌〔2〕家属住房困难尚未解决的来信，作出批示：“请科学院帮助解决一下。”

3月1日 上午，会见赞比亚总统肯尼斯·戴维·卡翁

〔1〕 江泽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

〔2〕 漆克昌，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1988年2月逝世。

达。指出：我记得毛泽东主席是第一个跟你谈到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你们那次谈话不久，我就代表中国政府到联合国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和根据这个理论所制定的中国的对外政策。我讲了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讲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也讲了建立世界经济的新秩序等问题。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现在执行的还是这个政策。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说：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我们的共同问题，发展也是我们的共同问题。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因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多，中国摆脱了贫困，就意味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在谈到美苏达成中程导弹的协议^{〔1〕}一事时指出：这仅仅是缓和的起步。我们欢迎这样的起步。但是美苏裁减核武器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解决，在地区问题上美苏也还没有解决他们应该解决的问题。霸权主义仍然威胁着世界和平。世界真正的缓和仍然需要全世界人民为之奋斗若干年。

3月3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某部炮兵连原政治指导员柴金良烈士“无私奉献的模范指导员”荣誉称号。

3月21日 签署中央军委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的议案。四月十二日，

〔1〕 指1987年12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在华盛顿签署的全部销毁两国中程和短程核导弹条约。

签署中央军委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草案）》的议案。四月十三日，向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提交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功勋章的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草案）》的议案。七月一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通过这两个议案。

3月22日 为纪念路易·艾黎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为中国福利会五十周年、《人民日报》四十周年题字；为《中国女记者》题写书名；为《中国老年报》题写报名；为天津火车站建站一百周年题字：“天津站”；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题写社名。

3月25日 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四月八日，投票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会议选举杨尚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王震为副主席，万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任国务院总理。

3月27日 在聂卫平中日围棋擂台赛取得九连胜的获奖证书上签名。

4月2日 视察北京亚运村建设工地。

4月3日 前往北京景山公园植树。

4月10日 下午，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李先念、彭真、邓颖超、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王震等，接见出席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并合影留念。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十日，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全国政协主席。

4月13日 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李先念、彭真、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王震等，接见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4月16日 上午，会见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指出：对南沙群岛问题，中国最有发言权。南沙群岛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国际上很长时间对此并无异议。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海军舰队去南沙群岛海域巡逻，随即对南沙群岛最大的岛屿太平岛派了驻军，并修了一个小飞机场。当时联合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没有提出异议。世界上有权威的地图标明南沙群岛一直为中国所控制，菲律宾舆论界也提到过这一点。我经过多年考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在承认中国主权条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队，共同开发。那些地方岛屿很小，住不了人，不长粮食，无非有一些石油资源。有关近邻国家可以组成公司，共同勘察、开发。中国有权提出这种建议，只有中国建议才有效。这样就没有争端，用不着使用武力。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并不是找不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但这个问题毕竟是个麻烦的问题，应通过协商找到对和平有利、对友好合作有利的办法。

4月19日 上午，会见日本首相特使、日本自民党总务

会长伊东正义。指出：我们两国的关系一般来说还是正常的。但最近这三四年，从教科书问题开始，总是不断发生一些麻烦。值得指出的是，你们称为右翼势力的极少数人，他们的活动应当引起警惕。如果对这些活动处理得过分软弱，就会助长他们的气焰。他们的目的就是破坏中日友好。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孤立起来看并不大，但积累起来就代表了一种倾向，一种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这种破坏力量的所作所为势必要引起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反应。我知道，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是不赞成这些事情的。国家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是要根据两国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和最近十几年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经验，妥善、及时处理遇到的问题。为什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很重要，不能忽略这个问题。针对一位日本议员提出日本不存在极右势力的观点，指出：存在着极右势力，任何社会都存在。周总理诗碑对日本有什么坏影响，为什么要破坏？〔1〕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段历史，为什么修改？这是有目的的，无非是煽动日本人民搞点什么事情，散布敌视中国的思想，是想在日本恢复点什么东西嘛。从三岛由纪夫那件事〔2〕就可以看出一种倾向。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

〔1〕 1978年4月，日本京都一些友好团体为了纪念1978年10月缔结日中友好条约，在日本京都岚山龟山公园里建造了周恩来总理诗碑。碑上镌刻着1919年周恩来在京都作的《雨中岚山》一诗全文。1987年6月25日晨，诗碑受到日本反华分子的破坏。当天，中国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

〔2〕 三岛由纪夫，日本右翼法西斯分子，军国主义团体“盾会”会长。1970年11月25日，到东京市个谷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军总监部发表演讲，要求修改日本宪法，使自卫队成为日本真正的“国家军队”，以“保卫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然后剖腹自杀。

的。我们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和平时期能够争取到，应该利用。我们近几年劝第三世界的朋友不要失去这个时机，好好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为什么裁减一百万军队，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新的判断。

4月25日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开幕。此前，邓小平为大会题词：“热烈祝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召开。”

4月27日 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

△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授予空军试飞团团长黄炳新“试飞英雄”荣誉称号；授予兰州军区防化学某团二连“保障科研模范连”荣誉称号。

5月4日 就《来信摘要》刊登的河南沈丘县回民中学一教师反映的对党风不正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等问题，作出批示：“转中央书记处参阅”。

5月5日 在住地同李鹏谈话。

△ 上午，通过中央电视台，向中国、日本、尼泊尔友好登山队突击队员从南北两侧成功会师珠穆朗玛峰峰顶的壮举，表示祝贺。

5月6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和嘉奖令，授予老山地区防

御作战有功单位及个人荣誉称号，通令嘉奖老山地区防御作战部队指战员。

5月11日 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周年题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冯白驹^{〔1〕}雕像题字：“冯白驹将军”；为谢子长^{〔2〕}烈士陵园题字：“子长陵”；为中央电视台三十周年题字；为《求是》、《党史博采》、《中华儿女》、《中国之友》、《军事工作通讯》题写刊名；为《解放军烈士传》、《国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大辞典》、《中国音乐家名录》、《中国现代名人辞典》、《绿色长城》题写书名；为《中国体育报》、《济南日报》、《黄山日报》、《海南日报》题写报名；为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题名；为中国电子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南财经大学题写校名。

5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美国《世界报》月刊五月号评选邓小平为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十年风云人物，认为他是“最代表时代精神的社会人士”。《世界报》在发表这一消息的文章中说，邓小平的革命“可能使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变成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强大的国家”。

5月15日 上午，会见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指出：

〔1〕 冯白驹，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海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7月逝世。

〔2〕 谢子长，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1935年2月逝世。

过去我们曾经对战争有较大的忧虑。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现在出现了对话代替对抗的新潮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正在发展。现在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我看这个说法为时过早，最大的缺陷是十亿人口的中国还落后，这个地区还有约十五亿人口处于不发达状态。所以说，太平洋时代肯定要到来，但不是现在。真正的太平洋时代的到来至少还要五十年。那时也会同时出现一个拉美时代。我希望太平洋时代、大西洋时代和拉美时代同时出现。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两个，就是和平和发展。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的和平时间发展自己，看来有可能。你们和我们都充分利用这个时期，从事建设。在谈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问题时说：外债问题责任主要在债权国方面。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应作出更多的努力。这是需要长期商量的问题。我们也借了外债，我们会注意你们的经验教训，就是借债要适度。

△ 为山西革命博物馆题写馆名。

5月18日 上午，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若阿金·希萨诺。在谈到中国国内问题时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在谈到物价问题时指出：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如粮食收购价格很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差价由国家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财政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财政开支达几百亿元。所以，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前进。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每一个步骤都涉及千家万户，涉及每个人的生活问题。在客人谈到莫桑比克国内情况时说：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5月19日 上午，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在谈到中国物价改革问题时说：我们党的十三大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

上。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理顺物价，加速改革》。

5月24日 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代表团^{〔1〕}。在谈到人道主义问题时指出：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口可能是十五亿左右，而且还一定要坚决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美国有些国会议员不懂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说什么人道不人道。什么是人道主义？如果中国到了那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至少对中国人民不人道。在谈到发展问题时指出：要从全人类的高度来研究发展问题。我们欢迎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但是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不能建立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前几天我同拉美朋友讲过，不仅希望下个世纪出现太平洋时代，而且希望出现拉美时代，出现西亚时代，出现非洲时代，这样全球就能真正稳定起来。又说：中国正在进行深入的改革和开放。今天，这么多国际知名的企业家、金融家一起来到北京，体现了你们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关注。同时，希望客人：第一，推动世界各国的企业家、金融家一起来帮助中国发展，重要的方式是投资，还有技术转让；第二，帮我们出些主意，这是“软件”。“软件”这个词过去我不懂，还是向基辛格博士学的。

〔1〕 这个代表团是来北京出席该银行举行的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团成员来自15个国家。

5月25日 上午，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在谈到干部新老交替问题时说：我现在已经半退了，准备过一两年真正全退。当然，还要听党的决定。不过我的心情是全退，这对党有益处，对国家有益处。从根本上说，退的涵义是真正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退休制度，从人事制度上，使比较年轻的同志容易上来。我们这些老人总站在那里，就挡了比较年轻的人和年轻人的路。不但中央要这样做，而且地方各级都要这样做。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要逐步年轻化，才能体现党的活力，体现国家的活力。年轻人经验不够，但精力充沛，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的知识比较多。还说：我的真正专业是军事，打了二十二年的仗，组织了不少战斗和战役。等我军委主席不当了，就全退了。在介绍中国的改革情况时指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当然，在改革中也有不同意见，但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

度，如何改革，如何开放。这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现在不是要收，而是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在谈到海峡两岸统一问题时说：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在谈到中捷两党关系时指出：我们两党恢复关系以来，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发展是好的。旧账都不算了，让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

6月3日 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1〕全体与会者，感谢大家对中国的发展提出积极建议，希望各国企业家放胆到中国来投资，进行技术转让，帮助中国发展。在谈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时指出：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1〕“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1988年5月30日至6月3日由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主办。会议就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及前景、世界经济目前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影响、90年代的能源及环境变化和国际政治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香港要稳定。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动乱，那是很不利的。这是个非常实际的严重问题。在谈到民主问题时说：大陆搞改革，完全搬用美国式的民主，是行不通的。中国这么大，如果天天这里游行，那里游行，哪个政府受得了？这样的事情，一切要着眼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6月7日 上午，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兹比格涅夫·梅斯内尔。指出：中国正在深化改革，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

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关键是两条。第一条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第二条就是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还指出：目前，中国在改革，波兰也在改革，两国都在改革中遇到一些问题，因此彼此可以交流经验。但解决问题必须根据本国国情，独立思考。国情不一，问题也不尽相同，解决的方法也不能照搬。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

6月8日 在住地同医学专家宋儒耀^{〔1〕}、王巧璋^{〔2〕}夫妇谈话。

6月16日 晚，前往北海公园，同首都优秀教师一起游览龙灯会。

6月18日 会见美国客人。在谈到中国的统一问题时说：最主要的是大陆的稳定，没有稳定的大陆，什么振兴中华、什么统一都谈不上。大陆的稳定是统一的基础，没有这个稳定，中国就又是一盘散沙。

〔1〕 宋儒耀，当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院长。

〔2〕 王巧璋，当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口腔科主任。

6月20日 和李鹏签署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草案）》的议案。九月五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这个议案。

6月22日 上午，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埃塞俄比亚工人党总书记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在谈到国内问题时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还需要过好几个关，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关是价格制度和工资制度的综合改革。我们正在闯这个关，我们有信心闯过这一关。闯过这一关是为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发展创造条件。在谈到第三世界的发展时说：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

6月25日 会见台湾客人。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反对任何导致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双方应明确建设现代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振兴中华是人民的愿望。发扬几千年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我们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个是政治统一，

一个是发展经济，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还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这些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6月26日 上午，同赵紫阳、李鹏、吴学谦〔1〕谈话。在谈到中苏关系和柬埔寨问题时指出：我们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不会触动中美关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赞成对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采取积极态度。

6月 为《邓小平文选》德文版作序：“我把联邦德国出版我的著作这件事情，看作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正在进行深入的改革和开放，我希望两国经济、文化交往和合作不断创造新的成就。借此机会，谨向联邦德国人民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十月，《邓小平文选》德文版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柏林西德勒出版社出版。

7月4日 阅习仲勋〔2〕就派往香港工作的人员中存在的违法乱纪问题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作出批示：“各方面反映，派在香港的人和机构（公司等）非常庞杂和混乱，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人不是个别的。建议设立一个专门小组，花一年时间，进行整顿，撤回一批机构。对于犯罪的人，不管其后台是谁，都要迅速、从严处理，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发现一批处理一批，决不手软。”

〔1〕 吴学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2〕 习仲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7月5日 上午，会见巴西总统若泽·萨尔内。在客人谈到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教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时，回答说：是这样的。还指出：今天我可以肯定地说，到本世纪末我们翻两番的目标能够达到。现在要为下个世纪持续发展创造条件，那就要深化改革，加快开放。在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物价和工资改革是件很有风险的事。深化改革会带来通货膨胀，对这个问题，需要整体考虑，综合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尽量减少波动，但改革要坚决地干下去。在谈到世界和平问题时指出：第三世界是保证世界和平的主力。第三世界国家要加强合作。中国把自己的发展看作是对人类贡献的问题，是保证世界和平的问题。我们要为人类做贡献靠自己努力。在谈到中巴关系时指出：发展中国家有落后点，但并不是一切都落后。中国和巴西有共同之处，两国加强合作有很好的政治基础，应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

7月9日 上午，会见几内亚总统、几内亚复兴军事委员会主席兰萨纳·孔戴。指出：要深化改革和开放，就会碰到诸如物价、工资问题，还会相应地出现通货膨胀等问题，因此风险很大。但我们不能避开风险，也绕不过去，除非不改革，除非放弃第三步目标。我们仅有十年改革的经验。我们碰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过，从外国找不到解决的答案。历史不同，问题也不同，外国经验不可照搬，只能靠自己实践。好在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但问题还是存在的，埋怨的话也不少，我们不能后退。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去冒这个风险，并克服困难，希望能成功，因为有十年成功的经验鼓舞着我们。又指出：中国的问题，也等于五分之一的世界问题。因为全世界有五十亿人口，中国就占十亿多。中国真正

发展起来了，对朋友们的帮助也许会大一些。现在中国对朋友们的帮助是很小的。所谓帮助，最大的帮助是提供经验。中国的经验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方针、政策，走自己的路，实现自己的发展。

7月13日 为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1〕}题名；为淮海战役胜利四十周年题词：“纪念淮海战役胜利四十周年”；为白求恩医科大学题写校名。

7月15日 上午，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谈到柬埔寨问题时说：中国对柬埔寨问题的态度就是最近外交部发表的声明^{〔2〕}。具体来讲，第一，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越南全部撤军，恢复柬埔寨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第二，要明确越南撤军后，柬埔寨在政治上要由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政府来领导；第三，新成立的柬埔寨国家一定要奉行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中国的真正立场就是帮助柬埔寨人民获得独立。中国在柬埔寨不谋求取得任何一点私利。中国不需要在自己的领土之外谋求任何势力范围。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我们真实的政策。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两个国家之间总会有些不同的见解，甚至存在一些分歧，这是正常的。中美两国关系需要发展，要把这一发展提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提到维护世界和平和全人类利益的角度。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市场，发达国家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

〔1〕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红军长征经过的雪山草地边缘地带四川省松潘县元宝山修建的。1990年8月25日落成。

〔2〕 指1988年7月1日中国外交部就柬埔寨问题发表的声明。

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两国关系要搞好。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说：中国的改革与苏联的改革不同，苏共党代表大会最近首先提出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他们来说难度大。为什么中国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做起，而不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着手？因为中国在政治上问题不大。国际上都在猜测，说中国有两派，一个改革派和一个保守派。中国没有保守派，特别是在我们领导层中，要改革是一致的。有时在改革的步骤、方法上，有些具体的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没有才不好。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这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中国有“文化大革命”和没有“文化大革命”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只讲“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它也有些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

△ 下午，乘专列离开北京，晚抵达北戴河。

7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中央军委命令，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并正式颁布。

8月8日 会见美籍华人熊介教授，谈台湾问题。

8月13日 会见霍英东〔2〕。

〔1〕《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原名《八路军进行曲》，解放战争时期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2〕霍英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8月18日 上午，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胡启立、李铁映〔1〕、薄一波、芮杏文〔2〕、温家宝〔3〕等在北戴河接见出席一九八八年暑期高校会议的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

8月20日 委托杨尚昆转告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关于柬埔寨必须百分之百独立的主张。我们完全同意和支持他十四日在日本发表谈话提出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三个条件，即：一、解散金边韩桑林政权；二、越南到一九八九年底从柬埔寨全部撤军；三、向柬埔寨派驻国际维和部队。

8月24日 深夜，乘专列离开北戴河，次日晨回到北京。在北戴河期间共下海游泳三十九次，每次一个多小时。

8月26日 上午，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回顾提出小康目标的过程时说：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中国历史上有“小康之家”的说法。小康社会就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就我们来说，目标定得低一点有好处。目标定低一点是为了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避免又回到“左”的错误上去。还指出：中国要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我们在闯难关谋求今后的发展方面，第一，改革既要坚决，又要稳妥；第二，改革期间的经济增长仍要保持适当的速

〔1〕 李铁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2〕 芮杏文，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3〕 温家宝，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应特别注意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第三，如果这个期间能得到更好的国际合作，取得国际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能力就会更强一些。同时，对日方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新贷款表示欢迎，并说：还有更高的要求，一是对华技术转让，二是来华投资，合资、独资都可以，我们更希望独资。

9月1日 上午，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邓颖超、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接见出席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合影留念。

9月5日 上午，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在介绍自己经历时说：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一九二二年算起〔1〕，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在谈到如何总结经验教训问题时指出：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

〔1〕 1922年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强调：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一九九七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一九九七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中午，在宴请客人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这个谈话的主要部分已分为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篇题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一篇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第一部分。

9月6日 为《李伯钊^{〔1〕}文集》、《回顾与展望》、《中国人民银行建行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

〔1〕 李伯钊，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85年4月逝世。

题写书名；为香港《文汇报》创刊四十周年题词：“祝贺香港文汇报创刊四十周年”；为《中国人口报》题写报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生院题写院名。

9月7日 上午，会见美国国防部部长弗兰克·卡卢奇。指出：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全心全意地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我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中国是一个守信用的国家，是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国际问题上，我们欢迎谋求缓和的趋势，我们反对谋求霸权。最近几年的历史证明，所有谋求霸权的都遭到了失败或正在失败。中美关系近几年的发展是比较平稳的，我们应该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欢迎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采取不干涉立场，促进海峡两岸接触。你的前任温伯格部长来访时，我跟他谈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有好处，这是关系到中美长期友好关系的问题。上次舒尔茨来访时，我对中美关系作了个评价，就是近几年来，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是比较平稳的。我用了“平稳”这个词。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友好关系，这是双方的共同愿望。所以，近年来尽管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纠葛，对一些问题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没有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是相互理解的。我们这样两个大国，不友好是不行的，有理解就好办了。自从我们建交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我們之间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产生爆炸性影响，那就不好了。我同温伯格部长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经常把这个问题放到脑子里，经常摆在工作日程里边，注意这个问题。我相信部长和大使都知道台湾在发展军事力量，这不是一个小问题。现在台湾的情况是这

样的，谋求统一的力量在发展，谋求台湾分裂的力量也在发展，这两种力量都在发展。这是很微妙的事情。希望美国始终坚持三个公报的原则，我们共同遵循这三个公报的原则。我们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坦率地跟美国的政治家们讨论这个问题。

9月12日 上午，在住地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1〕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薄一波。在谈到改革问题时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还说：真正

〔1〕指198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初步方案》。

建立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我们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在谈到科技问题时指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科教投资的使用要改进，这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这个谈话已分为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篇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第二部分，一篇题为《中央要有权威》。

9月14日 上午，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李先念、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王震、薄一波等，会见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1〕}、迟浩田、杨白冰、

〔1〕 秦基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赵南起、徐信〔1〕、郭林祥〔2〕、尤太忠〔3〕、王诚汉〔4〕、张震〔5〕、李德生〔6〕、刘振华〔7〕、向守志〔8〕、万海峰〔9〕、李耀文〔10〕、王海〔11〕等十七位高级将领。

9月16日 上午，会见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二阶堂进行。在谈到中国改革问题时指出：改革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到了应该很好总结的时候。十年来的发展是可喜的，但也带来新的问题。速度快本来是好事，但太快也带来麻烦。通货膨胀主要是管理不严造成的，我们缺乏经验。物价改革以前就有通货膨胀问题，主要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妥善。现在需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控制总需求的增长，控制发展

-
- 〔1〕 徐信，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 〔2〕 郭林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纪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 〔3〕 尤太忠，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
- 〔4〕 王诚汉，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 〔5〕 张震，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
- 〔6〕 李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 〔7〕 刘振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 〔8〕 向守志，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 〔9〕 万海峰，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 〔10〕 李耀文，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
- 〔11〕 王海，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速度。我们的胆子够大了，现在需要稳。十亿人口的大国，应力求稳定。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这是我们遵循的原则。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迟早要实现，现在正在走向正常化。正常化的性质不是五十年代那种关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我们同所有国家包括与日本的关系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自然还有一个党的关系问题。党的关系正常化的性质，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系，不是五十年代那种关系。

9月17日 上午，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谈到治理整顿问题时说：我们十年改革并不一帆风顺，现在面临一些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问题。我们需要总结十年的经验，制定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对一些措施、规划，要根据现实作进一步调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以后还会有，不会风平浪静。我们做好多事还没有经验，欠缺的是本领，不过本领是可以学会的。至于通货膨胀，我们会有办法的。很重要的一条是加强纪律，中央要有效地进行管理。这同开放并不矛盾，越开放越要善于管理。无政府主义会弄得天下大乱。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现在集团政治该结束了，这主要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1〕。霸权主义该结束了，不仅全球霸权主义，还有区域霸权主义。现在世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趋势是明显的，至少在今后三十年五十年内这一趋势

〔1〕 华沙条约组织，是1955年6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在波兰首都华沙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称《华沙条约》），而成立的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峙的政治军事集团。1991年7月解体。

还会发展。道理就是超级大国谁也不敢发动世界大战。谁搞霸权主义，谁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绝对优势也没有用，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说：蒋经国〔1〕先生在世时曾讲要对历史作出交代，但美国对这件事进行了干预。所以说，中国统一问题恐怕最大的障碍还在美国方面。美国在宣传方面公开声称不介入中国统一问题，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中美之间有不少纠葛，但核心是台湾问题。在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说：能游泳，证明我身体很好；能打桥牌，证明我记忆还可以。我健康的原因主要是心情比较舒畅。

9月21日 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邻国之间的关系。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都需要这些原则。现在看来，战争打不起来，和平可以维护。发展问题是个南北关系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更多，要放到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解决。要使发展中国家发达起来，穷国、富国都有责任，但毕竟穷国有自己的责任。穷国主要靠自己，靠别人施舍，希望不大。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利用和平环境好好地发展自己。

9月23日 和李鹏签署国务院、中央军委令，发布施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

〔1〕 蒋经国于1988年1月逝世。

9月24日 上午，会见河合良一〔1〕为团长和冈崎嘉平太〔2〕、斋藤英四郎〔3〕为最高顾问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满意的。希望日本方面加快在中国投资的步伐，特别是在技术转让方面，希望日方能够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帮助中国提高创汇能力，这比单纯地向中国提供贷款更为重要。同时，表示赞同斋藤英四郎提出的要发展经济，首先要解决钢铁问题的意见，指出：要搞好经济建设，就要解决好供和求的矛盾，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速度就不能太慢。

9月30日 同彭真谈话，重点就加强农业问题交换意见。

10月4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指出：我对国际形势有个想法，请研究国际问题的人考虑，就是是否要提出建立一个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去的国际政治是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实践证明行不通。霸权主义伸出的手不能不收回了。国际关系要用什么新秩序、新原则来代替？就我个人的知识来说，经得起考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亚洲的产物，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应该能够接受这些原则。

〔1〕 河合良一，当时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

〔2〕 冈崎嘉平太，当时任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

〔3〕 斋藤英四郎，当时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

10月5日 上午，会见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规划时指出：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先沿海后内地是我们的发展规划，但原材料很多在内地，不在沿海，这样就会出现沿海和內地的种种矛盾。所以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客观世界，制定下一步的方法和步骤。现在我们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我们将把整顿经济秩序放在首位。讲发展，第一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设想，第二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既要大胆，坚持现行的方针和政策，又要步伐稳妥。要求过急，往往是犯大错的根源。前一段时间发展速度太快，恐怕也是这个原因。还指出：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这是总的趋势。和平环境的赢得是全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共同努力斗争的结果，它并不是超级大国发善心的结果。

10月7日 在钓鱼台出席包玉刚的宴会。

10月13日 上午，会见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在阐述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指导原则时指出：我们要同苏联建立新的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关系。可能明年实现中苏首脑会晤。我们在两国外长和高层会晤中不准备谈过去的问题。简单的历史回顾恐怕也难免，这要当作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来讲。重点是一切向前看，建立新型的中苏政治、经济关系。不纠缠过去，一切着眼于未来，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来解决中苏关系问题。在谈到中印关系时说：中印关系其实很简单，只要尊重双方利益，不要追求单方面利益，问题就好解决。

10月17日 上午，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三年前托你带的口信看来有成果，中苏明年能够实现高层会晤。在介绍中国的经济情况时指出：我们最近经济发展过热、速度过快，需要总结经验。所以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控制经济发展速度，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初步确定搞两年。一个是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保持比较适当的发展速度。一个是努力消除一些腐败现象。为此应该加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控制能力，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和妥善的办法来加强管理。在谈到社会主义问题时说：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都在努力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但是，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多种形式，各有自己的特点。各国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方法、方式，制定适合自己具体实际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相互可以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照搬。自己认为成功的东西，就应该继续坚持，不要因为别人改变了，自己也跟着改变，用不着这样。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自己去总结，都是一个模式不行。我们都吃了这个亏。在谈到国际形势、国际共运问题时指出：国际形势最重要的变化是由对抗转向对话。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怎么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总的来看，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衰弱，它们的影响也在缩小。执政的共产党又不能帮助它

们。我这样讲有两点意思：一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要独立思考。每个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情况都是千差万别的。二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把生产力搞上去，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在较短的时间里不可能证明这一点，也难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随后，设午宴招待齐奥塞斯库。席间继续交谈。

△ 为纪念彭德怀诞辰九十周年，《彭德怀军事文选》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此前，邓小平题写书名。

10月22日 上午，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李先念、彭真、胡启立、王震等，接见出席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 上午，会见安哥拉总统、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主席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在谈到南部非洲问题时说：我们支持安哥拉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对话比对抗好，缓和比紧张好。对南非斗争既要有坚定性，又要有灵活性。希望你们按照现在的决策，能够通过对话，同他们达成某种谅解，然后一心一意搞国内团结和国内建设。在国际关系中，首先要处理好同邻国的关系。还说：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的共同任务。

△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某守备师侦察连“英雄侦察连”荣誉称号。

10月24日 上午，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胡启立、姚依林、王震等，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1〕。在听取周光召〔2〕关于对撞机工程建设情况的汇报时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定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定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水平。随后，会见参加对撞机建设的科技人员、干部、工人代表和来北京参加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美国科学家，参观了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各项设施。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0月26日 上午，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李先念等，接见参加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并合影留念。

〔1〕 1988年10月16日凌晨，中国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这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突破性成就。

〔2〕 周光召，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

11月2日 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题词：“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中国南极中山站题写站名；为《廖承志文集》、《廖承志传》、《走向大西南》、《中国书画选》、《永恒之日》（画册）题写书名；为《公安高教研究》杂志题写刊名；为青岛海洋大学题写校名。

11月7日 上午，在会见外宾前，同钱其琛^{〔1〕}谈话。在谈到戈尔巴乔夫拟在一九八九年访华时说：我可以同他谈一次，作为高级会晤。

△ 上午，会见乌拉圭总统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指出：十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总是正确的。就是说，我们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是正确的，服务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也是正确的。但到今天为止，还不能说我们制定的政策就没有缺点。过去的十年，我们确实没有犯大的错误，但是这样或那样的小的缺点和错误还是经常发生的。如我们目前面临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太快就反映了这一点。我们对未来是有信心的。这中间肯定会有曲折，但相信能够克服。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结论不能由我们来下，特别是不能由我来下，要由历史来做。在谈到中国同拉美国家的关系时说：中国的政策是要同拉美国家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使中拉关系成为南南合作的范例。

11月8日 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万里、彭真、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接见出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

〔1〕 钱其琛，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部长。

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1月15日 邓小平著作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波兰文版，由波兰书籍与知识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作者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八七年期间发表的著作和谈话共三十三篇，并附有彩色肖像和传记。邓小平在为本书撰写的《致波兰读者》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事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们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几十年的实践和探索使我们获得了有益的经验，深刻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定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来说，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1月28日 在住地同赵紫阳谈话。

11月下旬 开始逐篇审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报送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送审稿。

12月1日 和杨尚昆会见李嘉诚。

12月2日 上午，会见樱内义雄〔1〕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在介绍中国经济情况时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管遇到什么暂时的麻烦，如通货膨胀，都不会改变。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十年。这十年应该说是成功的，它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现在我们正在上第二个台阶，即

〔1〕 樱内义雄，当时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日本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会长。

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上第二个台阶遇到的问题比上第一个台阶所遇到的问题还复杂。现在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保持适当的速度，这些都是不可少的。我们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问题，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上第三个台阶需要花五十年，那时遇到的问题将更多。国际上对我们的发展情况估计得比我们更乐观一些，但我们自己要小心谨慎。现在遇到的问题总有办法解决。在回答有关钱其琛访问苏联情况〔1〕的问题时指出：中苏没有理由不改善关系。中苏关系的改善，不会妨碍中国同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中苏之间像五十年代那种“同志式”、“同盟式”的关系已经过时了，现在需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确定新的中苏关系。

12月15日 审读完《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全部送审稿，让秘书转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我看了，内容可以。二、《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这个讲话，是就当时的情况讲的。当时我党同国民党的摩擦主要在晋冀鲁豫地区。这篇讲话要作大的删节，删去一半。删后我不看了。三、有十几篇讲话都是口语性的，文字上再加点工。不用大改，改一两个字就可以了，就顺了。改后我也不看了。按照这个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对全部文稿又作了认真校正，对《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经过再三斟酌，认为不选为宜。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央文献研究室把这一想法和文选的《出版说明》报送邓小平。一月十三日，邓小平让秘书转告中

〔1〕 1988年12月1日至3日，钱其琛应邀访问苏联。这是1957年以来中国外交部部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

央文献研究室：出版说明写得比较好，提到各个历史时期。同意《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不收入文选。

12月17日 和李鹏签署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发布《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警官警衔制度的具体办法》。

12月20日 上午，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接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

12月21日 上午，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

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还指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12月27日 阅王淦昌^{〔1〕}、王大珩^{〔2〕}、于敏^{〔3〕}本月二十二日来信，就他们建议将激光核聚变研究列入高新技术跟踪发展计划一事，作出批示：“请紫阳、李鹏同志酌定，我看建议是可行的。”

12月31日 参加第六届“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

〔1〕 王淦昌，当时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学技术顾问。

〔2〕 王大珩，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3〕 于敏，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9年 八十五岁

1月2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内部刊物刊载的《北京市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对“多党合作”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根据这个批示，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1月3日 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十五位华人教授写给邓小平、赵紫阳、万里、李鹏的信，作出批示：“宜由李鹏同志复一短函。”来信建议在思想、政策、体制上三管齐下，革新、振兴教育；立法保障教育经费；优先大幅度提高教师与科技人员的待遇和地位；筹建国家教育基金和科技基金。

1月10日 在住地同李鹏谈话。

1月11日 阅一位香港人士谈内地观感的材料〔1〕，批请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阅。

1月17日 让秘书打电话给赵紫阳办公室，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一些人士在谈论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的联系和发展，以及世界华人经济文化发展问题时使用的“大中国”、“大中华”等提法，指出：“大中国”、“大中华”这个提法，香港、台湾人要说让他们说去，我们不要说。

1月21日 和李鹏签署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授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李连秀中将警衔，授予政治委员张秀夫、副司令员范志伦、副政治委员张海天等二十九人少将警衔。这是首次为武警部队军官授衔。

△ 晚，乘专列离开北京，次日抵达上海。

1月23日 同李先念谈话。

1月27日 上午，会见马里总统、马里人民民主联盟总书记穆萨·特拉奥雷。指出：中国专家参与马里企业的管理，是一种新的合作形式，可以积极发展。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

〔1〕 观感材料提出3点看法：一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确有改革的必要，但中国在宣传上似乎着力不够。在宣传改革开放的时候，不能只讲宏伟目标，更要强调全体人民的个人奉献。二是认为中共党风未有根本好转，自由化的思想急剧泛滥，党的整顿非动大手术不可。三是要看到知识分子待遇低、无心务业和“一切向钱看”对青少年毒害的严重后果。

益，很多国家都可以采用。

2月4日 上午，会见为中苏最高级会晤做准备工作而来访的苏联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接受他转交的戈尔巴乔夫的来信。在谈话中指出：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任务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个任务相当繁重，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太多，牵扯面太广，而且都不是小问题。为了开辟未来，也需要了解过去。不过有个限度，只是了解，不予纠缠，重点在于开辟未来。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有过曲折，并且中断了二十几年。中苏两国外长的互访，意味着已经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当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正式开始，还是中苏高级会晤，也就是我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苏关系正常化要消除三大障碍，首先要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要真正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指出：就我个人而言，希望中国能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贡献。只有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发展自己，摆脱落后。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同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我们同美国在“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同日本恢复了两国邦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们与英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按“一国两制”的原则解决了香港问题。现在剩下的重大问题就是中苏关系问题，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会见结束时，应客人要求在俄文版的《邓小平文选》上签名留念。同日，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和谢瓦尔德纳泽分别举行记者招待会。田曾佩说，消除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已获得实质性进展。谢瓦尔德纳泽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五月访问中国。

2月5日 除夕之夜，和江泽民、朱镕基〔1〕、陈丕显〔2〕、宋时轮〔3〕、周谷城〔4〕、刘靖基〔5〕、苏步青〔6〕等，同上海市各界人士一起共庆新春佳节。

2月11日 上午，同杨尚昆谈话。

2月13日 上午，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指出：中巴关系是不平常的，真正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无任何疙瘩，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能相互理解。非常特殊的是，巴基斯坦无论哪一派、哪一届政府，都坚持巴中友好。中巴两国总是互相关心的，中巴两国都需要发展自己。我们要利用可能有的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来发展自己。我们最关心的是巴基斯坦的稳定。我们高度赞赏阁下就任总理时公开声明不搞复仇政治，在处理国家事务中照顾各个方面，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2月16日 乘专列离开上海，次日回到北京。

2月22日 上午，会见布隆迪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布

〔1〕 朱镕基，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市长。

〔2〕 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3〕 宋时轮，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4〕 周谷城，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名誉主席。

〔5〕 刘靖基，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顾问。

〔6〕 苏步青，数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

隆迪总统皮埃尔·布约亚。指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十年来走过的路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下去。我们坚持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不会改变。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制定的各项主要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也不会改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能够克服的。我们是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要我们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能照顾到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总有一部分人得益多些，另一部分人得益少些。就是得益少的那部分人生活也比过去好得多，但还是要发些牢骚。我们的事情又好办，又不好办。好办的是举国一致，十亿人都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拥护发展战略；难办的是完全照顾到十亿人不容易。十年的发展使我们上了一个台阶。上台阶的好处是差不多十亿人都得到益处，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就是经济发展过热。人们提出的要求更高更难满足了。总之，这些问题我们要解决，也是能够解决的。

2月23日 审阅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组本月二十日提出的《建议我国对竹下登为侵略战争辩解^{〔1〕}应发表正式声明》，作出批示：“请常委商定”。二十四日，钱其琛在日本拜会竹下登，指出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坚持中日友好。

2月26日 上午，会见在中国进行工作访问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指出：你在北京任联络处主任期间，就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作用。我个人希望在你总统任期内，中美关

〔1〕 指1989年2月14日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国会答询时称：“上次大战不是侵略，应由后世历史学家做评价。”

系能在一种新的格局下向前发展。我不是讲战略关系，我是讲两国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尽量减少我们之间的麻烦。中美关系的最大特点是，从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到一九八九年，十七年时间里，中美关系一直向前发展。尽管双方吵过架，也有争论，也有分歧，但总是向前发展的。所以我们总的评价是，中美关系是稳定的。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的潜力很大。我深信，两国领导人，包括美国两党，都希望中美关系在新的格局下，有更好的前景。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同美国和苏联改善关系一样，中国也在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这对维护世界和平是大功大德的事。在谈到中国国内问题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还说：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 作为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委托中国桥牌协会主席荣高棠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丹尼斯·霍华德授予的世界桥联荣誉金奖。

3月4日 在住地同赵紫阳谈话。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中国人的事中国自己办，外国人要议论，让他们议论去。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在谈到如何估计形势时指出：要看到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大多数学生是拥护改革的。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台湾集中攻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最后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不允许乱》。

△ 阅荣毅仁〔1〕要求支持中信公司与美国有关方面合作在河北省兴建大型铝厂一事的来信，作出批示：“请紫阳、李鹏同志商处。”

3月17日 上午，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指出：泰国是中国在东南亚最好的朋友，中泰两国合作的潜力在下个世纪将得到充分的发展。很高兴苏哈托总统下决心恢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随着中国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新加坡同中国的关系也会有新的发展。〔2〕这样，中国和整个东盟将建立比较完全的关系。

3月23日 上午，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在谈到中国的建设经验时说：中国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问题恰当地解决了。从那时到去年底的十年里，中国有了可喜的成就，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成就，这是我们的根本观点。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准备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

〔1〕 荣毅仁，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团）董事长。

〔2〕 1990年8月8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谅解备忘录》，中断23年的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恢复。1990年10月3日，中国和新加坡签署两国建交公报，宣布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说：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非洲国家要利用这一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3月24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一测绘大队“英雄测绘大队”荣誉称号。

3月28日 阅李先念转来的五位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关于《对海南省拟引进外资，开发洋浦地区的意

见的联合发言》^{〔1〕}，作出批示：“请紫阳、李鹏同志酌处。我认为五同志的意见值得郑重考虑。”四月二十八日，审阅中共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三月三十一日写给邓小平和杨尚昆的《关于海南省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作出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

4月2日 前往北京亚运村建设工地植树，观看亚运会工程的规划图，听取有关负责人的汇报。

4月8日 上午，会见多哥总统、多哥人民联盟主席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称赞多哥为解决粮食问题搞的“绿色革命”，指出：“绿色革命”要坚持一百年，二百年。中国也一样，对我们来说，最难解决的不是工业，而是农业。难处是人口多，控制人口生育工作做得不好。到本世纪末，恐怕十二亿人口打不住，这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大的障碍。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说：这几年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也出现了经济发展过热的情况，带来了一系列供求关系的困难。这种现象如果在五年前就警惕，可能情况比现在好得多；哪怕在三年前注意这一问题，也会比现在好得多。这件事也许为国际上提供了一种经验：当事业进行顺利时，就要提高警惕，避免差错。要考虑到发展快会带来什么新问题，尽量避免出现过失。即使出现了，也要尽量缩小。这些失误是发展中的失误，出现的困难是前进

〔1〕《联合发言》提出，海南省拟将洋浦港中心地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每亩2000元人民币的低价租给日本企业熊谷组，期限长达70年，此举欠妥。

中的困难，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在这方面我们并未丧失信心。

4月10日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防救船大队机动救捞中队“英雄救捞中队”荣誉称号。

4月12日 为《蒋南翔^{〔1〕}纪念文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军衔制》、《新中国外交四十年》（画册）、《中国妇女四十年》（画册）、《中国科学院四十年》（画册）题写书名；为《中华英才》题写刊名；为《中国专利报》题写报名；为《光明日报》四十周年、《解放日报》四十周年、《南方日报》四十周年题字；为重庆机场题名；为东吴大学题写校名。

4月22日 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2〕}的追悼大会。

4月25日 上午，在住地同李鹏、杨尚昆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3〕}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

〔1〕 蒋南翔，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1988年5月逝世。

〔2〕 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终年74岁。

〔3〕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人借机煽动，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出现较大规模的学潮和动乱。4月2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碰头会。会议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面前，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赵紫阳因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前一段，上海态度明确，赢得了时间。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四个坚持”十分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做到认真贯彻。反对精神污染，二十几天就丢掉了。如果贯彻得力，在思想界、教育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混乱。当然，小的动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个别处理，分散解决，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迫使我们要集中去解决，迫使中央要直接干预。“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当然，要运用得当，注意缩小打击面。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人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使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变成泡影，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都搞不下去，而毁于一旦。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1〕}夫妇是个典型。表现坏的要解除职务，坚决调离。工人、农民是拥护我们的，干部是拥护我们的，民主党派也是好的。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

〔1〕 方励之，1984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任职期间，因在各种场合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煽动学生闹事，1987年1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副校长职务。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

什么？党的组织要发挥作用，党团员要发挥作用。要重申党的、团的纪律。大学、中学、工厂、机关都要开支部大会，还要开大会。要加强公安部门的工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的决定是对的，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才能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我们不是讲治理经济环境吗？现在也要治理政治环境。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有。如果没有“四个坚持”，他们就会横行无阻，肆无忌惮。中央和国务院都要分两套班子，一套处理动乱，一套抓正常工作。还是要把主要力量放到建设上来，不能把人都陷到这里面去。短期是可以的，长期不行。行动不能慢，越慢被卷进去的人越多。二十六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和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5月11日 上午，会见伊朗总统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在谈到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争端问题时说：中伊两国是朋友，我们同包括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也都是朋友，我们希望你们和平共处。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不要把力量消耗在相互争端上。不要自己抵消了力量，丧失了发展时机，使自己处于困难的境地。要利用目前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我还是一句话“和为贵”。还指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当前国际缓和的大气候下，只有不怕麻烦，通过耐心对话来解决问题。不要怕麻烦，对话没有战争那么痛快，但只能选择对话，不能选择战争。中国要力争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把自己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当前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

5月13日 上午，在住地同赵紫阳、杨尚昆谈话。指出：对惩治腐败，过去说了不少的话，但没有认真贯彻，趁此机会把自己的队伍纯洁一下也有好处。搞透明度，怎么个“透”法，要研究。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

5月16日 上午，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指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我们也宣布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又指出：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冷战和对抗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缓和。总的局势是军备竞赛，水涨船高。但是三年前我们已看到，美苏军备竞赛可能有一个转折，有一个解决的途径，美苏有可能由对抗转向对话。这就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中苏关系可不可以得到改善。出于这样的动机，才给你带信，时间过了三年多，我们才见面了。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平等。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过损害。从中国得利最大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军队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过去就结束了，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在今后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问题时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在宴请客人时，对其邀请自己访问苏联，回答说：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5月17日 下午，在住地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多数人认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决不能退让，反

对赵紫阳主张退让的意见。会议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1〕}邓小平发表讲话，支持多数常委的意见。

5月20日 上午，在住地同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王震、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2〕}等开会。提议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5月31日 同李鹏、姚依林谈话。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在谈到动乱平息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时说：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

〔1〕 1989年5月4日，赵紫阳在会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反对动乱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由于赵紫阳对动乱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发展，使本来已经趋于平稳的局势骤然转向激化。从13日起，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请愿。15日至19日，北京发生大规模游行活动，出现无政府状态。19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干部大会。赵紫阳拒绝出席大会。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话，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希望广大同学和社会各界立即停止一切游行活动。会上宣布，为维护首都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从外地调动部分部队进驻北京。20日，李鹏签署国务院命令，决定自20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2〕 宋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指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告诫：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最后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6月9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1〕}，也是必然的。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课题。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

〔1〕 1989年6月3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戒严部队奉命进驻北京城内一些重要保卫目标。一部分入城部队行动受阻，一些暴徒拦截、焚烧军车，冲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广播电视部等国家机关，抢劫枪支弹药，杀害解放军战士。在事态急转直下的形势下，当日晚和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息了由动乱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反革命暴乱。

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就提出要两手抓，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到计划与市场问题时指出：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封闭性的国家。实行封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总结过去的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最后强调：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6月16日 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1〕}、杨尚昆、万里谈话。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指出：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又说：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还指出：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东西。第一，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

〔1〕 李瑞环，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

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第二，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最后强调：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6月21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这次会议于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举行。会议批评了赵紫阳的错误，为召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作了准备。

△ 收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来信。布什在信中要求派特使访华，与邓小平进行完全坦率的谈话。二十二日，复信布什，表示同意他的建议，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

6月23日、24日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举行。全会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认为在这场同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全会高度评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在平息暴乱中解放军、武警和公安干警的巨大贡献。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

调整，决定撤销赵紫阳党内一切领导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组成；增补李瑞环、丁关根〔1〕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担任的职务。二十四日，江泽民在会上讲话提出：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最近再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们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坚实的基础。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的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6月24日 《人民日报》摘登《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一书的部分内容。该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辑录了作者一九七九年三月至一九八九年三月的三十九段论述。

6月30日 上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项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的提请，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1〕 丁关根，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

△ 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的刘国庚、王其福、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崔国政、马国选、王锦伟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七月十八日，和李鹏签署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授予李国瑞、刘艳波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二十七日，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授予于荣禄、臧立杰两位烈士和赵勇明、李勃、王强、廖开喜、张震、安卫平、沈运田、余爱军、周家柱、游德高等人“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7月2日 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前，同李鹏、钱其琛谈话。指出：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

△ 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1〕}。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

〔1〕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当时任美国国家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他是在中国政府平息北京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宣布制裁中国的情况下秘密访问中国的。

7月14日 为《邓颖超革命活动七十年大事记》、《蔡畅传》题写书名；为河南焦作市烈士纪念碑题词：“冲破天险，绝路逢生”。为中南海电信局成立四十周年题字：“中南海电信局”。

7月16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抵达北戴河。

7月28日 收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来信。来信感谢邓小平接见斯考克罗夫特，同时通报了在不久前召开的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1〕上，美国和日本曾把一些非常令人激怒的措辞从指责中国的公报中删去；另一方面又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进行辩护，试图把中美关系发生困难的责任推给中方。八月十一日，邓小平复信布什，指出：我说过“解铃”、“系铃”的话，意思是，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其后又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很大范围内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解决。美国对华采取的制裁措施还在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我希望这种情况早日改变，相信布什总统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7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六十二周年前夕，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分

〔1〕 1989年7月14日至16日，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7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在巴黎举行会议。会议在7月15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所谓“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支付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

别决定为首都戒严部队全体官兵颁发“首都卫士”纪念章、纪念册，编辑出版《共和国卫士》一书。邓小平为首都戒严部队纪念章题写“首都卫士”，为《共和国卫士》题写书名。

8月17日 上午，同杨尚昆、王震谈话。说：我希望退，要在今年完成。

8月20日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文选收入作者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二十八年中的重要文章、讲话共三十九篇，反映了他这段时间在军事、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做出的贡献。

8月23日 深夜，乘专列离开北戴河，次日晨回到北京。

9月1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3日 在住地同身边人员谈国际问题时指出：切不要打旗，不要去干涉别国的事情。关键是自己要搞好，自己搞好了，本身就是对国际共运的贡献，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

9月4日 上午，在住地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谈话，主要商量自己退休的问题。说：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

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退的方式，越简单越好。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希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安定团结和改革开放的形象。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末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

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最后说：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 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信中说：一九八〇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封信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9月11日 在住地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谈话。

△ 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斗争历史回忆录《苦斗十年》题写书名。

9月16日 上午，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指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在谈到个人退休问题时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在谈到不久前发生的政治动乱时说：现在我可以肯定，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我这里主要讲两点。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倒。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总之，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强调：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同时，希望李政道转告

他认识的人，包括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请他们放下包袱，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9月19日 上午，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针对巴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处理动乱的指责，指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根据谣言做出的，中国不能接受。我们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主宰一切表示怀疑。中国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提出制裁中国的国家，其内部是否行得通还是个问题，现在事实上也没有行得通。一个国家自称为世界宪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化大革命”时，中国本身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但也没有把中国搞垮。老实说，制裁十年二十年，中国也还是存在。

9月22日 和李鹏签署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授予王玉文、王志强、姜超成“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授予阎正连“灭火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9月26日 为《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冀南银行》题写书名；为《中国海洋报》题写报名；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十周年题字。

9月28日 上午，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王震等，接见出席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全体代表。

△ 会见并宴请包玉刚。

10月1日晚，出席首都各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四十周年联欢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朝鲜、民主德国、巴基斯坦、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古巴、肯尼亚、布隆迪、厄瓜多尔、蒙古、美国、日本、英国、荷兰等国客人。在同西哈努克交谈时说：今天看到一条消息，越南又提出要求尽快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对此我们抱欢迎态度，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越南必须真正、全部、干净地从柬埔寨撤军。撤了，才能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在同朝鲜党政代表团团长李钟玉〔1〕谈到不久前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时说：发生那件事是坏事，但归根到底对我们是有益的。过去一段时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我们党一些同志把思想阵地也交出去了。经过这件事，我们清醒了。我们的秩序两个月前已经恢复，但还要保持必要的警惕。不过，戒严不影响人民的正常活动。

10月5日上午，会见巴勒斯坦国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2〕。指出：中巴友谊几十年如一日，相互支持，相互信任。这种友谊非同一般。愿中巴友谊万古长青。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时期开始，对你们进行的斗争，我们都给予支持。你们已经取得相当的胜利，但这不是完全的胜利，你们面前仍存在严峻的斗争。还指出：巴解组织近年来采取务实、灵活的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阿拉伯民族团结和巴解内部团结，可以赢得很多朋友。只要坚持奋斗，坚持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最终

〔1〕 李钟玉，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 亚西尔·阿拉法特，当时还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

将会取得胜利。

10月7日 上午，会见老挝部长会议主席、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请客人转告越南领导人：我们从来认为中越最终是要改善关系的。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撤军。在谈到自己退休问题时说：我本人多年来一直提出要求退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难免有一天出差错，而且身居高位，一旦突然发生不测事件，影响倒不好。所以现在我要集中一切力量争取退休，要求同志们理解。我们要坚持党和国家的退休制度，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在谈到老挝正在进行的改革时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有的做法在中国行得通，在你们那里不一定行得通；有些做法在你们那里行得通，在中国则行不通。我们主要的经验是要把马列主义原则同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10月10日 为纪念十月十三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四十周年题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0月26日 上午，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指出：中泰两国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典范。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在谈到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问题时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

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就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在谈到退休制度问题时说：我现在尽量不管事了，日常事务少过问。我不赞成终身制，多次提倡退休制度。退休制度提倡了多年，自己未办到说不过去，我心中始终存在一个疙瘩。我现在的奋斗目标是全退，要求同志们理解。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10月31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指出：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

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在谈到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时说：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11月4日 在住地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

11月5日 前往北京火车站迎接来华进行内部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六日上午，在同金日成举行会谈时说：这十年我们党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岗位，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这在国际上也是公认的。我们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后又包括陈云同志，包括我，那个时候还有林彪。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党所以没有垮，就是因为有这个核心，就是

毛主席、周总理，把这个局面撑起来了，而且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1〕}。这也是一个有力量的领导集体。在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和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基本上是做得好的，但也有失误，甚至是重要的失误。两个总书记失职，不是重要的失误吗？这些失误纠正起来比较顺利，但也需要总结经验。指出：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两个总书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现在实际上换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江泽民同志知识面比较宽，多年来都是地方和部门的重要干部。这四个多月的中央工作很不错。他工作扎实，而且比较民主。十二日，再次同金日成进行会谈。

11月6日 收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来信。来信表示，美国与苏联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2〕}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当初尼克松访华的地缘政治原因依然存在，今天，美中两国在许多重要领域有着相似的利益。来信建议，在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晤后，美国将派特使访华，向邓小平通报会晤情况，探讨如何使美中关系正常化。

〔1〕 叶帅，指叶剑英。

〔2〕 1989年12月2日至3日美国总统布什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海域一艘苏联客轮上举行会谈。

11月6日—9日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七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全会提议：江泽民任党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任党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任党中央军委副主席，杨白冰任党中央军委秘书长；免去杨尚昆党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免去洪学智、刘华清党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职务。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提议。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和《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指出：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11月9日 会见出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在谈话中说：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11月10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

回答如何确保改革开放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等问题时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十年改革开放，虽然出了些毛病，现在需要进行治理整顿，但成就是很显著的。我们前进了一大步，使中国上了一个台阶。这一切来之不易。实践证明了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加强中央的权力是对的，但并不等于改变过去实行的改革开放以及权力下放等措施。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世界新格局。现在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秩序被打乱了，地区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现在需要国际政治家来考虑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个问题。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提出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请基辛格转告布什总统：美国应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并指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

11月12日 上午，接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指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就是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不同，因为他们的军队与我们的军队经历不同。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还说：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11月13日 上午，会见斋藤英四郎〔1〕为高级顾问、河合良一〔2〕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指出：在我离开领导职务之际，应该见见老朋友。你们这个团可能也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我已经八十五岁了，再不退，不知到哪一天就变成终身制了。我自己提出应该废除终身制，自己不退就是在终身制问题上犯错误。我今后不再代表党和国家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今后有些老朋友来中国，可能不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今后，我有意见，还要对领导班子讲。对新班子，我相信他们有能力把事情做好。有差错，他们自己总结，取得经验，就又前进了一步。重要的是领导班子要团结。在谈到国内情况时说：中国十年来制定的方针、政策不会变，发展战略不会变。治理整顿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前一段我们经济建设搞得太快，有点后劲不足，但我们不后悔。我们毕竟上了一个台阶，不是迈了一小步，而是一大步。我们十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一个大的失误就是政治思想教育少了，连爱国主义宣传也少了。青年人当中，有人

〔1〕 斋藤英四郎，当时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

〔2〕 河合良一，当时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

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实际上是一种洋奴思想。前不久的动乱，是由于思想混乱造成的，加上领导集体内部有个别人实际上在搞分裂，站在动乱一边。我们对学生采取了相当大的宽容态度。有些外国政府和舆论认为，我们实行戒严似乎犯了罪。美国曾经帮助蒋介石在台湾实行了三十多年戒严。为什么台湾戒严这么多年，美国继续积极援助，中国为了维护安定，才实行了几个月的戒严，就认为犯了罪？这是因为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差距太大了。在谈到人权、国格问题时指出：人权重要，还是国格重要？我看国格是关系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的问题，是压倒一切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成员，连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都能背叛的人，值得信任和尊重吗？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究竟现在世界政治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是什么？很值得研究。在谈到中日合作时说：两国合作具有深厚的基础，这种合作要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对中日友好的方针不会改变。希望日本方面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需要自强，不要自卑。只有这样，友谊才是永恒的，合作才是永恒的。

11月15日 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本月六日来信。指出：我一直把你看做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读了你的信后，我对中美两国如何共同采取步骤恢复和发展友好关系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我已委托基辛格博士向你当面转达。我希望并相信将能得到你的积极响应。我本人和中国政府欢迎你派私人特使访华。

11月17日 上午，会见美国前驻华大使伦纳德·伍德科克夫妇。说：我已经八十五岁了，要想到总有一天要糊涂的。

要避免在糊涂时做糊涂事，说糊涂话，避免给别的领导人制造麻烦。不要糊涂时犯错误，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指出：中美要友好相处，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我们不做伤害美国的事，美国也不能做伤害中国的事。这次美国官方使用的手段太厉害，甚至连回旋余地也没留。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僵没好处。要尽早结束这个纠葛，最好不要超过今年，为什么八十年代的事情要拖到九十年代？不必讲是谁占了上风，谁占先，谁胜利，也不能让世界上的人认为哪一家输了，哪一家屈服了。解决中美之间半年纠葛，不管美国使用什么语言、方式，要在实质上结束制裁。我们希望短期内解决这个纠葛。作为一条原则，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态度来解决纠葛。

11月20日 上午，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回顾“刘邓大军”的历史。指出：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抗日战争时，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有摩擦战，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也在这个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编成纵队。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赢。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

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早反攻。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晋冀鲁豫在中间，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直出大别山，搞无后方作战，困难可想而知。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还指出：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在回忆二野进军西南的历程时说：二野进军西南后，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一九五〇年的任务概括

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对二野历史的回顾》。

11月23日 上午，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平息暴乱后，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强调：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

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12月1日 上午，会见樱内义雄^{〔1〕}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指出：在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实行制裁时，你们带了这么大一个代表团来我国访问，这是真正友情的表现。在谈到中国国内问题时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他们主持全局已经五个多月了，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而有任何变化。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在谈到动乱问题时说：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虽然有一些失误，但今年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也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教训。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这次动乱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这次我们采用戒严的方式解决了动乱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1〕 樱内义雄，当时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

12月5日 和杨尚昆会见台湾客人王永庆〔1〕。

12月6日 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六十周年题词：“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六十周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图书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题写馆名；为《中国财政四十年》（画册）、《万众欢腾》（画册）题写书名；为《中国初中生报》题写报名。

12月8日 在住地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国际问题。

12月10日 上午，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你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还说：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此前，收到美国总统布什本月一日来信。来信提出，在马耳他美苏首脑会晤后一周内，将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公开访华，向中方领导人通报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情况。信中还要求中方对邓小平提出的结束

〔1〕 王永庆，当时任台塑关系企业董事长。

中美关系纠葛的一揽子建议，做出进一步的澄清^{〔1〕}，表示希望并相信可以找到恢复两国关系的途径。来信还表示，他正在为“解铃”而做出努力，请中方也予以协助，共同做出努力。这个谈话的节录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12月14日 上午，在住地和薄一波谈话。

〔1〕 1989年12月9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向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明，邓小平提出一揽子方案的考虑是：第一，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结束纠葛，开辟未来。第二，中美之间达成解决办法，必须同步或基本同步实现。第三，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保持接触，解决问题。钱其琛进一步表示，邓小平提出的一揽子方案，充分表明了中方解决中美纠葛的诚意，也充分考虑了美方的反应及布什总统来信中的想法。

1990年 八十六岁

1月18日 上午，会见李嘉诚。在谈到中国的发展和稳定问题时指出：去年的动乱，美国卷入得很深，现在转得也快。中国的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如果中国乱起来，成亿人向世界各地跑，难民问题将遍布世界，香港首当其冲。中国乱起来不只是大陆的问题，而将是国际局势是否稳定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中国将成为政治经济强国，世界舆论普遍同意这一点。中国要发展，首先要稳定，开放政策要继续下去，也靠稳定。中国头号的问题是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希望。香港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国家稳定，国家不稳定，首先受害的是香港。我们如果对动乱不采取坚决稳妥的办法迅速解决，中国将乱得一塌糊涂，也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局面。如果中国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全面内战的局面，哪里还谈得上发展？迅速解决动乱，取得安定的环境，这个决心我们下对了。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中国人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人，不管他是哪个党哪个派，都不能说完成了历史使命。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人是爱国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几年前我讲过，从一九九〇年起，香港人就要参与香港行政、司法、经济、金融等各方面的管理，不然政权怎么能一下子接过来。动乱平息后，英国参加对中国的制裁，在香港问题上也放出触角，试探中国，要从政治上入手，搞“政治民主化”来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争取在香港得到更多的利益，使得它在一九九七

年以后仍然管理香港，保持部分宗主国的权力。英国放出这样的空气，要价要得很高，起码比过去高了。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的。中国人在主权问题上不会放过一分一毫。中国绝对不能软，不能让人认为中国会屈服，能制裁得了。我跟撒切尔夫人谈过，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在考虑制定香港基本法时，我就讲不能使中央政府无所作为。如果把香港变成反社会主义、反大陆的基地，中央政府就要干预，不干预会越搞越大。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要中国、香港、英国三方面都能接受，五十年不变，大家都得到发展。真正能稳定香港的，第一是大陆的政策不变，第二是华资强大起来，与国内取得共识，包括推荐管理香港的人才。要有才干的人管理香港，才能稳住香港的局面。爱国，就是要爱整个中国，爱中国香港。这个力量怎样凝聚起来，采取什么形式，要考虑。希望你同接触到的有影响的人取得共识，搞好香港的过渡。

1月20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次日抵达上海。

1月26日 除夕之夜，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共庆新春佳节。在朱镕基^{〔1〕}代表上海人民祝他健康长寿时说：我到上海来过春节，向你们拜年来了，并通过你们向上海人民拜年。随后，同大家合影留念。

在上海期间 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1〕 朱镕基，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

2月13日晚，乘专列离开上海返回北京。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同朱镕基谈话。在朱镕基谈到虽然有东欧事件冲击，但上海仍然稳定时，说：不要紧，我们天不怕、地不怕。要多做政治思想工作。在谈到建议开发浦东时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就在鼓动改革开放这件事。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在谈到浦东开发需要优惠政策时说：我赞成，你们应当多向江泽民同志汇报。

2月14日途中，在济南火车站停留时同姜春云〔1〕等谈话。晚，回到北京。

2月17日上午，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谈浦东开发问题〔2〕。对李鹏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

△ 上午，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并即席讲话：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是对过去、现

〔1〕 姜春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2〕 1990年3月28日至4月7日，姚依林受江泽民、李鹏的委托，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上海对开发开放浦东问题进行专题研究。4月18日，李鹏在上海视察时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请示》，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必将对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极重要的影响。

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四月四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实施。邓小平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香港基本法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2月18日 参加第七届“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获冠军。

2月20日 上午，会见霍英东。指出：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讲历史。人人都要有个信念，没有信念团结不起来，不会往前奔，只会怨这怨那，起码是颓废，这是不行的。我说过，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抓这条，中国就团结不起来。

2月27日 为《周恩来外交文选》、《张际春文选》、《百团大战》、《南京解放》、《奉献者之歌》、《吴有训》题写书名。

3月2日 《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论党的建设》、《邓小平论改革开放》、《邓小平论文艺》、《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论著，由民族语文翻译局、民族出版社翻译成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发行。彝、壮等民族语文版也将陆续翻译出版。

3月3日 在驻地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谈话。指出：

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还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比如抓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在谈到农业问题时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

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最后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

△ 下午，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说：没有政治远见，你不会采取到中国搞合资经营煤矿这样的行动。希望你们这个合作项目成为中美经济合作的最好的典范。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我们欢迎国际合作，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欢迎你参加这方面的合作和竞争。还说：国际上还没有取消对中国的制裁，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制裁没有什么用处。世界上像你这样有远见的人多的是。在回答怎样看待苏联国内问题时指出：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分的批评。我们希望他们的情况好起来。苏联的问题比我们多。我们希望中苏关系搞好，更希望中美关系搞好。在客人谈到如同当年列宁所处的年代那样，中国需要更多的商人，列宁拯救了苏联，邓小平主席拯救了中国时，回答：我同列宁不能比，列宁的形象是高不可攀的。

3月20日—4月4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会议决定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4月7日 上午，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指出：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四个坚持”，就没有稳定，改革开放也是空的。搞社会主义，也允许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存在。还指出：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在谈到中国的统一问题时指出：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自不量力。我们相信，最终将靠

“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强调：中国是很有希望的。九十年代这十年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机会。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振兴中华民族》。

△ 晚，打电话给西昌卫星发射现场，祝贺用“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地发射了由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地运用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为外国发射卫星服务。

4月11日 为《包玉刚画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丛书》、《华北解放战争摄影集》、《纪念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四十周年》、《基本法的诞生》题写书名；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题写会名；为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中华体育健儿记功柱题名。

4月20日 在住地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

4月29日 视察北京三元立交桥。

5月13日 上午，会见埃及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在谈到如何解决国际关系问题时指出：时代不同了，

任何一种僵化的思想和僵化的模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僵化会导致对抗。对立的双方都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不能一厢情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相处，相互合作。互不干涉是最根本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得起考验，谁也不吃亏。强调：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中国乱不得。中国乱起来，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不仅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会影响整个世界。中国一乱，将出现内战局面，难民往外跑，周围国家都要受影响。千方百计、一心一意致力于发展和稳定，是中国人民的责任，也是世界各国政治家的责任。世界上负责任的政治家绝不能设想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主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一个国家要乱很容易，一夜之间就可以乱起来；但是，寻求较长期的稳定却需要花很多心血、很多时间，而且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都要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我现在不管事了，但心放不下。只要处理好中美关系，我们的后人，全世界的人包括美国人都会感谢我们的。

5月16日 会见邓文仪〔1〕。在谈话中希望他在台湾多联络黄埔同学，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做贡献。

5月21日 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谈到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影响时指出：我相信不久就会过去。我们从未责怪学生、青年，主要问题出在党内，甚至是党内某些高层人物。没有什么理由责怪

〔1〕 邓文仪，国民党高级将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曾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内政部”政务次长、“行政院”顾问。

青年，对青年工作做得太少了。这件事对国内经济影响也不大，基本未妨碍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政策。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破坏了原有的国际政治秩序，需要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但不能由七国首脑主宰一切。国际政治新秩序由西方七个国家垄断，很不健康。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逐步形成。美国应学得谦虚一点。日本不应因战后蓬勃发展对自己估计过高。统一后的德国〔1〕不要使人感到恐惧，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谨慎一些。这样世界就会看到，即使是穷国也能生存，这就形成了平衡的格局。在听取客人介绍德国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后说：我们有关部门一定会研究你们的经验，我们经验太少。

5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同志论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6月11日 下午，会见包玉刚。针对台湾当局抛出的“一国两府”论，指出：台湾最近提“一国两府”，要害是回避了哪个是中央政府，难道能有两个中央政府，这不就成了笑话？所以，“一国两府”实际上是“两个中国”。解决统一问题，只有“一国两制”可行，谁也不吃亏，哪个方面都可以接受，这样全民族就都发展起来了。在谈到东欧剧变问题时说：美国得分是最多的，苏联是大大削弱了。由于东欧的变化而引起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中国

〔1〕 1990年8月31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柏林签署关于实现政治统一的“统一条约”。10月3日，德国实现统一。

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稳定。中国不稳定，世界就不会稳定，我跟很多朋友讲过这个道理。所以，香港人应该拥护我们保持稳定，应该举双手拥护。对中国、对世界、对地球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就应该理解我们。“文化大革命”就是打内战。我在一九七五年抓的中心工作，就是抓稳定，抓秩序，恢复生产。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在世界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要向香港的左翼作家、新闻界讲讲这个道理，要在这个问题上造声势。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乱，就丧失一切。如果乱起来，中国什么事也做不了。不要看现在有人孤立我们，日子难过一点，但现在确实是一个机遇，不要丧失机遇。

6月15日 为《纪念李富春》、《焦裕禄^{〔1〕}》、《李慰农^{〔2〕}烈士专集》题写书名；为《人民画报》四十周年、《法制日报》十周年、纪念装甲兵组建四十周年题字；为电视讲座《廉政与法制建设》题写片头。

6月18日 在住地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中美关系问题和台湾问题。

6月23日 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参加桥牌比赛。

6月30日 上午，会见孟加拉总统侯赛因·艾尔沙德。在

〔1〕 焦裕禄，在任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期间，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抵御洪涝灾害，积劳成疾，1964年逝世。

〔2〕 李慰农，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任中共青岛地委书记。1925年7月牺牲。

谈到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时说：中国最不怕制裁。我们利用制裁这件事教育我们的人民，使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要自强不息。中国真正的稳定是要靠自身的发展。中国不会改变颜色，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客人表示要学习我国计划生育的经验时说：有人骂我们没有人权，说计划生育不人道，有罪。我看讲这个话的人有阴谋，用心不良。计划生育只要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就是正确的，不要去听信别人的闲言碎语。

7月3日 上午，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并到京广大厦第四十层俯瞰北京市容。在视察时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这么多亚运会建筑，是集中力量在短时间搞出来的，而且搞得这么好，证明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什么困难的事都能搞成。一九五九年我们搞十大建筑〔1〕，那时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社会主义行吗？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建筑之一，现在看起来，人民大会堂经受住考验了。我

〔1〕 指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兴建的10座大型建筑。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钓鱼台国宾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和北京工人体育场。

这次看亚运会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青年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

7月11日 上午，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指出：到我们这个年纪总要考虑后事，十年前我就考虑交接班的问题，一直到去年才完成换代的事情。他们已经把领导班子建立起来，一年来证明他们是胜任的，我很放心，也很高兴。去年以来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我认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什么“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可能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还说：我的目标是活到一九

九七年。我想到自己的国土香港去走走，哪怕一个小时，证明“一国两制”可以行得通。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7月13日 深夜，乘专列离开北京，次日晨抵达北戴河。

7月20日 同彭真谈话，要他管些大事。

8月11日 同薄一波谈话。

8月18日 同彭真谈话。

8月20日 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选》朝文版。该书由中文版《邓小平文选》选辑而成，收入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报告、讲话、谈话共二十篇。

8月24日 深夜，乘专列离开北戴河，次日晨回到北京。

8月31日 下午，收到美国驻华大使馆转交的乔治·布什总统来信。信中表示，美国不会缩小或降低具有重要战略性的中美关系。美国对中国就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所采取的原则立场^{〔1〕}表示赞赏。

〔1〕 1990年8月3日凌晨，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领土。中国政府对此的原则立场是：反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入侵和吞并科威特；反对大国军事卷入；主张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范围内，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伊拉克与科威特的争端。

8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五月，此书经修订增补后出版第二版，更名为《邓小平论教育》。

9月5日 为《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半世纪的历程——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五十周年》、《萨马兰奇〔1〕与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画册）题写书名；为《新疆经济报》题写报名；为董必武纪念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五十周年、希望工程、总参谋部情报部建部四十周年、首届中国曲艺节、珠海经济特区十周年、中山温泉宾馆十周年题字。

9月11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沈阳。

△ 晚，得知蔡畅〔2〕当日逝世，即委托夫人卓琳给蔡畅家属打电话转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蔡大姐，和蔡大姐是几十年的老战友。我很敬重大姐。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我很难过。

9月12日 上午，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在谈到国际局势时说：这一年来变化很大，但这个变化才开始，旧的秩序彻底打破，新的秩序还未露端倪，刚刚冒头。过去的矛盾是东西矛盾，还有南北问题。美苏两霸，苏联集团现在没有了。究竟世界局势变化到什么样子，怎么形成一个新的比较稳定的格局，现在还看不出来。苏联国

〔1〕 萨马兰奇，即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西班牙人。当时任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

〔2〕 蔡畅，终年90岁。

内怎样变化还不清楚。现在我们要冷静地对待变化，要耐心一些。处理所有的国际问题，都要采取这样的冷静态度，这一点对中国特别重要。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制裁，实际上对中国影响不大，我们表示了反对，但也不大在乎，相当克制。观察世界的变化，争取向好的方面变化，向有利于我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面变化，需要采取这样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核心问题有两个，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党的领导。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自己的失误，比如腐败现象、官僚主义等等，要认真纠正。前一段我们忙于搞四化建设，发展经济，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现在是个机会，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振奋人心。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对于西方的那些“反响”，我们不在乎。

9月13日 和江泽民、宋平会见金日成。

△ 乘专列离开沈阳回到北京。

9月15日 上午，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指出：现在世界上都说中国人会经营。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海外华人能够站住脚是很不容易的。中国人长期受歧视。中国人真正站起来是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在那以前，中国人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少数人虽有地位，但所有黄皮肤的面孔吃不开，就是现在也被人歧视。我对香港客人说，要改变这种历史，关键是中华民族要发展，首先作为华人主体的中国大陆要发展起来。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现在对台湾是个机

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十一亿人口。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八。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

9月21日 得知徐向前^{〔1〕}本日逝世后，即让秘书打电话给徐向前治丧办公室表达对老战友的深切哀悼。

10月15日 到聂荣臻家探望。

10月24日 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河北省涉县赤岸村将军岭和修建在涉县的刘伯承元帅纪念亭题字；为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题写园名；为人民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题字。

12月7日 为《彭真》（画册）、《光照千秋——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题写书名；为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奖状题字：“双拥模范城”、“双拥模范县”；为武汉机场题写机场名；为《经济参考报》题写报名；为中国检察官学院题写院名。

12月24日 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指出：对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我满意。对这次统一思想，制定出新的

〔1〕 徐向前，终年89岁。

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1〕}，我完全赞成。看来我们农业的潜力大得很，要一直抓下去。钢要有一亿到一亿二千万吨才够用，这是个发展战略问题。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稳扎稳打。在谈到国际问题和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作为。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又指出：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强调：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

〔1〕 指准备提交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

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在谈到国内稳定时指出：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最后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国际上不可能小视我们，来中国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后年党代会要选一些年轻一点的精力充沛的人进政治局，进常委会更好。这一年的成绩不可低估，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这个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12月26日 上午，到中南海怀仁堂投票站，参加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1991年 八十七岁

1月2日 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参加第八届“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获冠军。

1月27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视察。

1月28日 晚，抵达上海。在去住地的途中听取朱镕基汇报。在听到去年上海各项经济指标完成得不错，但国营企业十分困难时说：这是全国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抓晚了。我说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冒点风险也要干，就是说有点通货膨胀也要干，其实也不一定多发多少票子，现在积压产品占用流动资金太多了。在谈到浦东开发问题时指出：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1月31日 上午，视察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听取公司负责人汇报，参观铆装和总装车间。指出：飞机制造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带头工业，是很有发展前途的。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〇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二十万吨的

船也可以造出来了。

2月6日 上午，视察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参观总装配厂、发动机厂和国产化展览室，详细询问桑塔纳轿车的型号、性能、原材料是否国产化，出口到东南亚地区的价格。指出：你们的厂区很漂亮，文明、现代化，厂房很大，但不如日本人利用率高。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你们还要抓紧创新，搞新产品，变换车型，把车身变一变，像产品换个包装一样。在看到发动机铸件毛坯时问：是自己生产的吗？要研究利用稀土金属。中国稀土资源世界第一，用处是多方面的。一个美国朋友说，你们有这个宝，等于有中东的石油。我们还没有广泛研究，对这个宝怎样用还重视不够。要保护稀土资源。在视察途中，当陪同的朱镕基谈到外滩的一些大楼，解放前是银行大楼，解放后是政府办公楼，这些楼可以租赁给外资银行，但又有顾虑时，说：我赞成！你们试一试，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在朱镕基说到还有不少人认为合资企业不是民族工业，害怕它的发展等问题时，指出：说“三资”企业〔1〕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

〔1〕“三资”企业，指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方独资企业。

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2月10日 同李先念谈话。

2月12日 同杨尚昆谈话。

2月13日 上午，视察上海航天局新中华机器厂，了解运载火箭、气象卫星等的研制和生产情况，询问产品的性能和工厂生产能力。对陪同的上海航天局负责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国家需要就会集中力量来保证你们，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几件事。你们要搞新型号，增加新的能力，相信你们会办得好的。这支队伍经过几十年的锻炼，没有失败过。在返回住地的途中说：我们抓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抓得比较早，这一条抓对了。有的国家就不行，所以搞得很困难。在谈到浦东开发问题时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在东南亚国家的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

2月14日 下午，和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部分老同志

及各界人士共庆新春佳节。

△ 晚，同杨尚昆谈话。

2月18日 上午，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南浦大桥工地，说：上海这么大，总是要造好几座桥。随后前往新锦江大楼顶层俯瞰上海市容，听取浦东开发规划汇报。指出：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还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八日同上海负责人谈话的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2月20日 晚，乘专列离开上海回北京。

2月21日 途中，在济南火车站停留时同姜春云、赵志浩〔1〕交谈，听取他们汇报。当日回到北京。

3月1日 在住地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

3月4日 为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十周年题词：“绿化祖国，

〔1〕 赵志浩，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省长。

造福万代。”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回忆欧阳钦》、《钱学森^[1]》、《一代战将》、《南京路上好八连》、《中国医科大学校史》、《中国乡镇企业》、《亚运在北京》题写书名。

3月8日 经邓小平同意，《中国妇女报》发表他的《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一文，十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该文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邓小平接见参加全国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的同志时讲话的一部分。

4月10日 向程子华^[2]遗体告别仪式送花圈。

4月18日 委托夫人卓琳代表他到北京医院看望本月十一日生病住院的彭真。

4月23日 为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八六三”计划工作会议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为《罗荣桓传》、《王震将军》、《乌兰夫》、《九一八事变丛书》、《中国司法行政》、《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题写书名；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杂志题写刊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题字；为深圳火车站题写站名；为《中国检察报》题写报名；为中国检察官管理学院题写院名。

[1] 钱学森，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2] 程子华，1991年3月30日逝世，终年86岁。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逝世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5月25日 同杨尚昆、刘华秋〔1〕回忆与“四人帮”的斗争。

6月17日、20日 同身边人员谈中美关系和国际问题。

8月19日 让身边人员转告中央负责人：苏联今天发生的事件〔2〕是紧急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事件。中国的表态要研究一下。

8月20日 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3〕谈话，议论十九日苏联发生的事件。在谈到国内局势时说：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处理一九八九年那场动乱时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再一个是由于坚持改革开放。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不拿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道理也要讲够。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没有改革

〔1〕 刘华秋，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2〕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职责，由他代行，并成立包括他在内的八人紧急状态委员会。两天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戈尔巴乔夫恢复行使总统职务。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暂停苏共在全国范围的活动。9月6日，苏联宣布承认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3个加盟共和国独立。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3国领导人宣布建立由独立国家组成的联合体。21日，苏联的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举行会议，签署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不复存在。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解体。

〔3〕 钱其琛，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

开放十年经济发展的那个飞跃，取得顺利调整是不可能的。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还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强调：人才难得。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总的看，我们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建议中央总结一下用人的问题，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总结经验，使用人才》。

9月12日 为《周恩来政论选》、《刘少奇手迹选》、《彭德怀传》、《刘伯承传》、《贺龙传》、《徐向前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怀念陈毅》、《山西新军》、《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十周年》（画册）题写书名；为上海的南浦大桥题写桥名；为《火箭兵报》题写报名；为抗美援朝纪念塔题写塔名。

9月24日 得知包玉刚^{〔1〕}于本月二十三日逝世后，致电

〔1〕 包玉刚，终年73岁。

其家属：“惊闻玉刚先生病逝，深为悼念。先生热心祖国建设，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希家人节哀珍重。”

9月 为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题词。

10月5日 上午，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中最核心的是发展生产。我们的改革是先从经济上，从改善人民生活上做起，不是从政治上做起。在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我就说过，不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面对布什以及其他美国人多次讲，我们不会学美国。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也确实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在谈到国际问题时说：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还没有定，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是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孤立中国，谁也办不到。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没有起什么作用。七国集团从宣布对中国制裁的第一天起，就不一致。因为在美国宣布对中国制裁的同时，布什就宣布中国是不能孤立的。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今年中国遇到的水灾是很大的水灾，救灾这件事教育了人民，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好。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因此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包括自我教育，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不搞特殊化，这是过硬的东西。中国是大国，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10月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2月7日 同身边人员谈对外政策问题。

12月28日 在住地同杨尚昆谈话。

12月29日 委托夫人卓琳和子女到医院祝贺聂荣臻九十二岁寿辰，并送去鲜花。花束的缎带上写着：“祝荣臻同志健康长寿！邓小平、卓琳率全家。”

1992年 八十八岁

1月2日 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参加第九届“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并和运动员合影留念。

1月17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

1月18日 上午，抵达武昌。在火车站听取关广富〔1〕汇报。

△ 下午，抵达长沙。在火车站听取熊清泉〔2〕汇报。在听到一九九一年湖南北部发生洪涝灾害、南部发生旱灾，但在大灾之年仍然夺得农业大丰收时说：这样的大灾害，不要说第三世界国家受不了，就是发达国家也受不了。只有我们中国，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这么大的灾害。随后，和大家合影留念。

1月19日 上午，抵达深圳。到住地后即提出要出去看

〔1〕 关广富，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2〕 熊清泉，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看。在谢非〔1〕、李灏〔2〕等陪同下参观深圳市容。在参观时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当时要搞几个特区，你们深圳靠近香港，珠海靠近澳门，厦门靠近台湾，汕头是侨乡，也是靠近台湾，所以先在你们这些地方搞特区。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知要等到哪一年才实现。随后到皇岗口岸视察，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眺望对面的香港。

1月20日 上午，由谢非、李灏陪同，登上深圳国贸大厦五十三层俯瞰深圳市容。在观看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图，听取关于深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汇报后发表谈话。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如果一乱，便是一片灾难。还指出：我们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时间不多呀！世界市场也很紧，不容易竞争。要夹着尾巴做人。随后前往深圳先科激光公司视察，听取公司董事长叶华明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并参观激光视盘生产车间。

1月21日 上午，游览深圳华侨城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观看歌舞表演，在“布达拉宫”微缩景点前和家人合影留念。在回宾馆途中听取关于深圳支援相对落后地区情况的汇报时，表示赞成深圳每年按固定比例从财政划出一部分资金作为贫困地区开发“造血”型项目的基金的做法。

1月22日 上午，游览深圳市仙湖公园，在公园种植一

〔1〕 谢非，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2〕 李灏，当时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

棵长青树高山榕。在有人介绍一棵树叫“发财树”时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 下午，和杨尚昆接见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市纪委负责人，并发表谈话。

1月23日 上午，由谢非和梁广大^{〔1〕}陪同，从蛇口港乘快艇抵达珠海。离开深圳前再次叮嘱市委负责人：你们要搞得快一点。在途中听取关于广东省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情况汇报，并发表谈话。抵达珠海后，随即参观珠海市容。在询问广东农民收入情况后说：收入一千一百元人民币，在全世界来说，还是比较穷的。但可以说，现在的农民日子并不太难过。去年受了这么大的灾，没出大问题，我们承受得了，而且解决得很好。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经过这十多年改革开放，基础已与过去不同了。现在乡镇企业的设备已很可观，都是全新的或半新的，过去的设备简陋得很。这十多年真是干了不少的事。深圳和你们这里就是一九八〇年干起来的，变化真大呀！

1月24日 上午，视察珠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听取该厂总工程师迟斌元关于工厂建厂及生产情况的汇报，参观该厂的实验室和生产车间。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人欺负的局面。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要有一席之地。你们这个厂的科技发展成果就是一席之地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东

〔1〕 梁广大，当时任中共珠海市委书记、珠海市长。

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很有希望。这十年进步很快，但今后进步会比这十年更快。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每一行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我们过去打仗就是用这种方法。

1月25日 上午，视察珠海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在听取公司总经理游景玉介绍情况时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就是靠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这是正确的。在参观中对电子计算机操作人员说：我要和大家拉一拉手。我很高兴，我们有这么年轻的科技队伍。在参观结束乘车前往拱北口岸的途中说：当年钱学森搞导弹的时候，给他一百个高中生，就这样带出来了。现在这个公司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就有一百人，学历比那时高多了。珠海这个地方就容纳了这么多高科技人才，从全国来说，就更多了。今天我们看到那么多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有希望啊！从中国出去的科学工作者，有很多人很想念祖国，这很好啊！要把他们吸引回来。在陪同人员汇报到广东已制定政策欢迎留学生回来，也允许他们再出去时，说：这个好嘛！这要有点胆量。不是讲改革开放吗？开放嘛，进出就是要自由一点嘛。回来不适合，他可以走。事实上，绝大多数留学生回来后，只要安排妥当，是不会出去的。临近中午，来到芳园酒店二十九层旋转厅，观赏拱北新貌和澳门远景，听取谢非、梁广大关于广东、珠海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并发表谈话。之后，游览珠海度假村，并在途中发表谈话。

1月27日 上午，视察珠海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途中说：企业要创名牌，要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牌子。要发展就需要人才，不用人才不行。要鼓励用人才，出人才。听取公

司副总经理丁钦元汇报情况后说：你讲得好。特别是不要满足现在的状况，要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不断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才能有竞争力。视察后在返回住地的途中说：要挖掘人才，要不断造就人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做这件事。只要有人才，就可以创造出技术，事业就兴旺发达。在陪同人员汇报到个体企业的发展问题时指出：以后分工越来越细，工艺越来越新，一家一户办不了，最终要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不过，农民愿意怎样就怎样，不要搞运动，他们实际上会朝这个方向走，集体化也是社会主义。在谈到家庭问题时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

1月29日 上午，接见珠海市、佛山市、中山市负责人。

△ 下午，离开珠海前往广州，途中参观顺德县容奇开发区、容声冰箱厂。在广州火车站同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负责人话别。晚，乘专列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1月30日 下午，途经江西省鹰潭市，在火车站同毛致用^{〔1〕}、吴官正^{〔2〕}交谈，听取他们汇报。在得知江西粮食压库

〔1〕 毛致用，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2〕 吴官正，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江西省省长。

问题严重，库外堆放的粮食有四十亿斤时，指出：在粮食问题上，江西是做了贡献的。你们有困难，可以向中央反映。

1月31日 晨，抵达上海。

2月3日 晚，和杨尚昆参加上海市新春团拜会，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

2月4日 晚，同上海桥牌队打桥牌。

2月7日 上午，视察新建成的南浦大桥和正在建设中的杨浦大桥。

2月8日 晚，乘友好号游船游览黄浦江，观看上海夜景。对陪同的吴邦国〔1〕、黄菊〔2〕等说：二十一世纪是年轻人的。干部要年轻化，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人无完人，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同志就没缺点？老同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年轻化要从基层搞起来，现在的基层比过去更大，宝钢也算是一个基层。要提拔一批年轻人，这样才能后继有人。

2月10日 上午，视察上海贝岭微电子有限公司，观看该公司简介录像，听取公司经理陆德纯汇报。在高倍显微镜下观看芯片。在参观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时说：对外开放就是要引

〔1〕 吴邦国，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2〕 黄菊，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市长。

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

2月12日 上午，视察上海闵行开发区和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在闵行开发区紫藤宾馆听取开发区总经理鲁又鸣汇报。在谈话时指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农村改革是一大创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城市改革的问题也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上海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靠大家努力。

2月15日 下午，在住地观看筹建中的上海西郊宾馆水族馆模型和浦东开发区模型。

2月17日 下午，听取吴邦国、黄菊关于浦东开发和发展的汇报，并审看浦东新区规划图。听完汇报后指出：浦东开发晚了，但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2月18日 晚，视察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为孙辈购买铅笔和橡皮。

2月20日 乘专列离开上海。途经南京、蚌埠时作短暂

停留。在南京火车站同沈达人〔1〕、陈焕友〔2〕等谈话，说：要抓住时机，把经济搞上去，步子可以快一点。我现在就怕丧失时机。当听到江苏经济去年的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数时说：江苏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一点。

2月21日 回到北京。

2月28日 中共中央将邓小平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一九九二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谈话要点包括六个部分：（一）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

〔1〕 沈达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2〕 陈焕友，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省省长。

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1〕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恐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区姓“社”不姓“资”。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

〔1〕 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十三届八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全会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及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强调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定不移地深化农村改革。全会还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义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我国的经

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

（四）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

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六）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这个谈话要点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3月9日、10日 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会议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会议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讨论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强调：当前要特别注意抓住改革和建设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并

认真组织实施。会议就此作了研究和部署。会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4月16日 同身边人员谈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说：机构改革的关键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宏观要控制得好；一个是微观要真正放得开。要按这个原则来调整机构，不是单独追求工业速度。

4月22日 康克清^{〔1〕}逝世。在康克清病重期间，曾委托夫人卓琳到医院看望。

4月28日 同身边人员谈中国的发展问题。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有能力的时候，要搞高科技国防尖端武器。

5月22日 视察首都钢铁公司。参观炼钢厂四号高炉、重型机加工车间、第二炼钢厂，听取首钢负责人汇报。指出：主要是解放思想换脑筋。脑筋不换，怎么也推不动。脑筋一活，想得就宽了，路子也就多了，干得也就更好。要真正给企业权力。大中型企业不搞活，社会主义优势在哪里？改革开放进行得好的、发展得快的企业，要用上交的利税、出口创的外汇、技术水平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它的优越。

〔1〕 康克清，终年81岁。逝世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6月2日 为《毛泽东军事文集》、《朱德传》、《邓颖超传》、《中共东北军党史丛书》题写书名；为上海的杨浦大桥题写桥名；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题写校名。

6月10日 让工作人员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一位老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三千元人民币，用以救助那些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十月六日，再一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赠二千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将这笔捐款用于资助广西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孩子。百色老区的孩子写信给邓小平说：当我们得知您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赠了五千元钱，又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这笔钱用于救助我们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孩子时，我们激动得哭了。我们感到，虽然您住在北京，离我们好远好远，但您的心与我们贴得好近好近。我们一定不辜负邓爷爷的亲切关怀和期望，珍惜学习机会、好好学习，长大把家乡建设得更新更美。

6月12日 在住地同江泽民谈话。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1〕}。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

〔1〕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所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中，对建立新经济体制的讨论中提出的“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意见，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

到对外贸易和出口。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

6月21日 李先念^{〔1〕}逝世。在李先念病重期间，曾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

6月23日 阅彭真本月十七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来信，让秘书打电话转告：信中内容说得很好。已转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供他们参考。来信建议：一、把经济搞上去，关键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要搞活、要发展，搞不活，隔几年上个台阶就落实不了，这个问题关系大局。二、按价值规律调整价格，取消“双轨制”，取消妨碍商品流通的“关卡、苛杂”。三、制定统一的税法。

7月11日 邓颖超^{〔2〕}逝世。在邓颖超病重期间，曾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

7月12日 在住地同前来探望的弟弟邓垦谈话。说：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要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很长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还说：我哪天去，哪天走，不关紧要。自然规律违背不得，你们要想透这个问题。邓大姐^{〔3〕}没有痛

〔1〕 李先念，终年83岁。

〔2〕 邓颖超，终年88岁。

〔3〕 邓大姐，即邓颖超。

苦的去，是幸福的。

7月13日 同江泽民谈中共十四大筹备问题。

7月14日 获老挝国家最高金质勋章。十月二十六日，委托钱其琛接受勋章，并请老挝驻中国大使本梅·达拉洛转达对凯山·丰威汉^{〔1〕}、老挝政府和人民的感谢。

7月15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

7月23日、24日 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表示同意报告的框架。指出：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阻碍。北京郊区搞适度规模经营，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

〔1〕 凯山·丰威汉，当时任老挝国家主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

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我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同志说他都赞成，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又指出：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报告对我的作用不要讲得太过分，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报告第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要写得合乎实际。报告第二部分的第三个问题，把农业和第三产业放在一起讲也有道理，这里实际上是讲产业结构的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包括三个方面：提高第一产业的质量，调整第二产业的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兴起。提高第一产业的质量，具体的内容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调整产业结构是个大问题。最主要的是调整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第三产业创造利润最多。报告第二部分的第八个问题，所讲的文明素质，没有确定的标准，但总的说起来，我们国家的社会文明素质要比别的国家高，单单说救灾，哪个国家能做到我们这样？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不能定高了，还是要提倡节

约，提倡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但是必要的消费又不能卡得太紧，限制太死，否则就没有刺激了，没有市场了。日本人的经验是高消费刺激高生产。我们办不到，我们基础弱。我们可以提用消费来刺激生产。报告第二部分的第六个问题和第四部分，讲我们党和国家历来的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具体解释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问题不要丢，要加几句。民主集中制我们讲得太少。这个制度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用宪法的语言来表述好。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根本制度的问题，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报告第三部分，讲世界范围的问题，不要单写欧洲。世界局势还要观察好多年。集中批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报告稿提到的军队建设问题，指出：中国的武装力量，人数可以减少，但是质量要提高，不能削弱。中国是个大国，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保证不了国家的安全。军队的问题是加强装备，加强作战指挥能力，提高战斗力。

7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8月19日 深夜，乘专列离开北戴河，次日晨回到北京。

8月23日前 就近期北京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学生来信表示衷心拥护南方谈话，感谢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一事，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回信。二十三日，中央办公厅在回信中写道：同学们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关心改革开放事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立志为振兴中华奉献青春，小

平同志感到很高兴。他委托中央办公厅对学生们的良好祝愿表示感谢，并向全国广大青年学生表示问候。

9月18日 让秘书打电话给彭真，询问本月十五日他在北京医院做手术后的情况，并致问候。十月十二日，在彭真九十岁生日之际，让秘书到医院看望并致意。

10月6日 就中央军委人事安排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

10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是大会特邀代表。十二日上午，江泽民代表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

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

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报告评价：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这次大会作出三项决策：一、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十八日，大会通过作了部分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后的《章程》总纲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

10月12日 在住地收看中共十四大开幕式实况转播。听完江泽民的报告后，称赞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

10月19日 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 看了中共十四大闭幕的有关报道后说：真是群情振奋！

△ 下午，同新当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和出席中共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对江泽民说：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11月1日 视察北京市二环路。

11月12日 在住地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谈香港和台湾

问题。

12月8日 邓小平同志办公室通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时确定了编辑组成员和具体负责人。

12月14日 上午，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杭州，次日上午抵达杭州。

12月17日 上午，游览西湖。在游艇上向李泽民〔1〕、葛洪升〔2〕了解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情况。在谈话中指出：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一定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搞好精神文明的建设。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少说多做，要努力把自己的事办好，这样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中才有更多的发言权。

12月18日 阅《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两篇文章〔3〕。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

〔1〕 李泽民，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2〕 葛洪升，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省长。

〔3〕 这两篇文章刊登在1992年12月18日《参考消息》上。

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

12月29日 被英国《金融时报》评选为“一九九二年风云人物”。

1993年 八十九岁

1月1日 委托王汉斌^{〔1〕}到北京医院看望彭真，并致节日问候。

1月3日 上午，同孙辈谈话。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呆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自己去锻炼。

1月4日 接见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代表。说：我很关注浙江的发展。浙江的发展势头是不错的。要珍惜这个好的发展机遇，保持好的发展势头。同大家合影后，乘专列离开杭州。当日，抵达上海。

1月15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选录作者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九二年间的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

〔1〕 王汉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月22日 同吴邦国〔1〕、黄菊〔2〕等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共度除夕。在交谈中说：我向大家拜年，并通过你们向全体上海人民，首先是上海工人阶级拜年。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头羊。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还说：上海人民在一九九二年做出了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当然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有一点小的损失不要紧，回头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就是了。乘风破浪，脚步扎实，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强调：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2月8日 乘专列离开上海。离开前，对吴邦国、黄菊说：从现在开始到二〇一〇年是难得的机会，不要丧失了。次日回到北京。

2月20日 上午，同身边工作人员谈香港问题。

3月1日 在住地同江泽民谈话。

3月12日 得知王震〔3〕本日在广州病逝，让身边工作人员给王震办公室打电话：对王震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

〔1〕 吴邦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2〕 黄菊，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市长。

〔3〕 王震，终年85岁。

3月15日—27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宪法，肯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肯定了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肯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5月4日 初审编辑组报送的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部分文稿。指出：这部分内容不少，可以编一本好书出来。但要加工，要仔细推敲。现在有些东西没有理清楚，看起来费劲，那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本本，大概占三分之一，文字上要下功夫。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

5月25日 开始逐篇审阅编辑组报送的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文稿整理稿。

6月4日 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鲍比·沃尔夫和北美桥联秘书长杨小燕，分别代表各自的联合会，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和名誉主席万里颁发世界冠军金牌奖和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们为促进中国桥牌运动的开展做出的贡献。

6月10日 同刘华秋^{〔1〕}谈外交问题。

〔1〕 刘华秋，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

6月11日 审阅编辑组报送的《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整理稿。指出：这篇文章要加一个长一点的、详细一点的注释。^{〔1〕}注释要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过程、谈判的主要点都反映出来，要写明中国的意见是撒切尔夫人及英方参加会谈的人表示接受了。当时谈判谈得很细，谈到驻军的问题。我说，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表现的形式主要是驻军。后来又为一个很小的问题争了起来，就是双方今后在什么地方进行磋商。我说，可以在伦敦、北京、香港三个地方轮流进行。这些问题英方后来都表示接受了。所以，外国人说我敏锐。基本法也是在双方达成谅解和几个协议的基础上才搞成的，英国也同意了。可以把整个中英谈判的过程搞个备忘录，写罗嗦一点不要紧，找个合适的时机发表，配合当前的斗争。要让大家知道，是英方不守信义，我们是守信用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做一篇好文章。

6月22日 在住地同江泽民谈话。赞同江泽民提出的加强宏观调控，突出抓金融工作的建议^{〔2〕}。指出：什么时候政府都要管住金融。通货膨胀，人民受损失。人民币不能贬值太

〔1〕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香港问题做了一个详细的注释。

〔2〕 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意见》指出：我国经济在继续大步前进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要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切实贯彻“在经济工作中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同时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的重要指导思想，把加快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到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上来。《意见》提出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等十六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

多，市场物价要控制住。

7月7日 审阅编辑组报送的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几篇文稿整理稿。指出：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对送审报告提出的以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终卷篇的意见表示：编到南方谈话为止，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看来有些地方重复还是需要的。希望编辑人员要加加班，速度快点，争取早点出。

7月12日 得知李达〔1〕本日逝世后，委托夫人卓琳向李达的亲属表示哀悼和慰问。

8月17日 审阅完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批文稿整理稿后说：我主要看能不能连贯起来。还说：这是一本比较好的书，没有空话，要快出。

8月22日 在家中过八十九岁生日。同前来看望的江泽民谈话，接受他书写的条幅“青玉案〔2〕——贺小平同志九十大寿〔3〕”。

8月24日 审阅编辑组报送的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部分文稿整理稿。向有关负责人提出：文选印成清样

〔1〕 李达，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终年89岁。

〔2〕 青玉案，词牌名。

〔3〕 这是按中国传统的虚岁计算的。

后，发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请他们提意见。还指出：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東西。

9月3日 审阅编辑组报送的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后一批文稿整理稿。在审阅完最后一篇整理稿后说：大功告成！对南方谈话的最后一段：“……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说：这个结尾不错。从五月份起，编辑组将拟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全部文稿整理稿，分十四批陆续报送邓小平逐篇审定。

9月16日 同弟弟邓垦谈话。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1〕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当时我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

〔1〕指邓小平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是空的。我退休是党中央全会认可和批准的。我的意思是建立退休制度。没有退休制度，我们的事业难以为继。长久下去，会背起一个大包袱，一堆老人。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现在证明，我退休以后，江泽民他们搞得不错。我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但毕竟年龄到这个时候了，没有精力搞了。我在旁边看到成功，在旁边鼓掌，不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嘛！要创造一种风气，一代一代传下去，让国家逐步兴旺起来。走这一步，我是跟中央的同志讲清楚了，日常的事情少管、不管，现在一点也不管，让他们放手去搞。现在我比较放心，我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我们国家大有希望，我们民族大有希望。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所以，我们退休以后也不是无事可做。观察社会问题，出点主意，原则上要掌握几条。

9月24日 《人民日报》首次公开发表邓小平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谈话，题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9月27日 审阅编辑组报送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总结报告，作出批示：“我都同意”。同有关负责人说：算完成了一件事。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编辑组在报告中汇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编辑过程中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的情况，以及作了哪些修改等，同时提出准备在一九九四年，对已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两卷重新修订出版。

10月1日 就中国申请举办二〇〇〇年奥运会未获成功一事，同国家体委负责人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

10月31日 乘车游览北京市容，视察北京机场高速公路、四元立交桥。说：北京大变样了，我都认不得了。

11月2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文选收入作者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二年间的著作，一百一十九篇。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决定》指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落实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干部和人民，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从现在起，要把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摆在党的思想建设和干部理论教育的主要地位。同日，中共中央举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学习报告会。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

发行，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三卷《邓小平文选》是个整体。第三卷同十年前出版的第二卷汇集了邓小平同志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的最重要最富有独创性的著作。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灿烂光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中央号召全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努力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把十四大提出的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认真落到实处。随后，中共中央举办了四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理论研讨班。

11月11日 同身边人员谈西雅图会议^{〔1〕}和香港问题，表示：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今后不宜再过问政治问题。

〔1〕 西雅图会议，指1993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五届部长会议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江泽民出席了这次会议。

12月9日 上午，在驻地接见参加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部分工作人员，并合影留念。在合影前，为郑必坚〔1〕、逢先知〔2〕、龚育之〔3〕题词，肯定他们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所做的工作。

△ 下午，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傍晚，途经济南作短暂停留，在火车站对姜春云〔4〕、赵志浩〔5〕、张太恒〔6〕、宋清渭〔7〕说：我很注意你们的工作，你们山东搞得很好，发展快，我放心，前几年对你们就很满意。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他们的工作是胜任的，方向、路子是正确的，工作得很好，我非常放心，这一年多来，我更放心。谈话后，同大家合影留念。

12月10日 抵达上海。

12月13日 由吴邦国、黄菊等陪同冒雨视察浦东，并登上杨浦大桥，眺望浦东开发区的建设情景。在得知该桥是当今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斜拉桥时说：感谢上海的工程技术干部，感谢上海的造桥职工，向他们问好！并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在视察上海内环线浦东段及罗山路、龙阳路立交桥后说：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并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

〔1〕 郑必坚，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2〕 逢先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3〕 龚育之，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4〕 姜春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5〕 赵志浩，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省长。

〔6〕 张太恒，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

〔7〕 宋清渭，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

1994年 九十岁

1月1日晚，由吴邦国、黄菊等陪同，来到新锦江大酒店的顶层，俯瞰浦东开发区夜景说：上海变了。并向对其表示敬意和问候的中外旅客招手致意。随后，前往南京路、外滩等处参观游览。

2月9日上午，请李鹏转达对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顺利投产的祝贺，对该电站的建设者、科技人员表示感谢。

△ 下午，和吴邦国、黄菊等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同部分老同志互致新春的祝贺和问候。说：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同志春节愉快，身体健康。祝全国人民春节愉快，家庭幸福，人民团结，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一年来你们上海一次，祝上海人民春节愉快。

2月19日 乘专列离开上海。临行前，在火车上对吴邦国、黄菊说：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上海有特殊的素质，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 下午，途经南京时作短暂停留，并同陈焕友〔1〕、固辉〔2〕、方祖岐〔3〕谈话。在陈焕友汇报到江苏省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提前七年实现翻两番时说：好，好，祝贺你们。指出：现在是机会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中国人这种机会有过多次，但是错过了一些，很可惜！你们要很好抓住。你们要发奋，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聚精会神地搞建设。还指出：你们发展经济，能快则快，不要搞快呀慢呀的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大发明。

2月20日 回到北京。

7月9日 得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逝世，致电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惊悉金日成主席不幸病逝，深感痛惜。金日成同志的一生是为朝鲜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献身的一生，也是为缔造和发展中朝友好奋斗的一生。金日成同志的逝世使朝鲜人民失去了伟大领袖，也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和同志。我谨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朝鲜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8月22日 在家中过九十岁生日，并会见前来看望的江泽民。此前，得知许多地方准备为他举办祝寿活动，表示：一律不要搞。

〔1〕 陈焕友，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省长。

〔2〕 固辉，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3〕 方祖岐，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10月1日 晚，在中南海观看国庆焰火。

11月2日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和《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经过增补和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版，分别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一卷增补了四篇著作，主要是作者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的讲话。第二卷增补了十四篇著作，其中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次增补，对作者在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已经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重要思想，作了比较充分的反映。全书共收入六十篇著作。经增补修订后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连同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第三卷，集中了邓小平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从三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长达半个多世纪中，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同第三卷在内容上前后衔接、相互贯通，形成一个科学体系，这两卷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把第一、第二、第三卷作为一个整体来学习。在学习中，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深刻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由来、形成和发展。要认真研读原著，掌握精神实质，把握理论的科学体系，理论联系实际，统一全党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12月22日 因肺部感染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995年 九十一岁

1月 春节前夕，在医院会见前来看望的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在谈话中对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巨大成绩表示由衷高兴，并请江泽民等转达他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

2月7日 病愈出院。

4月10日 陈云^{〔1〕}逝世。在陈云病重期间，曾委派秘书前往医院探望。

5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纲要》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文选》的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干部认真深入研读邓小平著作，把《纲要》的学习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计划。

5月26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建设有

〔1〕 陈云，终年90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新编本按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版本,对一九九三年一月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进行了增补修订,专题由原来的九个扩展为二十个,篇幅由原来的十八万字增加到三十二万字。

1996年 九十二岁

7月24日 《邓小平文选》一卷本中文繁体字版在香港出版。《邓小平文选》一卷本，是根据已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选编而成，收入作者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九二年的八十篇文稿。该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8月22日 在家中过九十二岁生日，并会见前来看望的江泽民、李鹏。

12月12日 上午，因患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997年 九十三岁

1月1日 十二集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开始播出。这是一部全面反映邓小平光辉业绩和伟大理论，真实再现邓小平革命生涯和伟人风采的电视文献纪录片。这部文献纪录片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邓小平在医院病房观看了这部电视文献纪录片。

2月初 春节前夕，在医院会见前来看望的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在谈话中，请江泽民等转达他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并希望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今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召开党的十五大这两件大事办好。

2月15日 卓琳暨子女邓林、邓朴方、邓楠、邓榕、邓质方致信江泽民并党中央。信中写道：近来小平同志病重，作为他的亲人，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我们知道，中央的同志们都很关心小平同志，也与我们一样，已开始考虑有关后事安排。小平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向来达观，关于他的后事，近年来曾对我们多有交代。为了体现小平同志一生的追求和信念，完美地完成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根据他的嘱托，我们提出如下意见：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小平同志历来主张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符合他的看法。二、追悼会在火化后举行。骨灰盒以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上方悬

挂体现小平同志精神面貌的彩色照片，以表达庄重肃穆的气氛。三、家中不设灵堂。四、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五、不留骨灰。根据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把骨灰撒入大海。小平同志毫无保留地把毕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我们希望，我们为小平同志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既能体现小平同志的精神本质，又能以最朴素和最庄严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哀思。

2月19日 二十一时零八分逝世，终年九十三岁。在生病住院及病重期间，江泽民、李鹏、乔石〔1〕、李瑞环〔2〕、朱镕基〔3〕、刘华清、胡锦涛〔4〕、荣毅仁〔5〕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看望。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邓小平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高度评价：邓小平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1〕 乔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 李瑞环，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3〕 朱镕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4〕 胡锦涛，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5〕 荣毅仁，当时任国家副主席。

△ 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成立。江泽民任主任委员。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公告》，决定：（一）自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之日起到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举行之日止，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和我驻外使领馆、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门分社下半旗志哀。这期间，我驻外使领馆、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门分社设灵堂，接待驻在国和港澳地区的吊唁。（二）按照我国惯例，不邀请外国政府、政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参加悼念活动。

2月20日 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发布第二号《公告》，决定：（一）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将现场转播大会实况，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收听和收看。（二）全国党政军机关，各边境口岸、海空港口，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我驻外使领馆、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门分社下半旗志哀。（三）在追悼大会举行时，上午十时整，一切有汽笛的地方，如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鸣笛三分钟志哀。（四）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嘱托和亲属的意见，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2月21日 新华社播发《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的长文，介绍邓小平的生平与贡献。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主要报纸刊登该文和邓小平各个时期的照片。

2月24日 上午，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送别邓小平，并护送邓小平的遗体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在灵车前往八宝山的道路两旁，有十多万各界人士和从各地赶来的人民群众为邓小平送别。

2月25日 上午，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群机关各部门和首都各界代表，家乡代表，生前友好等共一万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沉痛悼念邓小平。江泽民致悼词，高度评价邓小平光辉、战斗的一生和建立的丰功伟绩。指出：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小平同志，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同志。又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个理论，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还指出：邓小平同志不仅以他创立的光辉的革命理论指引着我们，而且以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鲜明的革命风格感召着我们。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的心中。强调：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能够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坚定不移，满怀信心，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月26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题为《深切悼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缅怀功绩继承遗志共创伟业》和《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把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社论。

△ 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发表第三号《公告》，对邓小平逝世后，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议会、政府部门，政党，友好团体，各界友好人士，一些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许多国家的驻华使节，在华的外国友人，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发来大量唁电、唁函，发表声明、谈话，参加吊唁活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3月2日 胡锦涛等受中共中央委托和邓小平夫人卓琳等

乘专机将邓小平骨灰撒入东海。

5月29日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讲话，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7月1日 凌晨，中英两国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江泽民庄严宣告：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我们正是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指明的方向，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终于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交接仪式特邀邓小平夫人卓琳出席。

9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二日上午，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

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报告着重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在新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的发展。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

帜。大会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规定党员和党的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后 记

《邓小平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七四）》的编撰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

冷溶任本书主审。

主 编 杨胜群：负责全书的修改、统稿和定稿；

闫建琪：负责全书的修改和统稿，负责全书的编务。

副主编 蒋永清：参与全书的修改和统稿，参与全书的核校。

分段撰写者：

姜淑萍：1904年8月至1937年6月；

张爱茹：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

裴淑英：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

宋毅军：1945年8月至1953年12月；

李 纲：1954年1月至1955年12月；

徐永军、戚义明：1956年1月至1959年12月；

刘金田：1960年1月至1962年12月；

武市红：1963年1月至1965年12月；

张 曙：1966年1月至1974年12月。

下列人员为本书提供了部分初稿：

许保利：1952年8月至1955年12月；

杨瑞广：1956年1月至1960年12月；

杨明伟、田绍珪：1963年1月至1963年12月；

安建设：1966年1月至1974年12月。

汪作玲、熊华源曾负责过本书的组织工作和部分初稿的修改。

滕文生、逢先知对书稿的编撰工作给予了指导；金冲及审读大部分书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李捷、陈晋、董宏审读部分书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汪作玲、杨瑞广、熊华源审读全部书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张宏志、廖心文、刘金田、陈欣德、黄允升、凌步机、岳思平、田西如、边彦军、袁德金、张曙、周勇、艾新全、林明远、曹应旺、迟爱萍、张素华、王双梅、宋毅军等审读部分书稿，提出了修改意见。韩洪洪、李红喜审读本书注释，提出了修改意见。龙平平参与了书稿编写的组织工作。董振瑞、刘贵军参加了部分编务工作。

王瑞林、邓朴方审读了书稿。

中央档案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中央军委档案馆，一些省市的档案馆和党史研究部门，提供了本书使用的档案材料和其他资料。一些老同志、邓小平身边工作人员和邓小平亲属也提供了有关材料。

后 记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在逢先知、滕文生、金冲及关心和指导下撰写，他们审改了全部书稿。

主 编 冷 溶：负责全书的修改、统稿和定稿；

汪作玲：负责全书的修改和统稿。

副主编 闫建琪：负责 1982 年 9 月至 1997 年的统稿，参与全书的修改和定稿；

熊华源：负责 1975 年 1 月至 1982 年 8 月的统稿，参与全书的修改和定稿，并负责全书的注释和编务。

分段撰写者：

张曙、安建设、周立平：1975 年 1 月至 1976 年 9 月；

张爱茹：1976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

武市红：1979 年 1 月至 1980 年 12 月；

徐永军：1981 年 1 月至 1982 年 8 月；

高屹、许保利：1982 年 9 月至 1983 年 12 月；

刘金田：1984 年 1 月至 1985 年 12 月；

姜淑萍：1986 年 1 月至 1987 年 10 月；

闫建琪、裴淑英、宋毅军：1987 年 10 月至 1997 年。

李红喜、张曙撰写本书的注释，张曙还参与本书编务。

龙平平曾作为副主编参与本书 1982 年 9 月至 1987 年 10 月的统稿。

中央档案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中央军委的档案部门，一些省市的办公厅、档案馆和党史研究部门，提供了本书使用的档案材料和其他资料。一些知情的老同志、邓小平身边工作人员和邓小平亲属也提供了有关材料。

参加本书全部书稿审读或部分书稿审读的单位和个人有：

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外交部、科技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

长期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王瑞林，中央统战部刘延东，中央党校郑必坚、龚育之，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刘华秋，外交部戴秉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陈云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梦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侯树栋，《胡乔木传》编写组黎虹、程中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朱佳木，本室冯蕙、力平、刘武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年谱: 全 5 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 版.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11

ISBN 978-7-5073-4744-9

I. ①邓… II. ①中… III. ①邓小平 (1904—1997)
—年谱 IV. ①A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76609 号

邓小平年谱 (1904—1997)

编 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 编/冷 溶 杨胜群 汪作玲 闫建琪
责任编辑/王春明 彭 勇 田雪鹰
封面设计/北京中献唐人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010-83089313 83089394 83072509 83072511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华艺图文设计公司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700×1000mm 16 开 218.25 印张 2530 千字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073-4744-9 定价: 368.00 元 (全 5 卷)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